微覺此生未負人

——曾彥修訪談錄

曾彥修口述
李晉西記錄整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本書是一位中共老文化人的口述回憶錄，由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整理而成，並經口述者曾彥修先生修訂付梓。

曾彥修先生今年已是九十二歲的老人。早年投奔延安，即在中共的宣傳文化系統工作。這本回憶錄真實地記載了他的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也是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大潮流中載沉載浮的一個典型。

本書有幾大方面為中國當代史留下了珍貴的紀錄：

一是他對延安的真實描述和回憶，可從一個側面為近年興起的「延安學」提供一個「過來人」的個案。而研究延安的文化界的狀況則是研究新中國的政治運動、文化發展之來龍去脈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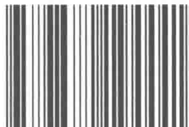
二是本書主人公五十年代初歷任廣東《南方日報》總編輯、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書中有些內容披露了解放初的廣東政界的秘聞，對香港的讀者來説當有相當的價值。

三是作者曾出任人民出版社領導職位，又被打成右派，長期在內地出版界工作，是一位資深的出版家，他的生活史也為中國出版界所經歷的血與火的浴禮留下點點史料。

四是作者親身接觸到不少中共名人，他從側面客觀地敍述了對張聞天、康生、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等人的觀察及印象，生動而具有識見。

最重要，也最值得作者自豪的是：他一生秉持良知，在頻仍的政治運動中從不對人落井下石，這就是本書書名所表示的：「微覺此生未整人」，要做到這一點，在中共體制內，尤其是文化界是很難的。

ISBN：978-988-219-444-1



H.K.$ 138.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微覺此生未整人

——曾彥修訪談錄

曾彥修口述　李晉西記錄整理



書　　名　微覺此生未整人——曾彥修訪談錄
口　　述　曾彥修
記錄整理　李晉西
責任編輯　孫立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印刷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1年8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1
ISBN ：978-988-219-444-1

目錄

代開場白……19

第一編◆

第一章 家族與我（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九三零年）……22
我們曾家十幾戶，只有我父親有職業……22
談到家鄉，我感到非常慚愧。我成了一個永遠的「望鄉」人……26
少年時代：我成為家庭多種事務的擔當者，買鴉片、進當鋪更是內行……30
沒有在母親面前下跪，這個罪，一輩子無法補……32
哥哥給了我政治方向……37

第二章 世界觀的形成……39
十歲左右，我讀了些舊小說……39
上高小後，文學對我的影響：郭沫若、魯迅、茅盾……41

我家有個百家爭鳴的小圖書館……43
我不是讀馬克思的東西覺悟的，我是讀這些人的書覺悟的……45
對我世界觀的轉變起作用的，還有這些事情……52

第三章 逐漸走上去延安之路（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59
人格教育最重要：影響我一生的兩個老師……59
初中畢業考試第二名，進了盧作孚在北碚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61
高中：我搞了兩期壁報。地下工作，無師自通……62
決定到延安去……65
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我要了三百塊，這是老虎吃天啊……67
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紹信……68
一起集議去延安的朋友：田家英、趙世英，戴碧湘、何郝炬等……70
我們是如何到延安的……72
兩點申明……73

第二編

第四章 在延安（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76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76

陝北公學三門課，學習過程中又反覆寫自傳……77
入黨，說容易也不容易，說困難也不困難……79
馬列學院非常特別，學員非常參差不齊……79
馬列學院重量級的老師：吳亮平、柯柏年、王學文、康生、陳雲、李富春、艾思奇、楊松、陳昌浩等……82
專學習聯共黨史，錯誤影響不小……85
為甚麼馬列學院辦不下去了……87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開始大讀閒書……89

第五章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發生歷史轉捩點的一年……91

統一思想、輿論……91
彭真從晉察冀調到中央當組織部長，當時他不是中央委員……93
開始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樹立毛澤東歷來正確的思想……94
把張聞天的歷史錯誤一翻，黨內的最高領導當然是毛主席了……95

第六章 跟隨張聞天到陝北和晉西北作農村調查（一九四二年一月—一九四三年四月）……98

陝北神府縣賀家川口：生產關係簡單時，我就着重調查生產力……98
晉西北興縣：我不會按地方意圖去寫調查報告……101
從田家會戰鬥談到敵後的抗戰……104
張聞天忽然就被送走了……106

陝北米脂縣：這次調查帶點學術性質……108
綏德縣：我的一個小調查報告，張聞天覺得有點意思……111
解放後，人民出版社印了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報告。我寫了出版者的話……112

第七章 在延安（三）：我在整風「搶救」時的情況（一九四三年五月—一九四五年七月）……114
回延安後，情況很不對了，跟離開時完全不一樣……114
「搶救」柯慶施……117
我被「搶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務」……120
「搶救」運動不是擴大化的問題，是無中生有的問題……124
「搶救」運動後的概況：種地，紡線，大演戲，有意放鬆了兩年……125

第八章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七年二月）……131
「王明路線」一詞是進北京後才聽說的……131
抗戰勝利，中央工作緊張，似未有大規模慶賀……133
延安大撤退：宣傳部有幾個「家族」需要我們照顧……134

第九章 在山西土改（一九四七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六月）……136
參加土改工作團……136
雁門關外的朔縣土改：不顧具體情況，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土改是不妥當的……138
臨縣郝家坡土地會上，康生說：「你們這個劃分階級的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140

郝家坡會結束後，我回到朔縣補課，大錯特錯……144

第十章　西柏坡全國土地會議後到河北山東土改（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四八年五月）……150
從山西興縣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為老同志服務……150
全國土地改革會議……154
河北饒陽土改：鬥爭目標已不明確了……158
有頭無尾，把麻煩丟給後來的人……161
康生叫我們到山東去繼續土改……166
聽見毛岸英批評康生，讚美饒漱石，我們提醒他，你不要隨便講……168
已經做過的錯事，一般沒有辦法再回頭改正……170

第十一章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一九四八年六月—一九四九年三月）……172
在東柏坡做書箱，保證了延安撤退時埋藏的部份書籍運到了北京……172
在西柏坡小新華社……175

第三編◆

第十二章　進北京，下廣州。在廣州只是一個「官」（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九五四年三月）……180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準備南下……180

葉帥、方方談話，改任《南方日報》總編輯。領導看來很滿意……182
代表葉劍英簽報紙大樣……185
陶鑄要用我，但不得不讓我去治療關節炎……189

第十三章 在廣州勉強做了四五樣事……192

半夜給「二零三」打電話：明天要殺一百多人，有些人罪狀不明確，怎麼辦……192
僑鄉調查：這麼多樓房是僑匯建起的，不應該侵犯它們……200
雲浮縣土改：改變死命令：小老婆、丫頭等問題我決定妥協處理……203
緊急開支部大會，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就流眼淚。我絕不相信有半個「老虎」……208
我這個錯誤不講，人家不知道：戲改……211
對香港有關事務問題的建議，對大學問題的建議……214

第十四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一九五四年四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218

調人民出版社工作，沒有任何人跟我談過話，我也沒有問……218
把一些淺薄低級的純蘇式教條的東西，想法用各種方式停止出版了……220
大請京派學者們吃飯，同時積極翻印一些有影響的舊書……223
權力能達到的地方，想辦法開開窗戶，透點新鮮空氣……226

第十五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整人」運動（一）：批胡適、批胡風……229

批胡適，經歷了一段瞎忙。出的書，我一個字未看過……229

反胡風，我們單位算是沒有胡風分子……231

第十六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整人」運動（二）：「內部肅反」……236

正式消除了對不少人的懷疑……236

把上面抓得最緊的對戴文葆的懷疑徹底取消了……238

我們被秘密監管張惠卿，我這個五人小組組長竟然全不知道……241

他是戴笠手下的特務嗎……242

「雖然我因你而受到更厲害的批鬥，但我從內心感激你」……244

「肅反」涉及的另外幾個人……246

第十七章　反右派運動興起，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號《人民日報》社論之前吧……250

吹風會上聽到陸定一、周揚傳達毛主席不斷批左的意見……250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講了些甚麼……253

會上發了〈草木篇〉，立即又收回……259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大大誇獎姚文元，大家都反感極了……260

第十八章　我這個「反右」五人小組組長，絕沒有整別人一點點，首先把自己報成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九六零年六月）……263

人民出版社的「×、×事件」……263

內部通知片片來……267

我的右派「根據」：黑板報上的「談話」，《人民日報》座談會上的發言……268
田家英確曾暗示過我，少說點……273
中央級的新聞、出版社的負責人，似乎沒有一個跑掉的，一鍋端……274
報右派名單，我把自己報上去。我自高自大想，我一個是不是可以頂兩個呢……276
今天可以明確地說，對我的批判完全是我不得不設法拖延時間的……280
要我性命的控告來了，形勢超級嚴峻，似乎是準備當場逮捕……282
黨內的右派狀元，但對我的處理很輕……285
可能因為我的原因，人民社劃右派的比例很高……287

第十九章 大躍進時期和「三年自然災害」……291
右派沒有資格參加大煉鋼鐵，專代抄大字報……291
「三年自然災害」……294

第四編◆

第二十章 在上海辭海編輯所（一九六零年六月—一九六四年九月）……300
調七八十個右派，結果只調去了兩三個……300
提意見只能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提真正重要的……302
石西民總結了《辭海》的根本大法……303

第二十一章　我在「四清」中為三十個工人徹底平了反，至今負責（一九六四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307
車間審查部份工人政治歷史，不得不全部由我負責，全部無事……307
被懷疑是特務的小資本家，其實是解放前救過地下黨員的同情分子……312
說人家是漢奸反革命，其實是抗戰時我們派出的「兩面村長」……315
一個真新四軍，長年被懷疑是特務分子……316
被認為是「濫權」病退了女工的女支書，差點被開除黨籍……319
「勸退」黨的會上，臨時暗中緊急改變「勸退」決定……322

第二十二章　半飢半飽，強作風流……326
我的關節炎竟然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326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麼度過業餘時光的……327

第二十三章　「文革」早期：牛棚虐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一九六九年九月）……333
甚麼人進「牛棚」……333
打掃廁所的學問，我可以寫一本很不錯的小冊子……337
天天早晚請罪中之千奇百怪……338
牛鬼蛇神有的不准坐公交車，後來全不准坐……340
不准在食堂吃飯……341

天天讀：他們幹出來的惡事，不應該是人類想得出來的……342
除了搬大餐桌，我還要在廣告牌上貼批判我的大字報，既有生命危險，又污辱人……344
第二十四章 「文革」中期：三年幹校勞動（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九七二年三月）……348
在奉賢縣海邊的勞動強度是很大的，相當緊張……348
平常看見我是一把骨頭，一勞動，樣樣會幹……350
我跟鄭炳中（耿庸）做管水員……351
撈水藻、撈水浮蓮、拉大車、倒石子……354
挑水，掏豬圈，沖鹽鹼……356
表面上對我要大整，重要的問題反而要請教我……358
用各種勞動去代替各種強迫思想「改造」……359
在寬寬的田埂上，吸着「勞動」牌香煙，做做打油詩消遣……362
第二十五章 「文革」後期：心如死灰（一九七二年四月——一九七七年六月）……364
閒散人員，一當就是六年……364
那個時候就是絕望，是等死——不是等死，是等被捕……365
這幾天不對頭，殺氣騰騰，他們動手了，我準備犧牲了……370
本單位宣佈「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會上，負責人卻專罵右派……371
一輩子有三件最快樂的事情，我都看見了，幸何如哉……372

第五編

第二十六章 調回北京到大百科全書籌備小組（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九七九年七月）……376
交給于光遠關於六十一個人和張聞天的證明材料……376
調回北京的經過……380
重新入黨申請書確實難寫，覺得不能恢復就算了……383
在大百科全書待了大半年，感覺能力實在太不夠了……384

第二十七章 回人民出版社：「外國政治學術叢書」禍起蕭牆（一九七九年八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386
沒幹幾天，「反精神污染」等政治運動來了，我立即辭職……386
為甚麼要發起出版「外國政治學術叢書」……388
發起出版「外國政治學術叢書」的簡單經過……390
胡耀邦立即批示，贊成「外國政治學術叢書」計劃……395

第二十八章 「颱風」的經過與我的三萬言〈申訴書〉……398
事情是這樣起來的……398
×××與我的總分歧：堅持馬列與堅持「雙百」方針是不是不能並存……399
比利時的曼德爾，跟中國的大權威開了一個大玩笑……403

現在還能堅持布哈林是個反革命分子嗎？太怪了……405
人民出版社還有個「反蘇」問題（指契爾年科時期）……408
是否應該了解外國黨（外國共產黨）……411
我在〈申訴書〉裏反覆要求×××道歉……412

第六編◆

第二十九章　張聞天：有才有識，大公無私，樸素謙遜，但是比較軟弱……419
在遵義會議中的作用……419
西安事變，最早主張全面和平解決的是張聞天……421
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首先提出應有繼承的因素在內……423
在延安馬列學院院長這段時間，我認為張至少不全是過……424
一九四二年初起的農村調查……426
至少張在表面上也已捲入了個人崇拜的巨潮中……426
「文革」期間在六十一個人問題上的崇高表現……427
逝世早了三個多月，給世人留下永遠的悲哀……428
第三十章　有才無德的康生……429
知識廣博……429

他是個害人狂……433
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絕不糊塗……435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437

第三十一章　陳伯達：才勝於學，學勝於德，德毀於位……440

不知為何威信一落千丈……440
我與陳伯達的關係……445
陳在延安整風中的特殊重要性……450
一個很有才情的人，最後成為一個反革命的頭子，確實是一場大喜劇……454

第三十二章　陸定一：中年就被自己人捉捕，最悲慘，才、識，沒有得到發揮……456

幾乎一生都任宣傳部長，但留下的著作並不多……456
教我們的是政治，不大講技術……458
進北京城以前，叫我做過三件小事……460
我弄不清「雙百」方針最早是誰提出的……461
最好不要正式提出「反對自由化」的口號……462
他為我題字，我能做到一點點就好了……463

第三十三章　謎一樣的胡喬木……464

也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大才人……464

在延安時期的作用……467
調我到中宣部去……471
同田家英到胡喬木的窰洞裏編語文課本……473
審查我編的十本小冊子……477
「不必回宣傳部了，就跟新華社到北京吧」……482
胡喬木的外表與內心似乎大有矛盾之處……483
在經濟上反對改革開放，過去沒有點名是他……490
尾聲：我對兩個「和諧」問題的一點看法……493
後記／李晉西……508
附錄……510

微覺此生未整人

——曾彥修訪談錄

曾彥修口述　李晉西記錄整理



書　　名　微覺此生未整人——曾彥修訪談錄
口　　述　曾彥修
記錄整理　李晉西
責任編輯　孫立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印刷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1年8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1
ISBN ： 978-988-219-444-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
焚烧只当闲粉身碎骨浑
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诗

曾彦修同志

陆定一七十八岁



陸定一為曾彥修的題字

目錄

代開場白……19

第一編◆

第一章 家族與我（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九三零年）……22

我們曾家十幾戶，只有我父親有職業……22
談到家鄉，我感到非常慚愧。我成了一個永遠的「望鄉」人……26
少年時代：我成為家庭多種事務的擔當者，買鴉片、進當鋪更是內行……30
沒有在母親面前下跪，這個罪，一輩子無法補……32
哥哥給了我政治方向……37

第二章 世界觀的形成……39

十歲左右，我讀了些舊小說……39
上高小後，文學對我的影響：郭沫若、魯迅、茅盾……41

我家有個百家爭鳴的小圖書館……43
我不是讀馬克思的東西覺悟的，我是讀這些人的書覺悟的……45
對我世界觀的轉變起作用的，還有這些事情……52

第三章 逐漸走上去延安之路（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59

人格教育最重要：影響我一生的兩個老師……59
初中畢業考試第二名，進了盧作孚在北碚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61
高中：我搞了兩期壁報。地下工作，無師自通……62
決定到延安去……65
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我要了三百塊，這是老虎吃天啊……67
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紹信……68
一起集議去延安的朋友：田家英、趙世英，戴碧湘、何郝炬等……70
我們是如何到延安的……72
兩點申明……73

第二編

第四章 在延安（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76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76

陝北公學三門課，學習過程中又反覆寫自傳……77
入黨，説容易也不容易，説困難也不困難……79
馬列學院非常特別，學員非常參差不齊……79
馬列學院重量級的老師：吳亮平、柯柏年、王學文、康生、陳雲、李富春、艾思奇、楊松、陳昌浩等……82
專學習聯共黨史，錯誤影響不小……85
為甚麼馬列學院辦不下去了……87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開始大讀閒書……89

第五章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發生歷史轉捩點的一年……91

統一思想、輿論……91
彭真從晉察冀調到中央當組織部長，當時他不是中央委員……93
開始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樹立毛澤東歷來正確的思想……94
把張聞天的歷史錯誤一翻，黨內的最高領導當然是毛主席了……95

第六章 跟隨張聞天到陝北和晉西北作農村調查（一九四二年一月——一九四三年四月）……98

陝北神府縣賀家川口：生產關係簡單時，我就着重調查生產力……98
晉西北興縣：我不會按地方意圖去寫調查報告……101
從田家會戰鬥談到敵後的抗戰……104
張聞天忽然就被送走了……106

陝北米脂縣：這次調查帶點學術性質……108
綏德縣：我的一個小調查報告，張聞天覺得有點意思……111
解放後，人民出版社印了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報告。我寫了出版者的話……112

第七章 在延安（三）：我在整風「搶救」時的情況（一九四三年五月—一九四五年七月）……114
回延安後，情況很不對了，跟離開時完全不一樣……114
「搶救」柯慶施……117
我被「搶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務」……120
「搶救」運動不是擴大化的問題，是無中生有的問題……124
「搶救」運動後的概況：種地，紡線，大演戲，有意放鬆了兩年……125

第八章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七年二月）……131
「王明路線」一詞是進北京後才聽說的……131
抗戰勝利，中央工作緊張，似未有大規模慶賀……133
延安大撤退：宣傳部有幾個「家族」需要我們照顧……134

第九章 在山西土改（一九四七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六月）……136
參加土改工作團……136
雁門關外的朔縣土改：不顧具體情況，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土改是不妥當的……138
臨縣郝家坡土地會上，康生說：「你們這個劃分階級的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140

郝家坡會結束後，我回到朔縣補課，大錯特錯……144

第十章 西柏坡全國土地會議後到河北山東土改（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四八年五月）……150
從山西興縣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為老同志服務……150
全國土地改革會議……154
河北饒陽土改：鬥爭目標已不明確了……158
有頭無尾，把麻煩丟給後來的人……161
康生叫我們到山東去繼續土改……166
聽見毛岸英批評康生，讚美饒漱石，我們提醒他，你不要隨便講……168
已經做過的錯事，一般沒有辦法再回頭改正……170

第十一章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一九四八年六月——一九四九年三月）……172
在東柏坡做書箱，保證了延安撤退時埋藏的部份書籍運到了北京……172
在西柏坡小新華社……175

第三編◆

第十二章 進北京，下廣州。在廣州只是一個「官」（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九五四年三月）……180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準備南下……180

葉帥、方方談話，改任《南方日報》總編輯。領導看來很滿意……182
代表葉劍英簽報紙大樣……185
陶鑄要用我，但不得不讓我去治療關節炎……189

第十三章　在廣州勉強做了四五樣事……192
半夜給「二零三」打電話：明天要殺一百多人，有些人罪狀不明確，怎麼辦……192
僑鄉調查：這麼多樓房是僑匯建起的，不應該侵犯它們……200
雲浮縣土改：改變死命令；小老婆、丫頭等問題我決定妥協處理……203
緊急開支部大會，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就流眼淚。我絕不相信有半個「老虎」……208
我這個錯誤不講，人家不知道：戲改……211
對香港有關事務問題的建議，對大學問題的建議……214

第十四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一九五四年四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218
調人民出版社工作，沒有任何人跟我談過話，我也沒有問……218
把一些淺薄低級的純蘇式教條的東西，想法用各種方式停止出版了……220
大請京派學者們吃飯，同時積極翻印一些有影響的舊書……223
權力能達到的地方，想辦法開開窗戶，透點新鮮空氣……226

第十五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整人」運動（一）：批胡適、批胡風……229
批胡適，經歷了一段瞎忙。出的書，我一個字未看過……229

反胡風，我們單位算是沒有胡風分子……231
第十六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整人」運動（二）：「內部肅反」……236
正式消除了對不少人的懷疑……236
把上面抓得最緊的對戴文葆的懷疑徹底取消了……238
我們被秘密監管張惠卿，我這個五人小組組長竟然全不知道……241
他是戴笠手下的特務嗎……242
「雖然我因你而受到更厲害的批鬥，但我從內心感激你」……244
「肅反」涉及的另外幾個人……246
第十七章 反右派運動興起，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號《人民日報》社論之前吧……250
吹風會上聽到陸定一、周揚傳達毛主席不斷批左的意見……250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講了些甚麼……253
會上發了〈草木篇〉，立即又收回……259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大大誇獎姚文元，大家都反感極了……260
第十八章 我這個「反右」五人小組組長，絕沒有整別人一點點，首先把自己報成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九六零年六月）……263
人民出版社的「×、×事件」……263
內部通知片片來……267

我的右派「根據」：黑板報上的「談話」，《人民日報》座談會上的發言……268
田家英確曾暗示過我，少說點……273
中央級的新聞、出版社的負責人，似乎沒有一個跑掉的，一鍋端……274
報右派名單，我把自己報上去。我自高自大想，我一個是不是可以頂兩個呢……276
今天可以明確地說，對我的批判完全是我不得不設法拖延時間的……280
要我性命的控告來了，形勢超級嚴峻，似乎是準備當場逮捕……282
黨內的右派狀元，但對我的處理很輕……285
可能因為我的原因，人民社劃右派的比例很高……287

第十九章 大躍進時期和「三年自然災害」……291
右派沒有資格參加大煉鋼鐵，專代抄大字報……291
「三年自然災害」……294

第四編

第二十章 在上海辭海編輯所（一九六零年六月—一九六四年九月）……300
調七八十個右派，結果只調去了兩三個……300
提意見只能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提真正重要的……302
石西民總結了《辭海》的根本大法……303

第二十一章　我在「四清」中為三十個工人徹底平了反，至今負責（一九六四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307
車間審查部份工人政治歷史，不得不全部由我負責，全部無事……307
被懷疑是特務的小資本家，其實是解放前救過地下黨員的同情分子……312
説人家是漢奸反革命，其實是抗戰時我們派出的「兩面村長」……315
一個真新四軍，長年被懷疑是特務分子……316
被認為是「濫權」病退了女工的女支書，差點被開除黨籍……319
「勸退」黨的會上，臨時暗中緊急改變「勸退」決定……322
第二十二章　半飢半飽，強作風流……326
我的關節炎竟然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326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麼度過業餘時光的……327
第二十三章　「文革」早期：牛棚虐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一九六九年九月）……333
甚麼人進「牛棚」……333
打掃廁所的學問，我可以寫一本很不錯的小冊子……337
天天早晚請罪中之千奇百怪……338
牛鬼蛇神有的不准坐公交車，後來全不准坐……340
不准在食堂吃飯……341

天天讀：他們幹出來的惡事，不應該是人類想得出來的……342
除了搬大餐桌，我還要在廣告牌上貼批判我的大字報，既有生命危險，又污辱人……344

第二十四章 「文革」中期：三年幹校勞動（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九七二年三月）……348
在奉賢縣海邊的勞動強度是很大的，相當緊張……348
平常看見我是一把骨頭，一勞動，樣樣會幹……350
我跟鄭炳中（耿庸）做管水員……351
撈水藻、撈水浮蓮、拉大車、倒石子……354
挑水，掏豬圈，沖鹽鹼……356
表面上對我要大整，重要的問題反而要請教我……358
用各種勞動去代替各種強迫思想「改造」……359
在寬寬的田埂上，吸着「勞動」牌香煙，做做打油詩消遣……362

第二十五章 「文革」後期：心如死灰（一九七二年四月——一九七七年六月）……364
閒散人員，一當就是六年……364
那個時候就是絕望，是等死——不是等死，是等被捕……365
這幾天不對頭，殺氣騰騰，他們動手了，我準備犧牲了……370
本單位宣佈「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會上，負責人卻專罵右派……371
一輩子有三件最快樂的事情，我都看見了，幸何如哉……372

第五編 ◆

第二十六章 調回北京到大百科全書籌備小組（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九七九年七月）……376

交給于光遠關於六十一個人和張聞天的證明材料……376

調回北京的經過……380

重新入黨申請書確實難寫，覺得不能恢復就算了……383

在大百科全書待了大半年，感覺能力實在太不夠了……384

第二十七章 回人民出版社：「外國政治學術叢書」禍起蕭牆（一九七九年八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386

沒幹幾天，「反精神污染」等政治運動來了，我立即辭職……386

為甚麼要發起出版「外國政治學術叢書」……388

發起出版「外國政治學術叢書」的簡單經過……390

胡耀邦立即批示，贊成「外國政治學術叢書」計劃……395

第二十八章 「颱風」的經過與我的三萬言〈申訴書〉……398

事情是這樣起來的……398

×××與我的總分歧：堅持馬列與堅持「雙百」方針是不是不能並存……399

比利時的曼德爾，跟中國的大權威開了一個大玩笑……403

現在還能堅持布哈林是個反革命分子嗎？太怪了……405
人民出版社還有個「反蘇」問題（指契爾年科時期）……408
是否應該了解外國黨（外國共產黨）……411
我在〈申訴書〉裏反覆要求×××道歉……412

第六編

第二十九章 張聞天：有才有識，大公無私，樸素謙遜，但是比較軟弱……419
在遵義會議中的作用……419
西安事變，最早主張全面和平解決的是張聞天……421
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首先提出應有繼承的因素在內……423
在延安馬列學院院長這段時間，我認為張至少不全是過……424
一九四二年初起的農村調查……426
至少張在表面上也已捲入了個人崇拜的巨潮中……426
「文革」期間在六十一個人問題上的崇高表現……427
逝世早了三個多月，給世人留下永遠的悲哀……428
第三十章 有才無德的康生……429
知識廣博……429

他是個害人狂……433
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絕不糊塗……435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437
第三十一章 陳伯達：才勝於學，學勝於德，德毀於位……440
不知為何威信一落千丈……440
我與陳伯達的關係……445
陳在延安整風中的特殊重要性……450
一個很有才情的人，最後成為一個反革命的頭子，確實是一場大喜劇……454
第三十二章 陸定一：中年就被自己人捉捕，最悲慘，才、識，沒有得到發揮……456
幾乎一生都任宣傳部長，但留下的著作並不多……456
教我們的是政治，不大講技術……458
進北京城以前，叫我做過三件小事……460
我弄不清「雙百」方針最早是誰提出的……461
最好不要正式提出「反對自由化」的口號……462
他為我題字，我能做到一點點就好了……463
第三十三章 謎一樣的胡喬木……464
也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大才人……464

在延安時期的作用……467
調我到中宣部去……471
同田家英到胡喬木的窰洞裏編語文課本……473
審查我編的十本小冊子……477
「不必回宣傳部了，就跟新華社到北京吧」……482
胡喬木的外表與內心似乎大有矛盾之處……483
在經濟上反對改革開放，過去沒有點名是他……490
尾聲：我對兩個「和諧」問題的一點看法……493
後 記／李晉西……508
附 錄……510

代開場白

誠實之花

一位禪師為挑選自己的衣鉢傳人，發給眾多的門徒每人一包花籽，宣佈誰種出的花兒最美麗，就傳位給誰。

比花的時候到了，衆人各自捧着盛開的鮮花，來見禪師。只有一位弟子捧着空花盆，神情坦然地站在一旁。最後禪師將衣鉢傳給了這位弟子，原因是他的花盆裝滿了誠實之花。原來禪師給大家的花籽全是煮過的，根本就不能發芽。

二零一一年一月《參考消息》取自台灣《禪心學院》

第一編



第一章 家族與我（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九三零年）

我們曾家十幾戶，只有我父親有職業

我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四川川南長江邊的宜賓縣城內，現在九十歲，說老也不老，說年輕也不年輕，路是不大能走了，唯一的是腦筋還沒有完全壞。

我們是客家人，是從廣東河源縣遷移到四川的。清廷初建時，四川幾乎是空的。現在歷史不講真話，其實是張獻忠及部下殺乾淨的。現在我們的歷史反過來講，說是清兵殺乾淨的。這說不通，一個統治者把人都殺光了，它統治甚麼呢？能夠認識到，並堅持是張獻忠殺光的，是魯迅和郭沫若。對此我很佩服。

我們曾家十幾家人，原來都是窮苦人，不知怎麼去到了四川宜賓縣。但這些人後來怎麼會統統都變成了官僚、小地主，我就不知道了。這十幾家中，有兩三家是做官的，還做得不小。我有個伯父，他們家門口懸有大金匾：「大夫第」。是甚麼官？我不知道。但是從他們家房屋的排場

看得出來，官很大。我們家的門口，也有個牌子，寫有類似「進士第」這樣的字。這個字牌是清朝時期模樣的，很小，邊上有花、有金。這進士是誰？是我祖父的一個兄長。我曾祖父很久沒有男孩，依照宗法關係，就必須過繼一個男孩來。他就過繼到我們這房來，成了我名義上的祖父。我沒有見過他。據說他後來成了太原府知府，又據說在義和團時，他支持義和團。八國聯軍來後，支持西太后的都殺頭了，他差點被殺頭。在他過繼到我們家後，我的祖父出生了，他又回到他的那房去。但是依照宗法關係，他還是屬於我們家的正宗。所以，那一套做官時的東西統統放到我們家。他的那頂呢轎，那些迴避牌等等，我都在我家樓上看見過。

但到我記事的時候，我們北門外這十幾家人，政治勢力全沒有了，全成了破落戶。十幾家中，跟我父親一輩的人，大概有二三十個，只有我父親一個人有職業。

我十七歲最後離開宜賓前，我們曾家在宜賓北門外有十好幾戶。十幾家人中，沒有一個人勞動，沒有一個人幹事情，完全靠收一點地租過活，全部是破落戶，窮得很。我們家父輩三弟兄，大概共收十來石租，一石三百斤，十石三千斤。當時是送租。所謂送租，並不是送米來，都是到時農民送錢來，有時也送米，是送新米。我父親三個兄弟，每個人留幾石。我們家裏收的租，合毫洋大概二三十元，與生活來源無甚麼關係了。其他十幾家，是靠收租過日子。全都是破落地主。那時，租佃關係也似乎沒有甚麼爭鬥，農民自己送來。我們這十幾家人，大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田在哪裏。如果人家不給你送來，你也沒有辦法。

我父親曾海如，最初當布店學徒，後來當銀號學徒。銀號就是舊時的銀行，也兼做生意。

四川的銀號都兼做生意，而且只做大生意。我父親開始一個月有四五十塊毫洋（毫洋一元二角兑一塊大洋），慢慢增加了。後來，我父親出資一千元，自己開銀號，當第一號老闆，做最大的股東。當時開這個小銀號，一共兩千元。大概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我父親就破產了。破產的原因大多是地方軍閥籌款，款越派越多。地方軍閥籌款的對象，一個是錢莊，一個是山貨莊，一個是綢緞舖，還有鴉片行。

破產後，我父親到重慶的一家小銀號當副手，名義上是第二把手（副經理），其實是第一把手（經理）。經理是個秀才，代表資方而已。過去的銀號就四五個人，做生意都在外邊跑，又叫「跑街」，銀號的業務大，人員少，所以伙食好極了，好得無法想像，好到現在你想到市場上去買來做一頓都絕對辦不到。像海參、鮑魚、魚翅、大蝦米、雲南火腿，今天根本吃不到，那時內地的大縣城都有。銀號裏有個專門做飯的，家家銀號一樣。我估計，這是中國的傳統。

因為我家裏父親工作，有收入，生活就完全不一樣，父親每個月寄四十毫洋回來。我去取過幾年，是在一個賣鴉片兼銀號裏取的。當時我十一二歲，我哥哥姐姐都去讀書住校了，我必須去取。

從廣東移民的十幾家，能夠全掙扎出來的，那時就是我們這一家。原因就是讀書，不讀書，不讀外面的報紙、雜誌，你甚麼都不知道。你光上私塾就變不了。儘管讀《詩經》、《左傳》，但不知道外面世界，便甚麼也改變不了。我父親到重慶後，訂了許多上海的書報，我們都能看到。

在宜賓，我們曾家老一輩，包括我父親那一輩，抽鴉片很普遍。比我出生早二十年、十幾年的，怕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抽。我父親三兄弟，包括最靠近的堂弟都抽。這種情況，現在很多人不太知道。在四川抽鴉片，比抽香煙還要普通，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們那一帶的強體力勞動者，大多抽鴉片，以振奮一時，抬滑竿的、拉船的、碼頭工人，大多抽。香煙剛傳到宜賓縣城時，也有幾個中青年手中夾根紙煙，卻被視為浪蕩公子，抽鴉片呢？彼此彼此。如果這家沒有人抽鴉片，才成了怪事。不但男的抽，我母親，還有兩個嬸母也抽。這些抽鴉片的家是不是都破爛得不成樣子呢？不是。那時抽不稀奇，不抽點鴉片似乎身份不夠似的。當時鴉片不太貴。但是，要飯的、路斃的也很多。

我們曾家從官僚地主，變成破落地主，變成只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最後連肚子都吃不飽，也不勞動，成了城市貧民，也不想辦法賺幾個錢，他們是怎麼活下來的，我全不知道。

為甚麼我要講這些呢？現在的青年不知道有這樣的社會，因為活到九十歲，我就知道我們家鄉的這種情況。這個社會是腐爛的，腐爛透了，這種腐爛是不聲不響的。當時的生活水平很低，不如現在北京或者上海領救濟金的人，買米都是一斤半斤的買，但是要抽鴉片。清末時期，還沒有變化，到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還是這種情況。舊中國如果不發生變動的話，這個社會不腐爛下去才怪。不光是我們曾家，北門外還有幾個姓，姓龍的、姓李的，情況都類似。所以，中國這時的社會，不改造，確實是要徹底腐爛的。

阻止腐爛的任務，國民黨未能承擔而由共產黨承擔了。當然，後來中共的有些手段有點過份

激烈。但是，中國這樣行將腐爛的社會，不是靠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領導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隊伍，進行多年武裝鬥爭，又怎麼挽救得過來呢？

談到家鄉，我感到非常慚愧。我成了一個永遠的「望鄉」人

教會勢力大——

四川宜賓是岷江與長江匯口的地方。宜賓以上，一般叫金沙江，宜賓以下，叫長江。金沙江，因為沙子裏面可以淘金，叫金沙江。金沙江水流很大。宜賓北門這邊有岷江，又稱錦江，是從成都流來的，所以我們的縣城成了金沙、錦水匯合的地方，可謂中國第一佳城。我們坐輪船到重慶，再從重慶坐船到上海，很方便。宜賓在川西南，處於川、滇、黔三省結合部，緯度跟浙江溫州差不多，富庶無比。

我一九三六年冬天回過一次家鄉，以後再也沒有回去過。所以，現在談到家鄉，感到非常慚愧。我像個忘本的人。原因何在？這跟我的關節炎，跟行動不太方便分不開。一個人出去，甚麼都要人家服務，所以我無法行動。一九五七年後，我成了國事犯了，怎麼還能回去？回去要被立刻驅逐出境也說不一定。那是政治使然。

解放前，我們家鄉外國人的勢力特大，加拿大的、美國的、法國的，在縣城裏外，佔的面積

往往超過老百姓區域。北門外，他們房子很多、很大。草地花園，人間仙境。好的地方，都是教會買去了。但老百姓從來不招呼任何外國人。小時候怕洋人。我幾歲時，大人說，洋人會把小孩子拿去蒸來吃，教會醫院專找小娃娃去吃掉。縣裏的醫院是洋人辦的，很大、很好，不大有人去看病。縣裏的學校，男中有三個，有一兩個是教會學校，很漂亮。但是，所有的家庭都看不起教會學校，上教會學校會沒面子，這跟北京、天津、上海全不一樣。在我們那裏，如果有孩子上教會學校，連家長都被人看不起。中國人被外人僱用的，也被中國人看不起。可見我們那個地方是很落後的。思想上，封建主義佔絕對地位。那時中國是一個非常頑固、保守、停滯的社會。別人沒看到，魯迅看到了，有點悲觀。從這點看，中國要進步，很難。對洋人又怕、又恨，連醫院都不敢進。那時，我們的思想狀況就是這樣。全國有這樣思想的地方肯定不少。上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我們縣城的老百姓，絕大多數還是半義和團思想，還是相信外國人是要吃人的。

物產豐富——

家鄉的氣候，熱起來熱得很，雨又多，未見過雪。這種氣候，甚麼都長得快，長得好。

我們家鄉極富裕，全國少有。我在成都平原住過，在杭嘉滬平原住過，在廣東住過，這些地方的物產種類都不如宜賓。比如宜賓的甘蔗有十幾種，灰的、白的，粗的、細的，各種各樣。宜賓的糖，各種各樣。橘子，也有十來種。橘子青的時候，小孩子抓起來像丟石子一樣扔，大人也

不太在意，因為太多了。成熟的時候，路過橘子林，可以隨手拿來吃，不給錢，但是不能帶走。北方棗子成熟的時候，去棗林也只可以吃，不能帶走，帶就是偷了。我們那裏橘子多到甚麼程度呢？無法想像。中藥需要大量的橘子皮，城裏人吃了橘子就丟皮，只好在錦江邊上買一船一船的橘子，僱小孩子來剝皮。肉沒有人來買，就丟到江裏。

宜賓的荔枝，紅的，那麼好看，沒有看見過。品種可能不如廣州的小核桂味荔枝，味道差一點，但也很好吃，產量甚大。還有李子，別的地方沒有見過這麼好的，是最好的，有半個雞蛋大，灰黃色，脫核，主要是香，世界上無此好香味。

我們的紅燒雜錦，普通人家也有能力辦到，有雞、海參、雲南火腿、冬筍、蝦仁、冬菇……。我們家鄉的吃，講究到甚麼程度？有一家包子店，包子裏是火腿丁、黑木耳、雞肉丁、冬筍丁、豬肉丁、蝦米丁、黃花菜丁、新鮮的豌豆……紅黃藍白黑都有，味道絕好，顏色更佳。這家店有多麼大？佔半個走道，進深一丈多，最多容四個顧客。解放後，我在廣州喝過早茶，覺得不如我們宜賓的好吃。一個餃子，就是兩個蝦。我覺得大大不如我家鄉的。

宜賓的酒也了不起。各地方都說自己第一，我現在感覺到評第一第二很難，沒有意義。我不但喝酒，而且只喝高度酒，高度酒才香，我一定要喝五十度以上的，現在也喝，天天喝半兩。

五糧液，是解放後才叫的，解放前叫「敘州大麯」。我們縣做酒的地方叫「糟房」，「糟」字，統統唸成「曹」。最大一家叫張萬和。大酒廠都有大門市部，有小桌，可以到那裏喝酒，有花生、胡豆、豆腐乾下酒。也有蠶蛹下酒的，我看見就怕。

五糧液的酒店及酒作坊，老招牌叫「原發升」，老闆尹紹周，是宜賓縣及下川南地下黨的創始人。尹紹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時領導大家遊行，淋了大雨，生病死了。他的兒子尹伯明當了酒莊的負責人，同時又是地下黨的領導人。一九三一年後的抗日運動等，就是由他暗中在地下領導的。這個人我見過。他那時可能沒有組織關係。一九三六年我回鄉一次，一天，在宜賓東街上碰見他。他穿個黑馬褂，長衫全是華達呢，高等士紳派頭。我哥哥跟他說了幾句話。我哥哥在銀行當職員。後來我哥哥問我，你知不知道他是誰？我哥哥跟我講了尹伯明是宜賓縣一切救亡運動的領導。我哥哥就在他的領導下。尹伯明在「文革」中死得不明不白。他是真正的川南黨的地下創立人。

中央檔案館現存七件宜賓黨團在川南活動的文件原件。這些文件是向重慶省委報告情況的，是尹氏父子寫給吳玉章，或者楊尚昆的四哥楊闇公的。這些文件從重慶到了上海。一九三七年後通過抗戰，又通過解放戰爭這麼多年，竟然保存下來了，真是人間奇蹟，是地下黨的偉大功勞。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各地興起的救亡運動，大多是失掉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領導起來的，方式都差不多，出牆報、組織讀書會、歌詠隊、演劇隊、演講等等。那時期國民黨的特務還未發展到內地省份與基層，不然全被它捉（抓）光了。

我們那個縣的商業很繁榮，在西南，幾乎是第一個。縣城不太大，商業很發達。雲南的物資都是用高過頭頂的立背，背到宜賓的。昆明、貴州、西康、川西的土特產都運輸到宜賓，再上船從長江運出去。

我這個人，解放後沒有回過宜賓，想起來，很難過，很難過，是罪人。

少年時代：我成為家庭多種事務的擔當者，買鴉片、進當舖更是內行

從一九二幾年開始，到一九三四年底我轉學到重慶之前的八九年，我成為家庭雜務的主要擔當者。

我父親長期在重慶，家裏有母親、祖母（後）和我。我哥哥從初中起就住學，後到成都去讀書也住學。我姐姐也住學。我妹妹和姐姐一起住學。這樣一來，家裏要維持一個中等門面，就有許多事。我從小就做事。我家裏有一個女傭，主要是管做飯。我媽媽抽鴉片，小腳，能幹，但不能出門。買菜甚麼的，都是我。我到今天也覺得奇怪，我母親每天晚上要我去買酒，二三兩的買，做菜的油也是一兩天去買一次。為甚麼不是一次多買一點呢？不是錢的問題，錢來不了，就去當舖。我有一點大概是超過魯迅的，那就是進當舖的次數。平常得很，一年進出幾次，倒未受欺負，見面時，老掌櫃還要說：「來啦！」

除了家務，我還管敬拜祖宗，拜天地衆神。天天晚上燒香都要跪下來，叩頭。還要點一盞燈，我們那裏叫神燈。拜祖先在堂屋，我一個人，十一二歲，很怕。媽媽雖然就住在旁邊的房子裏，但這些活動都只有我一個人。土地神——貼一張紅紙就算是土地神了，也天天拜。灶房也要天天點盞燈，還拜灶神。所有這些迷信活動，都歸我做。給祖宗燒紙錢，也是我，怎麼買，怎麼

做，怎麼燒，也是我的任務。我還管端陽節前後掛菖蒲，寫祛五毒的黃紙等。還要「嫁毛蟲」，房中遍貼一種用雄黃在黃紙上寫的中型字條，上書「張三閒，欠我木瓜錢，一去青州七八年」，貼遍全屋。據説，毛蟲見着就會跑走。這是民俗，不知它的源流是怎麼的。

每年過年，初二後到家外拜年。近房的長輩我都要去拜年，我還要去拜我哥哥未來妻子的父親。每年拜年，要拜十來家。過年的時候，初一到十五，活動多，掛祖先神像、點燈……

夏天，快黃昏時蚊子多，要熏蚊子。用扎成長三尺左右的乾艾草熏，所有的房子都要熏。雖然有蚊帳，但不把蚊子熏昏，根本無法睡覺。蚊子像成群的轟炸機一樣，而且暗中像有個總指揮，大轟一陣，又息一陣。

我哥哥喜歡養鴿子，但他住在學校裏，我還代他管理鴿子。我不太會養鴿子，還得管；家裏還有一個大石頭魚缸，我還要管買蟲子餵金魚等等。我們的祖墳離宜賓遠，要坐船，我十多歲的時候，上祖墳我一個人去。

我母親抽的鴉片，也由我買。買鴉片煙膏，買二両，送到專門熬鴉片的地方去熬。後來，自己學會熬了。為甚麼要自己熬呢？因為買了鴉片去熬，只給熬二次，一些東西還沒有熬盡，不給你了，他自己留下。我自己熬，就熬三次。怎麼熬呢？把草紙放在竹簸箕裏，一次一次過濾。我在熬鴉片的地方看會的，麻煩得很。鴉片有兩種，有一種是黑的，比較苦，有一種顏色比菠蘿深一點，發亮，香得很，用一種草葉包着的。這個好的價錢貴一倍，要自己熬。熬鴉片的全套工序我都會。我的叔父用一種小木製機床手捲香煙賣，我幫他捲過，也幫他賣過。舊社會這樣的事，

許多人都不知道，我偏偏知道，還幾乎件件幹過。幹了有甚麼好處呢？對舊社會的生活理解得比較具體。

因為哥哥姐姐妹妹住校，家裏的事統統落在我身上，這是應該的。我就成了「家事擔當相」。這四五年對我是一個很好的鍛煉。不是不公平，因為家裏只有我一個小男丁。我去買東西，一路看了很多，觀察社會，打金錢板的呀，賣打藥的呀，這裏有萬花繚繞、千奇百怪的社會。像我這樣從七八歲開始，經過這麼多事，承擔了這麼多事的人，恐怕比較少。這樣的經歷，一般人不太多，對我很珍貴。所以，現在早晨出去買菜，阿姨沒有我精（精明）。

「九一八」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一年，我進高小，讀通學。我不能住校。家庭有雜事，我得承擔。

沒有在母親面前下跪，這個罪，一輩子無法補

我母親叫淩文卿，在我們宜賓北門外的曾家，威信高得不得了。為人公道、公正，對人寬大，有禮貌，喜歡助人。那時，大家都窮。抗日戰爭期間，有本家要到重慶去找生活。從宜賓坐船兩天到重慶，我母親把手上的金戒指抹（取）下來，拿給他，讓他賣掉，去重慶。

解放初，我一個堂妹想參軍，來找我母親。這個堂妹叫我母親二嬸。我母親想辦法籌錢，讓她有了路費，到成都參了軍。她後來到了西藏。她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家裏來看我。

一個親戚表兄，家裏很窮，軍閥時期去當兵。後來他當逃兵，被打得半死送回家。我母親做好吃的東西，要我送去。

我一生軟弱，不會整人，不會鬥人，這跟母親的慈祥榜樣有關。

十來歲，「九一八」前後，我在家裏做「管家」，一切家務都做。我們家庭雖然不富裕，但舊社會窮人多得不得了。乞丐，我們叫「叫花子」，不斷地來。有時候是一家人，帶着孩子來，慘得很。他們都很熟悉找哪些家了，只要給，他們就反覆來。我們家不是窮人家，他們就來要。一天來很多次，幾批。我母親叫我去「打發」（安排），東西也好，剩菜剩飯也好，來一個，我「打發」一個，沒有剩飯，就給方孔錢，十個錢，八個錢，一天很多次，上午、下午，一次都不拒絕。

我母親大方、和藹，心地善良，對子女影響非常好。她雖然吸鴉片，但是那個時候，吸鴉片根本算不了甚麼，就像現在喝啤酒一樣。她讀過書，她的家庭肯定比我父親曾家富裕。那時女子能夠識字讀書的，家庭不是大地主，根本不可能。我們那個地方，大商人、大買辦沒有，大地主多。在那個時代，女孩是沒有機會讀書的。沒有女校，只有家學。有錢人，請人到家裏來教，女孩子也可以到至親家裏讀書。我母親能看《三國》、《紅樓》。

我大哥出生於一九一三年。這樣算起來，我母親可能在一九零九年結婚。那就跟清朝滅亡時差不多。

母親的仁慈，影響我一輩子。我一輩子都改不了這個習慣。六十年代初還是很困難，我在上

海，戴着右派帽子。江南水旱保收，沒有自然災害，卻有大量的乞丐，就在上海陝西北路大菜場周圍，我看見大量乞丐的時候，總要偷偷摸摸給一點。那個時候，「以階級鬥爭為綱」，如果你的施捨給別人看見，而這個人又去報告，你就是反動，幫助地主富農一起反攻倒算了。說那些乞丐都是反動地主富農分子，討飯是假的。世界的荒謬就到了這個程度！但是，只要遇到，我一看周圍沒有本單位的人，就給一角、兩角。現在乞丐也不少。我們家的阿姨推我出去，遇見我也十塊五塊地給。阿姨說那些乞丐是假的，我說不管真假，我都要給，你看她受這個罪，可憐不？這是個良心問題。這就是受我母親的影響。我最討厭殘暴，最討厭缺乏同情心。有幾年我天天看見電視上揭發假乞丐，但是我天天照樣給乞丐錢，不管真假。

我真正對不起的是母親。七八歲的時候，我多病，她在堂屋「喊魂」。喊魂要在半夜。她手裏攤着蛋，喊一陣子，那雞蛋就立起來了。我就在旁邊，她問，你的魂回來沒有？我回答，回來了。這樣喊了好多次，才在黑暗中結束祈禱。慈愛之心啊！我報答了萬分之一嗎？沒有。一九三七年我離開成都到延安，只有哥哥知道。我哥哥，甚至全家人都在騙我母親。一年、十年，最後也不敢說。那時候，不知道我的音信，不知道是生是死。我母親一天到晚哭，最後把眼睛哭瞎了。我在母親面前永遠是罪人，現在談起來就要哭……

在延安時，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可以通信，但是不敢，不敢跟家裏聯繫。一九四五年，陸定一到重慶開政協會，我覺得這個時候可以聯繫了，而且還有辦法讓對方查不出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一天我在延安楊家嶺食堂遇見一個很面熟的同志，叫甘道生或林蒙，看樣子是

大後方才來的，我不便招呼他。他問我，你認不認識曾冕莊？我說是我胞兄。從甘道生處，我才知道我家仍在重慶老地方打銅街十八號，是黨的地下通信處之一。我在重慶讀書時，就住在這裏。我寫了封信，交給陸定一，說，就照這地址，找《新華日報》一個普通人，找到打銅街十八號，往裏邊一丟就行了。回我的信，也如此，找一個不引人注意的人，到《新華日報》門市部前，無人時，把信往裏邊一丟就行了。就這樣，跟家裏聯繫上，母親才知道我沒有死。

解放後，我長期沒有回過家鄉。「文革」前一年，一九六四年我在上海，有個規定，在根據地工作的，解放以後可以回家一次，路費可以報銷。那時我右派帽子戴了好多年，也不知道批不批得准，但很快就批准了。當時，我母親住在四川萬縣，我哥哥在萬縣地區人民銀行當副行長。為甚麼當副行長？他是老地下黨，有人寫了證明，證明他沒有幹壞事。（他是一九四一年後被「甩掉的」。據說是絕對大多數。）我回萬縣去看母親，竟然沒有跪下，我真是不孝，不是個人！為甚麼不敢跪下呢？我考慮第一，我是個大右派，走到萬縣，別人是要注意的，而且已經有人指指點點了。第二，我那些侄兒侄女還小，只有七八歲，他們不懂，如果講出去，說我的二叔回來，給阿婆下跪，就是反動了，就是恢復封建秩序了。天天階級鬥爭，會把一個人的人性全毀滅的。

我沒有在母親面前下跪，這個罪，一輩子無法補。我哪裏還像個人呢。人而沒有人性，就不是人。我們的政治運動，讓人把人性都喪失了。我也喪失了。我認為，人性是最高的，一個人沒有人性，就不是人。那次見我母親，我就不是個人，竟然在母親日夜提心弔膽十多年，眼睛哭瞎

後，不敢在她面前下跪。想想看，去延安，不辭而別，母親為你把眼哭瞎了，你回去，從政治考慮，沒有下跪。政治利害戰勝了人性。我的靈魂髒了。這輩子，我九十歲，再活幾年，沒有甚麼事情在我的心裏引起這麼痛苦。想到這樣的事，就覺得我太卑鄙，抬不起頭。在這樣的關口，把政治利害擺在第一位，我失去了做人的資格。

我們過份的內部政治鬥爭歪曲了人性，包括我自己在內。在這個事情上，我是個非人。九十歲，就是九百歲，我對我母親也是個大罪人啊。

談起這些事，說一點，痛哭一下，好受一點。所以，反人性，我最反感。一個人把人性都反掉了，還有甚麼性，不是獸性了嗎？你把人變成非人了，還建設甚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沒有人性的共產主義嗎？一生奮鬥是為了建設一個沒有人性的社會嗎？我反省自己，我已經被改造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恢復人性這個問題上，我是最堅定擁護的人。任何反人性的人，我都堅持反對，不會同他有共同的語言。現在我們也要「吶喊」，就是恢復人性的「吶喊」。我相信，反對「人性」的共產主義，不管在在哪裏都會失敗的。

所以像我這樣一個人，這樣一種性格，要我一天到晚就整人，我寧肯死也不會去做。

我母親的骨灰放在成都郊區，我母親、我父親、我哥哥、我嫂嫂的放在一起。我曾去祭拜過，也跪下來過。但是，我心裏還是難過。我對侄兒們說，把你們阿婆的骨灰單獨拿出來，我要跪一個小時。他們說拿不出來。我想，他們是擔心我的關節炎，怕我跪。

哥哥給了我政治方向

我的哥哥叫曾冕莊，比我大六歲。初中在宜賓的敍州聯合中學，高中在成都石室中學。那時不叫石室中學，叫成都聯中。相當長一段時間，這所學校是成都第一號高中。

哥哥讀書很用功，成績極好，同時思想極開放，讀雜誌，讀課外書，知識豐富。我們家就是一個像樣的圖書室。他讀初中的時候，我九歲、十歲，他主要給我講帝國主義怎麼侵略中國。當時就是極端愛國，就是義憤填膺。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他都知道。他給我講甚麼叫外國領事裁判權、內河航政權、內地駐兵權等，他講得很仔細，因此我全懂。比如他講中國海關權，說中國海關不歸我們中國管，屬外國人管，進口多少稅，出口多少稅，權力在外國。收了稅又作為對他們的賠款。又講我們中國內地的許多權力都喪失了，重慶就有外國的軍艦。我一聽，作為一個小孩子就明白了，雖然半殖民地這個名詞當時似還未用，但我已知道我們是受外國無窮壓迫的國家，是孫中山說的「次殖民地」，比亡國奴還不如。

用現在的話來說，我哥哥對我的教育，是一種啓蒙教育，是愛國思想的教育。當時我哥哥也不講主義，灌輸的主要是一種愛國悲情思想。這個很厲害。內心的那種悲情是影響我今後道路選擇的，因為知道離家鄉只有一兩天航程的重慶，就有外國軍艦。外國軍艦開到萬縣江邊，萬縣被打得稀爛。外國人的勢力已經深入到內地了。聽了以後真是義憤填膺，知道帝國主義侵略的厲害，知道不反帝中國就要亡國。

我哥哥在甚麼地方講的呢？我家有一棵香樟樹，宜賓天熱，我們夏天就坐在香樟樹下。一般是吃了晚飯後，八九點鐘，他就在香樟樹下給我講。一個老師講，一個學生聽。我對他的感情，比對父親的感情深得多。我父親教舊道德。因此，我對哥哥，比父親還尊敬。後來，我要到延安去，是我哥哥偷偷借錢匯給我作路費，三百多元，在當時數目相當大，恐怕要等於現在幾萬元了。我哥哥八十歲去世。

我姐姐今年九十三歲了，比我大三歲，現在在成都，跟我母親一樣，慈祥、善良，我很尊敬她。順便說一句，我弟兄姐妹四人，全是共產黨員。我哥哥是地下黨，是一九三八年元旦宣誓入黨的，實際上他在抗戰前就是黨員了。我姐姐曾殿華，抗戰時期同我姐夫趙筱村一起做地下工作，解放初正式入黨。（我姐夫趙筱村比我先到延安，一九三九年派回四川。）我妹妹曾淑華是一九六零年在我被劃為右派後入黨的。

第二章　世界觀的形成

十歲左右，我讀了些舊小說

我唸的私塾，不是好私塾，是四川說的「雞婆學堂」，老師沒有本事，《三字經》、孔子、孟子、《詩經》，都要死背，卻都不講。我讀來讀去，也不懂。讀了這些東西，全是望天書，讀了六七年，沒有起作用。人家有的地方，像京、滬、杭，他們的私塾水平高，《史記》也懂了。這麼幾年，我幹甚麼？逃學。老師從不給家長說我們逃學的事，他就只管收錢。一個私塾，有二三十個人，兩三個人把書包放到人家大門後，跑到山上去玩，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又去玩。這幾年，除了認識幾個字，沒有增加甚麼知識。

讀私塾大概在五歲，七年時間，字認識不少了。九歲十歲時，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可以看一些小說了。

我們家裏不知道甚麼原因，有許多舊小說。我就讀舊小說。《東周列國志》、《三國演

義》、《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最喜歡《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也喜歡。當時說不出道理，現在看來，是因為半文不白，能看得懂。我小時候看書有個特點，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看不進去，言情小說也看不進去，武俠小說更恨之又恨。

我不明白，現在公然把金庸提到那麼高的地步，甚至有人把金庸視為文學的最高成就，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現在的武俠電影跟二三十年代的電影根本內容差不多。那時就有鬥劍光。手一舉起來，手心就發出劍光，在雲中鬥。現在鬥劍光「進步」了，不光是兩個手掌能放光，任何地方都能出劍光。眼睛、嘴巴，連肚臍都能射出劍光，荒謬程度超過十倍。我天生不感興趣，恨透了。把一個青少年的聰明才智和時間都消耗了，對一個民族只有害處，沒有好處。我沒有資格討論金庸，他的學問多，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對這些武俠小說恨得很。為甚麼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那些武俠小說衰落了，連電影《火燒紅蓮寺》等也沒落了？原因是進步文化上升了。進步文化是甚麼，就是要抗日，要反對蔣介石的獨裁，人民要活。現在中國武俠又起來了，不要輕視這個問題。一個民族的文化，這些東西上升，這些東西佔據了青少年的視線，是危險的。

《西遊記》我也不喜歡，就靠個孫悟空七十二變，全是公式。它裏邊的詩不像詩。對小說裏的詩，我從小不感興趣。《紅樓夢》看過，現在怎麼講呢，看紅樓時太小了，覺得它太長，對愛情不太懂。但對一些人物非常喜歡，像賈寶玉、林黛玉、襲人、晴雯等等。看紅樓時，還沒有到青春期，只有兒童的觀感，覺得他們可愛。但對裏邊的詩還是討厭。

上高小後，文學對我的影響：郭沫若、魯迅、茅盾

一九三一年上高小。我讀書素來都不用功，數學不行，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半年多，是乙等。我哥哥、我姐姐一直是第一名、第二名。學校裏的書，先生根本不會教，我讀不進去，就不得不喜歡讀雜東西。

十一二歲開始受文學的影響。我不是愛好文學，我不懂文學，純粹是當時的一種風氣。很多反封建的尋求出路的青年人，感覺舊社會是腐朽的，毫無生氣，就像一具屍體，感覺到這個社會不行，必須要有所改變，一般便去追求新文學了。

文學藝術上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郭沫若、魯迅、茅盾。

郭沫若的影響排第一。那時，郭老的東西，只要在讀書的，都會去讀，影響很大。當時看他寫的詩，覺得奇奇怪怪，看不懂。但他的詩劇對我的影響特別大。我到我姐姐學校去看《棠棣之花》，也到教會中學去看他的詩劇，看了大流淚。郭老翻譯的東西也看，十一二歲看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青年男子，哪個不善多情，少年女郎，哪個不善懷春。」快八十年過去了，到現在還能背出來。郭老的東西，最大的特點是用情感動人。以後，他在重慶寫的那些詩劇，《屈原》等，我都記得。到現在我還記得《孔雀膽》中的兩句詩：「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這是我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看到的。真是感人。批評郭的人現在很多，可惜的是，你把他的優點也批掉了。

對郭老晚年，解放後的言論、行動，我是不以為然的，有些不像話。但他在二三十年代對少年的影響可是第一的，誰也比不上。

在文藝上影響我的第二個人是魯迅。

當時我看魯迅的書，是毛邊書。記得晚上讀《狂人日記》，很害怕。他說，中國的歷史書裏，字縫裏只看見兩個字，「吃人」。他呼籲救救孩子。一九三零年前後還沒有上高小，看到這個東西，害怕。因為它的整個基調有點陰森。但是後來慢慢覺得它深刻。還有魯迅的《藥》，寫吃人血饅頭治病的，也害怕。那時畢竟是小孩子。魯迅的東西，有一些看不懂，《高老夫子》就看不懂。《阿Q正傳》反覆看，知道社會上評價高，呼聲高，但半懂不懂的。到現在為止，我認為這個小說是表達了他的一些思想，並沒有達到很高的藝術水準，有點像啞劇，要有很高水平，才有興趣看。

魯迅對我的影響跟郭老不一樣。讀魯迅，對中國的陰暗面多少知道一點，覺得可怕的事情太多了。郭老叫人興奮，魯迅叫人認識。

第三個影響我的作家是茅盾。茅盾對西方文學是熟悉的，對中國古代文學也是熟悉的。他的小說《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我都看過，都是在家鄉看的，以後就沒有機會了。但看不懂。到一九三四、三五年，年齡大一點，看《春蠶》、《林家舖子》、《子夜》。《子夜》是我哥哥看後寄給我的。茅盾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他自己發明的。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鬧得還不厲害。茅盾的小說是揭露舊社會的陰暗面，提高人們的覺悟，是宣傳政

治的，哪一本不是？《春蠶》、《林家舖子》是這樣，更不說《子夜》了。茅盾的每一部書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子夜》出版的時候，最轟動。《子夜》我看過幾遍，但現在想，想不起裏邊有甚麼人。裏邊有一個人物形象站起來了嗎？能跟《紅樓夢》比嗎？但其中一個小情節，我現在還記得。老闆吳蓀甫用一個同鄉屠維岳來管工人，他們有兩句對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就根據這兩句話，吳蓀甫發現屠維岳這個人很能幹，立刻用。屠維岳是反面人物，屠維岳，不知是不是「屠惟虐」？茅盾只對這個人寫出了一點性格。其他的人物仍無個性。茅盾的東西，雖然只講政治，但是，他的作品比我們以後的那些政治小說又要高明得多。以後的，一到念念不忘政治掛帥，就沒有看頭（不吸引人）了。書中人講的話，幾乎句句是政治了。

那個時候，一般來說，冰心的《寄小讀者》對讀者的影響大，但對我影響不大。我對冰心一點印象都沒有。可見，我偏政治。跟人們真正有痛切關係的，我就重視。扯劍仙俠客，我就不看，看過一些，越看越覺得胡扯。

我家有個百家爭鳴的小圖書館

更多的是讀我家裏訂的刊物。

我的哥哥比我大六歲，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已經是初中學生。現在初中生是小孩子，那時不得了，十七八歲了，一邊讀學校的課本，一邊還讀雜誌、報紙等，知道很多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家就變成了一個圖書館。哪來的呢？幾乎都是我哥哥的同學買的。我哥哥的同學家庭出身有幾個是大地主，一個學期家裏給的錢多到一百塊、兩百塊，所以可以買各種各樣的報刊，幾乎全是上海的。我們家的經濟夠吃飯，沒有這麼多錢。出錢最多的是我母親的一個內侄。這些人的家裏儘管是地主，但由於兩個原因，思想非常激進：一個是要抗日，一個是恨蔣介石殺人。

我哥哥他們訂的刊物真多。大約從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起，上海出版的重要書報都有，《大公報》、《申報》有。他們不知道我也在看。我甚麼都看，這樣的結果，我的思想起了變化。

上海的出版物——書、刊、報——空前的繁榮。我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真正偉大的百家爭鳴時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對中國的影響，就是上海這些出版物。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只是各種觀念中的一種，而且要看，沒有呀。《共產黨宣言》有嗎？沒有呀，上海也根本找不到，有的就是「左聯」前後的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戲劇、電影、音樂（救亡歌曲），這些東西，影響大得不得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比共產黨的東西還大。那時還找不到共產黨的東西，那時是「左翼」的東西（當然這些運動的核心人物，又多是共產黨）。我們家鄉受「五四」的影響不大，那時還較偏僻，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因為在長江邊上，上海的出版物不久就能看到。四川整個來說是閉塞，但沿長江邊的地方，不太閉塞。上海的《毛毛雨》兩三個星期就下到我們那裏了。

我不是讀馬克思的東西覺悟的，我是讀這些人的書覺悟的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這段時間，文學作品對青年思想的影響，在相對偏遠的地區，遠遠超過「五四」。「五四」運動的影響比較小，在我們縣就不大，當時還不能到達像四川我們縣這樣的地方，而上海「左翼」的像魯迅的書，郭沫若的書，蔣光慈的書，真是厲害，只要有小學，偏僻的鄉村都去了，就能看到。

這些書，我歸為兩大系統：一是郭沫若系統，革命浪漫主義的；一是魯迅系統，批判現實主義的，包括魯迅、茅盾等。

我們中國不能輕視浪漫主義。對我的影響，還是郭老的大。大到甚麼程度？他的那些詩我讀過，不大懂，不知道他說些甚麼，到現在有些還不懂，例如他的「我是一條天狗，我把月來吞了」，很多都是這樣的，不知所云。但他的詩劇影響很大，完全是靠感情打動人。之後是田漢等寫的歌詞。不少歌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學過一首歌：《茫茫的西伯利亞》，冼星海作曲，到現在還能記住，還能唱：

茫茫的西伯利亞，是俄羅斯受難者的墳。
多少英雄的戰士，被消滅在這萬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樣的無情，鞭子又抽得緊，每個人的身上，是一片血痕與淚痕。
難友們，不要呻吟，我們得把牙根咬緊，又粗又長的鐵鏈，把我們鎖成一條心。
我們冒着黑暗前進，我們向着黎明前進。

我主要想說明，這些東西在當時年輕人的腦子裏，比口號好，像刀刻的一樣。我又不是正式唱，是偶然聽來的，一個字都不會錯，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不是我的記憶力好，是它們感動人。這幾十年的歌，我只記得一句：「妹妹你坐船頭」，下一句就沒有聽清楚過。弄不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

啓發人們要求變動這個社會，要求推翻舊社會，通過革命的浪漫主義，比較容易些。革命的浪漫主義適合小青年，不管男女青年，都容易接受。

解放後，郭老只講官話，但在歷史上他的作用不低於魯迅，應該說高於魯迅，特別對內地的影響。

魯迅教育我的，有些話，也像刀刻在腦子裏。「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當時十三四歲，讀到這些，深刻得很。比方說，講中國的歷史：「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代青年的使命！」又如魯迅講：「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十二三歲記下來，好幾十年了，今天還能脫口而出，是它們太深刻了。不過上面是隨口說，錯誤之處恐怕不少。

郭老給我們的是甚麼教育，魯迅給我們的是甚麼教育，清楚得很。郭老鼓起了我們的熱情，魯迅叫我們沉思，缺一不可。中國人現在必須看他們二人的東西，就像古人必須讀司馬遷的東西一樣。

「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七年前這幾年，是胡適他們的啓蒙影響為主。「五四」的啓蒙作用很大，但中國變動非常劇烈，主要是帝國主義，日本侵略得太厲害了。因此，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社會思想的主流，影響我們青年思想的，從北平、上海這些大都市，到我們四川的小縣城，就是魯迅與郭老，而不是胡適了。而共產主義的東西，當時甚麼都找不到。《共產黨宣言》都知道，但是找不到。抗戰前上海沒有，內地更找不到。當時馬恩列的書，正規的書，抗戰前不大有，只有一些介紹，從日文翻譯過來的，許多名詞都不一樣。列寧，叫依里奇，或者叫烏里雅諾夫；意識形態，音譯叫意德奧羅基；小布爾喬亞，是小資產階級；恩格斯，叫弗里德里黑；突變，叫奧佛赫變等。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這些書都是這樣，我家裏多得很。一看，都看不懂。國民黨查得嚴，偷偷出一點，都要用這種化妝的方法。但仍得硬着頭皮看，求真理，求解放呀。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青年的變化，最大、最劇烈的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這段時間。這個思想變化，並不是看中國共產黨的甚麼書，也不是直接看到了馬列的著作。對中國共產黨不了解，但對蘇聯的了解則大大超過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對蘇聯的介紹，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比較多。國民黨不禁止，因為還對他的政權沒有直接的威脅。蘇聯並沒有像中

國共產黨那樣，要打倒蔣介石，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再加上中國上海有個租界，國民黨根本管不到，那裏同在外國差不多。上海的書店全在租界裏。

目前有一些說法，說當時的青年，抗戰前受了多少真正的馬列主義的影響。太誇大了，其實看不到。但很多人，都讀過郭老、魯迅的書。「九一八」前後，冰心已經過時了，已經不起作用了。當時是國難當頭，日本的侵略，使青年人非常激憤。冰心的文章我也讀了一點，但覺得已不是談那些東西的時候了，要抗日了。

郭老的作品，在客觀上就突出了這些。比如《棠棣之花》，講的是戰國時義士聶政刺韓相俠累的故事。聶政離開姐姐前，在母親墳前，姐姐吹簫，他唱歌。他唱道：

明月何皎皎，白楊聲蕭蕭。
阿儂姐與弟，離別在今宵。

儂欲均貧富，儂欲茹強權，
願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

你說怎麼不感動，除非是石頭！因為我們心頭想到的是抵抗日本，殺掉漢奸，打倒蔣介石，人民大解放，而不是甚麼俠累不俠累。我，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能不感動嗎？雖然講的是歷

史，但灌輸了對現實社會不平等的仇恨。快八十年前的這些歌，現在還能背得，還能唱，為甚麼？因為當時已經像刀刻一樣在記憶中了，是把它們完全現實化了。文學而不能感動人，叫甚麼「文學」？

現在，除了對魯迅，評價都不大高。我說這些，是想說明這些老前輩對我們的影響。這些老前輩對我們青年的影響，比馬列主義的影響大得多。我不是讀馬克思的東西覺悟的，我是讀這些人的書覺悟的。不是我一個，那個時候的中國青年，大多是這樣！

我不僅受文學的影響，還包括受哲學等其他書刊的影響。一九三五年前，北京出過一本《辯證唯物論教程》之類的書，是蘇聯的宣傳書，小三十二開，印得很糟。這本書在極少數人中可能有影響，但在中國的普遍青年中，沒有甚麼影響。原因是看不到，也看不懂。比方，它的第一編就叫「哲學的黨性」，可以講十幾頁甚至幾十頁，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本定型的斯大林的哲學。當時的任務是抗日救國。因此，它比較脫離中國的實際，起不到甚麼作用。這類書曾經翻過，一個字都不懂，說它們起了多麼偉大的作用，不符合史實。

這個時候，我還非常喜歡林語堂的東西，他辦的兩個刊物《論語》、《宇宙風》，我都看。林語堂的文章很幽默，比看郭沫若、茅盾的有趣得多，一本雜誌可以一口氣看完，其他刊物絕辦不到。我讀東西雜，我還看些雜刊物，如一種是《逸經》、一種是《越風》。這兩個刊物，是上海出版的，也是隨筆性質的刊物，講些歷史故事。這兩個刊物影響不小，一般人不懂，要常到圖書館的人才懂。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大概就是《逸經》登的，我當時就看過，全國都知道。

林語堂對正規中學、大學教育方法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到圖書館去看書，比一般地坐在教室裏讀書好。他不要書呆子，不要僅僅知道知識公式、條條框框，他要思想活潑一點。這一點，對我有影響。另外，他的刊物罵蔣介石，那種罵法，我也喜歡。他不像「左翼」，他用各種各樣的滑稽、諷刺達到罵的目的。這些影響使我對生硬教條的東西，一生不感興趣。據說像林語堂那樣，當時官方有個說法，說他們是「軟性反動」。林語堂那一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你要抓我的辮子，判我的徒刑，辦不到。但是我挖苦你，厲害得很。林語堂派的刊物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很大。他們的文字水平高，一般懂得外國的事情。左派是進步革命，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極大，但文章比較單調枯燥。左派的，寫得引人入勝的比較少，原因是知識面窄，革命家太忙了。

為甚麼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擁護？這跟我從十一二歲起在家鄉看的那些書、那些雜誌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這些書報，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我以為，專制出不了學問，出不了藝術，也出不了文采。我們家的書報，各黨各派，甚麼都有。我說一個雜誌，可能許多人不知道，《二十世紀》，開本很特別，封面是淺黃色的。到現在為止，我也不知道這個雜誌是代表哪一黨，哪一派。這個刊物的文章也怪，很深奧，看不懂，我哥哥他們也看不懂，不過是訂得多，把它也訂了。我還讀過一本書，塊把錢一本，很厚，《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這個書講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作者是郭沫若的日本同學，叫漆樹芬，是個左派，據說沒有入黨。漆樹芬後來犧牲了，在重慶被打死了。他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本書有兩個序言，一個是國民黨的吳稚暉寫的，一個是郭沫若寫的，列寧有關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我就是從這個

書裏看的，我大致也記下來了。那時大概十二歲，當時別的地方還沒有列寧的書，所以，知道列寧的觀點，就是這麼間接看到的，高興得不得了。這本書是一九三二年前後看的。有趣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延安要創辦一個馬列學院，叫我去參加考試，就考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當時，一般人不知道，我答上了一點，並不是我有學問，而是偶然湊巧。

我還喜歡看《時事類編》，這本雜誌好像是孫科系統辦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中山文化教育館，主要工作人員似乎是地下黨員。對國際時事的介紹，這個刊物最多。我們黨一九三三年辦的《世界知識》，實在的資料、內容不是很多，主要是分析。一九三六年，蘇聯第一次公佈大屠殺，屠殺季諾維也夫、加米列夫等一大批人，這是斯大林第一次公開向全世界公佈大殺包括地位比他高的人。一九三六年的中國，很注意這個事件的人似乎不多，包括上海的文化人、大學生。我記得《時事類編》裏有，較詳細，有起訴書、判決書等。

這一切說明各種信息對一個青年的影響非常大。我從小有個特點，在十一二歲不懂事的時候，就亂七八糟地廣泛接觸，我知道的事情，並不比北京上海的人少。閱讀無界限，這也是我一生的一個主張。因此對出版我就一直主張開放，多出一點書。

「九一八」後，思想普遍要求抗日，光靠文學不行了。這個時候，是以鄒韜奮為代表的通過生活書店這個系統出版的書刊的影響。我十一二、十二三歲看的書，不是生活書店的，而是昆侖書店的，南強書店的，亞東圖書館的，春明書店的……至少幾十家。在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生活書店這個系統的影響極大。生活書店有影響的是《生活》週刊。《生活》週刊在一九三三年被

查封，改名字。一九三五年，鄒韜奮從外國回來，出版了《大衆生活》。我在內地知道「一二．九」運動，就主要是從這本雜誌知道的。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生活書店系統的書的影響很普遍。通過抗日救亡，使人們左傾，接近社會主義，擁護蘇聯，慢慢接近共產黨，它的功勞第一。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上海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這兩個組織的成立，對我們這些幾千里外的青年人，一時暫無組織影響，但他們的報刊厲害，主要是宣傳抗日救亡，他們也不敢直接反蔣，不敢直接罵蔣，只給你灌輸蔣介石不抗日，蔣介石是獨裁。現在查蔣介石日記，他是一生要抗日的，但當時他一直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是鐵的事實。我們內地的先進青年，恨他那個「憲兵第三團」，同恨日本人一樣。

對我世界觀的轉變起作用的，還有這些事情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還在家鄉。我一九三一年讀高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讀家鄉敍州聯合中學。我讀書功課不行，一天到晚就是看上海的書報雜誌。這個時期，世界觀的轉變就形成了。不是共產黨直接教育的，我們哪裏看得到共產黨呀。

對我世界觀的轉變起作用的，除了書報，還有一些事情。

一個是蔣介石。蔣介石，原來我不反對你，但我看見你的鎮壓，太殘忍了，太沒有人性了。

不是別的人教我，是我看見你的行動後，起來反對你的。有一天晚上，我拿着一本左傾的書經過北門城門洞，城門洞裏貼得有標語，城門洞兩邊的油燈照得清清楚楚：「打倒劊子手蔣介石！」當時有衛兵在城門洞兩頭守，我走得很快。看到這條標語，糨糊似乎還沒有乾，就像看到革命青年的鮮血一樣，知道共產黨還有，不管是有組織還是沒有組織，還有。他們真是不要腦袋的人，如果貼標語時被抓到，就要被殺頭的呀。當時我心裏明白，貼標語的人，才出城門洞不久。那種仰慕之情，那種感動，真是到極點了。

蔣介石一九二七年搶奪政權後大屠殺，太厲害。像在我們那個縣裏邊，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零這幾年，經常槍斃人。一會兒聽說某家二小姐被殺了，一會兒聽說某家的三少爺被殺了。我確實從小沒有聽說過有工農被殺頭的，殺來殺去，都是大少爺、二小姐，因為他們才有經濟能力讀書。一讀書，思想就起變化。那個時候，都是殺頭，殘酷得很。蔣介石這麼屠殺幾年後，多數人怕了，既不敢有甚麼行動，也不敢看甚麼進步的書籍。但少數人覺悟了，雖然一時不敢公開起來遊行，貼標語反對你，但暗中起來反對是很多的。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上海的出版物，革命的、進步的很多，左派的力量飛速發展。一個縣城裏，有十個進步的人就不得了，有三五個就可以鬧個天翻地覆。

那時我已是十五六歲的青年，頭腦複雜，不像現在的青年這樣簡單。現在，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的抗日與擁蔣是並存的。不合史實。當時，看到蔣介石殺人殺得太厲害了，又不准別人抗日，所以，長時期是抗日就要反蔣，我長期就是如此，並不是甚麼托派的影響。

各地到延安的進步青年，叫蔣介石甚麼？不叫他南京政府，都叫他法西斯。蔣介石從來沒有說不抗日，但是他鎮壓抗日。他對內用的是法西斯統治，他想用法西斯的那一套來消滅共產黨，消滅進步勢力。所以進步青年一談話，相互就知道了。說蔣介石是法西斯，只有真正進步的青年才這樣說。蔣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基本上是法西斯，這是沒有錯的。

蔣介石對日本不想投降，這個確實是事實。但他用高壓政策來屠殺，最後把全國救亡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等七君子抓起來。這是蔣介石犯的天大錯誤，蔣介石不是糊塗人，這是他的背水一戰，他的威信跌到谷底了，人民已經到了欲與之不共存亡的程度。抓「七君子」，把張學良也得罪了。張學良的八項要求，釋放七君子是第一條。

蔣介石對內，沒有宣傳抗日。蔣介石一九三五年前後到處搞軍訓，我們學校也來了軍訓教官。但軍訓官不講抗日，連側面都不敢講半個字，這樣，誰會相信蔣呢？蔣介石當時的困難確實很多，你要他怎麼公開號召抗日？確實有困難。同日本的力量對比太懸殊。蔣介石對內鎮壓，不准抗日。這是事實。蔣介石的先安內後攘外，胡適、《大公報》他們是公開贊成的。西安事變後，北京大學的一些人開大會反對張學良。胡適在這個大會上說，從前，我是公開批評國民黨的，現在，我要加入國民黨了。北京的教授派，他們要求穩定「國家中心」，認為對外沒有一個「國家中心」不行。國家中心是誰呢？胡適他們認為，相對來講，蔣介石比袁世凱、段祺瑞等強，北京的教授，包括《大公報》全是這個觀點。要推倒蔣介石，不贊成，說各個實力派頭領沒有比蔣好的，蔣介石還是要能幹一點。但胡適他們對蔣介石對內鎮壓，有時也是有意見的，批判

有時也很明確。《大公報》批評蔣介石，有時也很尖銳。但要推翻，那就不行，那叫「動搖國本」。

推動我世界觀的根本改造的，第二個是日本的侵略。當時不少的人還是糊塗，對日本侵略，雖然很恨，但仍不大敢出來說話、行動。主要是國民黨政府要鎮壓，地方勢力也要鎮壓，但少數青年堅決出來貼標語、講演、演抗日劇等。

一九三六年，上海一個刊物叫《國難教育》，領導人是陶行之，老左派。有一幅漫畫是這樣，整個封面是中國地圖，一隻軍靴踏在上面，鮮紅的血濺滿了封面。畫面中有個不顯眼的太陽旗，讓人知道是日本人的軍靴。當時看到漫畫，一下子眼淚就掉下來了。

為甚麼中國老百姓要抗日？當時天津有個海河浮屍事件，鬧得很厲害，說天津海河上常常發現死屍，是日本抓去修軍工的勞工被弄死後，丟在海河裏的。當時上海的《申報》，全國的大報都登這件事，登了幾個月。

當時為甚麼青年要抗日，要到延安去？你國民黨不行，不抗日，才想到紅軍、共產黨。當時並不知道共產黨做些甚麼，但是這些不怕死的人還會不抗日麼？

對蘇聯，印象最深的是鄒韜奮的《萍踪憶語》第三集，一九三五年有零星登出來。一九三六年出版，很厚，這本書寫得很詳細，他在蘇聯看到了甚麼？他看見了人間天堂。其實都是蘇聯佈置的，蘇聯讓他看的，鄒韜奮統統相信了。鄒韜奮是個天真而偉大的革命家，這不能怪他。當時不僅在內地，即使在北平、上海，一般青年是根本得不到共產黨的主張的，我們只能看鄒韜奮，

聽他的話，跟他走，他的威信第一，勝過一切人。

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確實對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不太了解，不知道長征，報紙上說朱毛朱毛，但任何報刊都沒有報道共產黨在哪裏活動，打下甚麼地方。後來，從范長江那裏知道了。他不是有兩本書嗎？一本叫《塞上行》，一本叫《中國的西北角》，是他到陝北保安去訪問後寫的，《大公報》一期一期登，後來出了書。《大公報》在天津，素來以登官方以外的新聞為號召，因此大家爭着看。一九三五年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議後，蔣介石的黨政軍特被日本人從華北趕走了，所以這兩本書能出來。范長江的書，在我們縣城就能買到。大約大縣城都有小書店，經營人就懂政治，一個人經營，知道上海的甚麼書好賣。所以，很容易就知道外面的事情。

我是一九三六年看到范長江的通訊的。在之前，只看見共產黨員被屠殺。記得范長江訪問張聞天後，妙筆生花，說張「不似曾過萬重山者」。這句話對我的作用非常大，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的看法從根本上改變了：知道共產黨根本不是甚麼匪徒。那麼多領導人是留過洋的，比國民黨強得多，高明得多，不要看到他們在山溝裏，其實全世界的事他們都知道。我第一次知道共產黨的領導人，知道毛主席的簡史，而且還知道毛主席的文史修養很深。你蔣介石算甚麼？一個大軍閥罷了，比得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這批人嗎？范長江的這些通訊，當時的影響極大。一個縣城只要有一二十人看過這類東西，這個縣城就熱鬧起來了，救亡運動就會開展起來了。

《大公報》一直是偏於批評蔣介石的，但是，《大公報》在抗戰爆發前，態度明顯變了，明

顯擁護蔣介石了，是要抗日，要全國團結，蔣介石力量大，是中心，但單獨依靠蔣介石不行。所以派范長江去陝北，是《大公報》最高當局胡政之決定的。

《大公報》的社論很講究。總編輯張季鸞寫社論，六百字，到八百字就說完了，沒有長篇大論，不容易。王芸生要長一點，但也很短。《大公報》的社論只佔報紙很小的版面，但字是大字，影響很大。絕無廢話，也不尖銳。

我看了范長江的書後，只是感動，沒有跟別人交流過。那時不能輕易跟其他人交流。一九三六年冬天，陽曆一月我從重慶北碚鎮回宜賓看母親，當時蔣介石已經被張學良送回南京。我哥哥和我完全站在共產黨這一邊。我哥哥說：解維哲的面目全暴露了，是個法西斯。解維哲是誰呢？一九二七年是我們縣黨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但不知道是不是共產黨員。那個時候的縣黨部，招牌是國民黨，其實都是共產黨員，加上有名的非黨員的左派。解維哲一九三三年從上海回到宜賓教過我們的課，叫「三民主義」。他講天下大事，講抗日，還是進步的。我哥哥為甚麼說他是個法西斯呢？蔣介石十二月二十五號被張學良送回南京，縣城得知，據說是晚上九點左右，這時學生已經睡覺了，解維哲卻把學生立刻叫起來，到馬路上去遊行慶祝。抗日戰爭以前，態度是鮮明的：進步派都反蔣，說他不抗日。從沒有人說他真心不抗日，問題是他在鎮壓抗日運動，對軍隊並沒有抗日教育，而只有滅共教育。歷史事實如此，我是過來人，我們這些抗日分子都怕蔣系勢力，為甚麼？因為他們要鎮壓。蔣當然在實際上也困難，困難得很。在內部講一句抗日的話，日本第二天就知道了，立刻就要逼得他又要喪權辱國了。

張學良把蔣介石抓起來，我們高興得不得了。在我們看來，抗戰必須反蔣。我們當時哪裏可能知道共產黨中央要聯蔣呢。一個學校的訓導主任，半夜三更要大家起來遊行慶祝，說明他是站在蔣的立場的，所以我哥哥說他是法西斯，即擁蔣派。

張學良放了蔣介石後，大家心裏慌，覺得是放虎歸山。不僅是我哥哥，當時進步的青年都是這個觀點。現在，切忌這樣想，說這個思想是托派思想。當時對黨的方針不知道。我們接受的還是早一兩年的思想。蔣介石是法西斯。有這種思想的，就是進步的「左翼」分子。我們甚至認為蔣介石是賣國賊。因為一九三五年訂的何梅協議（何應欽，梅津美治郎），給我們的印象太深。國民黨的軍隊要從察哈爾河北兩省撤退，國民黨的省黨部、縣黨部，也不准在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存在。國民黨的憲三團也要從北京撤退。國民黨的憲三團到哪裏就是抓人、殺人，老百姓恨憲三團跟恨日本人差不多，甚至更恨。如果憲三團在北京，「一二．九」運動抓的人肯定更多。憲三團領導人是蔣孝先，是蔣介石的族侄孫。憲三團調到西安去，西安事變當晚東北軍有令，遇着蔣孝先先打死再說，都恨他。

當時的青年，判斷對方是不是可靠，要通過談話。一談話，就知道對方站在甚麼立場了，因為用的名詞不同，一談就知道。當時我們到延安去的人，往往先不認識，但一談話，就知道了，用的名詞，表達的思想完全一樣。我們這些青年這樣做，並不是共產黨教的，而是蔣介石自己的行動教我們這樣的。

第三章 逐漸走上去延安之路（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人格教育最重要：影響我一生的兩個老師

比較幼年的時候，跟同時代的孩子比起來，我是屬於一個早熟的人。這個時期，有兩個老師影響我的一生。高級小學時，是個音樂老師；初一時，是個教體育，也教音樂的老師。他們的人格，我終生難忘。可是他們兩個人都是啞喉嚨（聲音沙啞），不會唱歌，但是人格偉大。

小學老師教音樂，按風琴，「長亭外，古道邊……」。他有肺病，但他教課極為認真。舉個例子。他教簡譜，把譜提前寫好在黑板上，教你怎麼使用，一點不教條。當時作為農村出來的子弟，特別是少爺們，誰要學音樂？我同他們不一樣，認真學，感覺得到老師費盡心血。他一堂課怎麼教？教我們識簡譜，叫一個學生起來，他拿着教鞭比劃着，教聲音怎麼高，怎麼低，怎麼慢，怎麼快，完全用手勢，用眼睛表達出來。現在回想起來，他完全是拿出心血來教。想一想，對小學五六年級的小學生，如果要簡單應付的話，那太容易了。一個學期，油印幾首歌就可以

了。那時，音樂、體育、圖畫、手工這四科，考試是要考，但是平均分數不算，教得好不好無所謂。所以這個老師的精神讓我感動。後來越想越感動。他只教了我們一學期，第二學期就病死了，但一輩子感激他。

一九三三年剛進初中，遇到了一個老師，叫葉輕溟，是個大胖子，又高又大。這個老師很特別，教音樂，不會唱歌，教體育，又不能在體育場上做甚麼運動，但是，他教音樂很厲害。他教五線譜，先讓學生在黑板上寫好，上課再講。學生覺得五線譜豆芽瓣瓣，跟生計沒有關係，不愛學。他不管，你不學，他也正正經經地把每個音符講清楚，把五線譜的道理講清楚。他不唱，而是哼，也讓大家哼，大多數人不喜歡。他教我們唱李叔同等的歌，多數是中國古詩詞的歌，如唐朝高適的《別董大》：「千日黃雲白日曛，朔風吹岸雪紛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所有的歌詞，他都要講清楚。他說，歌詞懂了，才唱得出感情。所以，一個中小學的老師，給學生一生的影響很大。因為他是拿出生命來教的，啓發了我的知識，啓發了我的感情。這個老師又是一個學期後因為肺病死的。他死的時候，即使是不喜歡音樂的人，都流眼淚。做事情，這麼認真，這麼負責，這麼不怕犧牲，拚着命幹，這樣的老師，難找。我也沒有學到甚麼，但他們那種負責認真的精神，感動了我一輩子。現在的教師就要學這樣的精神。光教知識不行，沒有把人教育成有高尚人格的人，再教得怎麼好，都沒有用。要教學生，先要從道德上、從人格上來清潔自己。

初中畢業考試第二名，進了盧作孚在北碚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

一九三五年，我初中三年級從家鄉轉學到重慶北碚盧作孚辦的兼善中學讀書，我父親要我到重慶去開眼界。重慶辦得好的學校都是教會學校，課程都深，我考不上；亂七八糟的中學，我又不願意去。這個學校招生，我就去唸，唸初中三年級。學校風景如畫，我讀了一年後畢業。

當時，重慶附近的江北縣、璧山縣、巴縣、合江縣，山區多，土匪成群。盧作孚向劉湘要下離重慶一百多里的北碚，由他弟弟辦一個「峽防隊」，實際是剿匪，經費恐怕是官方給的。盧作孚的弟弟盧子英有本事，經過兩三年，真的把土匪剿得差不多了。但劉湘也沒有管北碚，成立了一個江巴璧合峽防區，盧子英繼續在北碚管事，名義好像是「峽防隊」的隊長，其實就是個特別縣的縣長。他的權不太大，主要是盧作孚。盧作孚在這個地方搞的事業就多了，辦了新式採煤的煤礦，修了短鐵路，辦了織布廠，辦了學校，還辦了科學院……。

盧作孚的這個中國西部科學院，有化學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生物研究所、農林研究所，都是小規模。兼善中學有個規定，凡是畢業考試第一名、第二名，要無條件地到中國西部科學院當練習生。初中畢業到科學院去，這不是開玩笑嗎？其實就是做兩三年徒弟，然後送你到北京、南京這些地方去讀大學。我的成績本來不高，到了這個地方，一九三五年畢業考試，竟然考了第二名或第三名。校長找我談，到科學院去當練習生。我徵求我父親意見後就去了，到地質研究所當練習生。我一個初中生的用場是管標本，管儀器——儀器都是進口的。我還學會了照相，包括

洗放照片等全套，學會了一般的畫地圖等。後來要製有等高線的地圖，我的天老爺，一個初中學生怎麼畫得了有等高線的地圖！自己摸索，根本不行。那時，不像解放後，他們是不教的，一去就幹。這樣搞了大半年，但不懂道理，是一種硬幹。我還跟着去調查煤礦。煤礦中有一種木軌，我鑽了好多次，了解到是資本家的煤礦。一九三六年快過年的時候，我回宜賓看哥哥，看姐姐，看妹妹，看母親，遇西安事變。我感覺到待在西部科學院，我的程度不夠。我哥哥說，還是讀書吧，到成都讀書，我就到成都讀書去了。

這件事，就是到現在，對西部科學院我應該道歉，因為那是不辭而別。活到九十歲了，內心十分不安，沒有辭職就走了。

高中：我搞了兩期壁報。地下工作，無師自通

一九三六年從宜賓到成都走了七天，有幾個人一同到成都考中學。頭一天，住白花場；第二天，住貢井；第三天，住資中；第四天，住臨江寺。晚上要住店的時候，路兩旁的小店，家家都敲鍋，搶客人。菜好得不得了，現在根本吃不到。我哥哥指定我考成都聯中，即石室中學。石室中學名氣大，難考。知道不行，我還是報了名。後來才知道，石室高中開始只收五十人，後來擴大到六十人。考了後，不敢去看榜。因為絕大多數的題，我沒有答上。到了發榜時，不得不去看。我的名字竟然在備取榜上。我到收發室問，收發室的人說，備取人全是可以進來的。後來我

知道這類學校從初中考高中是怎麼回事。學校故意出很深的題來淘汰人。一千多人報名，兩天後就發榜，老師不夠，沒有時間評分，只看少數考卷。所以故意出很難的題，讓你都交白卷，立刻淘汰掉。

我舉一個例子。當時考地理，中國鐵路，那時地圖上要分已成鐵路、未成鐵路。有一道題是問一條已經修好的鐵路經過哪些城市，我可能講對了幾個。另外一道題問，同成鐵路要經過哪些重要城市？我一個都回答不了。「同成鐵路」是啥呢？從山西大同到四川成都，根本沒有修。我一個都說不出來，只好交白卷。

上千人報名考試，絕大多數人是零分，我可能答對了一點點，至多得了一二十分，就被錄取了。

成都石室中學，清朝就有，很有名，但我們叫它老夫子學校，因為它只管讀書。我一九三二年去成都看我哥哥的時候，看見他們學校的高中學生課餘讀老子、莊子，覺得如果是自己的話，吃不消。學生吃了晚飯後沒有運動，一般是練習書法。石室中學一貫抓中、英、數。我進去後，感覺到很多學科都跟不上。除了中文外，都跟不上。石室中學，死氣沉沉。讀死書的，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沒有幾個關心國家大事，大多數人，既不是國民黨，也絕不左傾。

第一個學期，上半年主要是應付，還是把主要的時間放在看進步書報上。成都石室中學是老夫子學校，應該是沒有國民黨特務的。但一九三七年軍訓教官來了後，就不一樣了。一個中學，三個教官，主教官是上校。看到級別那麼高，知道厲害，特別小心。這些教官自己不講一聲抗

日，也不准學生講，誰講抗日誰就是共產黨。

我睡上床，下床也是進步同學，但我們兩個互相都不知道。進步學生怕民國黨特務，我提防你，你提防我。開始，我還以為他是國民黨的，是復興社分子，跟着喊「蔣委員長萬歲」，不像我只是應付。結果一九三七年，我經西安到延安，碰上他準備到延安，真是很意外。

一九三七年暑假沒有回老家，七七抗戰一開始，我就住在初中部的宿舍，少數沒有回家的學生，教師都住這裏，一個月四塊錢，六個菜，兩三桌。有一天下午，一個人走到我面前說，你是高一的，你做的事我知道。我說，甚麼事？他說，牆報，宣傳隊。

我在我們食堂牆壁上搞了兩期壁報，報名叫「石燈」，宣傳抗日，一般的學生，知道的情況太少，連「九．一八」以來的情況都不知道，所以都是我寫的。我找了幾個成績好的同學，晚上九點以後一起抄，貼上去。我的讀書成績不能跟他們比，我慢慢說服他們。地下工作，無師自通。我為甚麼要選快放假時做呢？你想查，快放假了，查不到。我還搞了兩次下鄉宣傳。全國學生的愛國活動，均是無師自通。初時還沒有共產黨領導。

這個人是高三的學生，叫余明，是監獄裏放出來的，當時不知道他是老地下黨。共產黨真厲害，連國民黨特務都不知道，他竟然知道了，他還是跟黨失去了聯繫的，他出監獄後還沒有恢復關係。現在我覺得一個能力強的地下黨員，比你一千個公開的國民黨員的作用還大得多。他一下子相信我了。從此後，給我看很多東西。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有延安的《解放》雜誌，有西安事變後陝西省委出的刊物《西北》，還有《救亡》等。還有延安出的《列寧主義概論》，印得很

簡單，但是當時很有用。當時整個四川的黨組織還沒有恢復，這些人已經有秘密的聯繫了。我這個暑假接觸到余明，變化比較大了。我以為他是黨員，後來知道是個人活動。一個共產黨員失掉了關係，還能起這麼大的作用，國民黨怎麼能跟共產黨比呢?!

決定到延安去

一九三七年暑假，心裏邊已經沒有讀書的想法了。我讀書沒有本事，是個乙等生。乙等，在班裏被看不起，第三十名。石室中學是講究成績的。「七七事變」一爆發，就熱鬧得不得了。我就想怎麼辦，自己知道讀書不是辦法，但共產黨怎麼樣，不知道。

我所在的石室中學，在政治上右傾保守。有好幾個國家主義派有影響的人是這個學校出來的。因此，石室中學的教師中，國家主義派，後來叫青年黨的影響大。青年黨是反共的，名義上是國家主義，基本上是右翼。我在石室中學讀書的這大半年，學校中的政治進步活動，絲毫也看不出來。

大概是九月二十三號，國民黨的報紙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國民黨的報紙發表這樣的宣言，從某種程度來説，就是承認你的合法性了。

跟着不久，又發佈了命令。這個命令只是説成立一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這個命令後，大家都知道全部的紅軍改叫八路軍了。好了，要抗戰，就去當八路軍。

這兩個消息一公開，我們這些人就想，這下可以抗日了。知道共產黨在甚麼地方了。我們要趕快去，參加抗日，立刻決定到延安去。

當時到陝北去，主要是抗日，對蔣介石的抗日不相信，蔣介石挫敗太快，抗日無效。我推測，紅軍沒有被打垮，這麼多年，游擊戰還能生存，說明會打仗，打日本要靠他們。覺得國民黨不會打仗，幾個省都丟了，軍隊損失那麼大，蔣介石抗不了日。特別是平型關一戰的宣傳，不只是我們學生，全民興奮，要抗日就只有找共產黨了。

那時，哪裏顧得上說實現共產主義呢，面對亡國，要想救國，只有到延安去。到延安去的，沒有一個不是想去上前線的。如果再不抵擋，四川也會失掉。誰吹他是為了打倒國民黨，實現共產主義到延安，那就不真實了。我們只覺得共產黨會抗日，就想上前線。我本來是個近視眼，平時都沒有戴眼鏡，為了去延安，趕忙到成都春熙路一家大眼鏡店配眼鏡，第一準備打槍，第二準備晚上行軍。

後來延安整風，就是整我們這個東西。只知抗日，不懂共產主義，你們不是為了共產主義奮鬥來的，你們是為了抗戰。就檢查呀，檢查呀。有這樣思想的人，叫「半條心」，就是不懂馬列，不懂共產主義。首先承認半條心，心服口服，到延安去，確實沒有想到去實現甚麼共產主義。

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我要了三百塊，這是老虎吃天啊

開學後，到處串聯，準備走。通過私人關係，進步學生就有聯繫了。但是，怎麼才走得了呢？

到延安去有幾大難處，延安成立抗大、陝北公學，並不是你想去就收留你的。你要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才可能去。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一是需要介紹信，二是要很多錢。沒有去之前，心裏算着要交學費、伙食費，還有路費，哪裏知道吃飯不要錢呢。每個人到延安去，無論從甚麼地方動身去的，都要準備二百元以上。那時二百元是甚麼概念？那時的豬肉兩毛五分錢左右一斤。女工，一個月幾毛錢。多數人要準備三四百元，這個費用大得不得了。

對我而言，錢比較容易，向哥哥要。我哥哥當時在宜賓中國銀行當行員，他做練習生三年後升為行員了，每月有二十四塊錢。我決心去延安了，向我哥哥要了三百元，這是老虎吃天啊！哥哥哪裏拿得出來！但我哥哥是無條件贊成我去的。他東借西借，借了三百塊。當時他已經結婚，有一個兒子。我到哪裏去取呢，到成都鹽市口中國銀行。沒想到，我取錢時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的長輩，表叔之類的。我在成都石室中學時用的錢，都是到他家去取的。他看到我在取錢，而且取這麼大數目的錢，問是怎麼一回事。他說，你不是在我這裏拿錢嗎？我當時很緊張，怕他猜到我要去延安。很快，我想沒有關係，他是個不問政治的人，跟我的關係也不是很密切，我就編了個理由，應付過去了。

最麻煩的是介紹信，你要弄到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信才行。在走之前這幾個月，我曾經去找過當時成都救國會四川大學的幾個人，但他們都不理我。我只是一個中學生呀，中學生去找大學生，理都不理你，談不到一起。當時到延安去的，基本上高中生是一團（撥），大學生是一團（撥）。

當時成都的黨組織正式有沒有，我現在都不知道。據現在我聽說的，成都地下黨恢復得很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前後，我們都快走了，延安才派出幾個老幹部回到四川，廖志高、羅世文兩個大概是關鍵人物。我們不可能認識他們，連韓天石我也不認識。「七七事變」後，韓天石是四川建立民宣隊的關鍵人物。韓天石是東北人，北京大學學生，後轉學到四川大學讀書。他哪裏是去讀書的，他是去做地下工作的。他在四川待了幾個月，找不到地下黨的組織，據說自己的關係暫時也沒有了，但他照樣活動。韓天石在成都救亡運動中是一個關鍵人物，是我的間接領導者，他的工作成就非常突出。

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紹信

幫我找到介紹信的關鍵人物是侯台階，現在改名侯方岳，比我大三四歲。到現在為止，我也不知道他當時是不是地下黨員。他一九四零年調到雲南。他怎麼跟我哥哥認識的，我不知道。他在成都編進步刊物。我哥哥搞地方救亡運動認識他。我哥哥讓我去找他，幫我弄到介紹信。我

第一次見他，是在一條臨河的房子裏。當時成都有許多房子，半邊臨街，半邊臨河。他認識不少人，知道哪些人要去延安。就是他介紹我認識田家英的。侯的關係多，領導能力強，他團結的進步的青年可能上百。他是我去延安的關鍵人物。沒有他，我得不到介紹信。

我一個人有四封介紹信。那時是各顯神通，有可靠救亡運動領袖的介紹信，西安辦處事認為你是可靠的，就行了。

一封介紹信是張志和的。張志和在大革命時期當過師長，是老地下黨。共產黨許多要人都知道他。四川不少人知道他曾是共產黨員，也知道車耀先是共產黨。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領導人是林伯渠，字祖涵。張志和的信就是寫給林伯渠的。信的內容我還記得。大意是說，祖涵先生，茲介紹成都救國會員前去延安……口氣就是老相識。張志和是四川救國會的領導人，其實我當時並未加入救國會，成都聯中還是沉寂的，無人來此活動。

我們一同去延安的四個人，只有我一個人有張志和的介紹信。

第二封介紹信，是王幹青的。這個人當時在鄧錫侯那裏做高級參議之類，其實只是個名義。鄧錫侯是四川軍閥，資格比蔣介石還老，四川綏靖公署主任，相當於四川軍區司令。綏靖就是剿土匪。王幹青是不是地下黨，當時不知道。但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時，他被害，是十二橋烈士之一，從這點來看，他可能是地下黨。

他的信也是寫給林伯渠的，口氣也是老熟人。

第三封介紹信，是郭祖劼的。郭祖劼在一九三七年是成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辦有刊物《國

難》三日刊，銷路很大。他當時的職業是蜀華中學教務主任。蜀華中學在成都規模比較大，但成績不怎麼樣。我到青龍街他的學校去找的他。他的信也是寫給西安辦事處的，但具體內容記不清楚了。我姐姐的愛人趙筱村先出發去延安，把郭祖劼介紹給我。前兩封信為甚麼記得呢？因為是直接寫給林伯渠的。

第四封信是同學余明的，他介紹我到西安找謝華。謝華是誰呢？是地下陝西省委領導的西北青救會在西安的領導。他辦的刊物叫《救亡》，陝西省委辦的刊物叫《西北》。謝華可能沒有資格介紹人到延安，他只能介紹到青訓班。安吳青訓班距西安不遠，是由陝北的黨派出來接待沒有介紹信的，或者不能立刻到延安去的青年的一個單位。這封介紹信我沒有使用。

一起集議去延安的朋友：田家英、趙世英，戴碧湘、何郝炬等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月份，通過侯台階介紹認識的準備去延安的人，經常在成都的少城公園茶館聚會。少城公園有很多茶館。少城公園既是玩的地方，喝茶的地方，也是各方面的人聯絡的地方。好人在那裏聯絡，壞人也在那裏聯絡。我們這些人，警惕性很高，怕蔣介石的特務。雖然經過了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國共聯合抗戰，但國民黨害共產黨那不是假的，要殺你還是要殺你。我們對國民黨一點都沒有幻想，對國民黨的看法沒有甚麼改變。有這種思想的，就是真左派。當時有這種思想的人就夠參加「民先隊」、「救國會」了。

我並沒有參加這兩個組織，我一九三七年才到成都，在成都無朋友，而成都聯中又是一個孤立於社會的純讀書的學校。參加「救國會」，特別是「民先隊」，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有兩個暗中的條件，一是反蔣，二是擁護蘇聯。不明說要有這兩條才是真正的進步分子。當時革命青年恨日本侵略，抗日，基本上都這樣。但只是抗日，根本不能參加這兩個組織。現在參加「民先隊」，就算參加共青團，參加共青團，就算參加共產黨，就算黨齡。這很對。現在聽說參加生活書店，也就是參加革命。這個做法也很對。當時的具體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這些人一起談，但不是一起走的。哪個先籌到錢，又有介紹信，就先走。通過侯台階，聯繫了田家英、趙世英（後來改為趙施英）、何郝炬（何其、何駒）、戴碧湘等。何郝炬比我小兩三歲，田家英也比我小兩三歲，四五個人經常談。我們這個非正式的小組，不斷在更換人。

田家英比我先走。田家英窮得很，他家裏能拿出幾塊錢來也難，估計是趙世英的，趙世英家比較有錢。那個時候，有錢人家的子弟要去延安，往往偷偷從家裏弄出金銀首飾去賣，一賣後，兩三百就到手了。田家英比我早走三四個星期。他們的路線證明他們的錢多。他們從成都坐汽車到重慶，轉船到漢口，又坐火車到鄭州，再坐火車到西安，繞一大轉（圈），很安全，很費錢。從成都到重慶坐汽車是八塊，還有那麼長的船和火車呢，每一步全要錢。

何郝炬也比我先走，他先弄到錢。去年，他來我家看我，我才知道，天老爺，他沒有甚麼可靠的介紹信，只有一封信，介紹他到西安謝華那裏的。我說，哎呀，你還不如等一陣子，我們一起走。你這個信，我也有，我去見過謝華，他在西安許士廟街十五號三樓，他也是介紹我到青訓

班，我沒有用。何郝炬經過安吳青訓班最後還是到了延安。

我們是如何到延安的

我們這一批新結合的是四個人。

還是通過侯方岳，他介紹我去找林蒙（名字可能有誤）。我在成都一個上層的公館裏見到林蒙。林蒙真是能幹，他可能已經有組織聯繫了。他找的是四川軍閥出差到西安的空軍車，架起的鐵欄杆上有帆布篷，燒汽油。軍車上有副官，還有押車的人。收我們每個人五十元錢，全部由他們分。

萬一遇到國民黨檢查怎麼辦？出發前已經辦妥一切了。當時閻錫山辦了個民族革命大學，閻錫山出錢，出地方，其實許多人是共產黨。這個學校在成都公開有招生廣告。離開成都前，在成都辦了報名手續。我想萬一有檢查，就說到民族革命大學去。當時，總的說來，你朝華北方向走，國民黨覺得你是上前線的，是自願去做炮灰的，檢查都不嚴。

到西安的準備是比較周到的。有介紹信，有錢，找到了車，到山西民族大學的報到證也有了。揣三百塊，一大堆。好在是軍車，土匪不敢搶，押車的有槍。通行無阻，沒有受到檢查。我們那一車二三十個人，各人坐獨木櫈。司機、押車軍人，一路大吃，我們付錢。坐這個軍車，比一般的民用車好，錢也花得少，也順利。

從成都到寶雞，土路，路很爛，汽車時開時不開，而且過秦嶺時很害怕，隨時都可能翻車。經歷了三四天，到了寶雞，然後再坐火車到西安。

到西安的時候，到八路軍辦事處報到。四個人，各人的介紹信全不一樣，我們的信拿進去後，被認為有用，可以到延安去。可見那些介紹信都很過硬，全部非常有效。接待的人穿羊皮襖，第一次看見皮在外，印象深。這個人說，同意你們去延安，你們是到抗大，還是到陝公，到時再說。我們有兩部軍車，現在沒有回來，回來後，可以送你們去。我不能胡吹呀，說到延安怎麼艱苦，我們是辦事處用汽車送去的。我們說，已經在旅館住下了，在偏僻的地方，怕國民黨檢查。他說，你們白天到郊區躲轟炸，晚上回城裏住，每天派一個人早上九點來聽消息。我們就在郊外待着，黃昏才回旅店。我們大概是雙十一那天到的西安，印象較深，等了五六天，有車子了，集中到辦事處坐上車。到延安的路都是黃土路，連石子都沒有鋪，車一走過，幾里路滾滾黃沙。從西安到延安，走了三天。

我們從成都到西安的這一批四個人，另外三個，到了延安後不怎麼聽說了。為甚麼現在連名字都忘記了呢？因為是臨時碰在一起的。我們這一批是中學生。

兩點申明

田家英到延安，跟我並不是同路。現在有一些人著書寫文，弄錯了。還有更莫名其妙的事，

張冠李戴，說我是教毛岸英的老師。更不對，那是田家英。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從蘇聯回到延安的。回來後，就到延安南邊的吳滿有那裏學農去了。按當時的說法吳滿有是富農，是第一號勞動英雄，《解放日報》發表了社論。當然是毛主席要這樣幹的。毛岸英在蘇聯住了十年，回來後，對中國情況不知道，毛主席就讓他到吳滿有那裏去了解中國農村。毛主席讓他住在宣傳部，由陳伯達管教他。但陳伯達不願做瑣事，一口福建普通話，就交由田家英管他。他跟田家英的年齡差不多，但他確實把田家英當老師看待。當時陳伯達任中宣部副部長，毛岸英回延安後一直住在中宣部。

現在利用這個講述的機會，再一次聲明。另外還有一個說法，一些文章說延安有甚麼「才子」之說。這個名詞，是打倒「四人幫」後才慢慢被人純粹捏造出來的。「才子」是封建詞，延安是無萬分之一容忍「才子」之說的可能。就是真正有學問的人，像陳伯達，也從來沒有哪個人說他是才子。這麼說的人，根本不知道在共產黨領導的環境下，根本不可能也不准講這種話。如果說了，運動來了，你就是「反革命」。任何人要這樣說，就是搞破壞。這是純粹胡編。還有幾大「美人」之說，也是根本沒有的，完全是假的。進北京後也還不准有這種說法嘛，全是胡編。

第二編



第四章　在延安（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

延安城裏就有幾個招待所，我們被分到天主堂招待所，就是張學良和周恩來會面的那個天主堂。當時不知道，知道肯定就更激動了。

當時我們睡在穀草上，穀草不是稻草，是小米的梗子，很硬很粗的，直接鋪在地上。頭天晚上住的時候，覺得奇怪，一大堆人睡在地上，不習慣。到鄜縣（現富縣）住下時，晚上吃飯，店老闆問你要多少斤，我說一碗麵，還是問要多少斤。後來別人告別我，所謂斤，就是未和好的麵粉，對方要根據你要的份量，給你和麵來煮。一般的麵條有筷子頭那麼粗，桌上有鹽，有辣椒粉，有水樣的醋，自己放。當時心裏感覺這個陝西怎麼這麼苦。從成都錦繡平原到那裏，生活水平，天地之差。這樣的麵，在成都哪有人吃。這就是那時陝北的物質水平。吃白麵條，就是享受了。

一九三六年雙十二後，東北軍後撤，收縮戰線，把共產黨「歡迎」進延安。我們去的時候，黨中央搬到延安將近一年。我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到延安後，延安已經比較熱鬧了，還不算十分熱鬧，一條以南北為主的小十字路而已。比我家鄉的小鎮還小。

我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號左右到的，因為到了延安後，聽說前幾天毛主席到延安飛機場去歡迎王明、康生、陳雲三個人。現在我了解，王明他們是十二月十五號左右到的。

到了延安，一天到晚是填表，寫思想自傳，包括到延安的動機，對共產黨的認識等等。思想自傳總是沒有完的，寫過多少次，哪些要你再寫得深刻點，再補充一點等等。現在來看，就是在詳細審查。在天主堂住了十多天，寫了多少萬字，填了多種表格，談了多少次話。

這以後，就分我到陝北公學十七隊。一個隊七十個人，住七八個窰洞。有隊主任、協理員管我們。又是填不完的表，寫不完的各種自傳，主要從事政治考查。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到延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些人分到抗大，有些人分到陝北公學。兩個都是短期的政治訓練班。當時有個說法，抗大畢業，基本分配到軍事部門，陝北公學畢業，分配到前方基層工作。這只是一句話，其實沒有任何區別。陝北公學也大得很，但後來不知何故不提了。

陝北公學三門課，學習過程中又反覆寫自傳

我們學三門課。第一門是「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教程」。這門課講的是「九一八」後的歷史。

國民黨的，我們知道一點，但共產黨的具體情況就不知道，所以有新鮮之感。第二門是「游擊戰術」，第三門是「群衆工作」。這些課都是抗戰的需要，跟文化沒有甚麼關係，跟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甚麼關係，課程的設置就是抗戰上前線需要。

陝北公學除了這三門課，還有晚上的急行軍。晚上哨子一吹，趕緊起來。都是半夜，冷死人，有時在高山上走一兩個鐘頭，女生也一樣。對一個中學生，特別是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去的人來說，有點吃不消（支持不下去）。但我當時並不覺得苦，你是來打仗的，這個訓練必須接受。

三門課學完後，我們並不是真的全到前線，到前方根據地，不少人留在了延安。到了前方的人，也不直接上前線，而是當基層幹部。基本上沒有作為一個連隊戰士上前線的。完全上前線犧牲的人，不算很多。大量死的人，是生病，過封鎖線，或者被日軍包圍這幾種情況。

陝北公學三個月反覆寫思想自傳，反覆寫對甚麼甚麼問題的認識。因為反覆寫，寫得很多，就能看出你這個人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就知道你的真實想法。你到延安來，是湊熱鬧的，是一時的心血來潮，還是真正的抗日，過去是否反蔣，或者是否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當然，還少不了一個問題是：你對蘇聯的態度。你必須是徹底擁護蘇聯的。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看出。你雖然不懂甚麼馬列，但你的思想傾向是多年形成的。如果你沒有十來年看左傾書報，你就寫不出來。這樣一來，就相信了我這樣的人，不是一時投機。

入黨，説容易也不容易，説困難也不困難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入黨宣誓。入黨之前，經過長期的考察、填表、寫總結，説容易也不容易，説困難也不困難。當時的背景是大量的學生到延安。中央有個目標，通過考察，能入黨的，都要入黨。長征到了陝北後，黨員就很少了，抗日戰爭的局面已展開了，知識分子黨員不多。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的概念，從初中到大學都算。當時入黨也不是號召，但對非黨員公開表態：你們想入黨可以寫入黨申請書。這就是在大規模發展黨員，比例是多少，我不知道。每個隊有個隊長，兩個輔導員，這三個人，找你談話，了解情況。他們都是相對有經驗的黨員。各個隊的情況都是這樣。陝北公學很大，工作人員連學生，大概有兩三千人。沒有甚麼黨委，是在陝北公學總支委辦公室裏宣誓的。記得牆上有三個人的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當時好像還沒有掛斯大林。毛主席像也沒有。

馬列學院非常特別，學員非常參差不齊

一九三八年一月進的陝北公學，四月初馬列學院秘密招考，通知我去考。要去考試，大概只是一個形式，基本上都定了。陝北公學十七隊還有余宗彥也接到了通知。

這個考試，是在延安清涼山下面一個千佛洞裏秘密考的。其實絕大部份題我都沒有答出來，

十個、二十個問題，你答對了一兩個，像列寧說的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你多少答出來了，就認為你是讀過馬列的。我自我估計，我至多能得二十分。

通過考試後，四月下旬，集中在延安藍家坪，黨中央書記處就在那裏。一個班是三三制，三分之一是長征老幹部，三分之一是老地下黨員（多數是抗戰後出獄不久的老革命家），三分之一是中央黨校、抗大，陝北公學三個學校考進去的，合起來不到九十個人。

馬列學院非常特別，第二學期我曾經同李先念一個小組，一個炕上睡覺幾個月。我那個小組，老幹部有宋時輪上將、姬鵬飛外長。後來曾做國防部副部長的王樹聲大將隔我一個窰洞。我們組有哪些地下黨員呢？有楊超、章夷白等，好像還有宋時輪、聶洪鈞、姬鵬飛，都是長征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活動的地下黨員，久經考驗的老幹部，抗戰後才被黨保釋出來的老英雄。我們那個組，有兩個三八式，一個是我，一個是張同舟。張同舟是西安人，西安事變時，中學生，紅得不得了，算是學生領袖了。西安事變結束後，國民黨勢力未進入西安前，黨趕快把這些人撤走了。我們組還有個人，叫曾三，後來長期當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新黨員有尹達、張黎群等。

後來，學員中的三三制辦不到了。因為一九三九年蔣介石封鎖嚴格了，根據地工作開始後，老幹部抽不來了。

馬列學院，江青是第二班，葉群也是第二班，丁玲大概也是第二班或第三班。實際上一個班就是一個期。

我們小組住在半山上，這個山只能開小窰洞，小窰洞只能住兩個人，我跟曾三住一個窰洞。到了根據地後，對我教育最大的就是曾三。曾三也是個知識分子，長征幹部，後任中辦副主任，「文革」中被整死。我受他的影響很大，我非常敬愛他。

當時十七八歲，對長征幹部和監獄裏出來的幹部都尊敬，但是，對後者更尊敬一些。道理很簡單，長征不管怎麼樣，槍在你的手裏邊；而監獄裏出來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人人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英雄、革命家。所以對他們真是五體投地。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特別敬佩這批人。他們確實是為了理想，為了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了解放全中國人民，隨時可以付出生命。現在許多青年對打倒蔣介石不了解，不知道那個時候要打倒蔣介石是絕對正確的，沒有任何錯誤。蔣介石當時就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至於說他並不準備投降日本，這是事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鎮壓一切抗日積極分子，首先是共產黨，手段殘酷，抓起來就殺頭，連陳獨秀都要抓起來坐牢。我們當時一批青年，痛恨蔣沒有錯。蔣介石在日記裏說，要抗日，但他要先安內。他這個「內」不是一般的「內」，而是關起來殺中國進步抗日人士。現在的青年不懂「九一八」後六七年的環境。那個時候，日本人侵略那麼厲害，蔣介石鎮壓抗日活動也那麼厲害，怎麼能不恨他呢？當然，現在我們去研究，發覺蔣也在準備抗戰，決不投降日本，也是完全正確的。

馬列學院重量級的老師：吳亮平、柯柏年、王學文、康生、陳雲、李富春、艾思奇、楊松、陳昌浩等

六門功課，分兩學期學，八個月就畢業了。第一個學期，三門課，是根本。馬列主義，從馬克思講起，講到斯大林。這門課，一九三九年後，就變成蘇共黨史了。老師是吳亮平，我對他有一種很傷感的感情。他是留蘇的第一批人，是跟張聞天、蔣經國同一批坐船到蘇聯去的。英文、俄文都好，還經過長征，到延安後卻只是中央宣傳部的一個科長。而博古、王明、張聞天這些人，先後是第一號人物了。吳亮平教的內容豐富，但也有教條。哪個沒有教條？都是把列寧斯大林的東西當《聖經》。

後來教我們的是柯柏年，解放後是外交部美大司的司長。美，美國；大，代表大洋洲，是研究性質的，當時談不上甚麼外交關係。柯老懂英文、德文，課講得最好，是學者型的，原原本本，頭頭是道，講得引人入勝。他是延安數一數二真研究過馬克思的人。

還有一門叫政治經濟學，是王學文教。現在知道這個老前輩的人很少了。王是留日的，學《資本論》很認真，他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表面上，他是研究經濟的，實際上還做特科的要務。特科是周恩來創建的，一直受周的領導，是共產黨的情報和反間諜部門，相當於公安部兼安全部，既搞情報，也搞活動。共產黨的特科很厲害，恐怕是世界第一，根本原因是他們是一批有崇高理想的人。王學文資格老，是馬列學院的副院長，但是他不善說話。我們很尊敬他。但說實

話，上他的課，很難聽懂。

有一門課叫黨的建設，簡稱黨建。講共產黨的性質、群衆工作、支部工作、反特工作等。第一班，第二班，不是一個人講的，張聞天人緣好，他這個人不得罪人，不整人，請甚麼人，甚麼人都來。黨的理論這部份是康生講的。康生會講，有一句是一句，條理清楚，沒有一個字重複，很有感情。他給我們講課，舉了一個人，饒漱石，後來的新四軍的政委，華東局的書記，地下時外號叫「機關槍」，康對他稱讚得不得了，說他會做地下工作。

陳雲講群衆工作，大大稱讚「小開」。「小開」是潘漢年在黨內的外號。「小開」是上海話，是小老闆的意思。陳雲稱讚他怎麼樣靈活機動，樣樣都能幹。陳雲也大讚過「機關槍」。記得這些內容的人，現在還有人健在，現在北京聽過此課的，我知道至今仍有六人，我不會說謊。中國的歷史很複雜，作為典型的了不起的好幹部，最後被整成「反革命」，連命都送掉了。這個教訓值得注意。

第二學期又是三門課：中國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哲學。哲學是艾思奇講。艾思奇寫文章十分通俗，使人感興趣，但不會講話。給我們講課，不看我們。反而是抗戰前看他的《大衆哲學》，對活潑人們的思想起了作用。

講中國革命史的人，叫楊松，湖南人，是個老前輩，在蘇聯很多年，抗戰後從蘇聯回來，是管東北抗日聯軍的人物之一。他講得不錯。一九四一年，《解放日報》創刊後，他被調去當總編輯。一九四二年春天得肺病去世了，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

教世界革命史的老師叫陳昌浩，是紅四方面軍的政委，徐向前是總司令。陳昌浩是留蘇回來的，「文革」中自殺了。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有講話的天才，從我到延安，到現在，沒有遇見有超過他的，他比王明還會講。他很年輕，一九三六年，紅軍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全部被打散，他們這些主要領導人手裏有幾個錢，他就躲到甘肅偏僻地方一農民家裏。巧得很，他躲的那家也是湖北人，那家人猜到他是紅軍。他到延安恐怕在一九三七年的秋末或冬天了。第二年八九月，就能夠給我們上課。他從羅伯斯比爾，講到拿破侖。他講課不狹隘，極傳神。講到拿破侖，他就是拿破侖，講到羅伯斯比爾，他就是羅伯斯比爾，非常有吸引力，英雄主義極為外露。以後我想，他哪裏有這些歷史知識呢？可能他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後，看了很多書。當時延安已有各種各樣的書，英文的，德文的，俄文的。當時蘇聯出的書不少，講世界革命史的書蘇聯剛出了一些。看情形，他可能熱炒熱賣。他給我們上課，印象最深。

延安講課，跟現在不一樣，七點吃早飯，從八點到十一點半，至少講三個鐘頭。如果有休息，了不起就是喝水。我們坐在馬扎上聽，有個馬扎就不錯了，扛來聽課，又扛回窰洞。教室是搭的平房，土牆，坐六七十個人。屋頂是很厚的黃土，沒有石灰。後來建了更大的，可以坐一百多人，外邊也可以坐一百多人。

專學習聯共黨史，錯誤影響不小

一九三八年底已經學了八個月，六門課也完了，進入一九三九年初，馬列學院就成立一個部，叫馬列學院研究室，分四個研究室：馬列主義研究室，哲學研究室，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中國問題研究室。人員以一班、二班的學生為基礎，有四五十個，又從中央黨校、抗大抽調了三分之一的人，加起來有八九十個。我分在馬列主義研究室。剛進去的都是青年人，基本上都不能看外文。開始讀一些翻譯的書，很快地，蘇聯在一九三八出版了《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簡稱「聯共黨史」，後來叫「蘇共黨史」，我們就以這個書為研究課本，根據這個課本，再找一些有中文譯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其他書來參照讀。這樣的一種研究方法，後來被毛主席批為教條主義。當然是，完全是。但是，以聯共黨史為根本教材的根本方針，不是博古、王明、張聞天定的，是一九三八年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基調報告明文定的，毛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號召我們學馬列，就是學斯大林。這些，現有文件都能查到，是執行毛的決定。

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延安學習馬列就走小路，走捷路了。所謂學馬列就正式變為只是學聯共黨史。我們在馬列主義研究室搞了一年，就是這樣做的。我們用的那本書，漂亮得很，是蘇聯出版的中文書，紙張、印刷都很漂亮，都是蘇聯的進口材料。一九三八年夏天開始，整個共產黨學習馬列，就是學斯大林，就是學聯共黨史，而這個是六中全會通過的毛澤東的號召，是中央定的。從前，我們這些人只知道點馬克思，哪裏知道斯大林？從此，很多人陷入對斯大林的崇拜。

陷入斯大林的教條，是從哪裏開始的？是從一九三八年夏秋開始的。當然，客觀上也有原因，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太多、太厚，也沒有翻譯，就是翻譯過來也看不懂。在今天，也沒有幾個人能真正看懂，像《反杜林論》、《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有幾個人能看懂？號召的人，真的懂嗎？

一九三九年在研究室的研究，簡單地說，是沒有學到甚麼真的馬克思。實際上，是使我們的教條化定型了。我也成了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者。聯共黨史，事實證明它不是馬克思主義。根本上，它就是加強專政，加強鎮壓。鎮壓成了全書的基本內容，包括內部鎮壓。可以說，蘇共黨史說的就是鎮壓萬歲史，影響極壞。我們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全盤接受。我是這樣，其他人也是全盤接受，沒有辨別能力。所以，延安新的施政方針，跟王明、博古他們並無關係，他們都已毫無發言權。他們犯教條主義的時候，我們還是小孩子。我們到延安，領導人號召學習馬列就是學習聯共黨史。我專門學習了一年，我的進步沒有，錯誤連篇，還很頑固。有些老同志自以為至今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在堅持聯共黨史，堅持斯大林主義。《聯共黨史》是甚麼？就是一本鎮壓萬歲的超級《聖經》，不從思想中毀去這部《聖經》，一輩子就會只知道鎮壓，鎮壓，鎮壓……。

一九四零年，我調到馬列學院教育科去做教育幹事，有時又叫助教，有四五個人。這個職務不重要，並不是非要不可，主要是做聯繫班上的工作，開會呀，學習呀。我的時間多一點了，可以看雜書。馬列學院有三四個窰洞的書，也有很大的閱覽室，有五六十平米。全延安，初時也只

有馬列學院有。大後方所有的雜誌、報紙，包括國民黨的反動報紙，統統有。我身在延安，對大後方的情況不生疏。我感到當時去看的人很少，經常去的恐怕就我一人。國民黨到了重慶後，專家多無事做，只好辦刊物。我記得當時有《外交評論》、《財政評論》、《貿易月刊》等，很正規，資料豐富，對國際形勢、國際經濟形勢，多有報道，我經常看。

一九四零年比較平淡。現在回想起來，在五六十平米的閱覽室看那麼多報刊，上百種，這個對我幫助大。我對國民黨區的情況，以及世界的大事，始終關心了解，不全盲目。

為甚麼馬列學院辦不下去了

馬列學院一期期辦下去，一九四一年初，辦第五班，實際上就是第五期。第五期分兩個班。這時的學生質量大大提高了。國民黨實行封鎖，學生來延安不容易；此外地下黨開展工作也困難，許多人都撤回延安了。

一九四零年底，馬列學院很難辦下去了。一九四一年起，請不到教員，連宣傳部的吳亮平，在張聞天手下做科長，《解放》的雜誌總編，他都不來了。這就不正常了。張聞天誰也請不動了，誰也指揮不動了。現在看來張聞天太單純了，那幾個月，非常困難，四面楚歌了，他還要硬撐。

黨的土地革命時期的幹部，白區工作的負責幹部，還有些抗戰後到延安去的知識分子幹部，

都到馬列學院來，馬列學院似乎變成一個共產黨中央訓練高級幹部的學校了。這種情況下，能辦得下去嗎？

張聞天當院長，拿筆桿的人，變成了拿槍桿的人的老師，還有那麼多大人物，解放後，大將、上將、部長一大堆（批）。這樣一批人都變成他的學生，行嗎？張聞天是個書生，一九四一年還要繼續辦，即第五期，突然所有的教師一個也不來講課了。以張聞天的身份，請不動一個人，有些人如吳亮平、艾思奇是他的直接下屬。張聞天成了孤家寡人。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這個學校的學員很多，但實際上教學進行不下去了，有學生，沒有教師，維持了幾個月，下半年，辦不下去。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幾號，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出來了，把延安過去的教育，特別是馬列學院的教育——當然沒有明講——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典型，說整個黨的宣傳、理論學習全部要改造。因此，學院要停辦，要改造我們的學習。過幾個月，就是反對黨八股了。

張聞天這個人，恐怕是太沒有心計了。他應該老早推辭，不當院長了。這個事很明白：看見老師不來，就提出辭職，學校停辦，或提出領袖來當院長，他辭職。可他是書生氣多，不會這些。

馬列學院停辦後，一改組，學院絕大多數工作人員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最後，學院改成中央研究院。跟馬列學院不同的是，沒有人來講課，全自學。設有多個研究室，有哲學研究室、文學研究室等。張聞天還是院長，只是純掛名的。這時，他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范文瀾來

當副院長。這個副院長也是個名義，范文瀾始終是個學者。真的副院長是李維漢。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開始大讀閒書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調查研究工作的決定》公開發表後，從黨中央到各縣，都加強調查。很快中央成立了一個大得不得了的機構，叫「中央調查研究局」，毛主席兼任局長，副局長是任弼時（這個機構實際上沒有真成立過）。下面分三個部門：一個叫中央政治研究室，主要研究國民黨區的情況，包括國際方面的；一個叫中央黨務研究室，研究根據地內部問題；第三個部門，叫敵僞研究室。敵僞研究室設在軍委裏邊，一般人不知道。裏邊有誰呢，有日共總書記野阪參三。他一九三九年就到了延安，但沒有公開。一九四三年才宣佈他到延安。日本戰敗後，他回國，是日共的總書記。黨務研究室的情況，我不知道。政治研究室，毛主席兼主任，陳伯達是副主任，包括工作人員在內的有七八十人。陳伯達這個人，甚麼事都不管，一直如此，就是寫文章，他自己要寫甚麼，或者上邊要他寫甚麼。自從這年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從此就成為一個黨的制度了，任何地方都有。中央書記處有，國務院也有。有些叫政治研究室，有些叫政策研究室不等。

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間，我就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鄧力群也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其實就是馬列學院的學生，馬列學院停辦了，大部份早期留校的學生就轉到這裏了，還有其他部門

來的少數人。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政治組、經濟組、國際組等組。我就在經濟組的農業小組裏，研究國民黨地區的農村問題。我一直喜歡農村。這個機構有個好處，報刊多得不得了。我們當時不是以看書為主，以看報刊、材料為主。在這裏只有半年，工作沒有做甚麼，很自由，也可以讀閒書，比在馬列學院舒服得多。

我在馬列學院待的時間比較長。從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到一九三八年底，在班上；一九三九年到馬列主義研究室，在研究室待了近一年；以後又在馬列學院教育科工作，即所謂幹事，全部時間都在那裏，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馬列學院停辦。但我以讀雜書、讀報刊為主。

第五章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發生歷史轉捩點的一年

統一思想、輿論

一九四一年，我以為基本上是延安的一個分水嶺，進入夏天以後，毛主席要採取另外一些東西了。

延安，最熱鬧的時候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各種各樣的學校很多，光是外邊來的學生就上萬。抗大、陝公，還有魯藝、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還有其他。吃甚麼？糧食全是老百姓支持；燒甚麼？延安全是荒山，一棵樹都沒有，全是二三百里外拉的煤炭。延安的經濟支撐不了這麼多萬人的簡單消費。

一九三九年春天，延安的糧食供應有困難了，能上前線的上前線，抗大、陝北公學也搬了，分別到各個地方去。馬列學院稍為延長了一年。因為總人數不太多。各校要在延安住下去，像

一九三八年一樣，經濟不允許了。因此延安時代，一年年的情況都不同。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六月，延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黨中央同時發佈了兩個決定，一個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一個關於加強減租減息工作的決定。更重要的恐怕還是一系列並無專門決定的措施。

要講我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經歷，我要先講一九四一年整個一年的情況。現在回頭去看，一九四一年是延安發生歷史轉捩點的一年。整風為甚麼要來？一九四二年的整風不是突然來的，先要做好準備。準備工作從一九四一年就開始了。有甚麼現象呢？統一輿論。

延安前後出了許多雜誌，像《解放》、《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八路軍政雜誌》、《萌芽》等等，還有一些非正式的文藝刊物。

特別要提一下《輕騎隊》。經過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之後，延安一些想表現自己特點的青年，在黨的中央青委裏邊辦了一個牆報，起名《輕騎隊》。牆報是用很多木板釘起來的，字很大。人物包括李鋭、于光遠、許立群、童大林等。《輕騎隊》有一種批評的聲音，對延安的某些現象提出批評。《輕騎隊》這批人膽子也夠大的，他們應該算延安青年當中思想最活躍的極少數人。他們寫短的批評文章，有些人叫雜文，遠在丁玲、王實味之前。他們的文章確實好。解放以後的雜文家，沒有哪一個能比得上《輕騎隊》的，我印象深得很。每出一期，很多人都要跑去看。我自己很少去，我還忙着我的教條主義工作，要看書做準備工作。

《輕騎隊》是轟動延安的，從毛主席到下面的人，每個人都知道。有一種説法，毛主席是去

看過；另外的說法，有人抄好了給毛主席看；還有的說法，說原稿給毛主席看。後來《輕騎隊》遭到一些人的堅決反對，跑到毛主席那裏去講。據載，主要是賀龍和王震二將軍，說《輕騎隊》這些人不得了，在延安要造反了。其實《輕騎隊》這些人只是批評了幾句，應該說他們是延安一部份思想活躍的青年代表，是延安的先進分子，是共產黨的先進分子。後來，《輕騎隊》那批人被整為自由分子，或者黨內造反的。毛本人對《輕騎隊》有甚麼說法，前後聽到很多，因無確據，我不能亂說。

黨中央機關的理論刊物《解放》，是一九三七年開始辦的不定期刊，名義上是張聞天主編，實際上是下面的宣傳科長吳亮平負責。這個雜誌在一九四一年春，出到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期的樣子，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不聲不響地沒有了。

所有報刊全部停刊的同時，黨中央在六月創立了《解放日報》。因此，延安只有一個輿論。一九四一年，所有的報刊全部停辦，誰有這個權力呢？具體內幕就不知道了。但現在回頭來看一九四一年，所有的報刊一律停，這件事非同尋常。

彭真從晉察冀調到中央當組織部長，當時他不是中央委員

中央領導幹部有個很大的調整。彭真從晉察冀調到中央當組織部長，據說當時彭真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陳雲一下子被換了。陳雲的聲譽本來是高得多的，作風比較實在。為甚麼要換陳雲

呢？大家都不清楚原因。

開始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樹立毛澤東歷來正確的思想

中央宣傳部慢慢瓦解了。當時不當一回事，現在看來，很重要。現在據載，張聞天在一九四一年夏秋即被免去中宣部長職務了。胡喬木調到毛主席身邊做秘書，以後出了很重要的書。一本是《六大以來》黨史資料彙編。這本書是怎麼來的呢？「九一八」以後，第三次左傾路線，即王明、博古主持工作時期的地下刊物有一些運到了延安。這本書就收了從六大到抗戰前能夠收到的文件，包括「九一八」前後，以王明、博古為首的中央的極左的打倒一切中間派的決議、文章等。這些東西確實是錯誤的，而且錯得很厲害。毛主席反對他們，這個對不對？我覺得是很對的。過去含含糊糊，看不清楚。毛主席本人雖然不重視他們，但在組織上還是把他們當成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博古他們當時是青年呀，知識分子出身，站在那麼高的位置，不了解情況，以為貼貼標語，遊行一下，鬧鬧就會取勝了。他們很革命，但是幼稚，而且這些東西又主要是來自莫斯科。張聞天雖然文化修養高過所有的人，但是那兩年寫的文章照樣是打倒一切。

一九四一年開始對黨的歷史的認識來一個大轉變，過去捧得很高的王明、博古、張聞天這些領導，一下子變得完全錯誤，有憑有據，而這個工作是一九四一年準備的。這個準備毛主席自己做，胡喬木是重要助手。

整風的準備工作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具體做工作的是胡喬木。不要看胡喬木當時也是個青年，一個毛主席身邊的秘書，但他的工作能力特別強，把這些東西都弄出來，編出了這本書。另一套書叫《兩條路線》，兩本。這些書的任務，是能充份說明王明、博古、張聞天是錯誤的。（其實均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

把張聞天的歷史錯誤一翻，黨內的最高領導當然是毛主席了

大概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沒有點名，但諷刺的主要對象是張聞天，說張聞天這些人對中國一點都不懂。〈改造我們的學習〉總的來說是很好的，中國人不了解中國情況是不行的。這個報告影響很大。「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報告中用此諷刺挖苦以前的中央領導，包括瞿秋白，挖苦得很厲害：你們從蘇聯學習回來，只知道蘇聯那一套，對中國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是根底淺。但是，毛的這個批評對黨內的年輕黨員，確是金玉良言，我一生拜服。當時看到這個對聯，只覺得很深刻，但對其所指的具體對象，延安百分之九十五的青年幹部，都不知道，我當然不知道。認為是指我們這些青年，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是指過去的領導。

當時王明、博古已經沒有權了，聲望也不高了，但張聞天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後，是總書記，或叫「總負責」。這個名義還在不在，延安含糊了幾年。一九三八年，張聞天讓毛主席當總

書記，毛主席不當。張聞天這個總書記又像是，又像不是。我們這些青年沒有到延安前，以為黨內最高負責的是張聞天，毛主席跟朱老總主管軍事。到了延安後，不大聽說張聞天。實際上也看得出來，延安的一切，都是以毛主席的領導為核心。但是名義上，還有模糊狀態，張聞天的總書記還有沒有，沒有下過文件。但是，究竟有沒有決定一切的領袖？有沒有說一句算一句的最高的領導？當時實際上的理解還是毛。

一九四一年，整風還沒有正式開始，據說在九月十四號就攤牌了。攤誰的牌？攤張聞天的。把張聞天三十年代初的底一翻，那時錯誤不小。

最上層開會批張聞天，是毛發動的。王明、博古已經早受過公開批評了，影響幾乎不存在了。而張聞天還沒有。當時在內部，毛一下把張聞天批得一塌糊塗。批張聞天有五個字。叫「狹高空怯私」，狹隘；高傲；空洞；怯，膽小怕事；私，如何解釋不清楚。這五個字拿出來，在黨內，還不要說我們這一輩，我們上一輩，都覺得不對。張聞天的一生，特點、個性、作風，好像跟這五個字是頗為相反的。文人膽子不夠大，「怯」可能有點像。總之一句話，這五個字一塌糊塗，張已不像個樣子，涉及到人格問題。這個批評，在今天看來也太走火，怎麼能「一句頂一萬句」呢？

對張聞天攤牌後，黨內不再隱隱有堪與最高領導人形成並駕齊驅的人物了。實際上抗戰後這幾年，延安就是這樣的。包括我們這樣的小青年，都確認毛是最高領導。但是張聞天總書記這個名，似乎又有似的。抗戰後，更明顯。只有毛才能掌握，當然周總理也能掌握，張聞天沒有這個

能力，要他領導黨、政、軍，他也難。所以權力轉移，實際上早就形成。張聞天一九四一年自己請求下鄉調查，張又不會爭甚麼權。九月攤牌後，他很快就提出了，實際上，他就是說，中央領導我自動不參加了。張聞天下鄉調查的背景很清楚，既然礙手礙腳，我就自動走。總書記或總負責之名又未正式取消，取消又要開會。

對張聞天秘密攤牌，我們當時一點風聲都沒有聽到。我們不知道張聞天在政治上已完全垮了。我知道這個背景，原則上清楚是在一九四三年回延安以後。一九四四年就完全清楚了。張聞天任何職務都沒有了，搬到棗園去了，帶幾個人辦一個刊物《參考資料》。實際上誰也不提他了。

一九四一年，一年，材料、人事、輿論都準備好了。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作反對黨八股報告，正式整風開始。張聞天則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離開延安了。

第六章 跟隨張聞天到陝北和晉西北作農村調查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九四三年四月）

陝北神府縣賀家川口：生產關係簡單時，我就着重調查生產力

從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三年四五月，我不在延安，我跟着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團下去了。我們叫延安農村調查團。張聞天自己要求下去，跟他的夫人劉英一起。現在看，他是徹底自我放棄權力了，離開延安，以免礙手礙腳。我們下去時，根本不知道是中央內部權力更換，不知道張聞天已沒有權力，自行下放了。這一下去就是一年半，沒有一個人知道。張聞天的事，就是毛主席周圍的幾個人，另外延安還可能有幾十個人知道吧。

張聞天這麼高的職位，中央組織農村調查團，各地方弄不清，把你當中央，由張聞天當團長，帶幾個青年小助手到晉西北調查。張聞天用的是假名，叫張晉西。

我們政治研究室農業小組有四個人，派了我去。中央各部委抽調一些人，中央黨務研究室去

兩個人，財經工作部去兩個人。中央研究院的馬洪當秘書。馬洪很能幹。我們的目的地是晉西北。全體團員是：劉英、馬洪、雍文濤、薛光軍、許大遠（須旅）、薛一平、尚明、徐羽、曾彥修。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天還遠沒有亮，我們十來個人就從延安楊家嶺動身，另外加上警衛一個班。中央派了一個加強班十二個人，還有一個排長領導，很是氣派，因為張聞天住到哪兒，通天亮是要站崗的。就是白天在路上，張聞天騎着馬，前邊是搜索着前進，左右都有人保護的。我們跟在後邊走。這些警衛戰士真可愛，是紅軍，是中央警衛團的。排長、班長均是經過長征的四川人，個個像小老虎。張聞天還有一個單獨做飯的，還有一個管理員。「管理員」這個稱呼現在不大有人知道了，但在延安流行了十幾年，管理員管理日常生活，即是個小總務科長。加起來，一共三十幾個人，浩浩蕩蕩。但是，實際上我們是悄悄離開延安的。李富春、楊尚昆送出楊家嶺。我們走出楊家嶺十多里，天才亮。

各地都不知道張聞天沒有領導地位了，接待得很隆重。我們先到陝北神府縣。國民黨統治區叫神木縣、府谷縣，這兩個縣有一部份在我們手裏，我們叫神府縣。神府縣的領導在賀家川口，是個小鎮。凡是叫甚麼川、甚麼口，甚麼灣的，在北方就相對富裕，因為有水，附近有小河。張聞天住在賀家川口，作農村兼城鎮的調查。我們其他人分三個組出去，我所在的組去路家南坬，這個地方是個窮地方。我喜歡調查窮地方。路家南坬距賀家川口要走大半天。我們組還調查另外一個村，叫柳葉村。我是這個組的組長。我們這個組的其他三個人是：尚明、許大遠、徐羽。尚明現在還在，解放後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

路家南坬有三十幾家，柳葉村也有三十幾家。柳葉村名字很漂亮，實際很窮，沒有水，旱災很厲害，收成很低。一般人只調查生產關係，甚麼多少地主，多少富農，土地佔有等，但這個地方沒有這些，沒有地主，兩個村都沒有，生產關係相對而言就簡單。我調查有個特點，如果生產關係沒有多少好調查的，我就調查生產力。

怎麼調查生產力的呢？舉一個例子，以後我在其他地方的調查也跟這裏差不多。路家南坬是個窮村莊，羊有幾群，一群十幾二十隻；有幾個放羊娃，幾家人的羊由一個放羊娃放，每家兩三隻或三五隻，大家出一點錢。山上沒有樹，也沒有一棵草，羊要跑很遠，十來里路，把草根都刨來吃了。近的吃完，就跑到更遠的地方，羊把草根吃了，土地流失嚴重。我提到過這個問題的嚴重，但農民不會看得那麼遠，聽不懂。跟農民講，農民接受不了，農民只看眼前，所以越來越窮。當時的地方黨政也不管這些。我還發現一個情況，小麥比穀子（小米）價錢高，農民反而不種。我問一個農民，為甚麼不多種一點小麥？他講了種子與收成的比例。小麥的種子花一斤，可以收十斤，不好的時候，種子花一斤，收五六斤。風一來，種子就被吹走了，種子就收不回來。而穀子呢，一斤種子，收一百多斤。一般的人願意種，因為種子少一點，肥料少一點，收成還有。另外，穀子一顆，很粗，餵牲口很好，而麥草輕飄飄，用處不那麼大，等等。這些東西，不在農村待十幾年，不懂。還有種大蒜，那裏的大蒜貴得不得了，我問為甚麼不多種一點？農民說，你知道大蒜是怎麼種的嗎？一是需要種子多，一瓣蒜長一頭，買不起種蒜。二是需要雞肥多，此外，一顆大蒜種子種下地時，需要三四粒黃豆做底肥，所以種不起。類似這些情況，通

過調查，我知道了很多東西。我後來在河北調查粉條廠、豆腐房，也是這麼做的。粉絲本身賺不了多少錢，開個豆腐房，也賺不了多少錢。粉房有粉渣，豆腐房有豆渣，這些渣可以用來餵豬，賺就賺在這些地方。知道一點點農村經濟的常識後，再去了解，就很有好處。一天到晚去調查這個剝削，那個放債，不給你講真話，很難調查到真相。「稼穡艱難」的時候，農民永遠不會相信你。所以，生產關係簡單時，我就着重調查生產力。

我們調查完這兩個村時，張聞天的調查還沒有結束，我又一個人跑到賈家溝去調查。賈家溝有七十一戶人家，是個富地方，有水，雖然不多，但是有條河的上游的看不見的細水在這裏。我一個人搞了十來天，專調查生產力，也有報告。此報告張感興趣。

晉西北興縣：我不會按地方意圖去寫調查報告

大概到了四五月間，結束了賀家川口的調查，東渡黃河，到了晉西北的興縣。興縣不是很窮，縣城離黃河五六十里。興縣的碧村是晉綏邊區區黨委所在地。當時還叫區黨委，不叫中央分局。黨內早就有電報通知下去了，說洛甫下去做調查了。洛甫是張聞天寫文章用的筆名。這個筆名確實有點蘇聯味道，但他是從蘇聯回來的那群人中，個人道德、個人修養都高的人。區黨委還不知道張聞天本人的情況，對張聞天非常客氣，因為長期以來張聞天名義上是黨的總書記，別人以為是黨的總書記下來了。當地的幹部偷偷問我，黨中央領導，到底是張聞天，還是毛主席？誰

是最高領導？我說，根據我的觀察，從我到延安起，都認為最主要的領導人是毛主席，從來沒有說張聞天是第一領導人，不管有沒有這個名義，誰都看得見，權力全在毛主席手裏，但大家都說張是總書記。

我們下去後，當地就組織大規模的調查團，我們成了加進去的一小部份。調查團有三個大組，組長都是當地的領導幹部。我們調查了三個地方，一個是興縣的黑峪口，黃河邊上，西渡河就是陝北。黑峪口是一個小鎮，有條小河，名字真漂亮，叫蔚汾河，從此處流入黃河。天旱時不大有水，雨天有一點水。這個地方比較富裕。還有一個叫高家村，是黑峪口到興縣縣城一個大路邊上的大村，是往來的要道，比較富裕，有點小作坊，有七八十戶。

晉西北的生產水平很低。在黃河邊黑峪口看見剃頭擔子，插有布幌子，灰黑灰黑的，寫有八個字：「朝陽取耳，清水剃頭。」令人吃驚。這是六七十年前的廣告。現在幾乎人人有手機，變化之大，是近一二十年的事。

我們在黃河邊上卻沒有魚吃。黃河漲大水，魚自動漂向河邊，群衆用棒打，竟然沒有網魚的東西，沒有捉魚的方法。這種用棒打魚的方法，像原始部落。我們幾個青年買了些棒打魚吃。這兩件事，說明當時生產力低下得可怕。我們如果不去發展生產力，只抓階級鬥爭，能起甚麼好作用呢？

我又鑽山溝，山溝的名字真好聽，一個叫花園溝，一個叫碾子村。花園溝三十戶，碾子村一百多戶，都比較窮。我是這個組的副組長，組長是當地的負責人閻秀峰，解放後曾任西南局的

書記處書記，「文革」時被打倒。

我選的是花園溝。花園溝原來有一個「富農」，我們看了後，認為只是一個富裕中農。他很能幹，養了一條牛，是大犍牛，很漂亮，毛色發亮。那個時候，有條牛不得了。他還代人耕地，收幾斤黑豆。後來我們討論，過去將他當做鬥爭對象，現在應該改正。為甚麼呢？一、他是先進生產力，二、他勤勞，牽着牛給別人耕地，一畝地收三升黑豆，也是應該的。雖然我們這些意見是正確的，但沒有用，我們一走，一個運動來，肯定還是個富農，又非弄光不可。

我在這個地方看見的東西，讓我感到非常驚奇。比如「耬」。「耬」是下種的農具，由很好的棗木做成，牛拉着，有三個落籽口，可以自由調整，根據播種距離來設定三個口的寬度。牛拉一次，就播三行。在這麼個小山溝裏看見這麼先進的生產工具，漂漂亮亮，真是驚人。「耬」是古人留下來的，春秋戰國時就有。西北的土地，大多貧瘠，種高粱的間距，牛都可以睡。叫做「高粱地，臥老牛」。為甚麼這樣呢？靠天吃飯，不這樣不行。行距、株距都很寬。種小麥，也要一尺多寬。

通過調查我發現，在中國農村，只要有點條件，農民勤勞，辦法多得很，只要有井灌，就富得流油。當時的問題在哪裏呢？在沒飯吃。我們調查時發現，他們的糧食非常困難。調查團還是老規矩，在窮苦人家吃飯，按規定，用糧票，一天兩斤半。正規的糧食很少，吃點小米窩窩頭，連皮一起吃，玉米也帶皮，做成窩頭。有時候，皮比糧食多。我們向上反映意見，認為農民的負擔重，農民交公糧往往佔去一半，自己剩下的很少，根本不夠吃。而只要成了幹部，成了解放

軍，一天的小米一斤半，這對農民來說，根本辦不到。根據地建立的第二年、第三年，還有多種負擔，布鞋也是派的。做布鞋需要布，需要麻等，也是負擔。牲口出差，更是個大災難。一年四季都有任務，農民跟着毛驢走，毛驢吃的，自己吃的，都是自己出，負擔不起，所以許多農民情願牲口死掉。所有的根據地情況都差不多，負擔不起。馬、騾全沒了，毛驢還有一些。這些情況我們都反映了。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上面的各種「調查」多得不得了，下面的基層幹部填表都是亂填。比如花園溝行政村——這是閻錫山時期的行政村，我們暫時還沒有改，一個行政村就是一個鄉——我問行政村書記，百分比是甚麼意思，他們並不知道，他們連「百分比」都不念，把「%」叫「括欄」，即圓蛋蛋的意思。叫都不會叫，怎麼還能填？我們出了多少報告，往往是這樣來的。上面的調查太多，各種各樣的調查全都是公文。報告中說的甚麼「青年隊」、「婦救會」、「兒童團」，其實不怎麼有。肚子餓，吃都吃不飽，哪裏又是農救會，又是青救會，又是民兵，又是基幹民兵，樣樣有，一去看，似乎甚麼也沒有。我不大會按照上級的意圖去寫報告，只按實際調查的寫。

從田家會戰鬥談到敵後的抗戰

這次在晉西北，我們遇到一次晉西北反掃蕩的大勝利，名「田家會戰鬥」。大概是五六月，我正在花園溝調查，半夜得到緊急通知，立即連夜西渡黃河，日軍來掃蕩了。我們這些非武裝

人員，連夜出發，天亮趕到黃河邊。西渡黃河，就是陝甘寧邊區的神府縣境。過了十來天，我們又回到晉西北。大概是在嵐縣境內，我們打了一場著名的田家會戰鬥，是一場漂亮的埋伏戰，消滅敵軍人數我不大清楚，好像是一百多，或二百多，或更多。現在的人不大了解，認為消滅敵人一百多，有甚麼稀奇。可那是十分稀奇的了。敵人出發前，我們必須有可靠情報，在最有利於我們的地方預設強大埋伏，以後外面對我們這樣的打法有「口袋戰術」之稱。硬打，我們的武器彈藥與日軍相比過於懸殊，硬打就是無謂犧牲。所以放你進來，進入我們在地形上佔絕對優勢的設伏地方，猛然發起攻擊，才有可能制勝。這次田家會戰鬥就大勝了，敵人停止前進了，根本沒有深入到根據地的核心地帶興縣來。現在的人已全不懂了，戰爭的規模並不大呀，這樣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嗎？確實，打敗日本，絕不可能是某一方面能辦到的。中國的抗日勝利，是集合本國的國、共兩方面直接領導的武裝力量，加上美軍在太平洋上與日軍三年多的硬打，加上蘇軍對日本在我們東北領土上長期保持數十萬（號稱百萬）精銳軍隊的牽制與最後的全面殲滅，等等，才取得最後的全面勝利。現在，有不少人認為，解放軍在敵後八年並沒有打多少大規模的殲滅戰，能起那麼大的作用嗎？這種作用，這種戰爭形態，在一切戰爭史上至今還是唯一的。想想如果華北、華中全被敵人佔領了，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就會被敵人據為己有，大大增加敵人的戰爭力量，而正面戰場的雲、貴、川恐怕也保不住了，中國的抗戰局面將何等困難？那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與抗日武裝，就是在敵人的胸腹內一直存放着幾把刺刀和幾個炸彈，你說它們的作用有多麼大？敵人在山西、在河北、在山東、在河南、在蘇北、在安徽、在鄂北，始終只處於

大半佔領，半佔領，以至於小半佔領的狀態。不然的話，敵人安然佔領華北、華中全境，實行「以戰養戰」的政策，那麼，日軍的氣勢還得了？我們在華北、華中雖然並未打過多少大仗，但根據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日軍的內臟部位插了幾把刀子，是我們根據地廣大軍民的鮮血把敵人拖住了。像上述的田家會戰鬥，如果我們沒有擋住，敵人進根據地來掃蕩幾天、十來天，我們的軍民就可能被屠殺多少萬。所以我們抗日根據地軍民真是生死與共的。我覺得我們多年來的影視，過份強調「階級鬥爭」，好像農村富裕戶都是漢奸，這是對歷史的歪曲，對民族的侮辱，把「全民抗戰」變成「窮人抗戰」了，這叫甚麼歷史？處處突出「階級鬥爭」，到了自己污辱自己民族的程度，真是可嘆之至。

張聞天忽然就被送走了

在興縣的調查目的是廣泛的，調查後我寫了花園溝調查報告。說明上邊報表太多，下面不得不填，但許多東西是虛假的。我們說的這些問題，張不寫進去，基本上是妥協的。

張是懂經濟學的，他最後提出了很好的意見：發展經濟是根本，允許農村富農經濟發展，不能消滅富農經濟。富農生產的糧食多，大部份都交了公糧，一家富農交幾百斤，對我們軍隊的存在，對抗戰很有好處。張聞天還提出了地主的減租問題。過去減得別人飯都吃不飽了。一些地主沒有甚麼收入，日常生活已發生困難。形式上來看，是革命，實際上，農民心裏不這樣想。地主

與貧農的關係，沒有對立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農村的貧農、中農並不支持你過左的政策。過去叫二五減租，張聞天說，現在多減一點，四六也行，需要的時候，對半也行，看情況。但佃客不能一點都不交。不交，農村有相當一部份人要餓飯，影響社會秩序。其實，這就是「當家不鬧事」之意，自己當政，天天鬧事，自己製造飢餓人口，這算甚麼政策呢？張聞天認為中農是農村的主要生產力，這個話，毛主席也講過。張聞天認為，對中農要絕對保護。那時，一般中農都怕再上升一點，再富裕一點，就整到他的頭上，成敵人了。

張聞天還提出農貸問題。名字是農貸，實際上一分錢都收不回來，成了救濟款。農民困難，要不要救濟？政府是要救濟，但農貸一定要有利息，一定要還。如果農貸成了政府的救濟，沒有甚麼好處，成了無底洞，對改變生產狀況沒有甚麼幫助，只能產生依賴性。張聞天明白提出農貸要貸給有生產能力的農戶，包括中農在內，要使之有利於發展生產。

所有這些意見，完全正確。張聞天是有政治水平、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懂得實際的經濟，不把階級鬥爭當飯吃。

這些意見，被當地最高領導完全拒絕。原因很簡單，區黨委書記××大概是九月初從延安回來，他可能去延安作工作報告之類的。他當然見到了毛主席，知道了情況，張聞天垮了。所以，××的臉色突然變了，一切變得太快。本來要張聞天對幹部作的調查報告也停止了，實際上是下逐客令了。張聞天知道是怎麼回事，立刻就走了，回到陝甘寧邊區繼續調查。張聞天終始沒有給我們說過，連馬洪都沒有跟我們講過。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個別跟我講，小曾，準備走了哦，人家

不歡迎了。張聞天從來沒有向我們宣佈過要走。但是幾天後，我們糊裏糊塗就過黃河，往南走。走的時候，我的印象是區黨委的負責人沒有一個人來送行，連話別也沒有。我們就灰溜溜「夾着尾巴逃跑了」。

當時，甚麼都不敢問，總感覺有問題，感到對方要送客，不走不行了。但是沒有人問過。怎麼會想到張聞天垮了呢？除了他的夫人劉英，其他人都不知道。那個時候的我們，絕對服從，不敢問，不敢想，組織性很強，就是相互議論也沒有談過。這是思想改造造成的，因為一天到晚講紀律，講服從，自然而然變成了這樣。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號晚上，在黃河西岸躲避日軍大掃蕩時，張聞天召集我們農村調查團，還有本地的一些幹部談話。張從頭到尾全部歌頌毛澤東這件事，我後面要講。張聞天為甚麼要說那些話？我們也一點都沒有思考。當時都是這個樣子，絕對地組織服從，不能有疑問。像這樣普通的問題，也沒有問過自己。

在晉綏邊區這段時間，好處是我們都作了一些認真的調查，張聞天講了些好意見。但是，張聞天的意見全部被拒絕。

陝北米脂縣：這次調查帶點學術性質

一九四二年中秋節前不久，我們就到了陝北米脂縣。米脂縣在綏德北邊六七十里，縣城很

小，很乾淨，而且縣城有文化，非常特別。至於說到出美女，我沒有此感覺。米脂縣是一九四零年才擴大的，具體我不清楚。城裏很小，沒看見甚麼婦女，美不美，我不知道。

大概綏德地委也不知道張聞天出了事，對張聞天招待得很隆重。我們住在三五九旅的一個團部裏，團長張仲翰，對張聞天非常客氣。張仲翰解放後是新疆建設兵團的副司令，是王震最得力的助手。他家是冀中的大地主，抗日戰爭爆發時，他是北京一個大學生，他把家裏的長工、短工組織起來，就成了抗日隊伍。

中秋節後，我們就下鄉了。我們的調查分四個地方，張在總部，他調查的米脂縣楊家溝，離米脂縣不遠。張和劉英，還有秘書馬洪都住在那裏。楊家溝基本都姓馬，有一百多戶，大、中、小地主大概有百之分七十以上。很特別，以一個姓集中在一個村的地主大集團，在全國可能只有這麼一個。張聞天作學術調查，調查馬家集團是怎麼發家的。楊家溝有大學生，主要是北京的，也有留學生，留日的，歐美留學的沒有聽說。這個地方的文化不低。

我這個組在劉家峁，也是個山溝，距楊家溝三十里。劉家峁跟楊家溝有相同之處，是一個地主集中的地方。劉家峁只有七八十戶，不大，地主集團姓姜，可見原來這個地方，並不是因姜姓而出名的。這個集團有幾家很大，其中有一家住在像歐洲中世紀的城堡裏，好幾層，全部石頭建築，包括有水井。水井很深，兩個人搖一半天才能把水拉上來。還有用石頭建的糧倉。米脂縣的縣倉庫就設在這裏。整個建築修建成那個樣子，主要是用來抵抗土匪，是怕大股土匪，你有幾十個人，沒有大量重炮彈，三五個月都打不下來。在中國，恐怕這樣的建築並不多。我去的時候，

這家已經沒有勢力了，他們收的地租，除了自己留四五個人夠吃外，其他的都交公糧了。我就住在這個建築的公家糧倉辦公室裏。房主四十來歲，沒有能力，表現上還是客客氣氣。對這些大地主，你沒有殺他，他阿彌陀佛。

這次調查也是學術性質。調查這樣的集團是怎麼發展起來的，甚麼時候衰落的。說起來非常可笑。最早，姜家在附近黃河邊上的吉鎮——老百姓叫「格針店」——開了一個中藥店。那一帶有這樣的風俗，任何人家死人，要摔一個沙鍋。（我們家鄉有「打破沙鍋問到底」一句俗話，不知是否由此而來。）光緒年間大旱，死人多，需要的沙鍋多，姜家囤積後漲價，生意越做越大，後來又放債，發展起來了。這是典型的中國農村的大財主的發展史。商業資本、高利貸和地租剝削結合，姜家就是這樣。中國商人賺了錢，最後還是買土地，修房子，不像西方發展大工廠。中國地主不擴大再生產，當土老財，修這樣的城堡。米脂全是山溝，像這種堡壘，很高的，沿着山修，三四層才能修到山頂。儘管他們是有錢人，但實際生活水平低。在這種家庭裏，還是只有地位最高的家長才能吃白麵粉，平時也不殺豬宰羊。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一個有飯吃、有衣穿而已。我們一般人不太理解。他們的錢，是想盡各種方法賺來的，卻堆在那裏，剝削到一定的程度，不是擴大再生產，而是坐享其成，一輩子做土老財了。

經過這樣的調查，增加很多知識，不調查農村經濟，就不知道它是由商業資本、高利貸和地租剝削三者結合發展起來的。但是，為甚麼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一味求保財，但它是怎麼發展起來的，這個現象看見了一些。

張聞天寫了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的初稿是秘書馬洪起草的。馬洪也是中學生，字寫得極好，水平也比較高，難得。解放後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綏德縣：我的一個小調查報告，張聞天覺得有點意思

在米脂縣調查完了後，我們又轉到綏德縣。綏德縣過去叫綏德專區，現在跟榆林區合併了。綏德比延安漂亮多了。大概過春節後，張聞天留在綏德調查商業。綏德一個小城有多少商業可調查的？大的全是公營，屬三五九旅王震管的。實際上張聞天就是不想回延安，在外邊能拖就拖。

我沒有參加商業調查，覺得在城裏沒有好調查的，我單人獨馬跑到城東六十里義合區去了。綏德城只有那麼一點大，沒有必要都擠在城裏，我一個人提出來，他就准了。張聞天這個人不一樣，和平一點，見識廣一點，民主一點。

義合區首鎮義合鎮，是交通要道。義合區委、區政府在那裏。因為我一個人，只能調查一個小村莊。他們給我推薦的地方叫虎墕，在山頂上。山頂上有寬的地方，周圍很雄壯，很險要。我調查了十天。此村原來是土地革命老區，後來被徹底清剿，破壞一光。一九四零年前若干年，由一些小軍閥統治，大概是一九四零年春天轉到我們手裏。我不作全面調查，只一家一家地問清剿時的損失，比如被搶走了幾隻雞，燒了甚麼，每家心裏全有賬。調查發現，經過我們恢復政權兩年，基本又全部恢復，只有一樣沒有恢復，那個大磨沒有恢復。我問他們怎麼辦，他們說，我們

苦了，糧食要挑到山下找別人的磨子碾。我寫了調查報告，副題是：「破壞和恢復的力量」。報告主要說明，小農經濟沒有多少設備，即固定資產。被燒、被搶後，和平一年兩年，只要不打擾他，與民休息，讓他好好生產，保證治安，生產就恢復了，一年、兩年、三年，就變得比較富裕了。我的調查報告，張聞天看過，覺得還有點意思。我從此肯定：農村第一需要的就是安定。只要有安定，中國農民吃苦得很，只要准他們好好勞動，不樣樣都充公，他們就會迅速發展起來。

我調查完後，張聞天接到通知，單獨回延安。秘書馬洪也走了，綏德還派人護送。

一九四三年三月，留我們五六個人繼續調查。我們留下的六七個人住了個把月，不太安心。我們在那裏是做客的，又沒有分配工作，又沒有回延安。大概四月份，綏德地委通知我，要我一個人立刻回延安。當時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現在知道了，延安整風緊，開始反特務了。我沒有參加整風，沒有參加審幹，所以一九四三年四五月緊急調回延安。回延安不久就是「搶救」。

解放後，人民出版社印了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報告。我寫了出版者的話

這次調查，各種調查報告很多。一九五四年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時，曾經問過中辦副主任曾三。我說，據我所知，中國的農村調查，沒有這麼詳細的，可以出版。他調查後，回答我說，除了張聞天的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報告，其他的在延安撤退時都燒了。我說，好，那就把張聞天的調查報告要出來。後來人民出版社就印出了張聞天的報告。我寫了出版者的話。我實事求是寫明調

查報告初稿具體動筆的是馬洪，張聞天是修改定稿。

一九五四年，張聞天還沒有被打倒，出版這本書估計到不會受到批評。張聞天這個調查報告認真、仔細。出版的目的，一是紀念這次調查，主要是對這次調查留一個痕跡；二是別人也不知道這些情況。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人也不知道。

第七章 在延安（三）：我在整風「搶救」時的情況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九四五年七月）

回延安後，情況很不對了，跟離開時完全不一樣

延安整風開始那一年多，我們都不在。延安整風從一九四二年二月八號毛主席的一個報告算起。我們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號離開延安的。

為甚麼張聞天在整風前要帶着我們離開延安？後來有一個說法，張聞天是躲風。張聞天去調查是完全自願——既然我在旁邊礙手礙腳，又無事做，我就下去調查。王明、博古已經沒有權。周總理在重慶，朱總司令不涉及上海中央的事，剩下張聞天，你說他不是總書記不方便；你說他是，他又不是。所以，他留在延安，對毛展開大整風，對權力的統一集中確實是第一個大障礙，他同王明、博古這兩個既往人物不大相同。當時形勢完全清楚：一九四一年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雖然是批判中央的教條主義，但着重是針對張聞天。在延安的幹部一般能看得出來，有些

話就是針對張聞天講的。毛的文章說，不能像你們那樣辦學校。

毛主席的整風的報告，我沒有聽過，但看過，從內心贊成，因為感受到黨八股太嚴重。但是，我所理解的黨八股，跟毛說的，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毛偏向黨的幾位領導的文章，我所感到的是普通的那一套文章。任何情況都講空洞的政治，包括文學，政治壓倒一切，沒有感動人的力量，只有政治鬥爭。反對主觀主義，我更贊成。我調查生產力，不講空洞。

我大概在一九四三年五六月單獨調回延安。回去時，感到一切變了，所見的情況跟我離開時完全不一樣，各個機關全有了土牆，絕對不能來往了。楊家嶺也全被土牆包圍起來。我們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楊家嶺旁邊的一條小溝，小溝與主溝，統統築個長土牆包圍起來。各個機關互不往來。那個時候電話少，大單位才有一個，像政治研究室都沒有。我一回延安，就參加築土牆。

第二個發現，是人不能自由行動了，必須幾個人在一起行動。另外也聽說了一些情況。一九四二年全年，延安在幹甚麼呢？業務全停下來了，學習毛的報告。學完報告後寫自傳，因為過去寫的那些還不夠，還要檢討入黨動機，來延安的動機；還有填不完的表。另外，還要寫互相揭露的材料。揭露甚麼呢？當時叫「小廣播」，即相互之間談的「不合組織原則」的東西，特別是對領導人的不滿。一句話，相互談的「陰暗面」，都要寫出來，叫「填小廣播表」。這一年我全不在，跟着張聞天躲風，真是幸運。我們離開延安不過四個月，延安就有「五人反黨集團」。「五人反黨集團」裏，我就認識三個。王實味跟我在馬列學院一直在一個單位，他不是學生，他

在馬列學院編譯室搞翻譯。他的英語好得很，文筆也很好；另外兩個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一個農業組的，一個是後來的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傳綱，還有一個是他的夫人王汝琪。王是後來審判「四人幫」時律師團的組織領導人之一。

毛（主席）的反對黨八股，反對教條主義的報告出來後，延安的知識分子非常高興，以為過去的那些教條，那些口號，那種文章和宣傳不大好了。因此三月八號才有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丁玲的文章是在毛主席的報告以後才出現的呀，在丁玲自己看來，她是擁護毛的反對黨八股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也登出來了。文章很漂亮，比丁玲的漂亮多了。我們當時在鄉村，不太注意這些，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文章，包括艾青的，是對毛的報告的理解，但他們的理解全錯了。發表丁玲與王實味的這兩篇文章，跟一九五七年「反右」時釣魚不一樣，這個不是故意放火、釣魚。延安《解放日報》的各級負責人也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那裏有一大批人，陸定一也在那裏，如果弄得清楚，為甚麼這些文章能夠發表呢？恐怕對毛的報告，只是從字面去理解，以為準許你講點個人感想。他們以為，他們是擁護毛的報告的。幾篇文章之後，就是「反對五人反黨集團」。

這些事情，因為我們在鄉下調查，全躲掉了，跟我們沒有關係。但延安越來越熱火朝天。很快，每個幹部、每個青年知識分子重新寫自傳，填表，相互揭發，很緊很緊。我們還沒有回延安時，已經流行一個說法：知識分子入黨是「半條心」。甚麼是「半條心」呢？就是說，雖然你到了延安，但你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作風，你的世界觀並沒有放棄，你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無產階

級立場上。當時，大概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參加共產黨是夠資格的，包括老黨員。半條心整了一年多，人人都承認了。

然後就轉入整「兩條心」。「兩條心」，就變成敵我問題了。你那條真心是擁護國民黨的，你到延安來是假的，是敵人派來的，是敵我矛盾。那時，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兩個名詞還沒有出現，但實際上就是這麼一回事。

「搶救」柯慶施

我是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間，已經開始整「兩條心」的時候回到延安的。

我回延安後一看，我們中央政治研究室七八十個人，已經有六七個人或更多的作為歷史上有政治問題的被審查，失掉自由了，來往要有人看着。有一個人叫許立群，筆名羊耳，「文革」初期是中宣部副部長，已經被隔離了，給他找了個小窰洞單獨關起來，水飯都是單獨送去，大小便也要人看守着。

回到延安後，康生七月幾號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楊家嶺中央機關，包括我們單位都去聽了。我一聽，吃一驚，按照康生的說法，到延安的青年，豈不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康生帶着一個人到處作報告，這個人好像是甘肅省的一個地下黨員，因為一天到晚要他坦白，他就坦白了。他是第一個坦白的人，說自己是國民黨特務，是國民黨搞的「紅

旗黨」成員。這個純粹是被逼出來的，說抗戰後國民黨對共產黨實行「紅旗政策」，即國民黨把大批青年送到共產黨裏邊去做特務。這個滑稽吧，怎麼一下子把來延安抗日參加八路軍的青年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當特務的呢？太滑邊了。所謂「紅旗黨」，就是指在國民黨特務「紅旗政策」下搞的假共產黨。抗戰後，大後方各個省開始恢復建立起一些不大的黨組織，因為抗戰前一些省一個黨員都沒有了，「紅旗黨」就是指的這個。這樣一來，大後方的地下黨組織，一下子又變成了國民黨特務了。我們這些人更都是國民黨派去參加共產黨的小特務。康生七月幾號的報告，就是這個內容。甚麼叫「失足者」？你是國民黨的特務，「失足」了，現在把你「搶救」過來，不殺你，就是叫你「坦白」，承認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跟着就搞「坦白」運動了。對共產黨要心懷坦白，對黨講了是敵人派遣分子後，就寬大處理。坦白運動，交代你是怎麼當特務的，怎麼混進延安的，做了些甚麼樣的破壞活動。

康生作報告那一天，我記得我們土改工作團的人全回來了，其中兩個進會場時我們還坐在一排。其中一個老同志雍文濤，後來是陶鑄非常相信的一個人，任中南局的秘書長，還有一個姓薛。他們是黨務研究室，我們是政治研究室。康生講話時，我們三個還講，要吸取中央蘇區的教訓啊。所謂吸取中央蘇區的教訓，就是指中央蘇區殺AB團的事。所謂AB團，根本沒有這回事，錯得沒有邊（譜）。甚麼AB團，殺的人不知道，被殺的人也不知道。AB團不知道是怎麼搞出來的。到現在為止說不通。那麼困難的條件下，那麼殘酷的戰爭都過來了，突然說是敵人派來的。總之，中國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不能自己人殺自己人了。

康生報告後，各個單位開展「搶救」運動。我先看見公開「搶救」統戰部副部長、後來的華東局書記柯慶施。柯資格老，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以前，他在上海跟劉少奇一起參加過外語訓練班，其實就是蘇聯派人來辦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的訓練班，這樣到了蘇聯，據說見過列寧。一九三六年春，一說柯慶施在華北局當組織部長。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春，柯回陝北，從共產黨成立，柯慶施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一九三八年後，中央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是王明，這個部的作用也不大。王明抗戰初在長江局當書記，回到延安，給他一個部長。王明一九三九年回來後，再也沒有出去過。柯慶施就是統一戰線工作部的副部長。

搶救柯慶施很突然。有一天楊家嶺大禮堂開大會，名義上不是搶救柯慶施，主席是李富春，會要散了，陽光從窗子外斜照進來，李富春問柯慶施，柯慶施同志，牆壁上有人寫了字，說你是國民黨特務，請你說明一下。柯慶施在台上，很鎮靜，說了一陣。大意是，我歷史上沒有任何問題，這個事，我不知道。對柯慶施這樣一個人搞如此的突然襲擊，沒有一個長期準備怎麼可能？接着有三四個人發言。發言人當中，一個是李克農，一個是陳伯達，還有一個姓張，長期在東北軍裏做地下工作。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第一個發言，這不等於是定了案了嗎？楊尚昆的回憶錄中說他散會後回窰洞，遇到毛主席，毛主席聽到喊口號，問是怎麼一回事，楊尚昆說「搶救」柯慶施。但是，別人整理的楊的回憶錄說毛主席聽見叫口號，就不合事實了。我就住在大禮堂正對面的窰洞，住了幾年。就是在大禮堂唱京戲打鑼，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才能隱隱約約似乎絲絲聽見，喊口號是絕對聽不到的。毛主席住在更靠後邊，離我們住的地方還有相當距離。

具體的發言記不起來了，但核心要點是說，柯慶施當時在長江、華北幾個地區巡視後，組織往往就被破壞了。有些地方呢，他去巡視後不久，組織就垮了。按照這個邏輯，地下黨的人都必須有被捕的歷史，為甚麼柯從來沒有被捕過？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懷疑已經過份，拿到大會上「搶救」，更不應該。沒有事實根據，下面的群眾莫名其妙。鬥了個把小時，沒有結果。這個會我是全程參加的。

連柯老也被公開「搶救」，那真是太隨便了。這說明形勢之緊張，行動之粗暴。「搶救」我們不算粗暴，我們是小青年。延安的「搶救」運動，柯慶施是唯一發了書面簡單更正通知的。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間吧，上面通知說，經過調查，柯慶施同志的歷史沒有問題。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的「通知」。

我被「搶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務」

我回延安後，補寫各種小傳，好在我一個小廣播也沒有。這方面也沒有被追問。我們政治研究室，領導是陳伯達。陳伯達這個人懶得不得了，是甩手掌櫃。真正幫他行政雜事的人叫柴木，「文革」初也冤死了。

政治研究室在「搶救」運動中，是出了一些問題，但不像有些單位規模那麼大，我們大概有七八個人被「搶救」。其中有兩三個，比如于炳然，在東北軍下面工作的一個老黨員，被捕了，

許立群也被捕了，陳傳綱、王汝琪夫婦早不見了。我們單位被「搶救」的人就放在那裏，看得緊一點，也不逮捕，也不拘留，也不天天鬥。總的說來，這次「搶救」，我所在的單位，屬於運動中比較文雅的，比例還是少的，沒有大鬥，不是最厲害。

九月間「搶救」到我的頭上了。開始是勸說，在延安叫「勸說運動」，就是來幾個人，日夜勸說你。意思是你有問題，你應該對黨坦白。勸說我有沒有理由？有一定的理由。第一個是我寫了一首打油詩。我一九四一年到政治研究室後，七八月間，曾寫過一首自嘲打油詩：「馬恩列史條條妙，不背條條恨不消。條條背得翻鍋爛，馬恩列史好條條。」

馬恩列斯的「斯」寫成「史」，是為了平仄關係。

寫的時候，我以為這打油詩是自我嘲諷，自我諷刺。我鬧着玩，沒當成一回事。但是整風一來，別人說你是諷刺馬克思主義，就是反黨。這樣批我，在當時可謂是有證有據，我也不去爭辯，承認就是「反革命」。

第二個是因為一些信。

我隨張聞天到晉西北調查後，寫了一些信回延安，說群衆負擔重，說調查的統計表不實在。這些都沒有錯，這是我去調查的結果。但是，上面覺得你的任務是歌頌，你不但未這樣做，還講了些批評性的話。

第三個是後來告訴我的。當時留在延安還有一個小型的陝北公學，我在那裏去上過課。一個學生寫坦白材料時，說我在河南開封介紹他參加國民黨復興社。我是從成都去的，沒有到過河

南。其實問問田家英，我是怎麼到延安的，就清楚了。「搶救」我的時候，田家英已經不在政治研究室了，但還在楊家嶺，一問便知。

延安的「搶救」運動，不知何故一下子發了高燒。在單位裏邊，先叫「勸說運動」。一個小組，日夜來勸說，車輪戰。勸說的人發自真心，怕你不承認，怕你被抓起來，說得他都要流淚。勸說時也有下跪的，下跪也是出自真心，難過呀，怕你犯錯誤呀。

我十八歲到延安，沒有政治經驗，哪裏經得住這種事呀！勸說了幾天，能承受，三五個晚上不睡，還能頂住，但一兩個星期，就頂不住了。不能睡覺，誰受得了？人到了那個時候，就是兩個字：隨便，要怎麼就怎麼了，至多是槍斃。當時覺得，槍斃都比這樣要好過一點。來勸說的人是二十四小時換班的。勸說最好的效果在晚上十二點之後。在這麼一種逼迫下，甚麼結果都能問出來。說我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我就承認。承認後，就交代，交代只有亂編了，越編越空，像寫小說。我編了一個初中時的體育教師，因為當時都看不起這個體育教師。我說他介紹我加入復興社。對這位體育老師，我無顏見他，他可能已經去世了，但是，我在延安污蔑他是特務，介紹我加入復興社，這是我這輩子最卑鄙的行動。我今天還應該對他下跪。人做了虧心事，只有坦白承認、認罪。

當時我沒有咬住不承認。許立群大概就沒有承認，當着大家的面，被手銬銬走了。這個事情，打擊面之大，想不到。我哥哥的同班同學張宣，鼎鼎大名的四川七君子之一，被抓了；一九三三年我在宜賓聯中三十五班的初中同學王家廣，被抓了；一九三七年我在成都石室中學的

高中同學余明，他三年級，我一年級，被抓了；他們統統被抓到保安局監獄裏。延安的監獄之一就是縣城西靠山的幾排窰洞。日本投降後，那裏大部份人到前線去了，這些被關的人無處可去，原來的單位或者已撤銷了，或者已改編了。後來，管得不太嚴，自由一點，允許他們晚飯後出來散步。而他們過去住的監獄，變成招待所了。一次散步，碰見王家廣。我說，幾年不見，你在哪裏？他說在「保安大學」。我問，甚麼保安大學？他才給我講清楚。當時把保安處的監獄叫保安大學，一起坐監的，叫同學。他說，他是一九四三年在綏德被捕的。余明是在米脂被捕的。這樣看來，他們大概比我早一兩個月，他們是被捕，我是被叫回延安。對他們兩個，懷疑更重。因為他們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張宣可能被捕得早一些。

對我的審查到一九四四年，這年五月左右，宣佈一些人的結果，包括我在內，曾某某，沒有政治問題。

宣佈決定那天，兩個人的講話我還記得。一個是中央組織部的幹部科長王鶴壽。當時科長了不得。部下面就科，科以下的，都叫工作人員，幹事、科員，沒有這樣的說法。因為下面老資格太多了，叫幹事、科員不好聽。另外一個是鄧發，中央職工委的書記，他三十年代初在江西負責「肅反」，是掌刀把子的。兩個人的發言，真是驚人。王鶴壽說，「搶救」了大半年，全是主觀主義。有人舉報某人是特務，這個人是不是特務，怎麼不來問問我，我跟他一起坐監，我就可以證明。鄧發講的最有趣。三十年代鄧發曾做過蘇區的保衛局長。保衛局長是甚麼呢？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部長加公安部長。他來講話的時候，是中央職工工作委員會書記，已經沒有甚麼權了。

當時有三委：青委，工委，婦委。他來講話的時候，形勢好一些了，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情況基本弄清了，原則上統統不是。他講，搞了那麼多，笑話百出。某單位把一個女同志搞成五種特務。有國民黨軍統、中統，兼日本特務，閻錫山的特務，這個女同志在北平淪陷後在北平一段時間，因此又是華北漢奸政府的特務。中統、軍統這些名詞，全是聽報告聽來的，不然哪裏知道甚麼中統、軍統？

「搶救」運動，純屬無中生有，沒聽說一個是真的。

「搶救」運動不是擴大化的問題，是無中生有的問題

現在還有一些人在為這個運動極力辯護，說這個運動只是擴大化了，還是正確的。根本不是擴大化的問題，而是無中生有的問題。誰都知道這是這麼一回事，包括那些現在硬着頭皮僞造歷史的人，其實他們心裏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硬要這麼寫。把大批到延安參加革命的人說成是特務，現在來講是個大笑話，也是莫名其妙的東西。被抓的我哥哥的同學，我的兩個同學，我問過他們：你們聽說過有沒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他們說，保安處抓起來的一個也不是。現在有鐵的證據。李銳解放初回到湖南，任《新湖南報》社社長，他曾看到國民黨軍統局副局長唐縱的日記。唐縱在離開長沙時，驚恐中把日記全部丟下了。唐縱是戴笠的副手，又是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的主任。第五組就是專門彙集各種情報的。唐縱的日記說，現在延安共黨內部不穩，可惜我們

一個人都沒有，甚麼都不知道。現在《唐縱日記》已出版，不知這部份還在否。

現在講，是擴大化，但後來擴大到全國解放區，並不僅僅是延安，有些根據地一九四四年才搞「搶救」。這個教訓是血的教訓。延安已經發現不是了，為甚麼其他根據地還要搞？延安「搶救」運動這個教訓，沒有好好吸取，我們的損失太大了。所以，這些問題今天為甚麼還要說，因為要接受教訓，要總結。「文革」前一兩年起，不是又是叛徒、特務滿天飛麼？現在又有文章說延安有國民黨情報人員，不知確否。即有一兩個，也不能來個全民「搶救」。現在中國大陸上有沒有外國情報人員？大概是有吧，能因此發動一個全民反特幾年嗎？

根源來自哪裏？來自蘇聯，來自斯大林。斯大林就是用很大的精力來搞內部肅清。現在不是說斯大林是三七開嗎？不是說斯大林殺的人是七個對，三個錯嗎？我們中國的「搶救」運動，也是七個對，三個錯嗎？中國的歷史命運要想絕對避免這些東西的話，那是要承認事實的，不能再用盡苦心去為這類東西辯護了。

「搶救」運動後的概況：種地，紡線，大演戲，有意放鬆了兩年

一九四三年「搶救」運動後，整個延安趨於沉寂，單位之間不往來，朋友也不往來，許多人等待結論。

除了軍事部門，其他部門的業務工作處於停頓狀態。延安的熱鬧沒有了。當時上面在總結

歷史經驗教訓，明確三十年代後幾年，在上海新成立的黨中央核心，王明、博古、張聞天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是確立毛澤東的權威以及毛澤東思想。但是做這些事，我們下面全不知道。為了做這個事，當時延安設立了一個大黨校，多至六部，有沒有七部八部，我不清楚。一部，就是高級幹部，把各解放區黨、政、軍能抽回來的幹部，統統抽回來；國民黨統治區、敵僞佔領區，能夠抽回來的，盡量抽回來，一是審查，二是重新訓練。因為這時我們的力量在收縮，敵僞在擴大勢力，國民黨反共越來越厲害。如十大元帥，羅榮桓當時在不在延安，我不知道，其他九大元帥統統在延安，包括彭德懷。在楊家嶺，有磚修的四個好窰洞，就住着三位元帥：劉伯承、陳毅、聶榮臻。我們中宣部部內來往，都要經過他們的小圍牆外邊。這個事情說明，延安這時，剛好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情況相反，延安青年分散了，各方面的領導和高級幹部大集中了——恐怕是空前的集中。集中一是為了弄清楚歷史問題，建立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二是帶有保護性質，減少損失。這些我當時當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才知道。

第二件事，是搞了特別大的生產。一九四三年後，內部供應困難增加。另一方面「搶救」運動後，各個單位基本沒有業務工作了，所以集中力量搞生產，種小米、種土豆，還有紡線。延安紡線就是這樣來的。紡線既紡毛線，又紡棉線。有一段時間，從早到晚紡線，到處都是這樣。這時王震的三五九旅，相當一部份要開進延安，要保衛延安，他們到南泥灣去住，吃的東西不夠，要自己解決部份，包括穿的。陝北好多地方出土羊毛，紡毛線，織毛衣，供軍用。男女都一樣動手。我呢，種地、紡線、織毛衣，這些都幹過。紡棉線開始比較難，很快就會了。

一九四三年，我同時又種西紅柿。我是種西紅柿的專家。在楊家嶺溝口外有很大一片平地，劃出一畝地左右種西紅柿。我跟張雲天種。以他為主，他身體強壯。我跟張雲天兩個人住一小窰洞。那個窰洞也只能住兩個人。他是在我被「搶救」成「反革命」和「特務」後奉命來監看我的，怕我出問題，主要是怕自殺。他是福建人，上海暨南大學畢業。這個人好得不得了。後來我們從北京一起南下，到了南城縣——贛州往南——他翻車死了，一車人死了二十幾個人。這個同志甚麼都比我強十倍，太可痛了。

說來也奇怪，種西紅柿，說幹就幹，種子還那麼好，結出的西紅柿一個有半斤重。那時延安與重慶還偶有飛機往來，延安還把最好的西紅柿送到重慶，送到最高級別的民主人士像宋慶齡、馮玉祥這些人那裏。因為重慶少有。哪裏來的種子？真的不知道。普通的紅色西紅柿，最不好吃，最好吃的是粉紅色的，還有黃色的味道也特好。種西紅柿要講技術，我們請教總務處，他們可能請教了老百姓。奇怪的是我們那幾年沒有看到老百姓種過西紅柿。種西紅柿需要大量的肥料，還要去掉多餘的岔枝。一株西紅柿剛掛果時，要用手把多餘的小岔枝摘掉，一株就保持七八個，但頂不能摘，摘了容易枯。西紅柿五月初分苗，七月掛果。看見果實一天比一天大，也不想甚麼事了。

我跟張雲天也聊天，但不談政治。談甚麼呢？我跟他談二戰問題，他也喜歡談這些。那時延安出了《參考消息》，可能只有現在《參考消息》的四分之一多一點，不大，一面印，沒有標題，甚麼美聯社電等，容納很多新聞。一九四三年，認為美國這樣打，逐島反攻，損失很大，不

理解。當時重慶有「先亞後歐」、「先歐後亞」論之爭。重慶一部份人希望先把日本打敗，即「先亞後歐」；聽說黨中央主張要先打敗希特勒，即「先歐後亞」。黨中央是完全正確的，但這種主張不能宣傳，一宣傳，不了解國際形勢的人會認為，你中國人，為甚麼要先打敗希特勒呢？

解放後，一直到現在，說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從一九四三年算起，真是莫名其妙，應該從一九三九年算起。一九三九年二月間，李富春就代表中央作了開始大生產的動員報告，我聽了，《解放》雜誌登了。冼星海還有「二月裏來好風光……」生產大合唱之歌。「二月裏來好風光」一就產生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因為冼星海一九三九年秋天就到蘇聯去了。李富春作的報告，冼星海作的歌，現在都不算了，怪事，甚麼道理？一九四三年，毛主席編了一本書，提出總結生產運動之類，因此大生產也從一九四三開始算，莫名其妙。

我們一九三九年、一九四零年根本上就以勞動為主了。一九三九年我還在馬列學院研究室，到南門外二三十里去背柴，後半夜就出發，每個人帶幾個比拳頭還大的饅頭，天黑才回來。背柴來回要走好幾十里，一些人支持不住，笑話百出。我是晚上九十點回來，有的人半夜回來。有一個叫黃乃的，第二天才回來。他是哲學研究室的，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黃興的兒子。他深度近視，晚上看不見，就在路邊隨便找個地方待了一個晚上，沒遇上狼，萬幸，天亮才慢慢摸回來。那時沒有電話，也沒有甚麼人救，只有乾等。

延安生產勞動，對大家的鍛煉意義比較大，至於對延安的供應起到甚麼作用，很難說。像我參加的那些農業生產，我就感到恐怕吃的比收的多一點。一天有幾個比拳頭大的白饅頭吃，那是

很不簡單的。在延安種穀子（小米）收成很少。荒地種穀子，相距一尺多寬種一棵。也種土豆，土豆需要的種子很多。

第三就是搞特大的戲劇運動，演大戲。解放後沒有人講過甚麼原因。為甚麼大演戲呢？一九四三年底，延安的「搶救」運動基本結束，大家沒有正事幹，都閒散在那兒，很多人在等結論，這時就出現了許多戲劇。延安有平劇即京劇院，《三打祝家莊》就是這時搞出來的。《三打祝家莊》的總司令是宋江。這個戲，毛主席寫信表揚了。後來，一九七三年突然批宋江，說宋江是投降派頭子。那麼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宋江又是甚麼派呢？一九七三年起的批宋江，我就設法一言不發。辦法多得很，找個重勞動，髒勞動去做就行了。誰知道過了兩年，宋江又是甚麼派呢？《白毛女》也是這個時候搞出來的。延安演過《日出》、《雷雨》，還有陳白塵的《升官圖》，這是個鬧劇，諷刺國民黨的。還演過某老前輩的《天國春秋》。還演出過果戈理的《欽差大臣》，還演過西蒙羅夫的《俄羅斯人》，還演過反法西斯的《馬門教授》。《前線》這個戲是斯大林批准的，翻譯過來後，毛主席又叫大家看，也演出了。還有一個戲，這個戲出來後沒有怎麼演，叫《同志，你走錯了路》，參加編戲的有陳波兒，著名的電影演員。這個戲是寫新四軍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軍部遭國民黨消滅的事。寫項英如何錯誤。這個戲完全是把政治翻譯成戲劇，沒有要看的，不久就停演了。當然，最用力氣的是《白毛女》。

戲編出來後，各單位輪流去看。延安看戲都是機關發票，晚上去看。當時延安沒有電，但煤氣燈很亮，很神氣，了不起。延安有兩處禮堂可以演戲。一個是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一個是楊

家嶺對面的中央黨校的大禮堂。延安有些人晚上看戲要跑十幾里，我們在楊家嶺，比較近。

延安的戲，就是「搶救」運動之後的大緩和，上面有意這樣做。這個事，是特殊時候產生的。延安有王大化那樣的天才演員——恕我說句大話，他的演技，我看遠至現在，是前無古人的。重慶抗戰後期的戲劇也特別發達，但未見得比延安的好。我一生看戲最多是這兩年。現在回想起來，我有這麼一個感覺，當時共產黨真是集中了國家的很多人才，而且一變成共產黨後，人就特別能幹起來，都很出色了。共產黨員有幾個學過演戲的，怎麼一演起戲來就那麼厲害？共產黨只要不把力量用在內耗上，有甚麼事幹不了的？

一句話，一九四三年秋季「搶救」後，緊張的是上層，下面不緊張了，像我，像一般的幹部，都不那麼緊張了。種種地，紡紡線，看看戲，上面是有意放鬆，感覺到緊張兩三年，有些人都自殺了，整個是放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思想上比前幾年壓力小一點，但是各個單位之間絕對沒有來往，相互也不看望，比較沉靜了。

第八章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七年二月）

「王明路線」一詞是進北京後才聽說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後，中央要重組宣傳部，因為整風後，它就停業了，雖然名義上還有這個機構。中央派陸定一做部長，陳伯達做副部長。這兩個人是孤家寡人來的，原來宣傳部的人已零零落落，還是原來那幾個人，絕大多數等待「搶救」結論。他們兩個人來，在一個窰洞開了歡迎會。陸定一準備編中共黨史。新的黨史，當然完全是新的歷史。為了編這個黨史，陸定一在部內成立了黨史小組，找了幾個人，有張仲實、丁華，還有我。開了幾次會，把《兩條路線》等整風的書給我們看了，我們才知道一些事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因為國共鬥爭很緊張，陸定一去做中共政協的代表了，離開了宣傳部。

現在很多書，很多文章，講延安怎麼反對「王明路線」，看上去這個黨內鬥爭好像是公開

的，大家都知道似的，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我身在中宣部，就沒有聽說過甚麼「王明路線」，包括在胡喬木的窰洞裏，也沒有聽他講過一個字的中央上層問題。共產黨的保密工作做到了甚麼程度？胡喬木那麼相信我們，分他辦公的一個窰洞給田家英和我兩人住，他一天到晚忙於歷史決定呀，毛主席的報告呀，對這些，我和田家英兩個人，半個字都不知道，胡喬木從未洩露過一個字。別人怎麼可能都知道呢？我根本不相信。

陸定一他們來了後不久，日本投降，宣傳部的很多人等着到前方去。這個時候，才有個別的老同志跟我們這些青年接近，跟我們講了一點。這些老同志歷來守口如瓶。從蘇聯回來，曾做過延安魯藝副院長的趙毅敏就跟我們談過。大概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日本投降後，一次晚飯後他跟我們講，你們注意，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這本書是錯誤的，以後不要吹了。他悄悄告訴我們，是好意。所以，現在講的甚麼「王明路線」，似乎延安人人都在批它。根本無此事，我當時全不知道，整個四七年、四八年都不知道。這個名詞，進北京前我未聽說過。

陳伯達是個書呆子，專門寫他的書。陳伯達在寫甚麼呢，奉命在寫《中國四大家族》。他這本書的材料，全由兩個助手提供，即何均與陳真。陳伯達很聰明，歸納能力很厲害，他自己很懶，這本書是毛主席叫他寫的，書名也是毛取的。

抗戰勝利，中央工作緊張，似未有大規模慶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號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消息傳到延安後，現在有很多文章說延安大慶賀，甚麼敲盆囉，放鞭炮囉，晚上有提燈遊行囉，我只能說，我絕不知道這些事情。我既沒有聽說過，也沒有看見過。有沒有，我不敢說。有，可能就是在延安南門外一點。我所住的地方，應該是延安的中心。楊家嶺是黨中央所在地，黨中央往南一點的山溝叫王家坪，是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對面隔一延河，是中央黨校一部。當時黨校一部不得了，都是高級幹部，大得很，一兩千人。我們斜對面，是中央研究院，當時改為黨校三部。我們住的那個地方，走出門來，一里、二里、五六里，盡收眼底。日本投降，我們那些機關，沒有旗幟，沒有鑼鼓，也沒有甚麼瓦盆銅盆給你敲，延安又哪來鞭炮呢？我所見的，延安很冷靜，但是內心裏確實是高興得不得了。這個高興是完全意外，因為我們不知道抗戰還要經過多少年，我們準備到山溝裏還要待那麼一二十年，日本突然就投降了，有點把人震驚呆了：勝利了麼？這就勝利了麼？日本人不能再殺中國人了麼？這不是喜極而狂，也不是喜極而悲，而是喜極而呆：日本也有打敗的一天麼？情緒太複雜了，主要是想哭……中國沒有亡呀！中國沒有亡呀！我們宣傳部的人，相對無言，只有禁不住的流淚。這時，只有禁不住的眼淚才能表現我們最真實的感情。看見中央領導人，也是嚴肅得不得了，中國人的鮮血已經流成河了，只有喜極而悲才是正常的。現在電視裏說的、訪問裏講的那樣大規模的情況，我只能說，我沒有聽見過，我也絲毫沒有看見過。因為沒有那個條件，不是每個

單位都有鑼鼓的，不是每個單位都有那些慶祝的東西的。每人只有一個陶瓦盆。瓦盆一敲，不就碎了麼，誰敢敲？

延安大撤退：宣傳部有幾個「家族」需要我們照顧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月，延安準備大撤退，因為估計胡宗南要用幾十萬軍隊打下延安。延安那時沒有甚麼兵力，延安機關老早就離開了。實際上九月、十月就準備撤退，十一月就撤退到延安北邊的瓦窰堡了。宣傳部也搬去了，搬到王家灣村。王家灣村，小村子，二三十戶，因為沾個灣字，就有小水溝，也算比較富的。

當時宣傳部零零落落，有幾個「家族」需要我們照顧。王學文、張仲實、曹葆華，許文宣母女，我們戲稱「四大家族」。王學文，加上他的夫人，一兒一女，四個，他的夫人是小腳，他的兒女還沒有分配工作，王老身體也非常不好。張仲實夫妻，有一個小孩。曹葆華夫婦，曹葆華非常胖，走起路來很困難。一個新來的女客人許文宣及其女兒。許文宣是毛主席一九二幾年在長沙活動時的老朋友，共同幹革命的。她帶着十四五歲的女兒到延安，作為客人住在宣傳部。延安那時有許多這樣的情況，來的客人都分散到各個部住着，像毛岸英，沒有工作做，住在宣傳部。此時中宣部的最高負責人是許之楨，資格很老的，一九二零年與劉少奇、任弼時等同時在上海外語補習班學俄語的。我們撤退時，就由他決策了。可是他沒有甚麼名義。他的身體不好。我們單位

的撤退，實際上由秘書長丁華指揮，丁華有四十來歲。

我們單位的壯丁呢，基本走了，圖書資料室的幾個人也都走了。延安撤退前，丁華秘書長等幾個人又調到中央新成立的指揮整個後方的機構去了。田家英那時在西北局書記高崗的調查團，到哪個縣去，我不知道，壯丁就剩資料室的刻字員和我兩人，還有剛從新疆出獄回來的一個同志。我們搬到王家灣村後，我曾回楊家嶺兩趟。上述兩個壯丁，他們不了解情況，只有我跑。毛岸英跟我們在一起，身體好，但不可能派他回去，一是安全，二是他也不熟悉。回楊家嶺住一晚上就走，兩百多里，來回好像要四天。為甚麼要回楊家嶺呢？撤退得匆忙，主要奉命去仔細檢查與銷毀文件。

陰曆年是在王家灣村過的。王家灣村很安靜，老百姓的生活看起來不窮。我住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天天還有《參考消息》看，消息靈通。比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參考消息》天天登。所以，我肯定是在三月初才離開陝北的。

第九章　在山西土改（一九四七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六月）

參加土改工作團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突然有一天，臨時負責人許之楨對我說，中央組織一個土改試點工作團，每個部門抽一個人，你跟洛甫（張聞天）下過鄉，你去。另外，田家英也要去。現在不集中了，你直接到山西興縣去。毛岸英已經先走兩個星期了。我說，難怪好久沒有看見毛岸英了。許之楨也不知詳情，我就一個人揹着被蓋行李，帶着牙刷甚麼的走了。當時，只要有證明，就有住的，有吃的。老幹部們是怎麼去的，我不知道。我一個人埋頭走，走好幾天。青年人都是一個人走，現在比較難想像。一九四二年我就幾次走過這條路，不稀奇。

我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到了山西興縣。誰也不知道還有誰，因為撤退後都是分散去的，到了才知道，團員是延安各個部抽調的一個或者兩個人，團長是康生，副團長是陳伯達。

這一批二十幾個人，以老幹部為主，所謂青年只有四人，後來只剩三個了，田家英很快就

調走了。老幹部有張琴秋，是個女革命家，原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茅盾的弟媳婦，工作能力很強，後來我主要在她手下做土改工作，我很尊敬她，「文革」中被整死。高文華，一九三六年劉少奇到天津、北平去之前，據説他是華北局書記，資格老，身體很不好，不能參加工作，實際是隨這個團撤退的。還有其他一些老幹部。這個隊伍拖拖沓沓。康生他們不跟我們走，他們是怎麼走的，我們不知道，毛岸英是由康生帶着的。

這時土改還沒有開始。我們跟晉綏分局幹部組成了幾個大的土改工作組，總部在山西臨縣，康生自己在臨縣郝家坡坐鎮。郝家坡是個小村。為甚麼選這個地方？可能是為了安全，離開大道，四周都是山，康生在哪裏住，當然首先要考慮安全。臨縣中心組，由臨縣地委書記當組長。另外有三個大組，一個是雁門關外的朔縣大組，一個是山西極西北三個縣組成的保德大組，還有一個是靜樂組。我在朔縣組。我們朔縣大組，延安工作團的成員共有四個，老資格有張琴秋、李國華、張越華（博古夫人），加上我。我們與當地的幹部組成三十多個人的大組，組長張邦英，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組織部部長，也是延安調去的陝北老幹部。保德組，延安工作團有兩個人參加，一個廖魯言，一個于光遠。廖魯言是老同志，是這個組的副大組長，解放後當農業部長。于光遠現在還健在。靜樂大組是陳伯達自己去的。延安工作團有田家英、史敬棠在那裏。田家英就不説了，史敬棠我們也很熟悉，過去是同學。這個組後來由於延安撤退後，劉少奇把陳伯達、田家英帶走了，也就撤銷了。

雁門關外的朔縣土改：不顧具體情況，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土改是不妥當的

我們從興縣出發，到朔縣縣城要走五天。朔縣，這個地名聽起來就有點怕。朔風凜冽嘛，過去把蠻荒之地叫朔方。這條路我前前後後走過五次，是全天下我最熟悉的路。朔縣是新區，是日本投降後我們解放的地區。朔縣的西面是大山，一片荒涼，但是滹沱河的上游要經過這裏，並不是想像的那麼荒涼，但是土壤多是半沙荒的，土地遼闊，撂荒的多。朔縣自然狀況很不平衡，少數地有水灌溉，很富；荒沙地佔絕大部份，相當貧困。我們到朔縣城後，還往西走五十里，到廈閣。廈閣當時叫行政村，也就是鄉。行政村是閻錫山時的名稱，我們還沒有改過來。我們到這裏的任務很明確，第一，反奸反霸；第二，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第三，建立組織，包括黨的，青年會、婦救會、民兵等這一套；第四，擴軍，動員參軍。土地改革最後看你有沒有成績，往往是用有沒有與有多少人參軍來考核的，這是跟擴大軍事力量聯繫在一起的。農村的情況看來不是到了非要土改不可的地步，但你不土改，兵源擴大就成問題。

張邦英、張琴秋在廈閣，我被分配在前柳村，組長是李國華，中央組織部的科長（當時部長下就是科長），參加過長征。我們這個小組有十二三個人，晉綏和當地幹部佔多數。前柳村是個平地的村子，大，有八九十戶，算中等偏大的村莊。後柳村要小一點，有六七十戶。

我們去前柳村調查後發現有幾種情況。一是群衆對我們很怕。要發動群衆鬥爭，分田地非常困難。原因是塞外荒沙地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當地並不缺地，缺的是水。不僅缺水，也缺肥

料，缺牲口等。牲口過去是很多的，經過十多年戰亂，快沒有了。沒有水，沒有肥料，收成不夠種子。可以說，農村處於破產、半破產的情況下，各種各樣的商業活動、交通活動，全停止了。還有一個根本原因，朔縣北面就是山陰縣的岱岳鎮。岱岳是個重鎮，汽車完全通。那些地方汽車路很好修，路很硬的，不修路汽車也能走。我們新解放區都是唱空城計，內部根本沒有兵力。如果傅作義的部隊來，兩個小時就到了。我們的情報靈通，情報一來，往山溝裏跑。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老百姓不敢起來，怕共產黨走了後，傅作義回來。我認為，在這種地方立即土改，恐怕不一定對。

前柳村八十來戶，實際上沒有一個地主，殷實農家，就四五戶。用科學的話來講，算得上「富農」的，一戶都沒有。只有兩戶，也仍是富裕中農。也沒有發現惡霸。所以，在這個地方搞土改，比較困難。但是，你的任務就是土改，不得不幹。最後，在李國華的領導下，還是鬥了兩個好吃懶做到處偷東西的流氓，當地叫二流子。你不開會，不鬥，給你一個「右傾」帽子，你可吃不消。我們這個組的幾個老同志，是老的土地革命出身，知道過去左傾的亂鬥，損失太大了。他們見多識廣，是有一點警惕的。按照他們的本性，是要穩重的。所以，有這幾個老幹部掌握，比較穩重。但是群衆對我們還是怕。山西老百姓在全國來說是很老實的，多少年閻錫山的愚民統治，敵僞的統治，每個人都是心驚膽戰的，只要是官家來的甚麼人，他們都極怕。

我們沒有劃出地主來，但還是基本上平分了土地。我要說，這個做法現在看其實是不對的。但在當時的條件下，你的任務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分配土地呀，每個人平均大概分了六七畝。

這些土地有些原來就在他們的手裏，不過拿來一律歸公，又重新分配一下而已。當地的土地單位叫「垧」，在北方，有大垧，小垧。我們還是照畝算。分配土地後，我參加丈量土地。量土地的工具叫「弓」。我發現，農民選出來的積極分子量得很隨便。如果是好地，就慎重得很，如是差地，馬馬虎虎。看得出來，他們對分配土地沒有大興趣，因為拿到後，無法耕種。他們一切都沒有，沒有工具，沒有肥料，沒有種子。很多人，肚子裏也沒有糧食。戰亂十多年，日軍及僞政權把中國榨光了。所以，現在回頭看，發現一個問題：在這樣的地方搞土改，並不是當務之急。當務之急，在我看至少要用三年去恢復農業生產。

土地分配後，我到最窮的三四家訪問過。進去後，他們也不招呼你，你問他，他也沒有興趣，說，我家裏老的老，小的小，你分的地，我要走兩頓飯的功夫才到，我肚子還沒有吃飽哩。現在可以講一句半句了：不顧具體情況，甚麼地方都土改，不一定是妥當的。

臨縣郝家坡土地會上，康生說：「你們這個劃分階級的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

我們在鄉下工作兩三個月，土改工作進行了三分之二，我就到康生的臨縣郝家坡去開會了，時間大概在六月間。本來應該是張琴秋、張邦英去的，一個組長，一個副組長。但是，他們是這麼老資格的幹部，又有這麼高的地位，要去，就麻煩了。要牲口，要管牲口的人，還要帶個秘書，實際上他們去，還得帶着我去，加上來回路上十幾天。他們就派我一個人去。給我的任務很

簡單，聽會。我不能代表這個組做工作彙報，當然我自己也不會那樣做。我們組的整個情況，如果上面有人問，可以講講，這個意思他們是明確了的。

我走了五天，回到了興縣。晉西北這個路，基本上是公路、平路，我走得多了，無所謂了。當時延安已經失守三四個月，所有的陝甘寧邊區的黨中央機關，統統到山西這邊來了。興縣到臨縣郝家坡，還要走兩天。從興縣出發，第一天，走到黃昏，我想，應該找個地方住了。這時就不用找兵站、找老百姓了，各村莊都有中央機關。太陽完全下山了，我果然發現原來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幾個人在散步。我一招呼，彼此都認識。我說，我到郝家坡去，今天晚上就在這裏住吧。他們已經吃了晚飯，又給我吃了飯。他們村莊住有甚麼人呢？吳玉章、王明，還有幾個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別高的，要特別照顧，所以，他們辦公廳有些人在這裏。這些同志，雖然平時沒有往來，但經常見面，都比較熟悉，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我住下後，他們給我講，康生那個地方，情況非常特別啊，中央機關的幹部，意見多得很。土改工作團的名氣大，別人都知道。到處吊打，到處挖地財，特別嚴重的是挖祖墳。康生當時是中央土改團的團長，政治局委員，長期的社會部長，因此，誰也難說話。這麼多人住在這裏（河東），還包括後方工作委員會，還有葉劍英、楊尚昆，這些情況，他們都知道，他們也不滿意，但不敢說，怕戴上右傾帽子。辦公廳行政處的這幾個人說，你是不是去見見吳老，然後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實說，我更怕。我說，吳老這麼大的年紀了，這麼晚了，已經七八點鐘，說不定已經休息了，讓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吳玉章的話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會聽。我去講，更起不

了作用。

所以，我還沒有到郝家坡，已經聽說康生那裏胡搞亂搞，搞得民間害怕，搞得所有的幹部，包括吳玉章這樣的人，有意見不敢談了。這就反映出一個問題：沒有民主，一個壓倒一切的「革命」口號下去後，明知道是錯的，誰也不敢反對。一反對，不但是右傾，說不定就是反革命，弄得像吳玉章這些老革命前輩，都不敢講一句話。很多錯事就是這樣一幹到底的。

到了郝家坡，我就聽會。我確實是聽會，聽晉綏分局召開土改工作會議。這個會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團搞土改的情況彙報一下。晉綏這個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較窮，但地委有八個之多。參加會議的人，有晉綏分局的書記李井泉，還有幾個部長，幾個參加試點的縣委書記。這時。保德那個組，廖魯言，于光遠來了。但于光遠因為手指嚴重化膿，在興縣住院，自始至終沒有參加。所以，康生帶的工作團，兩個人參加，但我純屬旁聽。

這個會議，名義上由李井泉主持，實際上是康生。發生了甚麼問題呢？康生有個非常片面的規定：滿足貧苦僱農要求。大家都窮，整個農村都窮，只有在窮裏邊想辦法，把不應該沒收的沒收，這樣去滿足貧僱農的要求。整個會，在康生的領導下，在康生講話的精神中，強調發動群衆，進行鬥爭。要鬥地主，徹底鬥倒地主。而且康生還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的這個文章，現在是徹底修改過的。

康生在晉西北搞了些甚麼東西呢？第一，同意並發展了「化形地主」一說。「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家雖然已經窮了，實際上是裝窮。這一來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

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後還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財」。本來農村窮，鬥來鬥去，沒有好多東西分，就挖墳，說元寶、銀元都藏在地下，到處挖。一般老實的農民，即使貧苦，也不願意做這樣的事。做這種事，中國人覺得違背良心。過去中國厚葬，稍為好一點的，有甚麼銀器、元寶。晉西北那個地方，有金器的少。在臨縣，挖得相當普遍。試點的多少個村，都在挖墳。這個錯誤就不可收拾了，社會道德良心都無法維持了。這種事，甚麼人願意幹？只有地痞流氓願意幹。他們沒有道德標準。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別是婦女被吊打。因為要追問家裏的東西埋在甚麼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幾個，我不清楚。就是逼要人家的銀元、元寶，沒有辦法，自殺了。

康生當然在會上不會講這些事，不會公開提倡，但允許這些事與不允許這些事，講話不一樣。大家希望他在這個會上，對這些事作出結論。你康生自己實驗的地方，有死人現象，你作為政治局委員，應該怎麼辦？但他沒有批評。

原來晉綏分局土地改革的時候，有個內部劃分階級的文件。這個文件是懂一些馬克思主義，懂一些政治經濟學的人做的，原則上是比較正確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沒有剝削關係，怎麼叫地主？所以，基本標準是對的。但是，在郝家坡會上，最嚴重的是，康生把晉綏分局的這個內部文件否定了。因為拿這個標準看，很多人不夠地主。康生在會上說，「你們這個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意思是作廢了，再不能用了。

這個會，康生把比較正確的劃分階級的原則作廢了。這是康生最大的錯誤與罪惡。

一九四八年，中央搬家，毛主席離開陝甘寧邊區到平山縣西柏坡，路過晉綏分局所在地興縣。毛主席有個在晉綏分局對幹部的講話，「毛選」中有。毛批評了李井泉，說你們把馬克思主義燒了。所謂馬克思主義，就是指中央晉綏分局原來內部劃分階級的文件。

這事就有點奇怪了。「燒了」，是康生要燒的，毛主席批評的是李井泉，未提康生。

毛主席批評李井泉，我們都知道是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事。一晃幾十年，一九七八年，我從上海調回北京後，因事出差到昆明，碰巧遇見了李井泉。當時我的黨籍還沒有恢復，但大家都知道「反右」時開除的黨籍，都要恢復的。我住在雲南省一招待所的普通房間，而招待所的後面是很講究的，有花園、假山等。我看到李井泉在那裏散步。我走向前招呼他，自我介紹說參加了郝家坡會議，我知道毛主席路過時批評你，說你把馬克思主義燒了。如果現在還需要的話，我可以向上面寫信，證明不是你燒的，是康生叫燒的。他說，謝謝你，不必了，不必了。他說，我也不談了。你說那時叫我怎麼辦，我說是康生說的？康生的地位在那裏，我能怎麼樣？我跟李井泉的談話不長，幾分鐘。

老人家明知道是誰講的。這些事確實令人難以理解。

郝家坡會結束後，我回到朔縣補課，大錯特錯

在郝家坡會議期間，因為我的身份，我不能代表我們那個組講話。我也問過康生的秘書凌雲

同志，康生同志要不要聽我的彙報？結果有天晚上，康生把我叫去了。我彙報了我們村半小時，說明沒有地主，實際也沒有富農，雖分了土地，農民沒有甚麼興趣等等。他批評我，應該說不嚴重。他說，書呆子，照你們這樣辦，怎麼滿足貧僱農的要求？回去，回去，重新來過。我彙報時提心弔膽的，怕闖大禍，一聽「書呆子」，就放心了。康生叫我回去，我還得回去，還有七八個人等着我回去。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郝家坡會結束後，我又走八天回到朔縣補課。這回補課，就要命，說原來的鬥爭不徹底，分配不徹底等，按照康生的要求重新來做。但我回去時，中央土改工作團的人都走了，他們以為土改已經結束了，只有區的幹部還在。所以回到前柳村補課，工作組就變成沒有頭了，老同志都走了，沒有領導了。我與縣裏交涉，縣裏把區委書記調來當組長。名義上我是協助，實際上區委書記要跟我協商，很尊重我的意見。這個區委書記很好。

回去後，幹了一些很不妥當很左的事。第一件，把兩家富裕中農劃為富農。這兩家是弟兄倆，住在一個院子，後來分成兩家。兩家都有兩三個強勞力，是種地的好把式，婦女也很能幹，房子乾乾淨淨的。這兩家確實比較富裕，養的是晉西北的大犍牛，全身油光水滑。但是這兩家沒有長工，每年在收割小麥的時候僱幾天短工。搶收時，天還沒亮要割到太陽斜照吃飯，下午太陽斜照後再去割到天黑。中午太熱了，受不了。從生產關係上看，他們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是勤勞致富的。但是要「補課」，原來已經分掉了一半財產，怎麼辦呢？我在郝家坡開會時，向康生具體彙報過這家。康生說，回去，回去，掃地出門。不然，怎麼滿足貧僱農的要求呀！為了

滿足貧僱農的要求，把不該分的，分了；把不應該打擊的，要他受到慘重的打擊。

在回前柳村前，我向區委書記傳達了康生的話，商量怎麼辦。他說，把這兩家劃為富農吧，沒有劃為地主。

經過多方了解，群衆對這兩弟兄並沒有仇恨，人家是老老實實的人，沒有聽說有甚麼高利貸之類，開鬥爭會，鬥不起來。但那個時候不管了，還是要發動群衆鬥一下，這種鬥只是走過場。鬥了後，把他們的土地沒收了。他們的家，按照人口，應該分多少分多少，多餘的全部拿出來分了。他們有水澆地，是比較好的土地，離家近。而遠地，走幾里路的，誰也不想要。他們兩家的兩條大犍牛也分了。怎麼分呢，那麼多人家分，幾家合分一條，一家分「一條腿」，如四家人，就是一家一條腿。當時看到牛被牽出來，我心裏非常難過。我知道一般的農民並不懂養牛，沒有料，三個月，牛就死定了。

對這兩家人的整個做法是全部錯誤的，是真正的破壞生產力。早在這之前，我就讀過蘇聯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裏邊不是寫強迫搞農業集體化嗎？老百姓就是殺豬、殺羊、殺雞，一場大破壞。康生當然知道這些。

以我當時的認識水平，我明知道這個沒收是錯誤的，但是當時我所處的地位，沒有辦法，必須要服從命令，我頂不住。但是，我還是大打了折扣服從的。

第二件，開鬥爭會。土改，最反對的是和平土改。甚麼叫「和平土改」？就是沒有大規模地發動群衆，開無數的鬥爭會。一九四六年後，有些解放區的高級幹部老家是大地主，他們就在這

個地區工作，他們自己獻地，全部獻出來，開始報紙上還登出來表揚，後來，獻地運動被當成和平土改，說是麻痹群衆。這些獻地的老革命，後來被鬥得很厲害。他們的資格都很老，有的可能是二八式。三八式，獻了地還沒有資格登報。

我回去補課怎麼辦？當時的農民，老實得很，上面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是，鬥誰呢，最後找來找去，找了兩個二流子，農民對他們沒有好感。區委書記跟我一起研究，要鬥，只有鬥一下他們。調查一陣後，調查到他們喜歡胡吹，說傅作義離開我們不遠，將來打回來不得了。傅作義在岱岳，真的離我們只有百把里，人人都知道。

凡是開批鬥會就要打，不打就不行。我在旁邊看着，一般地打幾下，不管，真打了，就找人來制（止）住。

另外有一些貧苦的人還要求分東西，把兩三家富裕中農吊起來打，我聽說吊打的是婦女，大吃一驚。急忙找區委書記說，你趕快去命令停止。後來我問，這幾家有沒有東西可分？區委書記說，你不知道，他們要分好醋，埋了很多年的。本地人知道這些情況，哪家十多年前埋下了醋缸。山西好醋引誘力大得很。我聽了哭笑不得。

前柳村的補課，總的來說是錯的，是我自己被迫犯的錯。很多人對自己過去的錯不願講。我必須講。

還有一件事，是死了一個人。磨石灘是個煤礦區，農業不發達。區委書記跟我講，這裏搞了土改試點，但不徹底。有個縣公安局的外圍偵察員，老百姓怕他，經常看見他騎着自行車轉

來轉去。區委書記說，磨石灘事情比前柳村複雜。於是，我們就到這個地方去，我也願意去。一九三六年我在四川北碚盧作孚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做實習生時，鑽過許多煤礦。到了磨石灘，我先鑽礦井。我下了兩三次，是斜井。工作隊下煤礦，是一種表態，發動群眾就容易一些。

最後弄清楚了老百姓害怕這個人的原因。敵僞時期，朔縣敵人有個暗探隊，叫「藍部隊」，就是利用無職業的中國人打探情報，這個人是藍部隊的成員，也就是說是漢奸性質的。日本投降後，傅作義留用此人，解放後，我們又留用。這個人的家在當地是小惡霸。群衆看到解放後他仍然被公安機關留用，還是騎着自行車轉來轉去，所以怕他，不敢揭發他，怕共產黨哪天走，他會報復。我跟區委書記了解了這些情況後，想辦法把他弄回村裏關起來，開批鬥會。這個會是又鬥又打的。有一天晚上，群衆偷偷把他打死了。天呀，一個區委書記，一個延安來的土改團的人在這裏掌握土改，死了人。以前，土改死了人不算啥，但是，我們自己卻不這樣認為。我說，到縣委去報告，承認錯誤，請求處分。我們報告後，縣委書記比較客氣，說，確實是群衆有仇恨，這件事已經出了，就算了。口頭上批評了幾句。

第二年，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間，我已經回到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了，一天，我看到《晉綏日報》，也就是中央晉綏分局的機關報，第一版整版報道解散朔縣縣委的事。報紙上沒有提到我們的事，說朔縣縣委是右傾。我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晉綏分局辦公廳之類的，請他們轉幾個負責人。我說，我在朔縣工作幾個月，到縣委去了多少次，看見過縣委的生活情況。他們吃的

甚麼？正規糧食是小米加穀糠。我沒有在縣委吃過一次小米飯，縣委是很艱苦的。我說，別的我不知道，就這一點來講，我作為客人去，也沒有招待過我，也是吃小米加穀糠，解大便都困難。我說，這個縣委是很樸素的。我的信當然起不了甚麼作用。現在我也不知道為甚麼要解散這個縣委，當時來看是土改右傾。現在來看，我們上面的領導，不了解下面的具體情況，一味「左」。

康生在臨縣胡搞，留下極壞的影響，到了無法干涉的地步。我們在朔縣，開始沒有胡搞，我到郝家坡開了會回去後，執行康生的批示，也胡搞了一些，也死了一個人，犯了大錯。

到了七月底八月，叫我回興縣，工作團準備離開山西到河北。

第十章　西柏坡全國土地會議後到河北山東土改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四八年五月）

從山西興縣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為老同志服務

這個時候，毛主席、黨中央已經轉到西柏坡，康生早就到西柏坡了。我們土改工作團這些人也奉命去西柏坡。我們這個隊伍裏，有像高文華、張琴秋這樣的十多個老幹部，加上三青年合在一起，要從山西興縣走到河北平山縣。平山縣靠近石家莊，從興縣到平山縣，要走十多天。怎麼走？並沒有甚麼人護送，因為當時根據地每隔半天的路就有兵站，農村的老百姓派人、派牲口從這個兵站護送到下一個兵站。我們從興縣晉綏分局出發，帶糧票，帶路條——路條還不是一般的，因為我們隊伍裏有資格很老的幹部，所以是晉綏行署開的。這個行軍就很特別，團長、副團長沒有了，也沒有說哪個帶隊，但自然是張琴秋帶隊，甚麼事都問她。

這十幾個人，就靠我們三個青年照顧。土改工作團的青年人有凌雲、于光遠、史敬棠、我。

凌雲是康生的秘書，「文革」被康生關了十多年。打倒「四人幫」後，當過公安部部長，凌雲跟着康生一路。于光遠，《解放日報》的，我，中宣部的，還加上史敬棠，這個工作團，以中老年為主，上面沒有派秘書，沒有管理員，統統由我們管。我們既是秘書，又是服務員。我們走路，同時為他們服務，我們很願意為他們服務。

三青年的任務怎麼分呢？我打前站做飯，一般是提前兩個小時走。比如這些老同志中午要休息，我就提前到下一站準備晚飯。他們每天有六毛錢的補助，我們三青年沒有。那時六毛錢能買半斤多肉。我們吃飯在兵站，但沒有菜，至多有土豆絲，我們住也在兵站。史敬棠管房子。到一個地方，老幹部住哪些房子，要他分配。于光遠管交通，老同志有沿途派的牲口、大車，于光遠要安排，一直走到西柏坡。老同志騎的毛驢都是老百姓派的，所以抗戰時期，老百姓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于、史的任務，我可能顛倒了。）

我們從興縣的碧村出發，第一天，到界河口。一聽這個地名，就知道有水，很富裕。第二天，到岢嵐縣；第三天，到五寨縣；第四天，到神池縣。這一段路，我曾經走過四次，加上這次，就是第五次了。這條路是公路。路上鋪有小石子，可以通汽車，只是沒有汽車。那些地方基本上是高原，很少下雨。某一次我一個人走，碰到國民黨飛機掃射，我趕緊躲藏，掃射完了後，我還拾了兩個小機關炮彈殼，有近四寸長，兩根手指那麼粗，青銅的，恐怕有大半斤。這兩個彈殼跟着我多少年，後來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五寨到神池，中間有一個大鎮，叫義井，是神池縣的，有兩三百家人。「神池」、「義

井」，從這幾個字看，就知道這裏水的困難。為甚麼叫「神池」？有一池，是神賜的。為甚麼叫「義井」？又有叫「三井」的，因為周圍沒有水，鎮裏有兩三個水井。打水的是柳條筐，編紮得很緊，能裝水。義井這些井旁，一天到晚都有人輪流搖水。

我打前站買東西，那些地方可沒有長江流域那麼富裕，沒有雞呀蔬菜賣，但是一般有豬肉賣。一天做晚飯，我買了兩三斤肉，但燒甚麼呢，甚麼菜都沒有，我發現有大蒜頭賣。四川不是有大蒜燒肉嗎？很香。我就做大蒜燒肉，燒好後，給他們送去。張琴秋大姐是浙江人，還有一個女同志張越霞是江蘇無錫人。她們聽見大蒜就搖頭，更不說看見大蒜燒肉了。我怎麼辦呢？我先把大蒜拿出來，只端肉去。她們吃了，覺得好吃得很。我說，幾位老大姐知道這是甚麼燒的嗎？我說是大蒜，她們唉喲喲，大吃一驚。我這才把大蒜拿給她們看。她們說，沒有甚麼蒜的味道嘛。當時沒有甚麼東西吃，有東西吃就不錯了。錢是有的，就是沒有東西買。

到了神池後，不是往北，而是往東，到了長城外雁門關北面的廣武鎮。這一段路我感想很多。這一路就是古代多少年的戰場，從秦漢開始就是。我們在荒原中見到當時一個人都沒有了，但有很大的天主教堂，感嘆天主教的勢力深入到這麼荒涼的地方。這段地形也特別，兩邊是山，中間基本上是小石子與粗砂平地。走在砂路上，看兩邊的山，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這當中的沙荒平川，怕有好幾十里寬。路上也見不到甚麼生物，所以，感覺好像看見了古代戰爭你殺我，我殺你的場面。那種荒涼、淒慘的感覺，非常難受。當時也不可能跟別人講，那些老同志不在乎這些，只有像我這樣的小知識分子到了這種地方，思想呀，感情呀，才會這樣。因為親臨古代戰

場，想着多少人戰死，有説不出來的難過。廣武鎮在雁門關之北，倚山而建，是向着關外的一個軍事重鎮。快到廣武的時候，居民已經開始做飯，炊煙在昏沙中已經升起，就想，古戰場的司令部可能就在這裏吧。為了爭奪廣武鎮，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們在廣武住了一個晚上，塞外的淒涼初步看到一點，難免不想起唐李賀詩的兩名句：「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不過這裏不是黑雲，而是使人更難受的黃雲。

到了廣武鎮，從北面彎來彎去慢慢上雁門關。這個路很寬，可以過車。雁門關很有名，特別得很，從北面來易攻。匈奴來打的時候，進攻比較容易。我們繞來繞去，繞到關頂，往南一看，就知道雁門關一失守，匈奴一下子可以衝到太原去。想想，那些古代鎮守雁門關的將領多險啊。因為一沖上來，就完了。一九三七年，日軍也是從北面先佔雁門關，然後南下犯太原的。

下雁門關後往南走二三十里，到了代縣城。過去防守少數民族大軍南下大司令部就設在代縣。路上，心情可謂複雜已極。一是想不到能活到今天，能親自來到這個古代中原民族與邊疆部落必爭之地，白骨現在已經看不見了，以後能不能永遠保和平呢？當時心裏可謂有説不出來的悲哀，因為根本沒有想到兩年後就會全國解放。

到代縣已近黃昏，遠遠看見很多樹，心裏高興得不得了。在陝北、在山西，十多年沒有看過幾棵樹了。進縣城後，看見縣城的十字路上有很雄偉的建築，街邊晚上有上百個賣東西的攤子，油燈火亮，煙塵滾滾，這種景象，從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後，已經十多年沒有見過了。在山溝裏住了十多年，一進代縣，心裏有點奇怪了。沒有想到，除了我們山溝，還有這個世界，而且這樣的

地方是共產黨的地區了。後來真進了北京上海，反倒一點也沒有這種感覺了。須知這才是濃濃的中國味，現在把地攤、夜市等都要改掉，就不大像中國了。

往東走一天，到了峨口鎮，這大概是甚麼河邊上的大鎮，沿着河邊有幾百戶，這也是十幾年沒有見過的。晚上人很多，還有點燈賣東西的。在峨口鎮住了一晚上，繼續前進。峨口之後許多地方的路，兩邊是山，中間是路，路上全是鵝卵石頭，也就是說，我們是走在季節河灘上的。有幾天遇到下雨，溝裏不能走了，我們住下來。我們三青年想為老同志買點東西，買一兩個雞，結果跑了幾個村莊都沒有買到。這說明根據地農村裏比較窮困，但自然條件並不那麼差，是十年以上的戰爭造成的。

又走了五六天，大概八月中旬，我們到了西柏坡。西柏坡是黨中央的中心，周圍十幾二十個村莊，都是住的中央單位，以西柏坡為代表。到了西柏坡，我們就分散到各人原來的單位了。

當時知道中央在九月要召開全國土地改革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毛主席還在陝北，陝北的危險還沒有過去。所以，全國土地會議，就委託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他們在西柏坡召開。我們就等這個會。

全國土地改革會議

這個會議，大概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間開的，在西柏坡村後邊疏林裏，那時太陽還大，但不太

熱了，搞了一些布幔。這個會由中央工委幾個人，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其中包括康生負責主持。實際上是劉少奇主持。有二三百人參加。全國各解放區的區黨委以上的代表都來參加。那時的區黨委沒有現在意義上的這種完整，下面還有幾個地委。一個地委管幾個縣委。座位沒有正規的，開會時自己搬坐的去。我們這一群（批）土改工作團的人，也沒有說出席甚麼的，反正自然就進進出出，自然而然參加。當時西柏坡一帶中央機構多得很，其他人是不能隨便進出的。

劉少奇的整個報告，內容很多，很長，現在我基本上記不得了。劉少奇一九四七年大概四月中旬到西柏坡，組織中央工委。根據地的工作由工委主持。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等在陝北指揮全國的戰爭。當時以戰爭為主。毛主席走到哪裏，中央就在哪裏，他可以一個人，至多找幾個助手如周恩來，但必須帶電訊器材，另外就是要「筆桿子」作宣傳的。陝北留下幾個大筆桿子：陸定一、胡喬木、范長江。但「文革」中把范長江搞死了，逼得范長江自殺，一代天才，太難再得了！

劉少奇主持這次整個解放區的土地工作會議，我認為總的還是比較穩的。他剛到西柏坡時，發現當地的土改都已經在大幹特幹。他發現太左，到處吊打、逼供，包括中央工委住的西柏坡，把農村的遊民當成基本群衆。遊民一起來，甚麼事都弄爛。真正的貧農老實得很，並沒有想分別人的財產。

劉少奇已經感覺到問題嚴重，一下制止不了，因此由中央工委派兩個縣委書記，直接由中央工委領導。建屏縣的縣委書記，換成經過長征、長期擔任中央青委書記的馮文彬，平山縣委

書記換成錢俊瑞。錢俊瑞解放後當過教育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能力很強，是一九三五年一一九三六年上海救國會運動的核心領導人之一。現在的平山縣，在抗戰與解放戰爭時期分為兩個縣，西半邊叫建屏縣，東半邊叫平山縣，西柏坡在建屏縣。

其他人的發言，很左的也有，東北來的發言最左，但不佔主流地位，強調甚麼「煮夾生飯」，即反覆搞，大家不願聽。我的印象大多數議論，事實上都是提出問題，即老根據地基本上不存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問題了。意思是說，土地問題實際已經基本解決了。怎麼解決的？經過合理負擔，這個合理負擔很厲害。不沒收土地，讓地主，或者其他收入多一點的，大部份交公糧。減租減息，合理負擔一來，事實上大地主、大商業老闆，基本沒有了。這些方式不是沒收，是逼得你非賣地不可。所以，地主的土地賣得很多了，土地已經相當分散了，形式上是賣地，但一畝地的價格非常低，假如，平常是十元白大洋一畝，這時不到一二元白大洋。老百姓都信白銀保值。誰有權力誰先買。農村誰有權？村幹部、鄉幹部。有的是從村裏提起來的區幹部，一直到縣幹部。土地的分散是隨着權力走的。他們有各種辦法弄到錢。

幹部多得鬥爭果實的問題，用通俗的說法，是多吃多佔。其實不是多吃，主要是多佔。從有較多土地的地主手裏通過合法的買賣形式，拿土地來重新分配。當時形勢很清楚，整個根據地全部是共產黨的軍隊，農民的顧慮不太多了，他們不怕甚麼地主，只怕頂頭的村幹部、鄉幹部。總的來說，基層幹部，過於滑邊（出格）的比較少，但通過合法的手段多佔鬥爭果實，則是比較普遍現象。

代表的發言到最後，傾向慢慢轉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上去了。在北方，土地面積比南方大，但是，肥地跟瘦地、水澆地與旱地的收成可能相差十倍以上。他寧肯要兩分近地、水澆地，也不願意要十畝遠沙地。

這個問題，我印象中講得最好的還有朱總司令、董老董必武。他們說甚麼呢？要點是說，土改鬥爭，對農村的小工廠要保護，對僱長工的人的鬥爭，要有限度。朱總司令說，小工廠的學徒，除了老闆養活他外，他還有工資，還能養活其他人，這是其他任何國家沒有的事。朱總司令說他跑了那麼多國家，一個工人原則上養活一個人，要養活一家人，很難辦到。我們要絕對保證我們的工商業不要被搞垮。這些老前輩敢說，一個學徒、店員的收入能養活幾個人，根本是不對的，不可能的，非把一切工商業立刻搞垮不可。

最後這個會草擬了一個土地改革法，報陝北中央，報毛主席。草稿我沒有看到，但是草稿的精神似乎不是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因為整個會議開得很長，不大贊成重新平分，這跟後來一九四七年十月十號公開發表的土地改革法不一樣。不過，我沒有原上報草案在手，可能記錯。

這個會結束後，我們土改工作團就在等，康生傳話，土改工作團還要繼續下去。我們也沒有分配工作。土地改革法這個方案報上去，很長一段時間，兩三個星期，等得很焦急，不知甚麼道理，就是不回答。可能是十月七八號，回答的電報到了西柏坡中央工委。

有一天，康生的夫人曹軼歐分別通知我們，第二天下午到他們家去，康生五十歲，請大家坐一坐。那個時候曹軼歐還很慈祥。我們去了，有花生、棗子、茶水。康生拿出一本手抄本的《土

地改革法》說，這就是要公佈的毛主席的回電。康生喜歡寫字，字也寫得很好，規規矩矩的楷書。他說，中央對報上去的土地改革法有原則的修訂。他究竟說了多少話，記不得了，但是「原則的修訂」這幾個字，印象比較深。甚麼叫原則的修訂呢？不管新區老區，土地全部歸公，然後打亂平分。

當時像我們這樣一些人，感覺到這樣做不妥當，這是沒事找事，把農村的農民得罪完了。農民的保守性是很強的。我這片土地，多少年種慣了，你全部充公，再平分，分到誰的手裏呀！弄得全部農民的心裏都不安，誰都怕受損失，貧農也怕，儘管他缺少土地，但是，他自己的那一小塊土地，還是怕拿來分給別人。當時我是不大接受的，覺得是自己找麻煩。我印象中會議上沒有人有這種主張。

公佈後大約三個月左右，整個根據地，山西、陝西、山東、河北，一直到東北，可以說是全部行動起來。一切最左的事，都是在這幾個月發生的。打人呀，逼供呀，挖地財呀，鬥幹部呀。一九四八年一月，不得不有個原則性的大轉彎，回到調整土地。但已經遲了，已經燒焦了，沒有辦法了。

河北饒陽土改：鬥爭目標已不明確了

康生到山東去了，與他夫人曹軼歐，還帶着秘書淩雲及毛岸英。毛主席把毛岸英始終委託給

康生。他們四個到山東去的事，我們全不知道。

後來通知我們，到河北饒陽縣冀中區黨委去報到。當時的區黨委，相當於現在一個小省委。我們這一批人，誰負責？康生走了，含含糊糊，沒有指定哪個負責，那麼多老同志，但大家原則上聽張琴秋的。張琴秋女中豪傑，精力好，能力也強。

這回我們是坐卡車去的，繳的國民黨的卡車，一個卡車全裝完。當時我們正在圍攻石家莊，白天有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們只能晚上走。經過曲陽，轉彎，向東，穿過定縣，再經過幾個縣到饒陽。非常巧的是，我們早上七八點前到饒陽，就聽說石家莊昨天解放了。那天正好是雙十二。為甚麼記得呢，誰都記不住解放石家莊是哪天，但我記住了一九四七年的雙十二。「雙十二」即十二月十二日，是一九三六年張學良在西安發動事變扣留蔣介石的日子。我記許多事，就用這個方法。

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個步驟是整黨。怎麼整法呢？每一個人，從區委書記、委員、部長起，到所有的黨支部的，一層層整。整甚麼呢？整你怎麼劃不清階級界限呀，怎麼跟地主有來往呀等等。整黨後，佈置土改下鄉。這是土改的第一階段，大政方針就是這時定的。區黨委召開三級會議，地委一級，縣委一級，區委一級，主要負責人都來，幾百人，有時候上千人。

到冀中饒陽時，冀中區黨委正在開三級整黨會議，他們要我們去看看。他們在冀中一個核心地方開會，叫辛集，是冀中最大的一個城鎮，產皮毛，現在是辛集市。我參加某個縣的會，縣委、縣政府，各個區區長、區黨委書記參加。我聽到一些極其不合理的事情：集中鬥一個區委書

記。說這個區委書記跟地主階級的界限劃不清，包庇地主。我從這個區委書記的發言，從別人的批評中弄清楚了事情。冀中是我們鞏固的根據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掃蕩」後，城市、鎮，大的村莊都被敵僞控制。敵人到處修碉堡，在村裏也修，而且很高大。我們留下極少數的人很難成立正式的區委區政府了，下面的工作人員只能叫武工隊，敵人一來一兩百人、兩三百人，有汽車，還有馬，我們幾個人，連槍都沒有，只有兩個手榴彈，當然退。夏天，我們躲到青紗帳裏，出不來。我們一出來，除了敵僞，還有漢奸。這位區委書記說，每次都是某某人家給我們送飯、送水，晚上估計敵人不來了，把我們接出來，安排住處，第二天天不亮，再送回青紗帳裏。按照黨的政策，這樣的人叫開明愛國人士，因為他是抗日的，是援助我們的。（按：其實應該是堅定的不怕犧牲的抗日英雄。）這位區委書記發言時帶有檢討，說自己階級立場不穩，在土改中對這個財主比較客氣等。在土改中，遇到這樣的事情，當事人往往要受處分，留黨察看，你不承認錯誤，就開除黨籍。把拼着腦袋救我們的人，當成敵人，這不是太荒唐了嗎？

當時聽了，以我的年齡、資歷，只有反映。沒有領導人，只有反映給張琴秋。她也沒有甚麼辦法。她也怕，怕挨整，不敢反映。所以，這種整，是錯誤的，它只能使我們的一些幹部越來越不講道理，越來越不講中國的人情事理。在這樣困難時援助我們抗戰，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險的呀！他的危險也是很大的呀！因此，在土改中，對這樣的人應該和平土改，把他多餘的地拿出來分了，還應照顧，而不應該鬥呀，打呀，查三代呀。當時的風氣是一律不管，如果考慮這些人在抗戰中對我們的援助，你就是錯了，你就是階級立場不穩。想想看，竟然到了這種程度。

為甚麼叫「全民抗戰」呢？現在的電影、電視，幾乎凡是地主就是漢奸，其實是對我們全民抗戰的糟蹋。八路軍固然以生命來保衛人民，但人家也是用生命來保衛你共產黨，保衛你八路軍打敵人的。現在過了幾十年，我已經到了九十歲了，我可以說，不管你從哪方面講，這樣做都是錯誤的，是過份的。這不僅僅是舊社會講道德良心，共產黨還要幹下去，把一切跟你合作的人整寒心了，這樣行嗎？但我們多少年來，實行的往往是這樣的政策。解放後，對知識分子，對科學家，對大學教授，都是這樣。整，整，一直整到「文革」。「文革」就封頂了，全部都是敵人，就剩下你江青了。到了這個程度，真是一個國家的笑話。十億人口，全部都是敵人了。劉少奇、鄧小平都是敵人了。總之，中國把「階級鬥爭」弄到了極致，發展到了無法理解的程度。在最危險的時候，別人拿出生命來救你，你轉過來甚麼也不認了，把中國的道德徹底丟進糞缸裏去了。現在大家也認識到過去的有些作法太滑邊了，但是，現在還有這麼一些人，還不承認這些，只是承認有些地方做得不大對，左了一點而已。一切事情，反臉不認人，在中國是絕對行不通的。

有頭無尾，把麻煩丟給後來的人

康生一生從未做過農村工作，怎麼當起名義上是中央的土改工作團的團長？真是怪事。康生雖然不同我們在一起，但因為有個所謂中央土改工作團的招牌，當地接待得很客氣，很周到。我們分成幾個組，到幾個村莊去。我跟張琴秋一個組。當時她四十多，實際上我是秘書了，只是沒

有這個名義。我們到冀中饒陽縣的大崔莊、小崔莊。到之前，我這個小知識分子就想了很多。這個崔字，讓我想起了唐朝崔護的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深縣與饒陽連在一起的，均以產桃出名。而作者就姓崔。因此我想，這個地方的風景一定很好。其實崔護的詩大概是講今西安市南郊的事情，跟我去的地方不沾邊。

大崔莊有三百多戶，小崔莊有八十多戶，小崔莊是附點，因為人手不夠，就沒有專門派小組去。小崔莊派我一個人去，住在農民家裏。有時也住在大崔莊，我兩邊管。

一到冀中，跟山西的感覺不一樣，這個地方房屋比較整齊，農民文化比較高，穿的衣服也比較整齊乾淨。我們一到大崔莊，看到牆上有很多口號，是當地原來的工作隊寫的。比如「平分一切土地，貧僱農萬歲萬萬歲」等。張琴秋也看見了。我們組裏還有兩三個老同志，都搖頭，頭痛呀，這樣搞法，那要大翻鍋，要大鬧。我給張琴秋提了一個建議，塗掉另寫，因為我們不是這樣的搞法。這個地方已經不好搞了，極左的東西已經搞過了。土改一次又一次，這次我們搞甚麼？她同意了。我找了幾個年輕農民，用石灰漿把這些口號塗了，寫上新的。不過，新的大概也是五十步笑百步，還是左得很，不過文字上通順一些罷了。

我們先調查，但是，非常難。沒有人贊成把土地打亂重新再分配的，我們心裏都知道辦不到。首先是村幹部不贊成。一句話，抗戰後的村幹部都不贊成，因為他們得到的「鬥爭果實」都是比較多的。

因為康生不久又把我們叫到山東去了，我們只調查了一個把月。但是，印象已經出來了，農

村的社會結構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不是抗戰前的舊農村了，不是地主、惡霸、漢奸的問題了，而且土地基本上已經分散了，分散到歷屆村鄉幹部的手裏。房屋的佔有也變了，過去有錢人的房子已經賣了，到了幹部手裏。所以，原來的甚麼甚麼人，都破落了，生活很貧困，再鬥他，拿得出來甚麼？無非就是挖地財那一套。但是，鄉村幹部內部鬥爭十分突出，很激烈。幹部與幹部之間有分配不均的問題；鄉幹部、村幹部跟貧僱農民之間有分配鬥爭果實不公平的問題。這個所謂「鬥爭果實」，是指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的土地。所以，這時調整內部矛盾，重於階級鬥爭。但當時不敢這樣想，也不敢說，只模模糊糊有這個意識，不明確，沒有形成理論。如果非要鬥不可，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打鑼打鼓，戴高帽子遊街，我們只能發動農村的二流子、農村的遊民來幹。這樣一來，農村就搞得稀爛。歷來的所謂農民戰爭，基本上是靠遊民發動起來的，不是靠老實的農民，老實農民全不想要人家的東西，而且是本村天天要見面的人的東西。

還發現農村的生產力已經大大降低了。到甚麼程度呢？壯丁基本上沒有了，牲畜也沒有了，出公差太多了。現在我説到這些，還是非常痛苦。當時開會，要成立青年小組。我到小崔莊去，也要成立青年小組，結果一看，兩個青年小組十幾個人，全部是十幾二十歲的婦女。我們看趕集，女孩子也愛美，也比較漂亮，個子高高的，乾乾淨淨，但幾乎全是年青婦女。久經戰爭的人，不大動情，我這樣的人不一樣，當時忍不住就流眼淚。日本侵略，把我們的農村變成女兒國了。當時他們就自稱是女兒國。我們看不到壯丁，日本的侵略，壯丁有些被捕了，有些當兵了、逃難了，慘得很。當時人民恨日本侵略者，很深。如果別的國家到你的國家來，把你國家的年輕

壯丁都殺光，就剩下婦女了，你哭不哭？

這樣一來，感覺到這個地方趕快恢復農業生產，比強調階級鬥爭重要得多。這裏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內部調整土地的問題，還有分一些富裕中農的田的問題。這些問題，從上面的政策去調整，並不困難。不採取鬥爭的方法，而採取內部調整的辦法，沒有甚麼困難。因為這些基層幹部都參加了革命，是黨員了。只要好好商量，農民沒有不聽共產黨的話的。

對這些事，當時我們只是了解了一些情況，感覺到重新再來平分土地，大動干戈，是很難很難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就在這時，康生叫我們到山東去。我們在冀中饒陽只調查了一個多月就離開了，有頭無尾。

我在小崔莊遇到一件事，說明我們新的內部矛盾往往代替了老的矛盾。張聞天時，我已經有在農村鑽一年半的經驗。開調查會，已是沒有用的。毛主席開調查會是甚麼時候，情況完全不同了。現在開調查會，全看上面要甚麼，他們講甚麼。在冀中時，一般晚上我回小崔莊睡，發現小崔莊很壓抑，人人不敢說話，也不敢接近我。冀中農民，比山西、陝西農民開放一點，絕大部份的農村人都識字。我找人談，不敢說。我住了一個月，和和氣氣的，慢慢地，問出問題了。我又深入了解，一些老年人敢講了。根源是民兵隊崔隊長。這個人只有二十幾歲，實際上是小崔莊惡勢力的頭子，是新的惡霸。這個問題不要迴避，他是黨員，不然當不了民兵隊長。大家都怕這個民兵隊長，因為他有武裝。我問有甚麼武裝，他們說，拿出幾個棒棒也是武裝嘛，有一些梭標，手下幾個人。這個人狠、兇，主要是強姦婦女。我說，你們不是都姓崔嗎？他們說，他不管這

些，好幾輩人了，同在一個村莊，名義上的同宗。

我跟張琴秋報告。這個人能夠把整個村莊壓得沒有一個人敢講話，工作隊到了，也沒有人敢講。張琴秋同意把這個人揭露出來，看群衆有甚麼事實。但群衆怕他，不敢鬥。又請示張琴秋。張琴秋是原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千軍萬馬她都指揮過。她說，那就扣起來吧。

於是叫青年把這個人扣了起來，關在一間房子裏，派人看着。有一天晚上，突然發現他跑了。小崔莊的人嚇壞了，說，你們走了以後，他回來報仇，我們怎麼辦？小崔莊的群衆上了屋頂，敲鑼通報，大叫：崔某某跑了，像發通緝令。快天亮時，在二十里外的滹沱河邊把他捉（抓）住了。押回來，把他關起來。

但是，關起來不到三四天，我們就奉康生的命令走了。以後的工作隊怎麼處理，結果怎麼樣，都不知道，我們就把爛蘋果丟給後來的人了。以張琴秋的權威，她可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但後來的工作隊怎麼樣，是不是跟這個人的關係很密切，就不曉得了。

這個例子說明，在我們根據地，借用毛主席的話來講，內部矛盾的突出，遠遠超過貧苦人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早不當權了。不但權力不是地主的，土地也分散了。這個時候的矛盾是一批新當權的人佔有的土地太多。所以，在老區，一般性的號召，發動群衆，重新分配土地，鬥地主，不大符合實際情況。

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一月春節之前在河北饒陽縣的大崔莊、小崔莊的土改經歷，我看見了很重要的現象，我們根據地的土地改革，像這樣的比較老的根據地，作法應該是調整解決內部

矛盾。假如有大地主、大漢奸，自然要鬥，要分他們的土地，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內部分配不均這個問題更加突出。實事求是地講，如果一定要叫我說根據地內還有多少惡霸，多少漢奸，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其實，一切重新來過，那是否定了過去我們自己的多年工作，我們好幾年不是白幹了嗎？我不能講假話。我講這些是我自己看見的事實。在我們自己的地方，長的十來年，短的也有幾年，敵人來，我們退，敵人退，我們進，反反覆覆多少次。實際上，當地的惡勢力，基本上已經被我們鏟除掉了。

康生叫我們到山東去繼續土改

我們在一九四八年春節前十多天離開河北冀中的饒陽，往東南，到山東黃河北面的陽信縣。這個縣不大，山東渤海區黨委、華東局後方機關、華東司令部的後方機關都在這裏。當時還沒有全國大反攻。

我們一路發現冀中這一帶群眾的發動、軍事組織工作比山西好。可能是群眾文化高一點，又是平原，客觀上工作好做一點。他們派給我們兩輛大車，用的是毛驢拉，當時已經沒有騾子了。只要有證明，當地群眾就負責派車、派人。當然，不是全部都招待。沒有上級路條的，就不管，管中級以上的官員。

我們三青年的分工，還是跟上一次離開興縣時一樣，我負責伙食，于光遠負責交通，史敬

棠管房子。這一帶走一下，立刻覺得人民的覺悟高得多，不怕我們，山西還有點怕我們，我們感覺到軍民確實是一家人，讓人感動。每個村都有一個接待的地方，有幾個人，幫助過往的人吃、住，派大車，一切都是義務。我們沒有遇到甚麼困難，每到一個地方，小米飯均有，但我也要提前到村裏去買點東西。村裏沒有肉賣，只有買點雞蛋。晚上住下，炕拿甚麼燒？那時燒玉米根。玉米根都很大，一個就好幾斤重，一個炕發四個。燒炕很講究，要把玉米根弄斷之後燒。等到燒了兩個鐘頭，我們飯吃完了，房子也暖了，炕也熱了，就睡覺了。炕上有兩層毛氈子，氈子上面有葦席，燒炕後，門窗關嚴了，蓋的被子比較厚的話，天亮前，還不怎麼冷，還能忍受。但是當地貧苦老百姓是達不到這樣的標準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離不開老百姓。我們吃的、穿的、住的，全是老百姓無償供應的。人民是父母，我有親身經歷呀！

我們經過津浦鐵路上的泊頭鎮，好像鄉下人到了北京一樣。唉呀，還有這麼大的城市呀！晚上，滿街的燈火，各種小攤，小吃店，熱鬧得很。當時才從山溝裏出來，看到很驚異。當天買了好東西，大辦「宴席」，吃了燒雞！

泊頭鎮才解放不久，是津浦路的一個重鎮，是日本人的重要據點。不但游擊隊去解決不了問題，就是國民黨幾百個人、千把人也難打進去。

到山東陽信縣，先要經過樂陵縣。樂陵出無核小棗。其實有核，只是核退化了，吃的時候，核很軟，很小，可以一起吞下。這些事業不知現在發展了沒有？陽信還出香椿，出大量的香椿。當地居民等香椿長到五六寸長，摘下來，用半人多高的大甕醃上，吃一年。

聽見毛岸英批評康生，讚美饒漱石，我們提醒他，你不要隨便講

一九四八年春節前幾天，我們到了黃河北面離黃河不遠的陽信，再到某村，渤海區黨委就住在這裏。過春節的時候，不好下鄉，我們繼續住在村裏。這時，康生給我們講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麼出獄的，清楚得很。六十一個人出獄奉中央命，填了甚麼表，登了甚麼報，辦理了出獄手續。

我們去之前，康生已經在山東一兩個月了。原來是鄧子恢在那裏管渤海區黨委的整黨。鄧老大概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換指揮，換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康生掃蕩了渤海區黨委書記，叫景曉村，當時比較年輕，三十幾歲，在當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曉村鬥下來，也把渤海區的行署主任鬥下來了。我們到時，他們已被鬥下來了。

不知甚麼原因，景曉村去世後的紀念文集，講他一生的貢獻的書，我都收到了。我估計于光遠他們也會收到，我們工作團員並無通信地址。為甚麼會給我寄呢？他們的家屬可能不太清楚，想是不是你們也參加了整景曉村，要不然怎麼給我寄來呢？

整景曉村的詳細情況我們絲毫不知道。但是，通過毛岸英，我們感覺到一些。我們四個人擠在一個小房子，在一個炕上。我們三青年，于光遠、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個個子都不小。毛岸英從蘇聯回來不久，比較隨便講。當時我們叫康生為康老。毛岸英說，康老整景曉村太粗暴了。「粗暴」兩個字，是我現在用的，毛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用不用這兩個字，我記不清

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怎麼能這樣整人呢？相反，毛岸英對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有很好的評價，說饒漱石有政治家風度。我們三青年，還是延安整風時的那套思想，上級是不能談的，不要說政治局委員了。聽見毛岸英批評康生，讚美饒漱石，我提醒他，不要隨便講，不要跟別人講。大概我們三人均這麼講了。經過延安整風，大家的組織觀念都極強，政治局委員是高級領導，你這個小黨員，怎麼能講政治局委員？所以，聽見別人說康生怎麼怎麼樣，自己就怕，內心恐怕，生怕別人說你議論上級，批評上級了，那不得了。延安整風，事實上就形成了這些東西。

就在這個時候，情況發生了突然改變。一九四八年一月中下旬，任弼時有個關於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新華社全文發表，各地都印出來了，人手一冊。當時，任弼時還在陝北毛的身邊，這個報告當然是毛的意思，我覺得，這個報告把三個月前公佈的《土地改革法》基本推翻了。現在當然不用這樣的話，但實際上就是這樣。原件俱在，可以複按。報告講，原則上根據各根據地的具體情況採取措施，已經有一點調整的味道了。我的理解，這是個很大的糾正，因為三四個月來，發生了亂打亂殺，損失極大。各個地方不斷叫複查。老百姓說，「不怕土改，就怕複查」，一次複查，說前次右傾了，第二次，又說你前一次右傾了。複查的人絕不敢說你左傾，我給你改正，而是加碼的左傾。要不然，下一個人也去複查他呀。東北的說法，叫「夾生飯」，就是說飯沒有煮熟，再去重新煮。煮一次，煮二次，煮三次，一次比一次火大，飯成鍋巴了。但是，我聽張聞天的部下講，當時張在東北的合江省任省委書記，他沒有煮夾生飯，根本未理此

事。張是政治局委員，在東北九省的一個省當省委書記，他以這個身份，管一個小省，他頂得住。抗戰時期，他也了解農村，一年半全在農村裏，別人是頂不住的。

任弼時的報告，從根本上轉變了土改中過激的、不適當的做法，也是緊急地把三四個月以來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做法制止了。過去的做法實際是在讓農村中自己製造恐怖。那幾個月根據地的損失太大了。我在農村，我在實際幹，只能按實際情況說話。至於現在的史家怎麼說，是他們的事，我管不着。

已經做過的錯事，一般沒有辦法再回頭改正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間，中央正式作出新的決定，即關於老區、半老區土地調整的決定。原則上改變了土改法的做法。

這個政策是對的，但是馬後炮了，而且是馬後炮得很多了，並沒有起到甚麼作用。要幹的，已經反覆幹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這不是一個地方的口號，到處都這樣幹過了。現在的有些史家，可以把這事怪這怪那，總之是下面錯，上面對。其實按照土改法那麼去做，不是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是甚麼呢？至於一九四八年為甚麼要補這個決定，意義在哪裏？現在很難說。我覺得這個決定已經起不到甚麼作用了。已經做過的錯事，一般沒有辦法再回頭改正。

我們在山東一九四八年過了正月初五就到各個村莊去。這一次，因為有任弼時的報告，我們

膽就壯了，就根據情況來處理，主要還是調查。我們發現，農村的土地問題基本也已解決了，不是重新分配的問題，基本上是調整鬥爭果實分配不均的問題。正是處於這個關頭，五月間，一封電報，調工作隊回西柏坡，康生本人留下，要他負責山東工作。

這時，康生也不敢違背任弼時的報告，他知道這是毛主席的意見。但是他後來怎麼搞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搞土改，工作沒有做多少，但看見的事不少，這也是很大的收穫。不是一般地跑下鄉，而是較長時期在村莊裏，了解了我們工作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對的。

工作隊基本回去是甚麼原因呢？毛主席已經到了西柏坡。他先不住西柏坡，住聶榮臻那裏，離西柏坡還有二百里吧，中央要正式開展工作，要把戰爭時各單位分出去的人調一些回來。大多數人已分到東北去了，從東北調回很困難。

這次我們回去，坐的是四輪大卡車，美國援助蔣介石的，給我們繳獲了，輪子有我的肩高。這次我們白天走，也沒有甚麼人打前站了。初夏，不太熱，一九四八年的六月上旬回到了西柏坡。回去後，各人回各人的部門。

第十一章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一九四八年六月－一九四九年三月）

在東柏坡做書箱，保證了延安撤退時埋藏的部份書籍運到了北京

一九四八年六月回到西柏坡，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二十幾號進北京，在西柏坡只有大半年的時間。在西柏坡的時候，我有前後兩段。前邊一段，即六月至十一月，屬中宣部，住在東柏坡。後一段住西柏坡，在小新華社臨時幫工。東柏坡與西柏坡中間隔一座小山嘴，像鱷魚嘴。相距不到二三里路就是西柏坡，等於一個村莊分兩邊。

在東柏坡，各人歸本部門，我回到中宣部。但是，中宣部當時實際上沒有了。部長陸定一住在西柏坡，他單獨應付毛主席那邊的事情。陳伯達住在西柏坡，寫文章、寫書。到此時，這兩個正副部長實際上從來沒有正式管過事。整個宣傳部的人，很多都到東北去了。剩下的人，有秘書長丁華。丁華本名叫帥昌書，四川眉山人，是一九二六或者一九二七年入黨的，是上海做教師工作地下黨同志，曾經是江青的上級，後來江青整他。其他的，有幾個家庭，我們開玩笑叫「四

大家族」，業務工作人員一個都沒有。這時調了一個到處跑的很能幹的人，叫林間。儘管如此，宣傳部仍然處於停業的狀態。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黨中央集中力量打仗，有沒有宣傳部沒有關係，暫時用不到它。宣傳工作，毛主席主要是抓新華社，號令一聲，全球驚動。他走到哪裏，新華社一定是要在腳邊。

于光遠轉到了宣傳部，他原來的單位《解放日報》停了。王惠德也調來了。于光遠、王惠德，加上我，三個人做點業務。在西柏坡時，我們屬於一般的幹事。整個延安，當時沒有幹事、科員這個名稱，「幹事」還是自封的。

這段時期，六七月到十一月，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回到西柏坡是初夏，六月，天還不太熱。我們知道延安楊家嶺中央圖書館的書基本上都藏在延安附近的地窖裏。雖然是中央圖書館的書，實際上是由宣傳部代管的。怎麼埋藏的，我們不知道，是中央辦公廳處理的。我們收復延安已經三四個月了，想到派人把書運出來。當時估計中央不可能回延安了，

林間是馬來亞回來的華僑，到延安時間很長了，他非常單純，非常熱心，個性開朗，跟大家的關係都很好。他管總務，很能幹。我建議丁華轉建議楊尚昆，設法把延安埋的書弄出來。楊批准了，由中宣部林間去辦此事。林一個人跑去延安，馱了幾十匹毛驢的書回來，辛苦得很。當然，中央辦公廳花了大力協助他，他也得到了各地的全力協助。林間把書全部馱回來了，功勞真是大得不得了。好在沒有下大雨，如果下大雨，就全完了，沒有箱子，連油紙都沒有。這些書放

在東柏坡很大的一間空房子裏，堆滿了。

慢慢地，我看沒有人管，因為圖書館的幾個人全部到東北去了，上面也沒有人管，我就想，如果哪一天傅作義一來，一本都沒有了，都要被燒掉，沒有準備是不行的。當時的準備就是進深山去。

我設計了一種書箱，兩尺多寬，兩尺多高，兩格，一個蓋子，十幾個木袢，很牢固。我到附近的夾峪找木匠舖做。夾峪是個大村莊，有四五百戶，距西柏坡有四五里路，中央很多機關在那兒。夾峪的木匠舖有兩三家，我要求用結實的木頭來做，用好膠來黏。木匠用的木頭是榆木，膠是魚膠，均是特上材料。魚膠的黏度很強，木匠用這種膠黏木頭，當場摔給我看，木頭打破了，膠黏的地方沒有破。魚膠說是「進口」的，即是從產魚的地方，如天津這些地方買來的，它是用魚鰾熬成的。做一個我設計的這種書箱子，要用相當於現在的幾百元。這筆錢不少，從哪裏來呢？我就找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志，說了做箱子的作用。我說現在把書裝好，現在不用，疏散時關起箱來立刻就可以抬走，好運輸。延安撤退時埋在地下沒有問題，因為乾燥，但以後疏散的地方潮濕，就不行，書會腐爛。楊尚昆很好說話，人和藹，他批准了。

我動員兩三個青年來裝書，統統裝好。一個立方體的箱子，在它的每一面都寫上相同的序號，蓋子上也寫上序號。記得是七八十箱。

這批箱子果然起了作用。十月到十一月，有一次說傅作義要來偷襲西柏坡，上邊通知，各個單位準備行軍，如果傅作義來，我們還是走。東柏坡破窰洞多得很，當天晚上，因為宣傳部的人

不多，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號召西柏坡的所有幹部，包括老百姓都來幫助搬書箱。真是壯觀，排成兩排，兩個人面對面，好幾十對，兩個人抬着傳送。傳了兩個鐘頭，半夜十二點左右，全部傳到了幾個破窰洞裏，外邊做了一些僞裝。

我這個人，沒有學問，但是幹這些事還用腦筋。後來這些裝在箱子裏的書運到了北京。現在不知下落。

在西柏坡小新華社

一九四八年十一或者十二月，我揹着行李，繞過山頭，由東柏坡到了西柏坡的小新華社。

新華社是很大的，西柏坡就那麼大一塊地方，所以只允許一個小編輯部存在。小新華社佔一個院子，胡喬木直接抓（領導），後來聽說是社長，但我沒有見到宣佈過。小新華社有軍事組、文教組、政法組、經濟組等。另外有個名義上的評論組，實際不評論，胡喬木宣佈他自兼組長。評論組有范長江、石西民、廖蓋隆、王宗一和我。我們坐在那裏，幹甚麼也不知道。現在回頭來看，是胡喬木要把我們這一大批人集中起來培訓一下，他是在辦訓練班。新華社的工作，稿件固然重要，但是他也把訓練擺在很重要的地位。

一直到三月下旬進北京前，這幾個月，我受胡喬木的培訓得益是很大的。他在文字上的要求非常嚴格。從邏輯、語法、修辭方面全面要求。他本人的文章並不一定那麼生動，

不如陳伯達，但他要求文章講究邏輯、語法、修辭、語境等等。這些名詞都是我現在想出來的，就有點僵化了，他講得還要生動。後來「文革」快結束時，鄧小平不是也找他出來編毛選嗎？毛答應了。毛說胡喬木就喜歡改人家的文章，他的文章胡也要改。毛主席的東西是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寫的，那時許多文字語法都不講究，毛病多得很。

西柏坡有電燈。我們大概在晚上七點上班，十二點下班。辦公都在晚上，跟報紙一樣。相當多的時候，有幾輛摩托車等着送稿件。一般分幾批送，送去在外村的電台發報。只要一發稿，全世界就收到了。快十一點稿件發完後，胡喬木經常要召開一個沒有名字的會議，即胡喬木的「爐邊閒話」。所有的人集中在中間一個比較大的房子裏，房間可以坐二三十人，由他來講。他主要講在稿件中發現的邏輯、語法、修辭問題。這些問題經他一談，覺得文章「一無是處」。這裏的「一無是處」，不是貶義。因為他說得有道理，大家都非常喜歡聽。像范長江這樣的名記者說，我的文章全不通呀！范當然是客氣，但也感到自己過去的文章有些問題。那時沒有錄音，失傳了，真是太可惜了。

胡喬木講的表面上都是小問題，比如，說蔣介石回南京後的政府是僞國民政府。他說，它是真國民政府呀，因為國民政府只有它一個。僞國民政府是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就是國民黨政府，僞國民政府就是汪僞國民政府，是兩個概念。北洋軍閥就是北洋軍閥，你不能說它是僞北洋軍閥，難道另外有個真北洋軍閥嗎？這一聽，覺得很有道理。他說，你把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稱為僞國民政府，那汪精衛的政府不是應該叫「僞僞國民政府」了嗎？說得大家笑，覺得道理很對。

我還記得他舉的一個詞。我們報紙常常用「哭聲震天」來形容蔣介石統治區人民怎麼苦。他說，這個詞要看具體的情況，上萬人哭，用這個詞還可以，但幾個人、幾十個人在哭，覺得離開事實太遠，你自己都不會相信。

胡喬木的講評，沒有一個人不佩服，沒有哪一個有怨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文章有問題，不通的地方太多了。因為我們平時的文字太隨便了，經不起推敲。

這種訓練，對一個人非常有益，而且終身受益。在這類技術問題上，胡喬木比別人高明多倍。用他的一套來分析，凡是沒有經過他改的文章，技術錯誤確實都很多。但是經過他修改的文章，有時也會發生另外一個問題：語法、修辭、邏輯等全沒問題了，也可能把個人的風格改掉了。胡本人的文章就並不漂亮，「第一枝筆」不等於文章大家。「第一枝筆」當然是大褒義，但仔細想一想，其實也同時是貶義，即不管怎麼說，都能勉強把事情說得「圓滿」，以錯為正，畫白為黑。他就對李慎之說過，他寫的「三個世界」的大文，全是「胡說八道」。

總的說來，胡喬木的這個「訓練班」辦得很好，在動筆寫東西時，不要隨便亂寫。用這個標準來看，現在的報紙，從標題到文章，許多東西，都是胡說八道。

我一生是愚魯的，如果說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一些教育，還是離不開陳伯達、胡喬木兩個人。儘管陳伯達判了他十八年徒刑，但是在我年輕時，他還是老師，實際上得到了他很大的幫助。胡喬木的教育更加直接，因此，他就是我的師長，不能因為今天我對他晚期有一些意見，就說他不好。中國人尊師重道，我這個習氣改不了。

第三編



第十二章 進北京，下廣州。在廣州只是一個「官」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九五四年三月）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準備南下

我本人是宣傳部的編制，但胡喬木叫我跟新華社進北京。進北京是三月二十五或二十六號晚上九點過，坐着卡車上的香山。毛主席他們是頭天到的，也住香山。當時黨中央在香山，組織部、統戰部等在城裏。毛主席住香山，新華社一定在他旁邊。中宣部本部也在香山。毛的槍桿子均在千里之外，筆桿子只能在身邊。

在北京香山住的兩三個月，相當苦，比延安苦得多。因為剛進北京，糧食不夠，要從東北調高粱米來。在北京甚麼也沒有吃過，北京小吃，水果都沒有吃過，一分錢沒有。像我們這樣下層的工作人員，也不參加其他社會活動。至於工作，我不忙，大家都不忙。有一天我去了一次頤和園，二十幾個人坐卡車去的。當時頤和園沒有開，裏邊是空的，沒有遊人，遇到謝覺哉夫婦。

在香山時，已經知道要南下了。這時，我請蘇聯醫生米大夫給我看關節炎。他是給中央看病的，香山的人比西柏坡少得多，所以我能找他看病，當時有翻譯。在小新華社時，我的關節炎嚴重了，要拄棍子。米大夫說，關節炎是世界性的毛病，很難治。有一種治療方法，在海邊用熱沙敷。沿海有些地方解放了，有這個條件的話，你可以去治療。

我找到當時中央辦公室主任楊尚昆。那個時候見楊尚昆不難。我說青島解放了，交通也通了，我到青島去治療一段時間，不然南下也不方便。楊尚昆知道我要南下，因為上面對各個幹部的調配，是要開會討論的。他同意了。

當時康生在山東濟南，他跟我們幾個青年人的關係不錯，跟于光遠更談得來。我六月底去青島，經過濟南市去看望康生，很順利到了青島。在海邊用熱沙埋腿，沒有甚麼大效果。有一天，接到電報，叫我回北京。

我回北京，不回香山了，中宣部在西四大院胡同有個城裏的辦事處，正籌備成立宣傳部。我到中宣部去，他們說，考慮到你的關節炎嚴重，已經決定你南下，到廣東。你去找中央組織部報到，他們會告訴你一切。

我到中組部報到，一個副部長接見，說，上面決定你南下，行不行？我說，南下是我的要求。他說，現在就是派你到廣東，職務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你去找第二書記張雲逸，他還在北京。

我說，這職務我不行。我要求的是去做一個縣屬區委書記。這位副部長說，行不行，你的組

織關係已經轉過去了。你去找張雲逸報到。以後幹甚麼，有甚麼要求，只能向他提出。

張雲逸是十個大將之一，是華南分局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是葉劍英。方方是第三書記。

我找到張雲逸。他說，上面決定你做這個工作。整個華南的幹部，全部是從東北調去的。從北京調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你，另一個是張雲天，做華南財經委副主任，兼中國人民銀行華南區銀行的行長。主任是個長征幹部。這次幹部的配備，中央要東北負責全套。北京去個別人。他說，你一個人怎麼走？你最好跟張雲天一路。張雲天可能還帶幾個專家去。張雲天當時任北京市人民銀行行長。

我很高興，我在延安時曾跟張雲天住一個窰洞。我說，我跟張雲天太熟悉了。過了幾天，我到西交民巷去見張雲天。他說，我去，我要帶幾個銀行專家，我也不懂呀，你我都是搞政治的。

葉帥、方方談話，改任《南方日報》總編輯。領導看來很滿意

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初，最熱的時候，我跟着張雲天的小隊伍走。除了他，還有四五個人。我們的目的地是江西贛州。當時只有這樣走，坐火車先到上海，由上海坐火車到杭州，再走浙贛鐵路，到江西南昌，最後坐汽車到贛州。這一帶都解放了。經過上海、杭州，熱死人。

上海是五月底解放的。到上海，住在外灘中國銀行十四樓臨時招待所，睡在地板草席上。

往來的人，都住在那裏，每天發一點錢，可以在路邊買麵、買包子吃。我們等了兩三天，坐火車到了杭州。我們住的旅館是三層樓的木建築，面對西湖。住了幾天，我問，西湖在哪裏？他們說這就是西湖呀！我說，這算甚麼西湖！西湖邊上有洗衣服的，洗碗的，亂七八糟的，把西湖破壞了。當時的情況很不好，很亂很髒。住在西湖邊，還問西湖在哪裏，可見在敵僞和國民黨統治的十幾年，西湖已經破爛不堪了。

在杭州坐火車，直通南昌。不知道甚麼原因，大概是沒有客車，我們坐的是悶罐車。七月份，從杭州到南昌，苦呀，這個悶罐車又熱，蚊子又多，真是難過。

浙江西部，還有江西一些地方的莊稼、樹林，是比北方好一點，但是，群衆穿的衣服非常破爛。這麼富的省，衣服還是那麼破爛呵。浙江、江西田裏，婦女很多，穿的是黑衣服，破破爛爛的。當時感覺到南方好、生活高的還是城市，到了農村，農民還是非常苦，苦得不行。在浙江看見農村男人的服裝還是三十年前阿Q時代的服裝，一點未變。

到南昌坐汽車。當時是私營汽車，沒有汽油，是木炭汽車。汽車背後背一個大鐵罐。我們從南昌坐這種汽車到了贛州。

到贛州後，大概有兩三個星期住在贛州周圍的鄉村。當時正值暑期，小學、中學、師範，都住滿了南下的人。葉帥、方方他們也住在村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也是在贛州農村知道的。

一天晚飯後，葉帥、方方派人來叫我去。他們很和氣，問我，中央派你來做甚麼工作，你知道吧？

在這樣的環境，他們這樣問，我知道有可能情況有改變。我說，我是一個普通的南下幹部，一切是到這裏來聽分配的。我說，我多年來要求做個區委書記，我參加過幾年的農村調查、土改，我願意做區委書記。我知道，縣委書記的目標太大，區委書記的目標小，但甚麼事情，實際上是區委書記作決定。一般開會，是縣委書記主持會議，區委書記夾在當中，看起來不重要，我所了解到的，縣委並不能真正指揮到各個鄉，區委書記實際在指揮工作，好鍛煉人。

他們說，上面叫你來，不是叫你做這個工作的，是叫你做宣傳部副部長的。但是現在跟你商量，準備把你的工作改動一下。

我說，我就是一個南下幹部，一切聽分配。

葉帥畢竟是第一書記，不大出面講。方方說，華南老幹部多得很，你知道一進城，報紙的宣傳工作很難抓。現在找抓報紙的人，比宣傳部長重要。你是知道的，毛主席近兩年有規定，一個省委的報紙，大樣要給第一書記看，要第一書記簽字後才能付印。

毛主席為甚麼作這樣的決定？原因是土地改革時，有些報紙搞極左號召出了比較大的問題，毛便做了這樣狠的規定。這個規定非常嚴格，但第一書記半夜三更起來簽字，實際上辦不到。任何第一書記都不可能執行。

他們非常客氣，說，你去，我們比較放心，你是老延安，延安這一套你清楚。他們都是香港回來的，雖然都是老同志，他們不習慣照根據地辦法辦。你去，你簽字就行了，不用送來再簽字。你知道的，要第一書記簽字，我們半夜看了，白天怎麼工作？因此，我們的意見是你到《南

方日報》當總編輯。原定總編輯劉思慕，中央決定要調他到上海去，我們找不出更合適的人。現在要你去。

劉思慕是一九二幾年入黨的老幹部，跟廖承志是同學。早在我南下前，《南方日報》的幹部配備電報，胡喬木已經給我看過了。哪個是社長，哪個是總編輯，我都知道。

我說，我當然服從分配。內心也是如此的。

名義上，《南方日報》的總編輯，比原來確定的宣傳部副部長，「官位」大概要差一些。我答應得如此順利，兩個老前輩當然高興。

在贛州住下後，文教幹部、財經幹部、組織幹部等分開走，坐着租來的木炭車向廣東進發。張雲天是跟財經系統的在一起，我跟新華社及做報紙的人在一起。張雲天坐的卡車比我們的先開一個多小時，大概在贛州之南不遠的南城縣，經過一個群山時，路不好，他們的車翻了，車子裏的人基本上都死了。帶着我走的張雲天，自己犧牲了。和平進軍時，犧牲的人還是比較多。當時我很難受，非常難受，但是，沒有辦法，我們的車子還是在繼續開，因為要接管廣州。

代表葉劍英簽報紙大樣

廣州解放三四天後，我們才進去。我們坐的是卡車，比大部隊快。大部隊是走路，我們進去時大部隊還沒有進廣州。國民黨撤退時，把珠江大橋炸毀了，其他的破壞不太大。我們兩三個連從北

面插進，沒有打甚麼仗。南下幹部住在幾家旅館。我們住在其中一家。事先地下黨把一些大酒店都租下來，全部住南下來的幹部。但吃飯要到街邊小攤吃，廣東小攤的東西比甚麼地方的都好吃。

這個時候，廣州流氓地痞特別多，還有「大天二」（土匪）。解放軍進廣東前兩三天，城裏空的，大天二到處接管，竟然敢去接管中山大學。後來成立軍管會，開招待會，把這些人請來，全部抓了。

進廣州幾天後，香港《華商報》的大批幹部才回來。香港《華商報》是我們辦的報，《南方日報》就是依靠香港《華商報》的班子來辦。當時社長叫饒彰風，是個老同志，掛名社長；副社長叫楊奇，比我年輕幾歲，帶了百把個人，不光編輯，連印刷工人都帶回來了。停辦《華商報》的決定不知是誰做的，是個很錯誤的決定。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對共產黨的輿論機關卡得很緊，減少一個後，絕對不讓你再辦。所以，我們自己把這個影響最大的宣傳陣地無條件放棄了。《華商報》分一些人到《南方日報》是可以的，還可以調一些人去香港，這樣就可以把影響巨大的《華商報》在香港留下來。

我任總編輯，但我不懂行，報館這一行，全不懂。我能起甚麼作用？看看版面，看看一些文章，一些消息，任何作用也不能起。楊奇是個非常好的久經鍛煉的老同志，打游擊出身的，能幹得不得了，一個人管很多事情。首先接管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當時這個報紙只有排字工人，編輯部的人都走光了。開始一兩個晚上，我只看看報上的東西，簽字付印。

香港回來的同志弄不清楚解放區這一套，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去的好處是少麻煩上級，承擔

一些事情。舉個例子吧。

《南方日報》創刊不多天，香港來了一個參觀團，是左派人士組織的，叫「香港僑胞回國參觀團」。我一看，嚇了一跳。把香港人叫僑胞，把香港人回到大陸，叫回國。香港不是中國的地方嗎？怎麼成了「僑胞」呢？怎麼能叫「回國」呢？我說，只能寫「香港同胞回穗參觀團」。因為這些活動都是我們統戰部組織的，我說要跟統戰部打電話，明天我們的報紙不能用這個名稱，徵求他們的意見，請求他們改名稱。當時廣州還有其他一些報紙沒有停，就是態度還比較好的，一些民主人士掌握的。我說，要緊急通知這些報紙，還有新華社、廣播電台。所有這些，要在半小時內辦妥。我說絕對不會錯，我負全責，中央不會責備的。像這種問題，我體會得出中央素來的態度。

我去，一個好處就是能處理這類小問題。我再舉個例子。

十一二月，財經困難，上面決定臘月不發雙薪。當時，按照歷史上多年慣例，要過年了，臘月是要發雙薪的，全國大體如此。我說，明天這消息登出去，那不鬧起來嗎？

這樣的事，我們這些「老油子」就知道，事先要有輿論準備，他們財經機關不管鬧不鬧事，就一個通知了事。我立刻寫社論：〈同甘共苦，渡過艱難〉。我們做宣傳的人，就是幹這種事的。有時錦上添花，有時雪中送炭。可現在的媒體只做前者，不做後者了。我的好處，臨時可以決定，臨時可以寫。同是南下的原延安《解放日報》的同志有些猶豫。我說不要請示了，這樣只登消息，是要鬧翻（出事）的。我說了一大堆道理，就是上述的社論。過了若干天後，我去參加

分局的擴大會議，列席會議的有些同志說，我們就是根據你們的社論去做解釋工作的。不然的話，突然來一個通知，真是不好辦呀。

我們做文字工作的人，任務就是補這些漏洞。另外，我對此也有把握，不會錯，我自己就可以負責。

但是，不到兩個月，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上面似乎又在強調，報紙大樣要第一書記簽字。這個怎麼能辦得到呢？葉帥就把簽字權委託給華南分局常委、十五兵團政治部主任、掛名宣傳部長蕭向榮。蕭向榮只是掛名，宣傳部在哪裏他也不知道哩。蕭向榮很有名，是長征時的年輕幹部。蕭向榮會半夜三更起來簽字嗎？於是，又要個花樣，把我調到他的政治部，因為《南方日報》離兵團政治部很遠。我住在那裏，上賓招待，半夜後代表他簽字，《南方日報》換個總編輯上班。這樣轉了幾個彎，我代表蕭向榮簽字，蕭向榮又代表葉帥、方方簽字，完全是形式。這樣搞了一個多月，上面突然宣佈，我是華南分局宣傳部的副部長，兼《南方日報》的社長。這樣，我又回到《南方日報》，簽字的任務就正式交給我了。其實按毛主席的規定，我根本不夠格。我估計，全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實行上面的這個規定，自然各有對策。

一九五二年後，大概五六月，到一九五三年的六月，有十來個月的時間，我離開報館，到宣傳部去當「坐堂醫生」，原來的坐堂副部長，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李凡夫，調工作了，掛名部長蕭向榮一九五零年就到北京了，所以就沒有部長。我的前一任「坐堂醫生」調到哪裏去了，當時不清楚。「文革」時聽說在安徽，做省委文教書記，被鬥得很厲害。

這時，陶鑄調的李心清來了，李是我馬列學院的老同學，他正式任宣傳部長，但是李心清跟陶鑄他們住在廣東的東山，距我們比較遠，相距十來里路，李心清不來上班，他在那邊參與機要。當時，葉帥、方方已經調走，新的三個核心人物是陶鑄、趙紫陽、李心清。李心清抓大學教授的思想改造。我的天老爺，這件事，夠要命的了，廣東那麼多大學，一個個教授要過關，忙死人。別的事，他就不大管了。李心清後來自殺了。

我在廣東待了四整年，幹了些甚麼呢？甚麼也沒有幹，成了華南的一個典型的文化官僚。甚麼文化官僚的名字，都放在我的身上。我兼了一些甚麼工作呢？華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長，但我沒有去過。一九五三年以後，我還兼廣東教育廳廳長，正式的，報紙上都登了，是陶鑄定的。教育廳我去過。還兼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等等，會長都是領導人，葉帥、方方掛名，他們哪裏管這些。我這個副會長也不管甚麼，這些會址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那裏有個總幹事就完全夠了，只是開招待會之類要我出席。

所以我在那裏成了宣傳界一個典型的官僚。關鍵是葉帥他們相信老解放區的延安幹部，認為是最可靠的，認為延安幹部是最忠實於黨中央、最忠實於毛主席的。

陶鑄要用我，但不得不讓我去治療關節炎

我的關節炎在這兩年發展很快，一個是忙，雜七雜八的事，第二個是營養不良。廣州幾年，

吃飯也不正規。

一九五三年六月後，陶鑄命我正式兼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秦牧的事，就是發生在這時。當時，秦牧在教育廳資料室做主任，我不知道。所以，過了若干年，大概上世紀八十代初，在北京知道後就當面道歉。我說我不知道你在那兒，如果我知道，我當然會立刻去拜訪你，向上面提出調動你的工作。當時都是當官嘛，無非調到文聯當個副主席吧，主席還是南下的老幹部來當。可見當時當地華南的老幹部的發言權比較小，像秦牧在全國這麼著名的散文家，他們都沒有考慮到，太不應該了。

在教育廳坐了三四個月的班，了解了情況，正準備下到各地去看看中等教學的情況，人走不動了，關節炎嚴重了。陶鑄看見說，這樣不行，要治療治療。陶鑄人能幹，甚麼事他都能決定，找人來代替我。

陶鑄要我去治療，還講了他的關節炎治療的事。他說遼寧省鞍山附近有個湯崗子溫泉，很有名，他的關節炎也在那裏治療過。他說在東北時，他的關節也不行了，到湯崗子治療後，兩三個月就好了。湯崗子，不僅有溫泉治療，還有理療。我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到湯崗子療養院，到一九五四年三月。類風濕關節炎很難治，最後是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治得大見效的。

在湯崗子治療中，北京幾次來人，叫我到人民出版社，說胡喬木已經跟陶鑄講好了，不要回廣州了，而且不准我回廣東拿行李，怕我想留在廣東。其實我並不想留廣東，因為回去幾乎純粹是做官，我不大習慣。

在華南幾年的經歷，我文教工作基本不談，報館工作也基本不談，那些日常工作，多談沒有意思。我真正做的工作，是在文字之外。

我這一生，應該是搞人事工作，搞組織工作的。宣傳工作需要學問，我沒有。特別是我自己挨了整，無緣無故被打成特務以後，知道隨便給別人一個帽子，是很大的事。審查人的工作我願意做，我生來就願意對人負責。我記得很清楚，進城初期，在北京西單豐盛胡同開過一個中央機關的幹部大會，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作了一個報告。安子文是一九二幾年的老黨員。他的報告講得很好。他說，將來你們分到各地去，都要做一定職位的領導，一定要接受延安「搶救」運動的教訓。事先要反覆講清楚。所有的人，歷史上有甚麼問題，只要自己講清楚，只要是自己報告了的，將來都可以從輕處理，甚至可以不處分了。但是，如果是查出來的，責任就重大了。你們將來不能隨便懷疑人。我很接受這個報告的精神。接管後，千萬不要亂整人。

第十三章 在廣州勉強做了四五樣事

半夜給「二零三」打電話：明天要殺一百多人，有些人罪狀不明確，怎麼辦

一九五一年，全國鬧了一年把的大鎮反運動，即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鎮壓的人不是三個五個，是一批，跟大煉鋼鐵一樣，各省每天要報告。全國所有的地方都要搞，叫做「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公開的，報紙幾版登，地球上恐會只有這麼一次。

廣州解放晚，比上海晚半年多，這個運動一直沒有大搞。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我那時在《南方日報》，一天晚上九點過，報紙開版面編前會，突然，政法組一下拿出個東西，嚇死人，說明天要公開槍斃一百四十多個人，罪狀剛拿來。這些人的罪狀大多空空洞洞，所有的人都驚呆了，怎麼辦？我說，毛主席說要大張旗鼓，就是要宣傳呀，宣傳為甚麼一定要殺這些人，其他省市都這樣做，報紙幾版幾版地登罪狀，鋪天蓋地，登幾十天；還要開群衆大會，還要控訴，一大堆事。我說，我沒有聽說過明天要殺人，我們才拿到消息，現在連個社論都來不及起草了，群衆

看到就是空空洞洞的罪名。這些空洞的罪狀，民主人士早就批評過我們，而且當面批評說，你們殺人，說一貫反動。甚麼叫一貫反動？是甚麼罪狀？要說清楚。我說這樣登出來，我們報紙就失職了。廣州靠近香港，剛解放，突然一天殺一百多人，歷史上沒有過，海外接受得了嗎？香港群衆接受得了嗎？

大家也覺得這樣登出來，整個廣州，廣東，就連香港，都要震動。因為沒有任何解釋，罪名抽象，突然殺一百多人，誰能不驚？但當時的態度就是一人定局：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大家都吃驚得很，苦得很。已經晚上十點多了，明天早上要出報。

當時有我、楊奇（副社長）、總編輯、採訪部主任、政法組的組長成幼殊等。採訪部主任是延安《解放日報》來的。曾艾荻，他也很堅持。這怎麼行啊，我們報紙見着人如何說啊？我們認為這樣登出去，對黨不利，對報紙而言，上邊也會說，你們就只是這個罪狀呀，沒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其他的採訪資料，其他的配合開會控訴等等，全國都不是這樣做的。總之，說來說去，我們覺得這樣登出去，實在不行，對政府、對共產黨的威信影響大，損失太大。我們報紙對讀者交不了賬。

副社長楊奇十幾歲就在東江游擊隊，打了幾年的仗。他對着我說，現在只有一條路，靠你打電話了。

當時有個規定，報館的最高負責人有實在解決不了的大問題，可以在晚上，甚至後半夜打電

話給第一書記。但是，話雖這樣講，誰敢執行這一條？我當然也不敢。第一書記是葉帥，跟一般的省委書記不一樣，聲望、地位高得多，半夜三更，打電話給葉帥，你自己稱稱自己的份量，碰釘子怎麼辦？

但報紙明天見報，弄錯了，是收不回來的呀。明天不出報，他照樣槍斃人，這樣更不行，我負不起這個責任。這件事情，推不掉。七八個人，十一點左右夜餐來了大家都吃不下，拖到十一點半，楊奇第二次提出來讓我打電話。楊奇辦報紙有經驗。他說，唯一的辦法，打電話給「二零三」才行。二零三是葉帥的代號。當時剛解放，都叫二零三。

我說，如果×××部門要我們登的這個罪狀是葉帥看過的，怎麼辦？這個釘子就碰大了，碰得起嗎？

大家分析，我也分析，看樣子，葉帥沒有看過。葉帥何等周密認真謹慎，大概沒有看過。大概十一點半，我硬着頭皮，只有打電話一條路了。電話當然是秘書接的。我簡單說，我是誰，明天要槍斃一百多人，這個事情很大，我要把這個事簡單向二零三報告一下。這個事很重要，因為列出來的罪名太一般化了。

十多分鐘，葉帥就來了。葉帥的聲音很響，說，這是毛主席決定的，你還有意見嗎？我嚇得不得了。我說，明天槍斃一百多人，我們剛拿着一張罪狀，其中一些人的罪狀不清楚，很抽象。罪犯包括解放前的教育廳長，是從香港回來的。

他又問我，是明天嗎？還有哪些人？我又給他說了幾個，比方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革命時，

殺蘇聯總領事的，好像還有殺蕭楚女的，他很吃驚，說，還有這樣一些人呀！我說，毛主席說要大張旗鼓，我們明天連社論都來不及發，更沒有甚麼資料。

葉帥想了一下，說，你等着，等着我的電話。

大家放下了一點心。葉帥也不知道此事呀！

大約半個小時後，秘書電話來了，通知我到東山小島去開會。東山小島是葉帥住的地方。後半夜，臨時緊急通知開會，有葉帥、古大存（解放後，古大存任中共華南分局常委、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是副省長，主持日常事務。還有宣傳部副部長李凡夫；當然，此事的主角是專管此事的黨內和政府內合二為一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這人後來調到北京來當某某院的副總長。後來這個人差點要了我的命。

這個會很重要，在葉帥樓下一個辦公室開的。×××氣得大怒，他帶的一個處長××，嗵嗵，把幾麻袋資料扔在地上。這在葉帥面前，太不禮貌。葉帥講，聽說你們明天要槍斃一百多人？「聽說」這兩個字，刺激了×××。×××說，這不是分局決定的嗎？葉帥說，分局決定是說，中央大鎮反的這個決定我們要執行，這個指示是討論過，可是明天你們這個行動……。

葉帥還沒有說完，×××知道出了問題，立刻打斷了葉帥的話。說，我們現在有關部門全部漏夜辦公。他強調明天這樣大的行動，要用多少卡車，沿途的警戒，刑場的警戒，處理後事要多少人等等，多少人漏夜辦公，都在等着。

這些話講完後，葉帥說，報館講講吧。

老前輩講話，一些名詞都是老的，把我們叫「報館」。

我說，毛主席的大鎮反運動，我們都是擁護的，不敢反對，也不會反對。但是，大鎮反跟宣傳分不開，叫「大張旗鼓」，新解放區的行動，不宣傳這些人的罪行，他們就不能接受。這樣的事，中國歷史上沒有搞過。我舉出了其中有前教育廳長。我說，據我聽知，他是公開從香港回來的，不是偷偷回來做情報工作的。這樣捉起來就殺，是不是好？

×××反駁我說，他這樣反動，參加反動黨政軍彙報，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當時我是不知道。後來才知道。他作為教育廳長，必須要參加。在解放前一年把，國民黨有個黨政軍彙報，是專門鎮壓進步的學生運動的。大城市都有，國民黨黨部特務方面、政府方面、軍隊方面出席。政府就包括教育廳長參加。

我說，毛主席的方針，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宣傳他們的罪惡，要發動全民來聲討，大學發動大學生，工會發動工人，青年團發動年輕人，婦聯發動婦女，街道也要發動居民，都要全民來討論、聲討，全國都是這樣做，報紙不是一天，而是一兩個月幾版報道。我說，這裏邊有殺害蘇聯駐廣州總領事的人，還有那些殺害我們重要負責人的人，這些材料都沒有掌握，明天一件材料也沒有，而罪狀裏邊寫得含含糊糊。作為罪狀，鬧不清楚，老百姓更鬧不清楚。

×××很生氣，指着幾袋材料對我說，你看吧，材料都在這裏！這樣，好像變成了我跟他爭論似的。我怎敢爭論呢，你這麼老資格，中央蘇區出來的，你還拿着刀，我敢爭論嗎？但是，葉帥既然後半夜召集會議，我就知道葉帥已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然不會開會。

葉帥叫×××不要那麼激動。但×××仍怒氣沖天地說，我們這個事，是毛主席抓的，是中央抓的，要大鎮反，廣東已經慢了，受了上級的批評。

葉帥發言，把我講的例子也講了一些，說這些人，是應該在報上宣傳，不然，殺他的理由，老百姓不知道。還有，像「一貫反動」、「民憤很大」這樣的罪狀不能成立。葉帥在國統區工作那麼多年，知道民主人士對我們「一貫反動」、「民憤很大」這些「罪名」素來就有意見。

×××沒有退讓，說，我們今天晚上全部在漏夜辦公，甚麼都準備好了，明天不動，這個事不好辦。而且這個事，分局討論過，分局知道。

這下把葉帥惹火了。葉帥說，要不是報館給我報告，我也要明天看了報才知道。我們開會，是一般地談過的，但是明天這樣的行動，我不知道。是報館給我報告後，覺得你們這樣做法有點問題，才開會的。

葉帥不得不點題了，最後不得不說：×××同志，我們要記住中央蘇區的教訓呀，刀把子究竟掌握在黨委的手裏，還是掌握在你們保衛部門的手裏，中央蘇區血的教訓還不夠嗎？這等於葉帥跟他攤牌了：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葉帥用的全是老名詞：保衛部門、刀把子。看來葉帥有點不耐煩了。

×××是老資格，他不怕。但葉帥說了這些話後，×××才沒有辦法，知道葉帥已下決心了，站起來說，打電話，明天停止執行。

古老（古大存）說，好啊。好啊。

×××去打電話，通知明天停止執行。他通知有關方面說，大家不要走，等他回去再說。電話就在會議室旁邊，都聽得見。

×××打了電話後，我不得已地說，我也要打個電話，報館那麼多人全等着呢。我給楊奇打電話，說，楊奇同志，明天不執行了，你另發稿吧。

這次是葉帥做主，沒有葉帥做主，我怎麼得了?!

這樣，就商量怎麼辦。古老、李凡夫，都插言了。這種會議絕對沒有記錄的，是秘密會議。最後決定，這些人的罪狀，還得重新研究，罪名還得重新落實。一些人，這次不應該殺的，就不殺了。

×××怎麼解釋呢?用現在的說法是他們沒有秀才，沒有筆桿子。一句話，沒有整理材料的人!天老爺，你們那裏沒有會整理材料的人，你們就可以罪狀不明地殺一百多人嗎?

李凡夫說，你們沒有筆桿子，怎麼不找我們呢?我以宣傳部的名義，找一百人、兩百人都找得出來。南下那麼多，那麼多大學地下黨的，找一點人還辦不到嗎?

這樣談了後，葉帥最後說，既然這件事是報館反映的，就由報館出人吧。

這個會就搞到晚上兩三點。回到報館，我把經過講了。我講要我們報館組織一個組到有關部門幫助他們整理材料，其實是覆核材料。我說，會上建議，由楊奇同志帶人去。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楊奇帶了政法組的組長成幼殊等人去了。

第二天，李凡夫召集全市有關方面的幹部開會，發動、準備控訴會。尤其是青委在幾個大學

要開大會。這一套是必須有的，要不然，糊裏糊塗殺一百多，像甚麼話！

第三天，我就動身到北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去了。解放後叫第一次宣傳會議，跟組織工作會議同時開。我帶隊，規模很大，廣東幾個地委，幾個市委，還有海南島的二三十個人。我早跟方方講，應該是李凡夫去，方說，留下主持工作更重要。

這次宣傳會議開得一塌糊塗，由胡喬木主持，開了兩個星期。許多廣東地下黨的同志第一次出廣東，想轉一轉。上海市委宣傳部就發出邀請，在上海住幾天，經過杭州，拐個彎回廣州。這樣一來，三四個星期個把月就去掉了。

回廣州當天晚上，想找楊奇和成幼殊問情況，但是，他們還在監獄裏工作。這時，我才知道，他們整理材料是在監獄裏。他們回來後，我問了問情況。我說，你們也坐了監呀！他們在監獄裏整理，我很吃驚。他們說，不是在監獄裏，是在監獄的辦公室裏。當時沒有甚麼法律，這是法院的事情，但根本沒有法院參與。

又過了個把月。有些上海調查，有些北京調查，準備了幾個版的材料，開了一些會，大學、青年團、婦聯、工會等統統動員起來，各階層都準備好了後，執行。毛主席要求的就是大張旗鼓，全民動員呀！我們有此點理由，才敢說話。

成幼殊現在在北京。這幾年為這個事，我跟她談過幾次。我問她，提出疑問的多不多呀？她說，不太多，變化並不大。我又問她，教育廳長究竟槍斃了沒有？她的印象是槍斃了。她說教育廳長站在卡車裏，尿褲子。現在看來，既然是從香港回來的，就是特務頭子，我們也不能槍斃。

就是戴笠公開回來，也不能槍斃。他是公開回來的。成幼殊告訴我，變化並不大，減少了兩三個人。他們就是把罪狀寫得具體、清楚一些。從頭調查根本辦不到了。現在楊奇還在廣州，成幼殊在北京，我敢造謠嗎？

這件事對我來講，看起來當時是有點膽大包天。當時我是拼了，看怎麼處理吧，總之我不能也無權照這樣簽字付印。一切都決定於葉帥的當機立斷，能夠在聽了我的簡單報告後立即召集會議。這件事，我這一生非常感激葉帥。關鍵是葉帥最後講的話重要：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黨委手裏，還是掌握在你們保衛部門手裏。當時叫「保衛」，現在還有些地方還叫「保衛」。但現在的保衛跟過去的不太一樣，甚麼偷呀，都歸它管，它過去是管捉（抓）人、殺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時候，×××公開出面，差一點把我捉起來，比這個緊張多了，簡單就是小說。

僑鄉調查：這麼多樓房是僑匯建起的，不應該侵犯它們

一九五一年初夏，還不太熱的時候，我隨同趙紫陽去作了一次僑鄉調查。葉帥、方方兩個人知道我在華北鄉下待過幾年。葉帥知道，我跟着張聞天，跟着康生下鄉幾年。這時，趙紫陽已經從河南調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當秘書長。為甚麼要調他呢？上面要加強土地改革，他是老根據地出來的，搞過土地改革。

華南分局組織到梁啓超的家鄉新會等縣去調查，主要是看看僑屬多的地方土改怎麼辦。這個

縣華僑多，很富裕。我們一共十來個人，趙紫陽領隊。我當時的身份是宣傳部副部長，就叫副領隊。在新會調查甚麼？唯一的任務是調查僑屬財產，主要是房產。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一般都知道，僑屬是靠海外勞動匯錢回來生活的。中國的人傳統，匯錢回來買土地，修房子，建祠堂，絕大多數是先修房子。僑鄉的房子是假西式，基本上是兩三層樓，加上一些鋼筋水泥，不土不洋，不中不西。

趙紫陽住在新會縣委，我完全到村裏。根據我的經驗，彙報我是不相信的。我在華北十一年，有三年根本就在農村，而且這個農村還不是一般的，就是在農戶裏，調查過陝、晉、冀、魯四省。所以，農村的事，要騙我，不那麼容易，我是知道點稼穡之艱難的。

在新會農村，我發現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新會的農村基本空了，相當好的房子都空在那裏，財產早就轉移了。但是，留下的老百姓很窮，生活很苦。我們還是吃派飯，吃的是很粗糙的紅米飯。吃甚麼菜呢？基本上沒有菜，有時在碗裏蒸幾塊木瓜當菜。綠蒼蠅就在上面爬，怎麼敢吃，吃了是要生病的呀。調查的結果，這些村莊——廣東人把一個村莊叫一條村——水泥石頭路很寬，有點半西化，樓房很多，這些樓房基本上是華僑的血汗錢拿回來修建的，不是剝削當地貧僱農民的。

結論很清楚，回來報告，肯定這些樓房是僑匯建起的，不是剝削地租，不是高利貸建起來的，因此，就不應該沒收它們。這個調查是葉劍英、方方主持的，這時陶鑄還未調去。

但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的情況完全變了。這個方面，我就對陶鑄有點看法了。這

時，葉帥走了，方方受處分，調到北京任僑委副主任，陶鑄以第四書記的身份主持一切，趙紫陽協助他。趙紫陽指揮日常工作更多。上面催得太緊，為了滿足貧僱農，統統動了，統統沒收了，分配了。後來，廣東僑鄉的房產問題，我問了好幾個人，說一直拖着，不知道怎麼辦，要賠吧，又不知道怎麼個賠法。現在，新房子比那些舊房子還漂亮，這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這個事情做得很不對。趙紫陽是能幹，但不能因為趙紫陽改革開放有功，後來吃了那麼大的苦頭，就歌頌他的一切。事情對歸對，錯歸錯。陶鑄我也佩服，他也看重我，但是，他們在土改問題上，在反地方主義上，百分之百錯誤。

反地方主義，就是反本地幹部。廣東這個地方的幹部，沒有甚麼地方主義。廣東人根本上是開放的，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到處找飯吃的。南洋也要去，歐洲也要去，上海也要去，瀋陽也要去，連我們四川小縣也要去。我們縣就有兩種店：北京人開的，廣東人開的。比較大的縣，都有這兩種。北京人的店，叫「京貨店」，賣的東西都是老式的，特點是一般人進去，出不來。甚麼道理呢，太客氣了，茶呀，煙呀，弄得你非買點東西不可。廣東人開的叫「廣貨店」，海產品多，草帽、手杖等，洋氣一點。

反地方主義，連古大存都反進去了。古大存哪裏是本地幹部，他在延安待了那麼多年，任黨校一部主任，是從東北帶領幹部南下的。幾次反地方主義，越來越厲害，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把當地的幹部大多打倒了。一九五八年還在反地方主義，還在反古大存，莫名其妙。甚麼地方主義，廣東連個影子都沒有。從來就是無中生有，完全是胡搞，不知上

面為甚麼要這樣做。

僑鄉土改那樣做，反地方主義那麼厲害，大錯特錯。這兩件事是百分之百的錯誤。陶鑄負主要責任，趙紫陽負次要責任。當然，他們主要也是執行。

雲浮縣土改：改變死命令；小老婆、丫頭等問題我決定妥協處理

一九五二年春天，二月到三月，正式搞土改，雲浮縣成為一個試點縣。我帶一個文教宣傳幹部隊，成員有中山大學的，有文聯的，有各級宣傳部的，還有嶺南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一共似乎有四百多人。其中有畫家關山月，陽太陽，作家杜埃、陳殘雲、韓伯屏等。

雲浮是山區，當時窮得不得了。縣城有幾百家人吧，房子破得很，有一兩家小飯館，很不像樣。現在是富得不得了了，高樓林立，因為產一種大理石，即雲石，外資多得很。當時看見過這些大理石，不當回事，思想不開放，覺得這些石頭在深山裏沒有甚麼大用處。

到了縣裏後，分幾個區把幹部分下去。縣委書記是個南下幹部，姓趙，抗戰期間久經鍛煉的，山東人，已在東北做過縣長，老實得很，非常好。我還留下了華南革大的一個部主任。他好像是冀中人，搞過土改，姓王，名已記不得了。我們三個人，對農村都不生疏，在縣城裏做指揮，一般白天是要到鄉下二三十里地方去。大隊伍幾百人統統分到幾個區，有的還要翻大山。縣長是一個本地幹部，未參與土改。

我們決定把著名國畫大師關山月留在縣裏，要他當縣人民法庭庭長。因為他名聲太大，下去萬一碰到土匪出事，交不了賬，留下來，保護他。

縣裏有一個縣大隊，九十來人也是拼拼湊湊的。縣大隊本身就不可靠，有些是舊警察，有些是臨時編成的，弄不清楚是怎麼組成的。不是我們的老游擊隊，根本不敢相信。我們把縣大隊分成三部份，三分之一在縣城東部一個重要的地方，三分一在另外一個中心，縣裏留三分之一，三十幾個人。縣裏還有個監獄，關有一百多個人。監獄裏邊的人，不知道我們演的是空城計，根本沒有武裝，而且留在縣裏的那三十幾個人，我們還不大掌握得住。但我們也不是很擔心，因為大軍南下後的形勢太壯，壞人一時不敢動。

廣東有種腳踏車，人坐在上面，郊區一二十里、二三十里，他可以送你去。但坐這種腳踏車，嚇死人。一邊是山，一邊是水，騎得又快。有一次過很窄的橋，我說我下來，蹬腳踏車的人說，你不要動。這些蹬腳踏車的人有本事，我沒有聽說有人掉到水裏。我經常下去，乘出租腳踏車來去。

晚上就回到縣裏集中開會。當時窮到甚麼程度呢，飯嘛，給我們三個人留起來，跑了一天，想喝一點酒，每個人湊，這個人湊兩百塊，那個人湊三百塊，就是兩毛三毛錢，買半斤酒。廣東菜好，酒根本不行，酒叫「雙蒸」，一點酒味都沒有。當時生活很苦。我們這個作風，如能保持下來，不說保持全部，能適當地保持，以後的情況都不可能發生。

當時土改的工作方法，上面有規定。這個規定主要是劉少奇和中南局的鄧子恢他們堅持的。鄧老尤其堅持，叫「訪貧問苦，扎根串聯」，即下去後，專門找一家「苦大仇深」的孤老人家慢

慢了解情況，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劉少奇堅持到最後，王光美也講「扎根串聯」。我是根本反對這種方法的。我下去看過多次，冷冷清清。牛角尖鑽了兩個月，甚麼也沒有了解到，這叫莫名其妙。說實話，最高層的領導沒有怎麼接觸過下層，設想的這一套是太主觀了，是過時的。照這一套做，三四個月毫無結果。

我們開了各個區的領導的會。我聽來聽去，都是這個情況，工作沒有甚麼進展。工作隊到了村莊裏，最怕接近群衆，都是找孤苦老太婆，給她做飯、挑水，搞了個把兩個月，沒有結果，而且我們工作隊自己變得偷偷摸摸，出門怕「狗腿子」看見，怕見老百姓了。去訪貧問苦，還得左右看看，有沒有流氓地痞跟踪。我跟縣裏兩個人商量，我說要從根本上推翻這種工作方式，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肯定這個工作方式是錯誤的。我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山西、河北、山東均這麼試過，全不對。如果照這樣做，我們的土地改革要搞好幾年。我說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們進村莊，要大張旗鼓，召集群衆大會，號召五類分子登記——三青團支隊長以上的、國民黨的區黨部書記以上的人等登記，而且公開宣傳，我們土改要進行到底，宣佈紀律，不准破壞，破壞我們就要鎮壓等等。我們膽子要壯起來，自己要站起來，不是我們要偷偷摸摸，而是要嚇倒對立面。政權在我們手裏，軍隊在我們手裏，公安在我們手裏，我們自己怎麼去鑽牛角尖？怕見群衆？

他們幾個幹部同意我的意見。我說開一個幹部大會，至少抽三分一的隊員回來開會，改換思想。全部抽回來，不可能。會上，我就講這一套。工作方法徹底改變，從守勢改為攻勢。我們是

居高臨下，現在不是我們怕甚麼流氓地痞土匪，怕甚麼地主狗腿子，而是要讓他們怕我們。必須做到這點。一個工作隊，或者一個大村莊，要配一個「小公安局長」，讓一個膽大的，高高大大的，身強力壯的人來做。一天到晚專門到曾經當過土匪的，可能是狗腿子的，可能是壞人的家裏鑽來鑽去，主動找他們，叫他們心裏緊張，叫他們出門活動時看看有沒有我們的人跟着。我們不是做地下工作，怎麼非用地下工作的方式不可呢？這樣的「扎根串聯」，是自捆手腳，要串到何年？必須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我們怕他們，而是要他們怕我們。

我當機立斷，公開提出一個小工作隊要有個小公安局長。群衆怕甚麼？怕變天，怕國民黨打回來。我們就公開把這個講清楚，國民黨變不了天，回不來了，全中國都解放了，蔣介石只有一個台灣了，他回不來了。你自己偷偷摸摸，本身就是怕「變天」的樣子，怎麼行呢？我作了一個百多人的報告，斬釘截鐵，不搞冷冷清清，得到了百分之百的熱烈贊成。

搞了一個多月後，發現有幾個社會問題很難解決。

一個是農村裏的「小老婆」問題。有些中農、貧農都有小老婆。怪不怪？廣東經濟相對於窮山區來講發達一些。湖南、江西南部地區天旱的時候，有大量的少女、少婦逃荒到廣東，她們也不想回去了，回去就要餓死。只要餓不死，就留在這裏，做中農或者貧農的小老婆。多少年來就這樣。

還有「丫頭」問題。同樣的，有些中農、貧農家有丫頭。丫頭也是解放前逃荒出來的。這個地方餓不死，總比回去好。

還有群衆性的土匪問題。有些地方，一個村莊多數人當過土匪。這不奇怪。華北、冀中也有這種現象。雲浮這個地方窮，南面全是山，北面靠近西江，就在西江邊上。西江邊上的一些村莊的人集體去搶西江上的大貨船。他們的小船鑽來鑽去，跑到大貨船上，也不弄死人，只要搶到錢、搶到貨就走了。這些村莊裏誰是土匪呀，大多參加過，婦女、小孩也參加過，靠在江邊一帶的窮人都是這樣的。

這一大堆問題，按照規定，小老婆要取消，丫頭要解放，當過土匪的，要自首、懺悔，不然就要問罪。當時的同志都覺得這些問題太多，沒有辦法解決。但共產黨搞土地改革，看見小老婆、丫頭，看見搶過人的，放過呀，說不通。不放過，怎麼解決？

這種情況下，逼得我拿主意。我說小老婆取消的話，早上把她解放了，中午她到哪裏吃飯？難道我們工作隊有能力給她開飯？丫頭也一樣，早上把她解放了，中午就沒有地方吃飯了。至於土匪的問題，既是群衆性的問題，調查完了，可以公開把這個問題攤出來。對那些做得過份的人，要他們檢討一下。只要沒有血債，沒有殺人，就不多追究了。法不責衆，老太婆、小孩子都參加過搬東西，怎麼鬥？誰鬥誰呀！你鬥我，我鬥你麼？

但是，我一個人不能決定。雲浮縣屬於肇慶地委——包拯在肇慶當過知府，當時叫「端州府」。地委書記叫梁嘉，大概是廣州「一二．九」運動出來的大學生，很優秀，能力很強。從行政方面來看，我這個華南分局宣傳部的副部長，職位大概跟他差不多，但是，假如把我放下去的話，絕對不讓我當地委書記，最多讓我在地委當個宣傳部長，掛個地委常委的名。我去地委，當

時很困難，路況很壞，還有土匪，縣城裏好像都沒有電話。肇慶派吉普車來，還派兩個警衛員。一般的槍還不行，要卡賓槍，能乒乓連發的。一路上，我們沒有遇到土匪。

我去肇慶地委彙報。我說，我們集體研究的結果，對小老婆、丫頭，原則上不告不理，本人沒有堅決要求離開的，不處理，也處理不了。一個村子，有一些人，當天就沒有飯吃。梁嘉說，老曾同志，你說的這些，我們早就知道了。我們本地幹部明知道只能妥協，但是不敢提出來，搞得不好，黨籍都會給你搞掉，說你是右傾投降主義，階級異己分子，跟封建勢力妥協！你就方便了，你可以提這個意見。我當然同意你這個做法。現在就好辦了，這樣一來，就是我們商量過的。他高興得很，又派車送我回去。

照我們商量的一傳達，問題解決了。所以，不了解情況，沒有膽量的話，像雲浮縣，如果強制要「扎根串聯」，半年都沒有動靜。你要解放丫頭嗎？你要解放小老婆嗎？全部社會將會搞得稀爛。

正好這時，我接到電報，讓我回去廣州，我們的《南方日報》已被打出了十來隻「老虎」，叫我趕快回去打老虎。

緊急開支部大會，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就流眼淚。我絕不相信有半個「老虎」

一九五二年春天，廣州開始大規模的「三反」運動。「五反」在前一年就搞過了，現在是搞

「三反」。「三反」就是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進城後黨政機關的人，統統要參加這個運動。這個運動是怎麼起來的，為甚麼一下子就這麼突出，而且以反貪污為重點，我弄不清楚。我在雲浮縣搞土改，縣委書記同我們連喝一口酒的錢也沒有，「貪」甚麼呢？《南方日報》已被定為重點反貪污的機構。《南方日報》算經濟機構，報紙十多萬份，還有廣告，進進出出的錢不算少。當時有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之分。一億元以上的，叫大老虎，千萬元以上的，叫中老虎，百萬元以上的，叫小老虎。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十萬、一萬、一千元吧。

派到我們單位打老虎的隊長是××，老同志，監獄出來的，當時華南黨領導機構的副秘書長。××一來，大大小小，幾天就打出了十幾個老虎，包括副社長楊奇在內。《南方日報》橫着通欄登出來的，字有鴿子蛋那麼大，說楊奇是大老虎。十幾個老虎被關在《南方日報》的老虎洞裏。所謂老虎洞，就是找一間大房子，把他們集中起來。當時還沒有「牛棚」這個名字。

當時一個電報，叫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土改回廣州。我回廣州後，原來的打虎隊隊長××當天就走了。他說，你來了，是你的事了。我看見報紙還在出，但很多部門的頭頭，都成老虎了。

當天晚上我請求開了一個黨支部大會，我建議楊奇同志出席。但支部大會的目的，是要我出來表個態，狠狠罵他們一通，警告他們一通。結果我站起來幾分鐘，一句話也說不出，就流眼淚。因為我根本不相信——我絕不相信這裏邊有一個會是老虎。昨日捐軀者，今日盡貪污。可能嗎？最後我說，我甚麼情況也不了解，我現在甚麼也不能講，建議今天晚上這個會不要開了，散

會。這是絕對真實的，現在活着的人還有一些。就是說，我在接受打老虎的時候，根本沒有打。為甚麼我敢這麼做呢？第一，上級對我絕對相信，第二，我是兼分局「三反」五人委員會的委員，當然是掛名的。我們這個單位，我有全權。

我每天都要經過「老虎洞」門口。我想，這些同志，他們經歷的鬥爭有些比我複雜，經過的考驗比我多，即使有些資格沒有我老，晚一點，但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都是提着腦袋幹的，進城才一年多，會去貪污十萬八萬，即今天的幾千幾百，去出賣自己嗎？絕沒有這個可能。將心比心，像楊奇，十年前在東江游擊隊那麼打來打去，跑來跑去，是不要命的。進城一年把，就會去貪污你那幾個錢？提着腦袋幹了那麼多年，就不算數了？不能說一個人提着腦袋幹了一二十年，進城一兩天就變成貪污犯，世界上哪有這個可能呢？

我回報館就放下了此事，根本不提了。上面絕對不來檢查的。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拖。老運動員，各種運動都遇到過，知道鬧鬧鬧，辦得到你就拖拖拖，幾個月後，這個事就沒有了。因為我能夠肯定，這裏邊半個老虎都沒有。上面不過問，下面不會催。大家都知道，統統是假的。

我這個打虎司令，人家打出來的一大堆老虎，我只好擺在那個地方，沒有再絲毫過問。我今天講，並不是以此為滿足，以此為驕傲，根據當時的情況，我是完全可以到他們的房子裏去看望他們的，因為我心裏明知道他們不是甚麼老虎。以我當時的情況，我即使看過他們，也沒有人去報告的。楊奇這個人，工作能力強得不得了，很有威信，大家都擁護他。大家都知道，我在政治上硬撐着，幹事情是靠他。我當時雖然沒有火上加油，但是，我應該到那個房子裏邊去看看他

們。我經常走那裏過，看見他們憔悴不堪的樣子，我沒有進去。就是說，我還沒有膽量，我這個正義心有限得很。今天想起來，我內心很慚愧。其實全放他們回本職，靜待審查也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但我當時不敢，從良心上說起來，我是大有虧欠的。

我這個人不是一個要筆桿子的人，我最適合的工作是做法官，做個小法官也可以，在縣法院做都可以，我決不會冤枉人。自己在延安被搶救，那個滋味嘗夠了。

到了秋天，開了個大規模的一萬多人的平反大會，宣佈對楊奇和羅明「寬大處理」。其實是平反，不便說。這兩個人，在市裏邊應該算是名流了。楊奇是《南方日報》的副社長。羅明是甚麼人？就是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的代表人，而他是正確的。把他們打成老虎時，都用大黑體的字頭版頭條登報了，宣佈平反，照樣用大黑體橫着通欄大標題登報。所謂寬大處理，事實上是不便公開講根本沒有這回事，暗示他們兩個是被弄錯了。這真是吃飽了沒有事幹，把自己可靠的老幹部一會兒打成「反革命」，一會兒說是大老虎，一會兒又說不是。我們自己整自己，太下得起手了，一下子一個單位頃刻之間就有十幾條老虎。

我這個錯誤不講，人家不知道：戲改

六七十年了，沒有人來算賬。但怕就怕這樣，只知道怎麼當官，怎麼得意，錯誤不講，那是會死了也閉不了眼睛的。

一九五二年秋天，也就是調我到華南分局宣傳部當副部長「坐堂醫生」時，發動了一次粵劇改革。我的天老爺，那真是不知輕重。當時有幾個老同志，有三八式地下黨搞文化戲劇工作的，在鄉下土改時天天在一起。他們說粵劇非常庸俗，如果不改，不行。主要談了這幾點。一是人物變化隨便，同一個角色，演得不一樣，這樣，藝術性就很難提高；二是粵劇服裝變化大，而且亂七八糟。他們舉例子說，粵劇有一種服裝，放了很多電燈泡，不倫不類。三是語言。總之簡單地說，粵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港澳的影響太深，商業化色彩太重。

要改革，怎麼改呢？首先劇本要定型化，不要同樣一個劇本，同樣一個人物，每次演都不一樣。此外，粵劇講究排場，熱鬧得不得了，很多人物出來，服裝穿得很講究，但內容不太多。因為靠近香港，粵劇自然港化，講究燈光、佈景，有些地方話劇化，不中不西，不洋不土，這些也要改。語言也半殖民地化，不是純粹中國的，也要改，還是要講純中國的語言，像京戲一樣。所謂改革的意思，說穿了，就是把被認為是半殖民地化的東西去掉，完全變成中國式的，最好向中國其他戲，主要是京戲靠攏。

當時南下的幹部也看不習慣，主要是地下黨有些搞戲劇的同志要求改。這些粵劇改革的話，我是聽進去了。於是我找了一些同志，在宣傳部座談了三四次，通過了我的發言提綱，然後我到戲院作報告，許多著名的演員、編劇等都參加了。當然，報告主要強調愛國思想，不要受殖民地的壞影響。這個旗幟舉起來沒有錯。我這個報告在《南方日報》摘登了大半版。

這件事，錯誤有這樣幾方面。一個舊戲怎麼改革，我又沒有研究過，舊戲容易改嗎？一個戲

劇形成了，改革很難。像京劇的那一套，川劇的那一套，大改不了。戲劇改革這個名詞，這種說法對不對？很難說。你覺得不好，你是從政府宣傳需要角度出發的。戲劇改革，不是你上面下個命令就能改的。要改，要得到編劇、演員等的同意，要他們自己有要求，而不是你作甚麼報告。你作報告，他可以奉命來聽，但他可以不買你的賬呀。對我來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個行動很孟浪。第二，在黨內搞文藝、搞宣傳的幹部還沒有統一思想，改革的內容沒有認真反覆地討論研究過，就聽了幾個人的意見採取了行動，顯然偏聽偏信。首先內部的步調就不一致。黨內那麼多文藝幹部，在廣州一百多個人總有吧，我無非是找十來個座談，而且這個事，不僅僅是文藝的事，還包括宣傳。宣傳幹部的思想還沒有統一，我就去做這件事，在行動上，就是一種胡來。現在悔之晚矣。第三，這個戲劇改革運動，需要報黨委，需要得到黨委的同意。沒有得到華南黨委領導的同意，把一兩百人叫來開了會。

改了半天，也沒有改出個名堂。這個事，倒沒有堅持搞下去，以後我就慢慢不談了，偃旗息鼓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表達下面的幾層意思：對當時粵劇界的演員，表示一種深深的歉意。他們的名字我還記得幾個：羅品超，呂玉郎，郎君玉……雖然他們大部份都不在人世了，我還是表示一種告罪。雖然領導沒有要我檢查，我現在要自己檢查。沒有領導的具體批准，在組織紀律上也是錯誤的。當時不知道輕重，不知道戲劇這個東西是老百姓幾十年天天接觸的，別的東西容易動，戲很難動。其他的事，我還沒有自作主張幹過、亂來過。這件事，我不講，人家不會講，人家不會把一九五二年的報紙翻出來講。所以現在自己講，不要人死了後別人說，他在那裏胡搞

呀！這個事，是有點胡搞，做錯了。我不求原諒，只承認錯誤。

對香港有關事務問題的建議，對大學問題的建議

我做《南方日報》的負責人時，華南分局每個星期開一次會，有二三十個人，現在看來叫高幹會、擴大會，我提了一些意見。我很知趣，我一看，人家都是一九二幾年的老幹部，不太好發言。我呢，往往在下面寫一個紙條，遞給方方，幾十個字。方方很和藹。

當時天天看香港報紙，知道情況。解放時期，香港左派不斷發動捐助內地運動。我提過這樣的意見，我說，從現在起，不要在香港發動任何募捐運動了。我說，過去我們在打仗，有困難，現在全國解放了，那點點錢對我們有甚麼用？這個運動應該停止。反過來，香港天天大火災，我們要派慰問團去，以群眾團體的名義去，像工會之類的。雖然拿不出多少東西，至少去慰問一下，總是可以的。當時香港的棚戶區經常發生火災，後來知道，是地產商故意燒的，是想把棚戶區的人趕走後，他們好建高樓。像這類意見，我提得多。我大體上從全國的局面去提出問題。這些問題，在葉帥、方方那裏，一提就通過。他們忙，想不到。這些問題，本來一說就清楚，不說的話，還糊裏糊塗幹下去，幹個七年八年的。

關於教育問題，我提了一些的建議，而且得到了實現。

一個是大學。大學我們不敢去摸。中山大學，那時誰懂？沒有人懂，連葉帥自己都沒有去跟

中山大學見過面，講過話，其他人誰敢去呀！中山大學是有名的大學，其他人去講，講甚麼呀。

一九五一年夏天，陸定一陪着蘇聯的尤金來廣州參觀，我們去迎接。尤金是被派來翻譯毛選的，當時給他的禮遇高得不得了，住在過去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公館裏，一天三頓飯，除了陸定一陪，華南黨委省政府負責幹部輪流陪同。我分到陪一次早餐。我看到陸定一，便利用這個機會向他講了大學問題。他不是老早就注意大學問題了嗎？還沒有進城，就叫我調查教會大學，準備接管。我說，中山大學這麼大，這麼出名，解放這麼久，沒有人理過，誰都不敢去碰，不懂，也沒有人去問。我說，大學都不拿過來怎麼行，我們趕快抓起來。中山大學的校長許崇清，老留德學生，老教育家，是孫中山的朋友，不能動，任何人都不敢動，我們也不能動。但是，他年紀大了，我建議，馮乃超同志回來當副校長。馮乃超是創造社的，把魯迅罵得一塌糊塗。馮是很老的黨員，年輕時犯過左傾錯誤，早就改了。當時馮乃超在國務院文教委員會當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我說，馮乃超是廣東人，是理想的人選，黨內的幹部，只有他。他出名二十幾年了，也是大名人。他來當副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山大學不是張三李四能去的，只有馮乃超，幾個條件都合適。

陸定一說，你這個想法不錯。但陸定一回北京後，沒有見動靜。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夏天，葉帥調到北京去了，方方調到中央當僑委副主任了，陶鑄以第四書記的身份全權主持華南一切工作。我有建議要找他單獨談。一天晚上，陶鑄叫我去。他實在忙，吃晚飯的時候，抽時間叫我去。我說，我們現在要辦正規教育，而不應該用全力去辦甚麼「革大」（革命大學）了。辦「革大」有甚麼用？過去辦「革大」，到處發動群衆參加軍隊，是為了打仗。現在是建設，再辦這樣

的學校沒有意思了。改造思想，三個月，幾個報告就能改變思想嗎？改不過來。我說，辦「革大」是臨時性的措施，這就是抗大、陝公呀，能一直辦下去嗎？我說，「革大」停辦，改成師範大學，「革大」副院長陳維實，實際去負責。陳維實也是廣東人，老延安，很有名。另外找一個當地有名的學者當校長。我說，我們連最著名的中學大學都摸不到邊，還不敢去碰哩。我建議，今後我們要抓正規教育，從廣州市來講，先抓大學，再抓中學。因此，教育部門的幹部都不能像從前那樣安排，要當成很重要的幹部來安排。

陶鑄這個人爽快得很，能幹得很。一聽，說，對，就照你講的辦，你就去當教育廳長。我說，這是怎麼回事呀？教育廳長不是杜老（杜國庠）嗎？他說，杜老年紀大了，叫他一天到晚到處跑，不行。杜老我另外安排。省裏有文教委員會，還有華南科學院，總之比現在教育廳長名譽地位要高得多，這是肯定的，這個你不要擔心。他說，既然你提出了這個問題，具體抓，就要你去，不變了。

很快，他就作了決定。「革大」停辦。華南「革大」是全國辦得最晚、停得最早的，成立了華南師院。當時房子不夠，「革大」都是臨時的乾打壘房子。陳維實改任師範學院副院長，找了個著名的教授當院長。馮乃超也真的調到廣州，當了幾年中山大學的副校長，後來又調回北京。我當教育廳長，還正式走馬上任。但是兩三個月後，我就走不動，關節炎大發了。

教育廳長做了個把月，就是暑假，遇到了問題。中學生要考高中，但是根本沒有那麼多高中來接收，高中畢業的，更不能都進大學。沒有幾天，就示威。我沒有辦法，只好草擬個談話，自

己擔起這個責任，要不，就是省政府，就是華南分局承擔。談話經過審查，公開發表。我說，全世界這樣的情況都會有的，不是說所有的高中生畢業都能升大學，不是所有的初中生畢業都能升高中，現在全國都是這樣。如果所有的初中生都能升高中，那要辦多少高中才夠呀，大學就更不用說了。公開表了態，登了報。不公開表態，怎麼辦呢？我來頂着，我想，無非示威更大一些，要接見的話，我就出來接見，無非還是講這一套。當時雖然請願了好幾次，但講了這些道理，事態沒有太擴大。其實我這套辦法是把問題推開，是打太極拳，即打官腔。

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間，開全國第一次教育廳長工作會議，我代表廣東教育廳參加。後來「反右」派時，人民出版社人事科長貼大字報，說曾彥修填的表，說他當過教育廳長，完全捏造。我也不去辯，運動一來，甚麼事都可能發生。我說，你們去翻翻報紙，我正式發表過談話，我參加過全國教育廳長會議，不但參加會議，錢俊瑞當時是教育部的副部長，還提到過我。算好，這些事，我不怕。我發現運動一來，除了不好說你是外國人外，其他全可胡說。

第十四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調人民出版社工作，沒有任何人跟我談過話，我也沒有問

一九五三年快到四月，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派了一個幹部來遼寧鞍山市湯崗子療養院。這個幹部說，上面已經決定調你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了。我沒有在北京工作過，對來的人也不認識。我說我現在屬於廣州，是請病假來的，病好一點，回廣州是自然的。過了一個多星期，這個幹部又來了，說，上面決定，你不能回廣東了，直接到北京。我問，甚麼道理呢？他說他也不知道。他說，沒有問題，胡喬木同志與陶鑄同志已經達成協議，陶鑄同意你到北京，不回廣東了。既然這樣，我就沒有話說了。喬木同志是多年直接領導我的，我不敢違背。四月間，真的就是從湯崗子溫泉療養院直接到了北京。我的行李是人民出版社後來派人到廣東取的。那時有甚麼行李可言呢，賤價買來的十幾方普通端硯是沒有了。很重，倒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舊書有一兩個小書架。

其他的，就是一個床墊，一張被子。

一九五四年四月，以中央的名義批轉了中央宣傳部關於改進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報告，其中第三項，是關於出書範圍的。第三項說：「為了推動科學研究工作，培養學術著作力量，對於學術著作應採取積極鼓勵的方針。凡屬經過認真研究，在某一方面說來有些價值的著作即應使其有適當出版的機會。……應當估計到中國目前的理論、學術研究的現有水平，不要要求過苛，特別是對待涉及當前政策的學術著作，標準可以放寬。」

從這點可以看出，上面已經感覺到人民出版社過去專門出版中央文件、出版蘇聯的東西有問題，要改變了。解放已經六年了，但整個出版工作停頓了六年，當時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停了，一個都沒有。因此，按照這個批示的這條，要出版一些社會科學的著作了。後兩年，黨中央出了「雙百」方針，如按照這一出版批示來看，這個意見兩年前就有了，就是專對我們的決定。

我去幹甚麼？就是執行這個批示，但沒有人給我講，我只看見這個文件。叫我到人民出版社的過程當中，沒有任何人跟我談過話，很怪的。我只記得是單位來催我去就職的。我住在西單一胡同內中宣部的小招待所。當時國家出版總署還在，大概一九五五年後就沒有了，只存在了三四年。

我去做副社長兼副總編。原來有一個副社長兼副總編王子野。我這一去，上面大概覺得這些人是老延安人，去就去了，誰也沒有介紹，也沒有說明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我們就這樣維持了幾年。好在我們都是老延安，大家都是十二三年的根據地，互相都非常注意關係問題。如果兩個

人因為這件事鬧矛盾，那就笑話了。在延安時，我住靠北的山溝，叫楊家嶺，是黨中央機關，王住靠南的那個山溝，叫王家坪，是中央軍委機關。雖然我們不認識，但是在根據地那麼多年，也不會鬧權力問題的笑話。

但是形式上，我在前邊。中宣部開會，出版署開會，是叫我去的，有甚麼事是通知我辦。客觀上，形成了我是第一。今年前幾個月，一個老同志還說，明顯是你在前邊。我問他，會上講過嗎？支部內部傳達過嗎？誰講過嗎？他說是沒有講過，就是客觀上大家這樣認為。

總之，我們兩個非常自愛，就怕出「關係」問題。我們能友好多年，不容易。後來，有趣得很，一九七九年我從上海調回北京，王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偶然談起過去的事。我說，人民出版社有沒有社長，有沒有總編輯呀，幾十年都沒有嗎？他說，有呀。我問是誰，他說是胡繩。我問，甚麼時候是胡繩？他說，你在的時候就是胡繩。我說，沒有人跟我講過呀，你也沒有跟我講過。

我們這方面的組織性，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兩人之間，既然上面沒有談，兩個人也不談，處得很好。

把一些淺薄低級的純蘇式教條的東西，想法用各種方式停止出版了

一九五四年，解放後就關了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此時還沒有恢復。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甚至在中國，只有三家出版社，一個是人民出版社，一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個是中國青

年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還有個附屬少兒出版社。當時每個省已經有個人民出版社，但它們一方面是印刷中央文件，一方面是出通俗讀物，真正的出版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

人民出版社用三聯書店、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個牌子出書。適合於哪個牌子，就用哪個牌子出。人民社本身就出文件，真正有點工作可作的，是用三聯、世知的牌子出書。我幾年間工作出的書，全部是用三聯、世知的名義。

這三個出版機構合而為一，可以說星光燦爛，人才雲集。人民出版社是解放區出來的幹部多，三聯書店，是由三家黨領導的大出版社合在一起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人才似乎更多。這一來，人民出版社把社會科學的書全包了。

我去之前，人民出版社出的書範圍很小，以出版馬、恩、列、斯的著作，出版中蘇的文件和中國領導人著作為主。還有個別人的東西可以進人民出版社：郭沫若，陳伯達、范文瀾，胡繩、于光遠。其他人不行。

我是講過這樣的話，這也是後來鬥我右派的一個材料。我說，如果只出版中央文件的話，只設一個校對科就行了，（按：解放前，校對工作附屬於印刷廠。）還要編輯部幹甚麼？

人民出版社出了幾年《蘇聯大百科全書》條目選譯，即把蘇聯大百科全書某一條譯過來，成一本小冊子。我覺得這樣出下去不大好。我剛去，說話不能隨便。便找沈昌文。沈昌文當時是總編室的秘書，二十多歲，從上海進京的，懂一點俄文，跟我們一個辦公室。當時甚麼副社長、副總編、秘書，都在一間房子裏，五六個人，兼會議室。一天下午，沒有人的時候，我說，小沈

呀，大百科選譯一次一條，算一本書，你覺得怎麼樣？他說，出了好久了。我説，這不太好吧。如果自然科學方面的某一條，我們寫不出來，出出可以，但是蘇聯的大百科全書多少萬條，這樣出下去，不太好看，你能不能去暗示一下，一般的，就不要了。就這樣，這套書後來就沒有再出了。

還有一次，一本俄文翻譯的書《論契卡洛夫的經濟觀點》，二十幾萬字，清樣已經出來，要我簽字付印。我問沈昌文，小沈，你懂俄文，這是怎麼回事？他說，契卡洛夫是蘇聯十九或十八世紀的二流哲學家，這本書就是論他的經濟觀點的。我問，這不是他們「副博士」的論文嗎？他説，就是。我説，他們的大學畢業生可能找一個冷門，寫出一篇一二十萬字的論文出來，就得了個副博士。蘇聯當年的副博士，相當於我們的碩士。我說，既然是他們歷史上的二三流哲學家，我們三五十年也不會有人去研究。何況這本書也還是這位哲學家的經濟觀點，這種書印出來，誰看？我們的教授不會看，大學生也不會看，誰也不會看。我的意思是不印了。當時作為一個副社長，要下點決心。但是，我不便在會議上談。我通過沈昌文，向編輯傳達這樣的意思：全國無讀者，不印了吧。其實正合大家之意。

我去以後，設法把這些離開學術的、片面引進蘇聯的書，利用各種非正式的方式停印了。這確實不太容易，你不能公開作報告，也不好在領導的會上講。沈昌文在其中，對我這一套起了很大的作用。沒有他在中間轉環，沒有他懂得俄文，這些事都辦不了。他可能沒有估計到新來的這個人如此狗膽包天。

大請京派學者們吃飯，同時積極翻印一些有影響的舊書

我去後不久，開門請客，請學者們吃飯。在甚麼地方？一個是西四同和居，一個是宣武門的豐澤園，都是有名的教授們知道的地方。一次請兩桌。請甚麼人呢？原則上就是請北大、師大的一些教授。當時大學已經合併了，清華變成了理科。人民大學當時也還有很多老教授，我們也請了。馮友蘭、白壽彝、翁獨健、羅爾綱、張政烺等人物都請了。當然侯外廬、翦伯贊他們更要請。我們就是把左派的，還有純學術的人合在一起請。主人參加陪的不多，我跟王子野兩個，還加上一個熟悉這些教授的編輯。

有兩個人想請，不敢請。一個沈從文，一個朱光潛。這兩個人名氣不是更大嗎？沈從文，請不得，請了會得罪很多人，黨內名流通不過。朱光潛也害怕，第一，說他觀點反動，第二，我知道他好像還被聘為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的名譽幹事之類。其實這個是空名，社會上好多名人都被排上了，純粹是掛名的。我們知道他有學問，但他素來被左派罵得很厲害，抗日戰爭前就被大罵了，那個時候是請不得的。

我們請吃飯，就是兩個目的。一方面確實就是對他們的尊敬、尊重。解放以後，他們就是受打擊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全國大學教師思想改造，天天檢討，過不了關。當時社會上，還有上面的領導，還沒有出現過要尊重學者的苗頭，我們在全國是第一家，冒着比較大的風險，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胡適派的學者。另外一方面，他們出來一次，客觀上總是有影響的。

他們自己不會講，也有可能慢慢就傳開：人民出版社尊敬他們，敬請他們赴宴。

吃飯的時候，自然就請他們寫書，請他們幫助擴大一些影響。我們這個行動就等於發宣言：我們不光是出馬克思主義的書。

同時，為了立刻體現中央的批示，我們擴大出版了一些書。在方針問題方面，是提前執行了雙百方針。

像出羅爾綱的書，把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出了一大堆，五六本。誰都知道羅爾綱是真正的胡適的嫡系學者，他在胡適家裏住過幾年，當過胡適秘書，私人關係好得很。但我的解釋就是，羅爾綱這樣的學者，全力研究太平天國，而且同情太平天國，在舊史學界中是帶點叛逆性的。能像他這樣，了不起。那時，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就要堅持這一點。當時我當然也是「農民戰爭」革命派。現在我的看法根本改變了，我決不同意中國歷史是農民戰爭推動前進的。這個觀點真可謂錯到極點。

當年我們搞審讀，審讀甚麼？就是政治審查。那些舊學者的東西，你說他句句都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呀，句句都符合階級鬥爭呀，根本辦不到，一個都沒有。

當年，新的著作比較難找到。我們出了中山大學岑仲勉教授的存稿：《黃河變遷史》。岑仲勉當時是很有名的教授。還出了中大教授劉節的舊稿《古史考存》。還有北大有名的教授向達的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這篇重要論文在國際上影響很大，曾被翻譯成好多國文字。一直到今天，我們說的長安規模大，如何系統、完整，萬國來朝，大體都是根據他的考證。還出

了王鍾翰的《清史雜考》。特別是陳寅恪的幾本書，影響較大。出版這些書，當然帶有千金市馬骨之意。這些學者和這些書，在老左派及老黨員，大約只有齊燕銘、范文瀾，胡喬木幾個人知道，他們不說話，就等於通過了。

還出版了陶菊隱的《北洋軍閥時期史話》。陶菊隱是湖南人，新聞記者，看的東西很多。他自己投來的稿，很厚。我翻過後，覺得這個稿件是老先生搞的，認認真真的，字也寫得工整。中宣部出版處的處長黎澍也是湖南人。我請求他，你們湖南老鄉來了這個稿，很厚的，可靠嗎？他說，我認識陶菊隱，他在上海寫了很多文章。他對北洋軍閥確實研究過。黎澍說，你覺得有內容的話，可以出。後來，我們出了薄薄的八本。前不久，我看見此書又在湖南出版了，把「時期」兩個字去掉，改成《北洋軍閥史話》，這樣符合習慣。

這樣一來，等於做廣告。這些書，都是用三聯的牌子出的。

除了這些新書外，又重印了一些書。像鄧之誠的《骨董瑣記》，一段一段的考評，研究文物的。這本書好像敵偽時在北平出過。因為與抗日無關，敵人也沒有干涉。聽人家說，這個書很有內容，很有學問的人才能考證出來。我個人以為這就是燕昭王築黃金台，以廣招徠。

美國著名記者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二十天》，是舊譯本了，抗戰前我看過，是列寧寫的序。這本書在世界都很有名，是講十月革命那一二十天的事。此書沒有提到斯大林，所以列寧去世後，斯大林就禁了這本書。斯大林當政時，誰藏這書是要殺頭的。里德後來恐怕算美共了。

還有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寫的近三十萬字的《列寧回憶錄》。我知道這本書，也知道列寧

大人在列寧去世後受到斯大林的壓制，她也反對斯大林，但斯大林不便殺她。

這類書，我要請示。請示誰？只有請示胡喬木。我知道，請示別人沒有用，別人不一定知道，胡喬木三十年代一直在上海，對上海出書的情況瞭如指掌。有些書，像《震撼世界的二十天》應該沒有問題，因為斯大林都去世了，但又怕出問題。如果出問題，出在哪一關？就出在胡喬木這一關，別人不太熟悉這些事情。康生不熟悉，幹別的事去了，陸定一很早就進了中央蘇區。那幾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直到抗日戰爭上海的出版情況，他不一定很清楚。我請示胡喬木用甚麼辦法？寫一封簡單的信，如果他同意，請他的秘書打個電話就行了。

當時，以三聯書店名義出了《非洲內幕》，這是美國著名記者約翰．根室寫的。在抗戰勝利到解放戰爭這三年期間，上海出了他的《亞洲內幕》、《歐洲內幕》、《拉丁美洲內幕》等。這個作者，過去看不起他，說他專門寫內幕書，其實是我們翻譯成「內幕」。中國人一看見「內幕」，價值就降低了。《非洲內幕》在我去人民社前就列入了選題。這本書現在也十分值得看。看了後，你就知道非洲為甚麼到現在還會這麼亂，這麼互殺不止了。

看了《非洲內幕》我才想起他的其他的書，反過來說也不會差到哪裏去，所以計劃把他的一套「內幕」書全部翻譯校訂出版。正準備要印他的書時，「反右」運動一來，甚麼都完了。

權力能達到的地方，想辦法開開窗戶，透點新鮮空氣

我去人民社不久，發動了一次調查，調查二次大戰後各個國家重要社會科學書籍出版情況，列了五千本，書名，哪個出版社出的，哪一年出的等等，最後做成備查的目錄，印出了幾千本。但是這個書，竟然沒有起作用。當時很奇怪，沒有甚麼人注意這些問題，都忙學習「文件」了。所以，中國自我封閉這麼多年，要想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實在不那麼多。我自己寫了篇雜文，叫〈論睜眼看世界〉，發表在當時的《文藝報》上。「睜眼看世界」這幾個字，來自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對林則徐的評價。我說，我們現在就是對世界的情況太不了解，我們現在就需要林則徐的這種精神。其實現在更需要這種精神，中國人現在了解的世界，仍均是我們自己重新畫出的世界。

所以，我去了人民社後，強調要了解世界的情況。你既然讓我來做沒有總編輯的副總編輯，天天只要我簽字付印上面的決議，這不是純粹成了一種無意義的工作了嗎？商務書館的王雲五，你說他是資產階級，但他做了多少工作，出了多少書呀。他不但翻譯出版外國的書，還當後台大量整理出版了中國古籍。

一九五五年，中宣部叫我們編一本怪書：《國際右翼社會黨》。一九五五年，英國工黨的副領袖比萬作為英國工黨中的左派要來訪問中國，一下子，抓瞎了。英國工黨是怎麼一回事呀？過去學蘇聯，罵別人是甚麼帝國主義走狗，罵了幾十年，比法西斯還壞，對方是怎麼回事，啥也不知道。這時，黎澍打電話給我說，你們那裏人才多，現在中央要這方面的書，你們在個把月內，交出一本三十萬字的各國社會黨介紹的書，特別是英國的。

我說，國際社會黨，你要問外交部嘛，還有中聯部嘛，中聯部是負責聯絡各國黨派的。黎澍說，他們寫得出來，還會找到你們呀。我的天！這兩個部竟然寫不出來。過去罵人家，罵得狗血噴頭，光是罵。我說，好吧，我們這裏人才是多，商量商量，辦得到就辦，辦不到就回話。

我找到另一副總編陳原商量。我說，既然講明了，外交部、中聯部寫不出來，別的地方大概也寫不出來，我們這裏有哪幾個人，臨時湊湊，到各個圖書館去看看。於是就搞了一個小組，陳原抓，戴文葆負責，下面三四個人。他們真的在一個月內，印了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書，名字就叫《國際右翼社會黨》。「國際」，就是講全世界。「右翼」是我們加的，必須加「右翼」，這是我們的規矩，就是「右派」的意思。

比萬還是當時英國衛生部部長。後來我問，既然是第二把手了，怎麼僅是個衛生部長呀。別人說，在英國，衛生部長很重要，有點像內政部長，甚麼都要管。

我談這些為了甚麼呢，我在人民社的工作，主要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在我權力能達到的地方，想辦法開開窗戶，透一點新鮮空氣，多依靠專家，不要整天只印我們的文件、決議，再加上蘇聯的文件。這樣子，不像一個大國，不像一個獨立的大國。根據地關閉了十幾年，進城反而關得更緊，全世界是甚麼樣子都不知道，只是整天罵人，罵了半天，罵得又不像樣子。所以，我的觀點就是睜眼看世界。根據這個精神，首先是打開局面，比較放手，出版方面，不管對內對外，主要是開門。這個開門，不是大開門，小開門而已。不要把眼睛閉起來，睜開一點點也好。但在那時的中國，睜開一點都不行，睜開一點，就是右派。

第十五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整人」運動（一）：批胡適、批胡風

批胡適，經歷了一段瞎忙。出的書，我一個字未看過

批胡適，批胡風，「內部肅反」，我是人民社五人小組組長。五人小組是做甚麼的？是整人的，審幹的，肅反的。

批胡適是一九五四年的事。我到人民社不久，遇到批胡適。批胡適，我們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們又不辦報，不需要我們發表文章。我們的任務就是把批胡適的文章，管你有理無理，趕快彙集印書。胡適這個人，我過去讀過他的一些東西。我對他本人，是比較佩服的，他甚麼事情都要你拿出證據，這個沒有錯誤。後來把他罵得狗血噴頭，說他主張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適這句話，不是說歷史應該這樣說，他是諷刺一些搞歷史研究的人，自己想怎麼樣寫就怎麼樣寫。但我們很多人，把他的意思完全反過來批，這是不對的，這不是他的本意。胡適的文章深

入淺出，明白如話，到現在，有幾個人比得上？所以，一批胡適，我就知道，全國的文科教授全完了。全國的文科教授，有哪一個與胡適是處於敵對狀態的？一部份很擁護，一部份擁護得少一點，但是沒有敵對關係。胡適這個人，有些地方是有些淺薄，他曾經提出或贊成過「五鬼鬧中華」之說，這個說法比較幼稚。「五鬼鬧中華」是說中國落後是由「貧、病、愚、弱、私」這五個「鬼」鬧的。這是中國落後這個病的表現，而不是病根。他把它作為一個原因，恐怕就不對了。

當時知道胡適這個人，從原則來講是擁護蔣介石的，他的態度跟《大公報》一樣，批評蔣介石批評得很厲害，但絕不主張推翻蔣介石。他們最關鍵的東西是「國家中心」。他們認為，中國要強大，要統一，只好依靠蔣介石。相對於其他軍閥來講，他們認為蔣介石算是最佳人選了，是矮子中挑高子的意思。

我們對批胡適這個事，消極應付。要我們出書，有電話通知。我們出了《胡適批判選集》，由一個生活書店的老編輯史枚負責選編。所謂選，就是選代表性人物的，從報紙上剪去付印，抄都來不及，等於出雜誌，出週刊，一兩個月，出了八本。我問過史枚，你看過沒有？「哪能呢。」他說。這八本書，恐怕不到全國批判胡適文章的百分之一，加起來，八百本都有，大家都是執行緊急命令。許多年後，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短文，說這八大本可能沒有人看過，我一個字都沒有看過。編輯這本書的人也沒有看過。李慎之後來打電話說他看過。我說，你看過，你都看過嗎？他說，看過三本。哪個人在那個時期有時間看？我想看過的人，全世界可能只有一個，就是

胡適本人。胡適說，凡是批判他的文字，他都要收集起來看。大陸的報刊，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他都看過。胡適為甚麼要如此，不得而知。

為甚麼要批胡適，要這樣大幹？大概認為國內所有的文史社會科學的老教授，都屬於胡適派，只要把胡適打倒，才能樹倒猢猻散了。大概是這樣，不然，沒有甚麼意義。批胡適經歷了一段大鬧，有一年左右。

反胡風，我們單位算是沒有胡風分子

批胡風，大概一九五五年初夏就開始了。這個運動是暴風驟雨式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三批材料。我所知道的，這個運動從頭至尾，是毛主席自己抓的。在批判胡適後，中宣部一兩個星期要召開一次會，下面某些業務單位的負責人都要去。大學是清華、北大、人大、師大這四個大學的黨委書記去，不是校長；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這兩個大單位的黨委書記要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是我，人民文學出版社是王任叔（巴人），這個會有二三十個人。這個會沒有名字，用現在的話叫「吹風會」。主要由周揚、陸定一講一些情況。在這個會上，知道批胡風的問題，陸定一、周揚多次挨毛的批評。因為陸定一、周揚每次講，都是講毛對他們的批評。

三批材料，我以為只是一個催化劑。胡風，沒有這個東西，也是要批判的。為甚麼是必然的？關鍵問題是胡風不贊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才是關鍵，所以總要做他的文

章。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不是有幾把刀子之説嗎？胡風挖苦毛的文藝講話是「圖騰」。這是要挑戰毛的文藝理論。所以胡風必須徹底打倒。市面上有那麼多書，似乎往往未抓住核心要點。

批胡風時，究竟是一點都不知道，還是知道了要這樣做呢？比如綠原與阿壟的問題，這兩個人都被定為特務，但阿壟是把國民黨的情報送來給中共的。至於綠原更妙。綠原解放後在中宣部工作，應該是非常信任的，怎麼突然一下就變成中美戰略情報所的特務了？一九八零年開會，正好我們一個小組，我問過他。我説，綠原同志，怎麼一回事，你怎麼一下就變成特務了？他原原本本跟我講了。他説，一九四四年，蔣經國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建立一個青年軍，提出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不是招收一般的青年，而是招收各個大學、各個高中的畢業生，而且很多是要求會講英語的。當時美國援華的空軍很多，要招大量的翻譯——後來變成徵用了。當時青年軍，現在知道倒不是拉夫，而是各個大學的學生出於一片愛國心自願去的，包括西南聯大的學生。綠原當時在復旦，可能經過考試，被分配到中美戰略情報合作所。這個單位，跟渣滓洞集中營沒有關係。中美戰略情報合作所在山溝的這邊，渣滓洞在山溝的那邊，兩個單位，在一個山的兩邊。而中美戰略情報合作所，已經是國民黨跟外國合作的第三個了。之前是中蘇所、中英所，都叫戰略情報合作研究所，就是了解日本人，了解敵佔區的情況，並不是對付共產黨的。綠原被徵用或考試錄取後，給胡風寫了一封信，説了他的情況。胡風畢竟是上層，知道一些政治情況，説，那地方去不得，是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去了就出不來，叫他跑。所以，綠原立刻跑到川北一個地方去教書了。這明明是胡風做的一件非常好的事，出主意

讓綠原快逃，但是後來說綠原成為中美戰略情報所的特務，是胡風送去的，剛好百分之百的顛倒了，荒謬到了這種程度。胡風及他的追從者，一般都是非常有才能、非常聰明的人，但又都是有一些異常觀點的人。

反胡風時，我對這些情況全不知道，我對胡風的印象倒是有些不太好。一是他的文章叫人看不懂，太怪了。中國有三個「看不懂」，一個馮雪峰，一個侯外廬，一個胡風。這三個人，可以說是左翼裏邊名聲大、地位高，但文章叫人看不懂的人。另外，胡風及他的追從者，在抗戰期間對跟他們不在一起的左派的人，往往不看時間、不看當時的情況，批評左翼內部太尖銳。

看了三批材料，哪個不恨胡風？都是出自內心的。胡風原來你表面上是左派，實際是國民黨特務。因此批判胡風，我是積極的。

這時，每個單位已經成立五人小組了。五人小組，又管批胡風，又管肅清胡風分子。我們單位，倒沒有甚麼胡風分子問題。

我把胡風派的東西，有半尺高，除了小說，其他的都看了，苦得很，難讀得很。我在單位作了一個動員大報告，這樣的報告都要作的。後來我的報告整理出兩三萬字來，在《文藝報》很顯著的地方分兩期全文發表了。《文藝報》當時還是大的方形刊物。當時我用的筆名是「魏璧佳」。我還有一個筆名叫「蕭時聰」，偶爾用，兩個筆名的意思是「小時聰明」，「大未必佳」。這篇文章叫〈關於胡風反革命理論活動的前前後後〉。今天我不講，沒有人知道。死後被人揭發，就是污點了。

在陝北時，我對大後方的情況一直都是注意的。我沒有離開中央的宣傳系統，看報紙、雜誌沒有斷過。對胡風的事，不詳細，但了解一點。因此，在〈關於胡風反革命理論活動的前前後後〉一文中，我把胡風及其朋友們在那個時候寫的文章跟當時國共鬥爭的形勢對照起來，提高說這些文章在客觀上都是配合國民黨進攻共產黨的。胡風跟他的信徒，確實沒有從正面寫過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文章，他們都是批評。我的文章聯繫形勢，說胡風的理論配合國民黨，進攻共產黨。把胡風的理論當成政治活動，這就純粹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政治結論了。

現在來看，我這篇文章在客觀上找到點材料，是無限上綱。這樣上綱，把胡風及其友人的理論活動變成反革命活動，不是甚麼左派內部的批評。對這個東西，我現在原則上全部收回。幾十年，我再沒有看過。

胡風和他的朋友在抗戰期間的活動，是不是有些問題？我覺得也有一些問題。他確實對當時的客觀形勢照顧不夠。而我認為，對同一陣線的朋友應該寬鬆一點。胡風和他的追隨者，還是有點槍口似乎過於對內了。他和他的弟子，批評左翼的話非常尖刻。對內用的語言，太尖刻，太挖苦。他確實是比較孤立的。在三批材料發表之前，他就是孤立的，追隨他的大多是一批抗日戰爭中期十幾、二十歲的青年。胡風和他的信仰者狹隘得很，不合他們的也被罵得一文不值，也是唯我獨尊。

胡風在有的問題上，意見是對的，而延安卻一直反對。比如在文學的民族形式問題上，他認為，民族形式與民間形式是兩個概念。民間形式有些是非常封建落後的，灌輸的是奴隸主義

思想、忠君思想，講因果報應。這一點完全是對的。中國的民間形式沒有宣傳革命，對人民覺悟的提高，談不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零年，已經在批胡風這個東西了。當時青年人不可能發表甚麼意見，只是感覺胡風這個意見是對的。民族形式與民間形式，不能混為一談。在這點上，胡風跟延安的矛盾很深。

第十六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整人」運動（二）：「內部肅反」

正式消除了對不少人的懷疑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內部肅反」，是延續反胡風運動下來的。上面可能感覺內部問題很嚴重，覺得共產黨裏確有許多國民黨特務。這次運動的名字不太清楚，也沒有大講運動，有的叫「內部肅反」，有的叫「清理中內層」。中內層是哪些人呢？黨內外的幹部。我所遇到的，基本叫「內部肅反」，重點是整文藝界、學術界以及民主人士。

「內部肅反」，跟揭露胡風分子緊密聯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一個十人小組，而不是五人小組。組長是陸定一，副組長是羅瑞卿。為甚麼陸是組長，羅反而是副組長呢？這是沿着反胡風下來的。反胡風就是陸定一出面領導的。

我還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組組長，這是反胡風時候指定的，也沒有副組長。我打電話請示了

幾次，說這樣不太好，應該有個副組長，但上面始終不接受。

五人小組幹甚麼？就是把人事科檔案裏邊或者頭腦裏邊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全部過（清理）一遍。這個運動的性質是甚麼？我搞了後，慢慢才知道重點之一是對地下黨。我曾打電話問上級，五人小組為甚麼沒有范用？我說，范用在出版界資格又老，影響又大，沒有他不行呀。但上面說，你不要問了，這些事情，上級決定的。後來我才猜想到，他是地下黨，屬於要審查的範圍，他也要受審查。「內部肅反」審查地下黨，沒有公開宣傳過、號召過，我沒有得到任何指示，但實際上是這樣做的。但像范用這樣的老同志，政治上沒有問題，所以也根本沒有去懷疑他。

另外一點，是針對黨外進步人士的。大學裏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的大學教師思想改造。這個改造把大學教師的祖宗三代都摸透了。但在機關裏，對黨外的進步人士，沒有正式審查過，當時基本上認為是值得相信的，很受尊敬的。但是胡風運動一來，就提出了問題：黨外進步人士是不是國民黨派來的？是不是暗探？另外，舊社會留下的工作人員，當時稱「留用人員」，解放後在政治上也沒有經過普遍的審查。所以這一次，主要是針對這些方面的人。這一次，上面沒有號召大張旗鼓，也不發動群衆亂鬥，是秘密進行的。但「內部肅反」也是有比例的，大約也是百之五左右。我要老實說一句話，人民出版社在此之前，在葉籟士、王子野二位領導下，本來就不「左」。而我任五人小組長時，人事科彙報大小懷疑對象，大概至多十幾個人。我覺得其中五個人關係重大。這些人最容易當成目標，因為一抓出來就是條大魚，所以我自己審。「內部肅反」一直搞到一九五七年前的「反右」。

把上面抓得最緊的對戴文葆的懷疑徹底取消了

「肅反」時，我在單位聽人事科彙報哪些人要審查，再分工哪個負責管哪幾個人。我知道人事科知情不多，對人事科我不放權。

我們單位我本人抓此事，決不亂來。首先表現在對戴文葆同志的事情上。現在，戴文葆等於國家第一編輯了。過去江澤民在北戴河每年都要招待一些專家去休養兩個星期，出版界就是戴文葆去。近兩年，中央領導人春節看望各界人士，出版界就是戴文葆。當時我知道戴文葆能力特強，也特別尊重他。但「肅反」一來，幾個方面指着我們說，你們那裏有個國民黨特務，你們怎麼不抓呢？

有一次開政協會，陸定一把王子野叫起來說，你們那裏有個國民黨特務，你們怎麼不管？王子野說，有這個傳說，現在我們非常認真地在查這個人的材料，還沒有查出來，沒有甚麼根據。不久，我碰到一次，而且一模一樣。在宣傳部開會，陸定一把我叫起來，我又只好解釋說，現在對戴文葆的傳說很多，但我們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有特務嫌疑，我們正在研究調查。如果確實是，要處理他。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反胡風的高潮過去了，進入「內部肅反」高潮。出版署的副署長陳克寒跑到我們單位，對我和王子野講，一個現成的活老虎戴文葆你們都不捉（抓起來），是甚麼意思？我當然還是說，只是傳說，沒有材料，在重點審查。當時署長是胡愈之掛名，陳克寒實際就

是署長。

為甚麼上面肯定戴文葆是個特務，批評我跟王子野兩個人不管呢？戴文葆解放前在上海《大公報》工作，他自己講歷史上有段時間在國民黨縣政府工作。上海《大公報》的地下黨分兩派，一派說他是特務，另一派說他不是。解放後，說他是特務的那一位調到中宣部，陸定一大概聽到了，當然就傳到出版署，陳克寒也是這個來源。我們人民社內部就沒有這個傳說。

後來，「肅反」第一個是戴文葆。五人小組分工，我說這個人我必須自己來。

其實戴文葆的事情一點也不複雜。他是蘇北阜寧人。抗戰初期蘇北阜寧日本人還沒有去，是國民黨統治。當時的江南，日本已經佔領了，阜寧在蘇北，屬於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新四軍還沒有去。戴文葆中學畢業後沒有出路，考了個甚麼訓練班。訓練班完後，他被分配到阜寧縣政府工作。阜寧縣政府前掛了一個類似情報機構的牌子。幹的全是敲詐老百姓的事。他嚇壞了，感覺到這個機關不好，半夜僱了一條船逃到了南通，再從南通到上海。他是獨自逃離阜寧的，沒有憑據。但是天下的事妙就妙在後來我們拿到真憑據了，真是無巧不成書。

戴文葆從上海走到重慶，沒有錢，只有到國民黨作為中國政府在它統治地區為淪陷區青年逃離敵佔區設立的招待所去住一晚，吃兩餐。當時國民黨也在做這樣的工作，爭取淪陷區的青年到自由區去。（當時淪陷區人民把原國民政府管理的區域秘密地叫「自由區」。）相隔幾十里的縣，大路上都設有這樣一個招待所。國民政府在抗戰時做的這些工作，是件大好事，就像在全國設立十多個國立中學一樣。招待所是由縣三青團、縣教育科聯合組辦的，所謂招待所，有幾張空

床，晚上有點黃米飯吃，第二天早上，有點黃米稀飯，吃了以後，你就走，下一站，也可以不花一分錢，甚至還可發一點路費，用現在的錢算，十塊二十塊，萬一中午沒地方吃飯，可以買點東西吃。這近於難民工作，有甚麼不對呢？

戴文葆到重慶後讀復旦大學。解放後，在上海《大公報》工作。戴文葆非常老實，把這一段都寫在自傳裏了。解放初，他在上海《大公報》，因講了這段經歷，就被一些人懷疑是特務。但另外有人認為，中學生小孩子找職業還不懂。國民黨縣政府為了摩登，搞了個情報機構的招牌，表示他是抗日，好看，那不是對付共產黨的。那時共產黨還沒有到蘇北去。

我研究戴文葆的材料後，認為關鍵問題是他在阜寧縣這幾個月究竟做甚麼。我們派人事科副科長李西克去。之前因為公安部隔離我們的幹部張惠卿，我不知道，對他發過火，李小心一點了。李西克後來立了大功。第一次，沒有調查到甚麼情況。十幾歲的孩子，人家不知道。但這解決不了問題呀。我說你還得去。公安局才掌握這些情況。你去仔細請教公安局。第二次，他去縣公安局。公安局說，我們這裏是有一封信，但不知道信是怎麼來的，就是你們說的這個人寫給他胞兄（？）的一封長信。信裏講縣政府不好好抗日，他覺得不對，住下去危險，必須要偷偷離開。縣公安局同意李西克把原信帶回北京。我們打開一看，就是戴文葆的字。戴文葆的字工工整整的，幾千字都是楷書。這封信，正是他十七八歲的字，還帶點孩子氣。我問，這個信要不要找司法鑒定？大家都說不要了，沒有一個人認為有必要找司法鑒定。這個筆跡不可能是僞造的，錯了我們負責。這下就清楚了。戴文葆連哥哥都不敢找，是半夜坐小船逃出來的，非常難能可貴。

戴文葆的結論是我寫的。一般人喜歡寫這是歷史問題，我說這個問題連歷史問題都不要寫，歷史問題寫上去，就沒有完，任何運動來，都要清查。五人小組同意我的觀點，就是一段個人經歷。拖了這麼多年，特別是陸定一把我和王子野都叫起來將了軍，我們這次索性就擔保到底，戴文葆沒有任何問題。

這樣，戴文葆的問題審查清楚了，甚麼問題都沒有。所以李西克拿這個材料回來，我們都大吃一驚，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如果李西克沒有拿這個回來，多少還有點麻煩，可能會留個歷史問題「尾巴」。

我們被秘密監管張惠卿，我這個五人小組組長竟然全不知道

張惠卿是在日本佔領上海時的地下黨，是久經酷刑生死經考驗的，在我之後，接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

一九五六年春夏之間，「肅反」運動已經進行了兩三個月。有天「肅反」五人小組開會，我突然感覺張惠卿好像好久沒見了。我說，怎麼好久沒看見張惠卿了？人事科長列席參加五人小組會，說，張惠卿已經被「隔離審查」了（當時沒有這個詞，此處是借用），關在單位一個小房間裏。我一聽，發火了，說，怎麼我不知道？我是五人小組的組長，現在是專管這個事的，我都不知道。他說，李西克知道。李西克是人事科副科長，管保衛工作，跟公安部直接聯繫。我把李西

克叫來問是怎麼回事。李說，是公安部決定的。我再一次問，甚麼？他說，是公安部決定的，要把他單獨審查。我說，你為甚麼不報告我。他說，他們規定就是這樣。我一下發火了，說，不像話！這不是「肅反」機關站在全黨之上嗎？當時蘇聯赫魯曉夫已經暴露了斯大林時代「內務部」在全黨之上。我說，中國也是這樣嗎？我這個五人小組的組長不是我自己當的，是上面指定的，怎麼可以這樣幹？在一個機關，把人關起來，連負責領導「肅反」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天把我抓起來，大家也不知道。這件事情說明當時還是「秘密權力」高於一切，甚麼五人小組，內部指定的，公安部直接來抓人你也不知道。

接下來怎麼辦？我叫李西克直接跟有關部門交涉，立刻解除隔離審查。

他是戴笠手下的特務嗎

李××自己填表，重慶時期在某國際問題研究所之類的機構工作過。於是，說他可能是戴笠軍統。因為國民黨軍統局下面確有個國際問題研究所。

我說，我找他談，他騙不了我的。戴笠下面那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叫王芃生，是個大學者，國民黨頭號日本問題專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他是國民黨駐日大使館的參贊，但實際上大使館他在負責，他才是管事情的。

一般的情報機關都有一些研究機構，情報機關出錢、出地方，聘請一些專家來研究，大體

上都是從公開的報紙、雜誌研究對方。這種研究機構的專家跟特務機關的特務是兩回事，這些僱員、專家不是特務。周總理在延安給我們作過報告講過。

我找了個很隨便的時間，像聊天一樣，對李××說，重慶時期你靠甚麼生活啊？李××是老前輩，據說參加過一九二八年的平江起義，留蘇回來的，懂俄文。我說，聽說你在重慶時期生活不太寬裕，你幹甚麼啊？我說得好像不當回事，他也不當回事，說，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呀。我一聽，就知道他不覺得他那個地方有問題。我說，你在甚麼國際問題研究所呀，所長不是王芃生嗎？他說，哪裏是呀，是王寵惠的呀。原來他去的地方是王寵惠為安置部屬、部屬的部屬等而設立的機構。（或者不是王寵惠，是另一個老資格的甚麼大人物設立的甚麼機構。）

王寵惠在北洋軍閥時期是中國第一個國際法專家，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總理。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前，是國民黨外交部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就把郭泰祺調回來當外交部長，這個時期主要是對美的關係了。郭泰祺，現在對他的評價很高，說是老一輩職業愛國外交家。王寵惠下來後做甚麼呢？國民黨是這樣的，對這些地位很高的老前輩下來以後，都要安個位置，因人設機構，才能在財政部領錢。王寵惠被安排到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黨到了重慶後，南京政府那套機構都得去，去的人都得維持，其他地方撤退去的也一樣，都得設很多機關發錢。像王寵惠，就叫他當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長。搞了一兩百人，也不開會，但是有這個機構，就能向財政部要錢。王寵惠的朋友、學生一大堆，他的這一批人怎麼辦？他早就設立了國際問題研究所一類的機構。蔣在南京時期，尤其是在重慶時期要為很多老前輩設立很多類似的委員會、研究所之類的機

構，用以安置大量的、無業的各方面的人員。

我繼續跟李××聊天。我問，那你們幹甚麼呢？他說，重慶的官僚機構都一樣：抽抽煙，看看報，躲躲警報，都是這三件事。

我跟他閒談後弄清楚了，他根本不在軍統王芃生的研究所。以後又調查了，國際問題研究所，名字大體是一樣，單位不同，不能張冠李戴。一般人只聽說過軍統下面有個國際問題研究所，但是，叫國際研究所的，除了它，還有其他的。李××所在的研究所，就是王寵惠養活他的一些門客的，任何事情都沒有。當然，王芃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裏面的一些報刊研究者，也有傭員性的。戰時，我們一些黨員與進步人士進入英美情報研究機構不為稀奇。

這樣，問題解決了。所以審查幹部的事，我最願意做，我天生負責，負責到底。

「雖然我因你而受到更厲害的批鬥，但我從內心感激你」

鍾遠藩不是我負責審查的，是五人小組另外一個同志負責，但我最後給鍾遠藩留了麻煩。鍾遠藩是在一外文單位黨籍被開除後調到人民社的。五人小組譚士跟我商量怎麼辦，這開除對嗎？我便一起負責審查。

鍾遠藩是廣東人，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後在廣東中山大學搞救亡運動，是廣東救亡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是從外文出版機構調到《人民民主與持久和平》這個刊物的。這個刊物

當時是蘇聯控制的歐洲共產黨情報局的一個刊物，中國每期要翻譯出版。後來，這個刊物全部搬到人民社來了，我們代管。把這種機構放在我們單位，他們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都歸我們管，但我們管不了他們的業務。他們也不需要我們去管，他們唯一的任務是翻譯。

鍾遠蕃在外文出版機構是被開除黨籍的。甚麼原因呢？當時，那個機構的主管某某是蘇聯回來的。在甚麼運動時，鍾遠蕃對他提了點意見。在中國，下面的人對上面的領導人一般地提提意見，一般不會被開除黨籍、說你是反黨，但某某是蘇聯回來，就不行了。對我提意見，就是反黨，開除黨籍。

負責審查的同志問我，你看怎麼辦。我一看，這個處分沒有邊（根據）嘛，下級對上級提點意見，就要被開除黨籍？五人小組一討論，認為要改正才好。但這個問題比較麻煩，鍾遠蕃跟我們不是一個系統，那個機構是國務院另外一個系統，要經過國務院國家黨委轉來轉去。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怕麻煩，建議恢復黨籍。但是，恢復鍾遠蕃黨籍的草稿寫出來，還沒有發出去，就「反右」了。這個草稿可能是我起草的，我簽的名，就擺在他的檔案裏一輩子。他的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後，鍾遠蕃到美國去了——現在還在美國。前幾年他回京，硬要來看我，他比我大幾歲。我說，你來看我做甚麼，你這麼大的年紀了，我來看你。可他非來不可。他說，我可是來感激你的。我說，你感激甚麼呀，你的事情沒有解決。他說，因為你，我在廣東暨南大學被鬥得特別厲害。我說，你被鬥得特別厲害，還要感謝我呀。他說，鬥我鬥得最厲害的時候，他們把檔

案袋裏的東西拿出來公佈，當衆說，你們看，大右派曾彥修想給你恢復黨籍。你不是老反革命是甚麼？這一鬥，我才知道你是起草好了報告，還沒有來得及向上級反映就被打成右派了。他非得來感謝不可。我說，我那是照正常工作做。他說，雖然我因此而受到更厲害的批鬥，但從內心來說，我感激你。

「肅反」涉及的另外幾個人

黃季芳，清華畢業，參加「民先」（是否已入黨記不清了）。他在抗戰中期，作為應聘或應考的譯員，赴印度英軍司令部下設的宣傳機構做翻譯（大概是英譯中）。而英美軍中的這類公開宣傳部門，它們的名字在中國人聽來都很可怕。例如「戰略情報局」之類，其實基本就是翻譯或編他們對日及對盟國的宣傳資料。美國的這類機構更大。不少地下黨員、進步分子都被黨或自己想法進去工作了。這與替美英當特務根本上是兩回事。黃季芳早就講過，這次無非是再講一遍。我之所以一定要把他納入我直接抓的名下，就是怕不懂的人對他不禮貌，亂問一氣。我找他談，當然也要問及歷史，但也是帶着向前輩學習、致敬的神態發問的。如問他這幾年與清華同學于光遠、黃秋耘是不是還有來往之類的。在有的地方，跟黃季芳情況一模一樣的，卻一直遭審查。解放初三年，在廣州我就老聽說一個非常有名的老黨員、漫畫家（名字我記不得了，似乎是黃新波）就這樣。

應××是東北軍張學良的重要政治顧問，在西安事變中功勞很大，是周總理到西安時當晚參加歡迎周總理宴會的幾個人之一。西安事變後，他潛住北京。日本投降前三個月，日本人在北京小胡同中把他抓起來了。他說鮑文樾可保他。鮑是張作霖的同夥之一，當時當了大漢奸，任偽河南省長。鮑出面保他。日本人的條件很簡單，出來當官，放你，不當官，就殺你。結果要他當了三個月的河南省偽財政廳長。他這個人聰明得很，知道日本一投降，日本人就會殺他，他立即逃到冀中解放區。他不願留下來，經過延安指令多給費用，他自願到北平去。解放後，他到人民出版社是周總理辦公室安排來的，別人沒有這個權力，也沒有這個膽量。但是「肅反」一來，這些問題都要翻出來呀！有人主張追究。我說，恐怕不行，追不追究要問總理，所以事情便了了。真把事情弄去問總理，就是給周總理出難題。

還有一個我們管不了。周靜同志，是個男同志，今年九十一二歲了，我們關係一直很好。他是潘漢年系統的，本身就打進了日本特務機關工作。他當過一個上海偽報紙的編輯，還在偽江蘇省教育廳長家裏工作過，這個廳長還派他到日本留學一年。公安部通知我們，這個人的事不要管，他們管。到現在我都弄不明白，潘漢年系統的人處理得那麼嚴格，他卻始終沒有成為「肅反」對象。對這件事，公安部門處理是公平的。

幾十年後，我問過他，潘漢年都被抓起來了，你怎麼沒有事？他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自己審的五個人。戴文葆、黃季芳、李××，另外兩個好像沒有這麼突出，都沒有事。不

屬於我負責的，我也管了，我舉幾個。

我們的總務科長是根據地來的，文化不高，但人非常好，工作踏實，負責得不得了。他寫自傳說，抗戰初他殺過人。他是貧農家庭出身，家鄉是邯鄲附近平漢鐵路西面靠近山地的一個地方，抗戰初期十四五歲。

這麼老實一個人，怎麼會殺人？抗戰初，日軍南侵，全國一片大混亂。他在三不管的地方，地痞流氓厲害。每個村莊紛紛成立自衛隊，二十四小時站崗，外村人進來，一般要殺。他們村也組織了自衛隊，他也參加了。一次，一個人到他們村來偷東西，被抓住殺了。他在根據地時，就講過這件事。

我找他談，問清了當時的情況。我們都知道，當時自衛隊之類極普遍，他也不是殺人犯。他這類問題，根據地時就很多，反覆調查了幾次，也沒有任何證據，他的表現又這麼好。所以，五人小組討論，大家同意我的意見，就相信他本人的說法，在特殊的情況，農村的小孩子沒有飯吃，參加自衛隊。不再作深究了，問題就這樣解決。

另外一個是女同志。我一九五四年到人民社去，她先我半年到，當時二十幾歲，能力很強，字也寫得漂亮，我也很倚重她。當時人事科說她有問題。她填的表說自己參加過讀書會。人事科說，據說這個讀書會是三青團的外圍組織。我說，這個同志愛面子超過其他人，樣樣都爭強，現在向她提出問題，可能要出人命，我主張現在決不去談此事，結果大家同意不談。不說三青團的外圍組織，三青團又怎麼樣？三青團，中央有政策規定，只要自己說明就行了。審查他人歷史，

要沉着冷靜，千萬不要風未來，雨就來了。明明沒事，也會搞成暴風驟雨。

我強調，在運動高潮時去調查這麼一個愛面子的好強的人，事情又很輕微，沒有必要，如果要調查，也要等這個運動過後。再說死了人，誰負責？

我這一生不學無術，無甚麼長處可言，但我一生對人負責，決不亂搞。我在當五人小組組長時，在審這些「叛徒」、「特務」時，沒有發現一個叛徒、特務，也沒有發現一個可疑的人，相反，是把一些人的問題、疑點，統統解決，即作了結論，不存在了。

但是大概半年以後我才知道，我們單位仍被抓了一個電工。這個電工很能幹。我怎麼發現的？因為他經常要來檢查電路，我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着他。我問，我們的電工哪裏去了？說抓起來了。誰抓的，我怎麼不知道？說他是國民黨交通警察總隊的，是國民黨保護鐵路交通的特別警察。這種警察是訓練得很嚴格。當時把它作為特務武裝，現在不知如何看了。

第十七章 反右派運動興起，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號《人民日報》社論之前吧

吹風會上聽到陸定一、周揚傳達毛主席不斷批左的意見

「反右」是政治大運動，在我們國家是一個大轉折，從「反右」，一直到把「四人幫」抓起來，二十年，中國人走的甚麼路？天天暴風驟雨，天天烈火雷鳴，世界無二。敵人幾十百種：「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舊人員」，「右派分子」……人人幾乎都可分入某個「分子」，幾乎人人都可以劃到某種「敵人」中去。「反右」以後，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實際上都是「反右」。

反右派運動，正式興起應該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號《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之前，而不是在之後。「反右」前，中國當時處於甚麼形勢，可以簡單說一下。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大。二十大就把斯大林內部大規模濫殺無辜的事情暴露了

一點，但絕對沒有全部暴露。赫魯曉夫講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一點兒東西，他們連根本的幾個重要人物提都不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布哈林是甚麼時候平反的？一九八九年。布哈林是最冤枉的。儘管如此，蘇共二十大膽敢把斯大林本身不可侵犯的面具多少拉開了一點。哦，原來斯大林並不是那麼神聖啊，他是亂殺人啊。儘管當時對亂殺人仍諱莫如深，但就是那麼樣，大家都很吃驚。為甚麼把跟列寧一起革命的領袖全殺掉了？五個元帥，斯大林殺掉了三個，中央政治局委員，除了自己，全殺了。這個情況和蘇聯整個國家的形勢，我們極少數人知道了一點點。個別的人看到美國的《紐約時報》，傳開一點。蘇共二十大後，朱老總帶回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翻譯成中文，在內部極少數人中傳閱。我也正式得了一本，是小本子，辦公廳直接發的。過了一兩個月，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口頭傳達，這樣慢慢傳開了。雖然並沒有在全黨，或者老百姓中傳達，但實際上全知道了——當然一般工人及農村老百姓還是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內部情況一時似乎有點緩和。這時，宣傳部有一個會議，用現在的話叫「吹風會」，把北京一些文教系統黨內的負責人一兩個禮拜召去開一次會，這個會沒有名字，就通知你去。四個大學：北大、清華、師大、人民大學，還有文化部、教育部、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新聞方面，《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出版界有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共有二十多個人。這個會是甚麼時候開始的？大約是反胡風之前就開始的。情況緊呀，不斷地傳達毛的指示。在反胡風的問題上，陸定一、周揚受毛的批評很厲害。毛批評陸、周的話很尖銳。

蘇共二十大後，宣傳部開吹風會，一般是陸定一和周揚講話。一些事我們就知道一點了。比方說，毛主席在黨內高層講過，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不會發生，英國、法國不會發生。這個話確實講得很對。反過來說，只有在個人絕對獨裁的國家才能發生。當時，給人的印象，毛主席是不是要講一點民主了，要不然怎麼會對斯大林講這種話呢？這可是「要害」啊！這就是說，個人獨裁無法無天，沒有制度管得住啊！

陸定一他們還傳達過，毛主席不斷講，要擴大民主。比方說，我們的人大，是不是也可以開幾個月？美國國會一開就是一年，英國國會天天開，幾個人也開，沒有人聽，一個人照樣講，我們也開幾個月行不行？不說一年十一個月都開會，我們開它幾個月，開它半年，你國務院做你的事，讓他批評，讓他講。

陸定一、周揚還傳達，毛還提出來，大學的黨委是不是可以考慮撤銷？可以成立一個教授委員會，可以搞一個教授治校嘛。我絕對沒有說假。現在，有許多問題死無對證。因為人多不在了，偏偏我沒有死。像我這樣年齡聽見過這些的人，也快要辭世了。

陸定一自己當時對蘇聯的迷信，一下子降了下來。他對參加吹風會的人說，當時，蘇聯一九五幾年的農產總量，還比不上沙俄時代的一九一四年。過去不是講蘇聯集體農莊是天堂嗎？但還不如最落後的沙皇時代。現在，據專家研究蘇聯的糧食產量，快垮台時，即一九九一年，還不如沙皇時代。是陸定一把這個情況告訴我們的，他可能早就知道，這時才漏了一點。當時，陸定一還說，中央決定，以後黨史不由官方來寫，由各方面的學者來寫。這個話，更開放了。

所以，蘇共二十大斯大林這個蓋子揭開以後，中國自然而然就鬆一點。但中國情況特別，一方面鬆一點，另一方面知道鬆不得，反而是更緊多了。首先是一九五六年出了社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過了幾個月，覺得不對，又出了一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第一篇文章是誰寫的？可能是陳伯達。這篇文章，對斯大林的批評多少有一點。〈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胡喬木寫的，收到他的書裏。〈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就變調了，各方面強調專政的必要性，實質上，就是「批修」的開始，根本是維護斯大林的。毛主席也講了，看斯大林要三七開。殺了那麼多人，也三七開嗎？十個人，殺對七個，殺錯三個，也是三七開？歷史證明，那麼無止境地屠殺老革命，全是錯的。

斯大林的「肅反」不是「擴大化」三個字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很多人還是這個態度，只准說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再說下去，你就是修正主義，就是反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目前有發言權的，就是這麼一個態度。人家都說全是假案，中國人還要堅持毛的說法：三七開。即使如此，也是駭人聽聞，絕不許可的呀，錯殺一人即是國家之恥，民族之恥，歷史之恥，殺人一個都錯不得，可以來個「三七開」嗎？「三七開」就可一風吹了嗎？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講了些甚麼

關於反右派問題，已經有某些文章，還有專書。這個問題至今還是敏感的。所以我也不敢

去談，沒有必要自找麻煩。我只是感到一點，講這個問題的，大體上是從一九五七年四月發佈整頓「三風」決定、發動「大鳴大放」說起。但據已公佈的最權威的資料，最帶有根本重要性的文章，似乎並未被怎麼重視到。最高方面共有三次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及二十七日長篇工作佈置性質的講話，題目叫〈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共三十三頁，載《毛選》第五卷三三零頁—三六二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我手邊沒有這本書，是臨時借來的）。誰都知道，這種會議才是真正佈置行動的會議。這些講話是要在決定之後行動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最高方面在中共八大二中會上的講話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的頭上來了。」（《毛選》五卷三二三頁）又說：「（教授）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要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同上，三二六頁）這十分明顯地宣佈了為甚麼要整風：不是整自己，而是要整人呀！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第一句就是「要足夠地估計成績」；已經提名批了農業部長廖魯言，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已經把孔子與蔣介石同列為「反動派」，已經公開批評了舒蕪的小文章〈說「難免」〉等（按：舒蕪劃右派就是因為此文）。下面，我只把彙集的若干段抄在這裏，這些文章報告清清楚楚，錯誤是批評不得的。

有些黨委的宣傳部長不敢宣傳合作社的優越性。農業部的部長廖魯言，又是黨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據他講，他自己洩了氣，他下面的負責幹部也洩了氣，橫直是不行了。（《毛選》第五卷三三一頁）

現在報紙上的宣傳轉了一下，大講合作社的優越性，專講好話，不講壞話，搞那麼幾個月，鼓一點氣。（同上，三三一頁）

我們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幹部中，相當一部份人，出身於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幹部回到家裏去，家裏人就講那麼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富裕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層，他們單幹思想現在又在抬頭，有些人想退社。我們幹部中的這股風，反映了這些階級和階層的思想。（同上，三三一頁）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曾

按：《武訓傳》是在解放前開拍的）（同上，三三三頁）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颳，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同上，三三四頁）

有些黨員，過去各種關都過了，就是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有這樣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個。她原來是河北省的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她是甚麼時候動搖的呢？就是在開始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統購統銷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她卻堅決反對，無論如何要反對。還有一個，就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孟用潛。他上書言事，有信一封，也堅決反對統購統銷。（同上，三三五頁）

在我們軍隊的高級幹部中間，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親屬來，聽到富裕中農、富農、地主的那些話，受了觸動，於是就替農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

黨內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好像只有他們這兩部份人才代表農民，才知道農民的疾苦。……江蘇作了一個調查，有的地區，縣區鄉三級幹部中間，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農民叫苦。後頭一查，這些替農民叫苦的人，大多數是家裏比較富裕，有餘糧出賣的人。這些人的所謂「苦」，就是有餘糧。所謂「幫助農民」、「關心農民」，就是有餘糧不要賣給國家。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誰呢？他們不是代表廣大農民群衆，而是代表少數富裕農民。（同上，三三六頁——三三七頁）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同上，三三八頁）

田裏長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你説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於要田裏只能長糧食，不能長一根草。話儘管那樣講，凡是到田裏看過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動手鋤，草實際上還是有那麼多。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你説它沒有用？可以化無用為有用。農民需要年年跟田裏的雜草作鬥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鬥爭。所謂鍛煉出來的，就是奮鬥出來的。你草長，我就鋤。這個對立面是不斷出現的。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鬥爭一萬年。（同上，三三九頁）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同上，三四六頁）

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後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甚麼《烏盆記》、《天雷報》，甚麼牛鬼蛇神都跑到戲台上來了。這種現象怎麼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醜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台的東西也搬上來了。（同上，三四九頁）

對於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那篇文章（按：舒蕪作），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並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同上，三四九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共產黨，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黨與群衆的聯繫，這些他們都不講了，空氣不濃厚了。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上，三五七頁）

這些都是整風前六個月之內，在內部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覆講了的。現在有些研究「反右派」的著作竟未涉及，就把「反右派」跟着說成是甚麼「反擊」了。

會上發了〈草木篇〉，立即又收回

在正式「反右」前，一九五七年春天還有一個怪事，至今無法理解。大概在三月，開了一次超大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出席的人有一兩千，是黨內黨外的人一起開的。這個會前，原來宣傳部決定要開一個全國宣傳會，一般是地委宣傳部長以上的人來參加。陸定一他們向毛報告時，又被罵了一通。毛說，你們就是關門主義，你們的門就是打不開，我要調來千軍萬馬，把你們那個門衝開。這個話是非常明確的，你陸定一、周揚這些人，都是搞關門主義的。我要搞民主，我要搞大民主。這件事，我絕對不敢亂說半句假話，是陸定一在中宣部給我們傳達的。他們當時也是摸頭不知腦，挨罵之後照辦而已。所以，一下子開了另外一個會，全國黨內外的，一千幾百人，電影方面的著名演員都參加了，這個會我也參加了。

從毛主席批評陸定一、周揚的話看，毛似乎要講一點民主了，但實際上為甚麼要開這個會，到現在說不清楚。我記不得一個報告、發言，就是熱鬧一陣。但這個會有個特點，開幕那天，每個人進場時發一篇〈草木篇〉。這是流沙河的一篇散文詩。這個〈草木篇〉是很怪，文章字面有點陰暗，讓人難猜。當時，每個人拿到後，以為這是一篇「反革命」的典型文章了，可能要在會

上大批特批，要不，為甚麼要單獨發它呢？但是過了兩三天，這篇文章又被收回去了。

為甚麼要收回呢？現在來看，可作兩種解釋。一種是，如果立刻展開批判，妨礙開會；另一種是，如果立刻批判，以後的「毒草」就不會出來了。這個文章一批可能甚麼「毒草」都不放了。如果用當時毒草的標準來看，〈草木篇〉確實是一篇大「毒草」，當時甚麼都算毒草，何況你這個〈草木篇〉，文筆陰沉。這個我不怕得罪流沙河，流沙河這個人很好，十分博學，現在還在。前若干年，在成都我見着他，我跟他說到這次會，我說覺得是要把你打死，後來又收回去了。發出又立刻收回，我鬧不清楚是甚麼意思。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大大誇獎姚文元，大家都反感極了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大概開了十來天。其間，毛主席還分批接見了各界人士，有電影界、作家界、新聞出版界等等，一個上午接見一批。

我是新聞出版界被接見的二十個人之一。接見的目的是甚麼？到現在我也不清楚。我們二十個人在會議室，毛主席來了，陪着的有兩三個人。毛始終跟幾個人談話，一個人是《文匯報》的負責人、大右派徐鑄成，《新民晚報》的趙超構，還有上海中華書局黨外的負責人舒新城。毛跟過去認識的人閒談，沒有談甚麼正經事。接見了兩個小時左右，東拉西扯的。唯一記得一點，在這個會上，毛特別介紹了姚文元。所以，姚文元並不是在一九六五年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才出

來的。毛突然說，姚文元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他都看。他問大家，你們看過他的文章嗎？毛還推薦說，你們可以看看他的文章。可是上海來的幾個人無一唱和。在座的人，沒有人能回答，只有上海來的兩個人知道姚文元。那天接見的，有京滬報紙、出版社的負責人，地方的，有一個《山西日報》負責人吳象。這個同志現在還健在，我們兩個可以作證，其他人均作古了。

毛誇獎姚文元，大家聽了都覺得莫名其妙。怎麼中國之大出現了一個新的魯迅，都沒有聽說過，沒有人讀過他的文章呢？散會後，走出門，我們出版界幾個人走一路。黃洛峰（當時擔任文化部出版局負責人，一九二七年的黨員，出版界最老的黨員）、金燦然（出版局）、王任叔（人文社社長），還有我，我們三個人議論起來。毛主席說的這個人是誰呀？這時，王任叔一下子很生氣地說：姚蓬子的兒子！王任叔說這話時，又生氣，又輕蔑。姚蓬子的資格很老，也是個黨員，後來自首了。王任叔還知道姚文元的其他情況。他說，這是根棍子，在上海專門打人的。王任叔的口氣是厭煩透了，氣得發抖。這一下子，大家太吃驚了。毛主席，以全國思想領袖、國家領袖，以從來沒有過的偉大身份，在黨內外新聞出版界經過挑選的單位領導的接見會上來推薦姚文元，到現在，我也想不通，覺得太莫名其妙了。這些人不會因此就捧姚文元的呀，不可能呀，辦得到嗎？金棍子，銀棍子，專門打人的棍子，怎麼能叫人人一下就會對他拜倒呢？

這件事表明一個問題：這個會是真正主張雙百方針、主張開門，還是學習姚文元？是學習姚文元就是極「左」，就是打人。這件事，當時就讓人覺得受到極大的污辱。說是開雙百方針的會議，怎麼最高領導出來鄭重其事地推薦姚文元？還說，你們不知道吧，他的文章在《解放日

報》，我建議你們多翻翻《解放日報》。也就是説我們要永久拜姚文元為師。當場我就極不高興，王任叔也極不高興，沒有一個人的臉色好看。我估計恐怕沒有人會接受這個勸告。在座的人，不會因為你老人家推薦姚文元，大家就去捧姚文元。這叫怎麼回事呢？這不叫人晦氣嗎？

這次上千人的會，是動員大放，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究竟是釣魚的會，還是真正讓大家開口的會，現在很難説。但從這兩個象徵，一是發了〈草木篇〉，立刻收回，二是鄭重推崇姚文元，是不是可以看出一點甚麼？不過，我覺得老人家鄭重向這麼一批人推薦姚文元，未免太主觀和滑稽了。這一批人不是小學一年級學生呀！

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黨中央正式發佈整風決定前的情況就是這樣。各種情況都有，一個是開，一個是收，一是發動你講，一個是不准講，鬧不清楚。下面我先按公式講：黨中央發表決定以後，「反動派」就趁勢進攻。

中央正式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好像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四月底，是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大家對黨提意見，從下到上，從普通黨員到毛主席，都可以。

這個文件發佈後，全國就真正熱鬧起來了，每個單位幾乎都動起來了，中學、大學，還有科研機構，各大機關，立刻大字報就鋪滿了。解放後，大字報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以後就不可收拾。

第十八章 我這個「反右」五人小組組長，絕沒有整別人一點點，首先把自己報成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九六零年六月）

人民出版社的「×、×事件」

我們單位的大字報也鋪滿了，大房子，小房子，走廊上。天天號召，不貼不行。貼甚麼事情呢？沒有一篇是批評我跟王子野的。王子野是個好人，品德上挑不出毛病。當時首先整的，幾乎全是個人道德方面的問題，作風問題。既然你們兩個頭頭都沒有甚麼大問題，怎麼大字報貼得地方都沒有了，連辦公室裏邊都貼出來了？當時叫「×、×事件」。×呢，是出版部主任，是比較老的黨員，在國民黨地區幹出版十幾年，成績優異。在人民社，工作非常負責，就是方式比較簡單，對人講話不太和藹。×呢，叫×××，原來的人事科長，貼大字報的時候已經因為自己多次修改自己的歷史檔案，被調到甚麼科做科長了。人民出版社鬧來鬧去，始終就是這兩個人，就鬧

他們，後來變成了我。不過，對我是空洞的，說我要推翻黨之類的。

反對他們，跟我有何關係？整風開始時，我為了表示反對宗派，成立了一個整風學習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除我們五人小組之外，加了幾個人，其中就有上述這兩位，另外還有兩個黨外人士。這一宣佈，就像炸開鍋了一樣，集中力量反對這兩個人當學習委員。所謂學習委員本是表面文章，就是掛個名，開開會甚麼的，但廣大群衆就是以這個為題目，正好抓住這件事反對這兩個人，要求撤掉他們學習委員的職務。為甚麼要求撤呢？全是借題發揮。×主任的問題要簡單一點，主要是工作方式問題，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校對科一個女青年突然起來揭露一件事情，說她有一次到×的辦公室，×忽然對她說，「儂面孔把我香香吧」。×是上海人，意思是讓我親親可以吧。這個話當然不對，照現在來說是語言性侵犯。這個女同志起來揭發後，單位內很緊張，比核爆炸還厲害。五人小組研究很多次，認為一般女同志，不大會說這樣的話，又沒有深仇大恨，何必去造這樣的謠呢？我們半信半疑，支部開了幾次會，×說沒有。我想，解決不了，我自己跟×談吧。我說，兩個月了，越鬧越兇，即使有，道個歉，就完了。我說，這個事情，根據我所了解的，黨內不會有甚麼處罰的。談了兩次，×都堅持否認，說沒有。這件事情不大，但容易引起義憤，像海嘯一樣。

×××的事就複雜多了。「內部肅反」大約一九五七年初就結束了。一九五六年冬天，按照當時的規定，五人小組每個人都要作一次鑒定，很嚴格。×××不是五人小組成員，他是固定的參加者，因為他曾是人事科長，很多材料要他提供。五人小組成員作鑒定時，我發現一個問題。

×××的表格入黨時間填的是一九四零年。當時根據地是沒有嚴格按照黨章的規定滿十八歲才入黨。十七歲、十六歲，甚至十五歲都可以。但十四歲，還是兒童團，提前到這個程度，令人生疑。我找到我們的秘書長周保昌。我們單位沒有資格設秘書長，秘書長制度是上級在人民出版社為周保昌特設的。他一九三六年就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黨，把他算副社長，上面又不願意給他這個名義，辦公室主任，好像又小一點，所以，給我們單位設一個秘書長。我說，保昌同志，你在延安時聽沒聽說過根據地有十四歲入黨的？我知道年齡的規定不是死的，但是，早到這個程度不太可能。我說，你是不是把他的表格找來看一看。奇怪的是，×××的檔案就在他自己那裏，很快就拿出來。而人事檔案的管理有規定，人事科長的檔案自己不能保存。

我、王子野、周保昌我們三個一看，眉頭立刻皺起來了。很多張不同時期填的表，入黨時期最後一個字都改了，由一九四五年，改成一九四零年，提前了五年。那麼一堆表格，統統都是這個字寫錯了，統統都是這個字看不清楚改了？很清楚，統統都看得出來，「五」改成「零」。所以沒有疑問，清楚得很，是一九四五年入黨的，他自己改成了一九四零年。於是找×××來談，讓他解釋一下，他解釋不了。我們說，你修改了自己的黨齡，提前了五年。他沒有一句話，承認了。這個事，我們在黨內根本沒有公開，上級批准更換人事科長。我們讓他管點總務，原來管行政總務的來當人事科長，只是換一下。

這件事，就發生在整風前幾個月。這麼一調工作，群眾就知道這回事了，就傳出去了，×××自己修改檔案被發現。群眾要求罷免他，我就難處理。我這個五個小組組長，接受群眾意見，

把他們兩個撤換下去，這對他們兩人的威信打擊太大。我們還要請示上級，上級肯定不贊成。

成立整風學習委員會，我沒有想到鬧下這麼大的麻煩。後來各組開會，特別是行政部門，非拉我去不可，我不去，就不開。我去，有的拍桌子——不是拍我的桌子，是拍他們兩個的桌子——罵他們。鬧了兩個月，整天鬧，發展到簽名罷免運動。有些團員也簽名，後來連累團支書吳道弘也被劃成右派，說他帶領一團人「叛變」。吳道弘非常溫和，工作老老實實的，是啥子右派?!

這樣一來，規模就越來越大。大到甚麼程度呢？大到有人在單位裏放言，要到天安門去示威。到天安門示甚麼威嘛，示人民出版社前人事科長的威？那天安門就擠不下了。不是滑稽嗎？還放出信息，要搶人事科的檔案。這不能怪群衆，群衆會想，你人事科長改了自己的檔案，給我塞些甚麼東西，我哪裏知道。太危險了，動了衆怒。

當時出版署沒有了，我們屬文化部管。我給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彙報。陳克寒原來是出版署的署長。他也很忙，但我還是說，我就談幾分鐘。他說你來吧。我把情況給他講了，他說，有甚麼奇怪，戲劇學院、美術學院，還有別的地方比你嚴重多了。他叫我硬頂住，怕甚麼嘛。他比我大幾歲，入黨比我早幾年。我說，他們要去天安門。他說，他們去，你跟着去，一起去就是了嘛。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這個話是甚麼用意。如果人民社的人真的去了，我跟着去了，那我腦袋早沒有了，會僅是一個右派問題？陳克寒這個人，大家恨他恨得很，認為他只會整人。

一九七八年我從上海調回北京，想去看看他，遇到老文化部人事司的司長。他說，你不要去。我說，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三次呵。他說，你不要去，你以為你去是安慰他，說不定他還會罵你是右派，你改正了他還會罵你。後來，接到他追悼會的通知，我還是去了。

我們單位在中央整風文件出來後，轟轟烈烈鬧了三四個月，不得了，其實就這兩個人的雞毛小事。

內部通知片片來

就在我們單位鬧「×、×事件」期間，一九五七年六月八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這個文章出來後，在人民出版社並沒有甚麼影響，因為我們並不涉及這些問題。

但是，逐漸地，內部的風聲比較緊了，我也覺得不對了。好像六七八這幾個月，不斷地收到毛主席寫的內部意見，這些意見都是作為特別文件送給我一份的。現在，毛主席寫的文件很多都公開了，但其中一個文件，我始終沒有見到。我記得清楚，大概意思是：右派是一群吃人的狼，這次必須把這些狼的背脊骨都打斷。其中還有這樣的話：對有的人，還要把他祖宗十八代的醜事全部拿出來公開。好像還舉了具體的人名，一個地方實力派的大頭目，我這裏就不舉了。這個資料，我沒有看見哪個材料用一個字。難道是我的腦子憑空捏造的？我想不出來。毛選五卷也沒有這件東西，不知是不是由於技術性的原因，把它漏收了。因為其他幾個相當尖銳的指示是收了

的。

在這些內部意見中，我也看見了劃右派有比例，有百分之二三，有些單位，可多到百分之十。我們人民社一共有多少右派？我不知道，因為我的右派是我自己第一個報的。接下來的事，我就全不知道了。

我的右派「根據」：黑板報上的「談話」，《人民日報》座談會上的發言

這時，我們單位的黑板報記者張梁木來訪問我，他的目的是要說服我，何必在×、×問題上堅持呢，要我接受群衆意見。他的用心不壞。這是個星期天，他在我家裏跟我談的。我不好隨便回答，這兩個人的問題我實在解決不了，撤銷他們學習委員的資格，出爾反爾，對這兩個人的打擊也太重。如果兩個人吃不消，出了事情，也不行，我怕出人命案啊。要改變這個決定，要請示上級。而且在這個問題一犯錯誤，也是個大錯誤，說你在群衆面前投降，是投降主義，不也一樣嗎？我為了避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故意找一些大而化之的問題來應付他，問題就出在這裏。我以為我這個話是聰明的，因為我談的事，是普遍真理，人人都可以談，沒甚麼稀奇的。我以為是王顧左右的言他。我談了甚麼呢？我說，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就這麼回事。

我說，整風是很重要、很必要的，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值得注意。以國民黨而論，國民黨一九二七沒有上台的時候，開始威信比較高，把多數的軍閥打倒了。老百姓不知道它會變成一個

新的獨裁者。我還把經過講了一下，說蔣介石堅持內戰剿共，特別是「九一八」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他在內部也不准宣傳抗日，到一九三五年訂「何梅協定」，連國民黨的一切力量也得撤出華北了。這個時候，由於打內戰，堅持不抵抗，老百姓就很反對蔣介石了，就要打到他了。我還糊裏糊塗地引用了兩句杜甫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說，這兩句詩很有教育意義，我們共產黨，在山時的泉水是清的，出山後的泉水也是清的。但是，好像沒有在山時那麼清了，所以要注意一些問題。我講這些時，是大而化之的，我想這個是一般公理吧，有甚麼要緊呢？

這一談，談了一兩千字。稿子整理出來給我看了，沒有歪曲我的意思，我修改過，在單位黑板報發表了。這一發表，在單位裏變成了原子彈，所有的人都擠去看，群衆高興得不得了，說老曾敢講。外單位的人也擁來了。文化部也來了，宣傳部也來了，上級那麼多單位來看，天天圍着，幾百人，像鬧市。儘管如此，我也沒當一回事。但這在北京成了爆炸性新聞，認為曾某人大逆不道，竟敢講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

其實我講的是公理，過去的歷史書都講過，哪本舊歷史書不講呢？哪個朝代上台來不講前朝的得失，不講自己要小心呢？所以我認為我講的不過是普通的話，應酬話，甚至是應付話。

我的這則談話，現在還在，因為宣傳部全文印出來了。宣傳部有個內部刊物叫《宣教動態》，不定期的，大字，四頁。《宣教動態》就是專門登後來都被劃成右派的人的言論。但也例外，有很尖銳的，像北大教授傅鷹的，登了幾次，後來他沒有劃右派，毛特別提了的。

我現在也說，我的這則談話，沒有一個字是錯的，精神上沒有錯，文字上也沒有錯。但是，

事情就爆發了。就是說，你共產黨員根本沒有資格講黨中央，只有資格講自己怎麼不行。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還是五人小組組長，我們單位反右派的動員報告還是由我反覆做的。除了黑板報的事，後來還有一件出問題的事。這件事情早就出了，只是這個時候才被上面提起。在到處大鳴大放期間，《人民日報》召開的某次座談會把我叫去了。座談會的目的當時我也不清楚，其實就是釣魚會，希望你講幾句，然後給你誇大，登在報上。因為預備的右派分子越多越好。我發言批評文化部的陳克寒個人。我說文化部個別領導太不講理，像陳克寒同志，誰吃得消？他動不動就要人寫書面檢討。我去人民社工作不到半年，要我兩次寫書面檢討，我當然沒有寫。

要我兩次寫檢討是怎麼回事呢？我去不久，一九五六出版了《蘇共二十大文獻集》。在我去之前，一九五二年蘇聯開十九大，第二年一九五三年，十九大文獻集中文本出版了。蘇共二十大後，我照章辦事。但是這次是批斯大林。陳克寒認為，批斯大林的東西不能出，就要你寫檢查。我依樣畫葫蘆有甚麼錯？還有一次令我寫書面檢查更亂來。我們黨的老前輩惲逸群，是潘漢年的同事，在日本投降後撤退到根據地。那時不能不撤退，因為他是打進敵僞機關的，不撤退，國民黨說你是漢奸，會抓走的。他在蘇北的時候，寫了本書，叫《蔣黨真相》，印成小冊子，內容非常實在，很豐富，而且把一些根本沒有人弄懂的事，講清楚了。有人提議出，我們就以三聯的名義重印了此書。陳克寒說，重印這個書，又是個政治錯誤，要我寫書面檢討。為甚麼要印《蔣黨真相》呢？舉其中一個例子就清楚了。蔣介石跟江浙財閥究竟是甚麼關係？我們都講蔣介石是

依靠江浙財閥的支持發家的，蔣介石是保護江浙財閥利益的，但他們究竟是怎樣相互利用的，誰也沒有說清楚過。江浙系銀行財閥跟蔣介石是怎麼個關係呢？比如蔣介石要向江浙銀行借八百萬的現金，給的債券卻是一千萬。江浙銀行的債券一出去，立刻就賺了二百萬。公債每年都要還利息，由政府擔保，用稅收來還。蔣介石剛上台時，是靠江浙財團借給他錢，而江浙財團越吃越飽，越吃越富，在公債上，既吃回扣，又吃高利息，因此，蔣介石跟江浙財閥的利益分不開了。這個東西，我們過去都講，但卻不懂得道理，而《蔣黨真相》解釋得清清楚楚，連中學生都看得懂。

陳克寒要我為《蘇共二十大文獻集》和《蔣黨真相》寫書面檢討，我當然不理他。陳克寒下面的一個司長金燦然，陳克寒也要他寫書面檢討，他也沒有寫。

在《人民日報》座談會上，我講了陳克寒的事。我說，陳克寒動不動就要人寫書面檢查，而且沒有理由，還不准申辯，他好像要把文化部變成「武化部」似的。這個挖苦得厲害，但只是挖苦陳克寒一個人。後來《人民日報》登出此事，加小題目說，「曾彥修說，文化部是武化部」。《人民日報》這個標題，當時是一種標準做法。當時，一是要遵命誇大，製造毒氣；二是必須有意歪曲。因為在反右派，需要敵人，必須製造「毒草」。說「曾彥修說，文化部是武化部」，這當然從根本上曲解了我的意思。

這時《人民日報》的主持人已經變了。原來的主持人是鄧拓，他就是因為不積極搞這一套，領導不滿意，把他罵了一通，說他不是書生辦報，是死人辦報，大概在五月間就把他這個死人總

編輯撤了，變成了吳泠西。一九三九年，在延安馬列學院，我同吳泠西曾住過一個窯洞，原來似乎也是很沉穩的。若干年前，吳泠西寫過《十年論戰》，堅持中國「反修」始終偉大。這個人，是我所看見的「一二．九」、「三八式」裏邊最徹底的，恐怕也是全國範圍裏最徹底的，百分之百地為六十年代那些「四海翻騰雲水怒」辯護，百分之百地堅持中國始終是對的人。他聰明得不得了。為甚麼會那麼被看重？不清楚。很多會，只有三幾個人參加的毛的小會，他也參加。這不是我造謠，是他多次的自述。這一點，讓他終身感激，始終不變。

因此，這種「曾彥修說，文化部是武化部」的標題，總編輯肯定是要看的，這個標題把我的意思改變了。那個時候，全國報紙均如此，我不當一回事

我現在怎麼看我的這發言？對文化部，我沒有這個意思，對文化部的領導，特別是錢俊瑞，我非常佩服，我只是不佩服陳克寒一個人。但是在那樣的會上，講這樣尖銳挖苦的話，是完全錯誤的。雖然我指明的是陳克寒，但是話本身傷的不是一個陳克寒，傷的是文化部，是文化部的部長們。所以，我對文化部的錢俊瑞同志，對文化部的其他同志，現在還是要道歉。錢俊瑞是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沈雁冰是部長，掛名的。我對錢俊瑞，絕對不會說這個話，我很尊敬他。那篇黑板報上的講話出來後，我已經在右派的邊緣，是沒有正式定下右派的右派，他還讓我去參加五人小組長會，這不是所有的上級都辦得到的。錢能夠辦到，錢的膽子大，也有見識。

相當一個時候，我的五人小組組長沒有被撤，文化部開五人小組長會，佈置這樣，佈置那樣，我照樣出席。有一次，開會傳達甚麼，錢俊瑞還是沒有把我當右派看，還是叫我去。這次

會就是傳達「文化部，武化部」問題的。上面發話了，文化部受到了批評：右傾。（恕我不能談了，只能以此二字示意。）

領導說，人家在罵你們是武化部了，我看你們一點也不武化。意思是說，還不動武。這個傳達我在場，這個我造不了假。這個東西應該有記錄稿，可能檔案裏還有。

田家英確曾暗示過我，少說點

這裏，要提到田家英。田家英對我不是明白警告過，只是較明顯地暗示過，但我當時沒有很好地體會這個暗示。李銳同志多次在公開場合下說過，田家英曾多次談起過，他叫曾彥修少說點，但他還是要說，闖了禍。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反右派勁頭很大的時候，田家英為了出版毛的甚麼著作到人民社來催。他來時，我對他講，做一個單位的小頭頭，柴米油鹽一大堆，甚麼亂七八糟的事都得管，這種日子不好過，吃不消，我幹不了。我說，我到你那個單位去好不好？那個時候，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小單位，他是副主任之一，陳伯達是主任。我說，我到你那裏掛個名，當個研究員吧。他說，到處都一樣。他問，你住在哪裏？我說拐個彎就是。他跟我到我家裏，沒有吃午飯。當時他主要談《人民日報》的問題，提到「救報運動」。他說，毛主席對《人民日報》批評得非常嚴厲，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就是「大鳴大放」不放手，並說現在少說話為好。這句話只能說

是意到而言未到。

談到我的調動問題，田家英説，現在人員調動已經停止了，而且你要離開人民出版社，首先要得到×××的同意才行，新聞出版一直是×××在管。我沒有辦法把你弄到我們單位來。

當時，田家英在一定程度上暗示過我，很緊張，鄧拓挨整了，意思要我少説話，這個事是有。但是跟着要來一個反右派，要大整，他可能當時也並不知道。他也不會告訴我這些。只是暗示我，少説點。

田家英提醒我這事，李鋭同志講過多少次。每次見面，李鋭都説，田家英給我講過多次，他警告過你，不要説，你偏要説。我説，我也沒有説甚麼呀。

當時我確實沒有理解田家英講這些話的意思。即使理解，我也難辦到。我講的話，不是普通老話嗎？一個新政權要注意前朝滅亡的原因，這無非是説二加二等於四嘛，歷史上不知已被人説過千萬次了。

中央級的新聞、出版社的負責人，似乎沒有一個跑掉的，一鍋端

這次，事實上在劫難逃。中央級的新聞、出版社的負責人，似乎沒有一個跑掉的，一鍋端。北京中央一級的大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有《大公報》，全國性的大概就這三個。説《人民日報》的鄧拓是死人辦報，立刻撤職。還好，鄧拓的右派沒有掛上。寫《鄧拓

傳》的夫婦前幾年來過，說他們非常感謝鄧拓，如果鄧拓按《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做，也是這麼大幹，鄧拓少不了戴右派帽子。鄧拓一戴右派帽子，《人民日報》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戴帽子。很多人很感謝鄧拓，雖然上面壓得很緊，他始終懷着戒心頂住不亂來。但是，鄧拓是何許人呀，他是個老前輩，經驗多，善觀風色，穩當不動，我怎麼能同他比呢？《人民日報》有兩個副總編輯自殺，一個是×××，還有一個女同志××。鄧拓總編輯算好，暫時高掛，不管版面了。《光明日報》就不得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都是大右派。儲安平後來失踪，到現在也沒有弄清他是怎麼失踪的。《大公報》，黨內的負責人，實際上第一號人物被劃成右派，名字我忘記了。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因為有人巧妙地說了話，沒有劃成右派。張黎群跟我熟悉，在延安同一個窰洞。當時中央劃右派是花了幾個星期討論的，民主黨派也好，新聞出版界也好，樣板人物，哪些要劃，哪些不劃，都討論過。當然，我也是經過討論的。具體的情況後來知道了。張黎群告訴我，要劃他右派時，有人起來保了他，說，張黎群這個人，沒有甚麼頭腦，人家說東就是東，說西就是西。然後很快把張黎群派到陝北米脂當縣委副書記。

出版社這邊，人民出版社，是我。人民出版社不是簡單的人民出版社，當時用人民、三聯、世界知識出版社三個招牌出書；人民文學出版社是馮雪峰，雖然馮雪峰是剛剛解除了社長不久，但是，他的聲望、地位在那裏，劃了他，沒有劃王任叔。當時新成立的一個全國性的通俗出版社，出版比較通俗的讀物，面對農村，面對基層，社長楊賡，副社長蘭鈺，都是右派。楊賡還是名人，大作家、大記者，楊賡自殺了。楊賡為甚麼經不住？我有點不大理解。他受的鍛煉比我多

呀！通俗出版社才成立半年多，反右派後就合並到人民社了。當時只有這幾個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負責人就是團中央的宣傳部長，對人很和藹，中國青年出版社，還管一個少兒出版社。這個社的負責人朱語今也劃為右派了。

當時，北京主要的新聞、出版機構沒有一家跑掉的。一號人物走了，二號人物頂。一般是劃第一號人物，或者兩個一起劃，在劫難逃。這是掃蕩戰，統統掃蕩。只有一個單位例外——新華總社。新華總社正副領導好像沒有一個劃右派的。道理在哪裏？新華總社都是×××直接領導的，任何一個問題，任何一篇文章，都是他改過的。其他的報紙、出版社，都是間接的，新華社是直接的。如果新華社的正副領導都是右派的話，×××天天抓，面子放在哪裏呢？二十五年後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也是如此。

這就是當時一鍋端的形勢。這是個徹底的殲滅戰，徹底的掃蕩戰。現在全國的人不太知道了，哪裏知道共產黨內部的消耗，自己消滅自己，比任何國家都厲害。似乎一個人，只要有點知識，有點文化，都不可靠，有點意見，更不可靠。

報右派名單，我把自己報上去。我自高自大想，我一個是不是可以頂兩個呢

緊張局面已經出現了，在社會上也已經聽見一些風聲了。當時劃右派的範圍擴大得很，有些人不挨邊，都是右派。我們單位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只是估計要出大事。在這種情況下，我感覺

闖禍了，闖下滔天大禍了，說不定要被抓起來。

我建議開個黨支部大會，這個會大概是在七八月間開的。當時我們全社只是支部，不像現在，動不動就是黨委。開會的時候，我就檢討了。我說，黑板報那篇東西是完全錯誤的，不管我主觀怎麼想，客觀上引起的反應，就是現在這種情況，許多部門、許多地方都派人來看，客觀效果非常不好。而且客觀上是有利於右派進攻的。我說，我認識到我是臨陣投降，我是五人小組組長，應該帶領單位去跟「反黨」的人鬥爭，而我的那篇東西，得到所有「反黨」的人的極大歡迎。我知道情況的嚴重，我在黨裏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了，我請求按照黨章最嚴重的處分，留黨察看兩年。先不要開除黨籍。我這個發言是真心還是假意？按照習慣，按照思維定勢，它當然是真心；不過，它是純粹按照客觀形勢不得不講的，又可以說是一種被迫的政治表態。

我們這些人，自己出了事，自己要扛着，知道越辯問題越重。

那年七月，幾十天不下雨，那幾十天熱死人。我講了後，會場的氣氛非常緊張，事情來得太突然，不知道怎麼辦，沒有人發言。人人知道，曾某某不是反黨，他講的這些東西，是引起了一個高潮，但大家也不知道這個應該算甚麼，嚴重到甚麼程度，應該受甚麼處分。全社雖然鬧得稀爛，進攻的矛頭始終只有一個科長，一個處長，根本無一字涉及高層。我以一個老運動員的身份知道，我那個談話一出來，一被抓住，說不定丟腦袋都可能。說在右派進攻時，你帶頭，你鼓勵，而且話還說得很重，跟蔣介石政權的興亡來對比。

這個會沉寂了很久。這樣沉寂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呀，我心裏特別着急。算好，我們裏邊有一

個老同志周靜出來解了圍。我跟他的關係始終非常好，他今年九十二三歲。他是潘漢年系統的，是我們單位唯一一個一九三六年抗戰前入黨的老同志。他平時很穩重，甚麼事都不怎麼發言。他大概看到情況不妙，站起來了。他是蘇州人，軟綿綿地說講了幾句：曾彥修犯了嚴重錯誤，錯得不得了。他不是臨陣投降，他是臨陣倒戈。我聽了後，心裏放下來一點。為甚麼呢，這種會，上級要派人參加的，還要去彙報的，如果始終沒有人發言，或者發言的人說得太軟了，那後果就不得了了。周靜是動了頭腦的，把話說得厲害一點，說明這個支部水平很高，這個支部不包庇曾某人。我非常感謝周靜。不要看到他表面把我講得很厲害，實際上是幫了我。這個會議，沒有他的意見，怎麼向上級反映？說不定就解散這個支部了，說你們都是曾某人的尾巴，不但不批判，還同情他。

這樣一來，這個場面算是應付過去了，不然就收不了場。後來，周靜在以後一個關鍵時候又解了一次圍，此是後話。

這時，還是沒有撤掉我五人小組的職務，我還是五人小組組長。我們單位的「反右」，還是在我的領導下幹，上面催報人民出版社右派名單時，會議還是由我召集。五人小組開會議論了兩三次怎麼辦。我就提出來把我的名字報上去。我說，光報別人不報我不行。當時，我還有個想法，可謂絕對主觀主義。我想，把自己報上去，我一個是不是可以頂兩三個，是不是可以少報兩三個呢？實際上恰好相反，既然頭頭是右派，下面的右派必然更多。

我提出兩三次，沒人表態。後來，譚士說，那只有照老曾這個說法報上去吧。再說當時大家

都沒有想到事情會這麼嚴重。

人民出版社第一批右派名單的報告，是我起草的，我的名字也是我自己寫進去的。當時沒有第一批、第二批的說法，以為就是一次過。當時提了幾個人，我已記不得了，不會超過四個。今天的人會奇怪，為甚麼要自己報自己。我以為沒有甚麼奇怪的。你如果處在我當時那個地位大概也會如此。因為覺得自己把事情鬧大了，得想辦法收拾，談不到甚麼可貴之處。

我起草報告大概在七八月。六月八號，《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反右」已經轟轟烈烈鬧了很久了。上面沒有明確表態，是在作準備工作。名單報上去後，也沒有跟我談話，沒有甚麼進展。突然有一天，也是在八月，我從人民出版社後門一進去，單位所有平房，一個空的大操場，裏裏外外貼滿了標語和大字報，一些標語的標題字大概有一平方米那麼大：打倒右派分子曾彥修。大字報可能有幾千張。看來，沒有個把月的準備是辦不到的。我向來不看，一張不看。我倒不緊張，我知道這件事總是要爆發的，但我沒有想到有這麼大的規模。過去沒有挨過多少整的人，看見這個規模，可能要嚇得自殺。我不怕，「特務」都做過，有啥稀奇的，無非是再來一次就完了。我當時非常鎮靜，不當一回事。後來才聽說，當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經廣播了，第一條，廣播得很長，曾彥修是個大右派。

當天，即我看到大字報的當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第二條，用佔五六行字的黑體字登了一條消息，標題叫「曾彥修腐化變質」，副標題我就不知是甚麼了。標題是當時最大字號的標題，字是臨時用木頭刻的。這條消息我只看了題目，內容沒有看一個字，到現在也沒有看一個

字，確確實實的。稱我「腐化變質」，何必要看。一直到去年，我們單位一位同志找到這個報紙，複印給我看。我說，我不看，我一生也不看，就是現在重新處罰也不看。我知道裏邊可能會講些甚麼內容，我看它做甚麼呢？

我是在共產黨裏見報的第一人。不知道從哪個方面考慮的。後來有人開玩笑說，你是黨內的右派狀元。這個狀元可不好當，作為典型示範，批鬥的時候長，有半年。為甚麼是第一個呢？我現在確實說不出道理來。論地位吧，中央監察部副部長王翰劃了右派，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劃了右派了，馮雪峰、丁玲、艾青，這些名人也劃了右派。無論從哪方面數，比起他們來，我算甚麼呢？小蘿蔔頭而已，但宣傳規模卻很大。一九五七年九月後，我的「標準相」作為新聞照片，全國到處貼。這個照片我沒有看見過。過了六七年，一九六四年我回四川萬縣我哥哥家看母親和哥哥，走在街上，有些人認出了我。

我這個「自報」對不對呢？我認為很對。如不自報，我就要成為「反右」小司令。如果要我把史枚、戴文葆、王以鑄、彭世楨、吳道弘……這些人打成右派，我恐怕會自殺。因為我的右派是前奏曲，以後我就一事不知了。

今天可以明確地說，對我的批判完全是我不得不設法拖延時間的

從此後，我就自然作為一個批判對象了。在單位批，在文化部大廳裏也開過一次會批，各單

位的人，加上領導一百多人。這是表態的，沒有火力，前輩無人發言。我們單位的批判，要幾個月，老油條了，我估計得到。在批判當中，有一點是比較明確的，即沒有人會問我：有甚麼人支持你呀？有甚麼組織呀？只要沒有這些問題，我是應付得了的。了不起，我統統承認。

批我，上面知道弄不出甚麼大政治陰謀問題來，也沒有甚麼人來管這些事，由我們單位管。五人小組誰來管我的事？陳原。讓陳原來分管我的事，我就知道沒有甚麼大事了。陳原是一個學者，一個新黨員，好像是一九五三或五四年入黨的。他來抓我這個事，就表明沒有把我當成了不起的政治黑幫來抓，無非是批判會總是要開的，開三次五次是交不了賬的，總要開好幾個月才說得過去。

對我的批判，我配合得非常好。今天明確地說，這個批判在相當程度上是被我牽着鼻子走的。我必須這樣做。我知道批判會不是幾次的問題，起碼要開半年。半年沒有東西，怎麼開會？要我寫交代，就是寫檢討。好在我知道一些理論條條，知道馬克思主義有史以來的一些「修正主義」理論，我就有計劃地寫了厚厚十幾頁，兩個禮拜交一次檢討。列寧批評的那些東西，我都有。馬克思批評的，我都有。不找這些東西穿在身上，大家都難開會。我用這個辦法，單位的批判會就真的照這個辦。我把檢討一交，他們就組織一批人來看，然後開會來批。就這麼樣，一次一次地，全是書本戰，空對空，最後這個會就沒有甚麼勁頭了。那個時候，也不是真正要開甚麼批判會，但過場必須走，每次前後不過兩個小時。因為在露天開會，集合人也需要二三十分鐘。兩點鐘開會，兩點半能到就了不起了。一上來，口號叫半天，比「文革」差一點。口號不能不

叫，要不然這時間怎麼過？一陣口號後，一個人做主要發言。其實這個主要發言，也就是在我的指定範圍內，找材料來批，如反馬列主義，修正主義等等，其他組織上的陰謀找不出來。這個人發言完後，又一陣口號。這樣的批判，搞到一九五八年的一月春節前就開不大下去了。

這時，我們單位還有一個重要的人要批。這個人從美國留學回來不久，原是白崇禧的機要秘書，打進去的，老黨員，功勞很大，可能現在還健在。他的講話跟我不一樣。他在外國住了那麼久，他的話說出來，不是我們這一套。比方老是問他，問得他厭煩了，他就說，我在美國，中央情報局都沒有這樣審問過，客客氣氣的。這下不得了，把黨組織比作美國特務機關。他一直生活在美國，不習慣中國這一套。叫他發言，他就發，他一開口就走火，就講一些不對的名詞、不對的話，動不動就說，我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審問時沒有強迫我承認甚麼。所以，開批鬥會的興趣就轉移到他的身上去了。

要我性命的控告來了，形勢超級嚴峻，似乎是準備當場逮捕

我的事情，內部這樣的批鬥批鬥是走走過場，是做給上級看的，不得不做，雙方合作任務算完成了。但是，問題是忽然來了一個真的高潮，要我的命。「要我命」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

人民出版社的後門有一個操場，再最後邊是出版署很大的一個大禮堂。大概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批了我七八次後，大家突然看見有幾輛載重卡車停在操場上，還有幾輛吉普車，還有發電

機、探照燈，指頭粗的一大堆電線，從操場一直拉到禮堂，兩個星期，無人知道在幹甚麼。實際上就是佈置鬥爭我的會場。禮堂內四面八方有探照燈，主席台也有探照燈。那麼多探照燈，做甚麼？拍新聞紀錄片。我當然完全不知道。一天下午突然說去開會，幾個人押着我往後邊操場走。押我的人是我們單位的，是一般性的，不厲害。一進去，看見邊上有大標語口號，才明白是鬥爭我的大會。看見這樣的架勢，我估計當天就把我帶走。越是這樣，我心裏越無所謂。既然已經這樣了，對不起，看你說甚麼，我今天就無路可退了，把問題說說清楚。

下午兩點鐘，出版署禮堂開會，一千多人，塞得滿滿的。不僅是我們單位的，還有好多個其他單位的。我坐在第一排，對着主席台。當時要幹甚麼，誰也不知道。新聞記錄片恐怕已經開始拍了。燈光對着我，我也不管。主席台上有十幾個人，陳原在主席台上。有陳原這些人，我想關係不大。陳原這些人不是抓人的人。另外還有幾個我認識的人。

一宣佈，最高××××署某司長代表副總長×××揭發我。這個副總長×××就是在廣東一天忽然要殺一百多人的那個大人物，半夜被我報告給葉帥，讓他補證據。這下好了，看到《人民日報》批我的東西，於是開了這個大會。這是公審大會呀，樣子是要帶人走，我這世恐怕就此結束了呀。開這個會至少要經過幾個相關的部，經過幾個星期的籌備吧。

主持人稱「控訴」與「檢舉」。控訴甚麼呢？控訴曾彥修在廣州的時候就反對毛主席的鎮反，一貫反黨。我一聽，心一下就放下了，行若無事。我想，醜事情自己收起來就算了嘛，何必現在還要來自己翻騰呢？我想，當時不可能不佈置一批人觀察我的氣色的，他一說，我就奚落地

笑一笑，主席台上是看得到的。這同測謊儀一樣，你如何反應，是躲不過的。老實說，我要是真有問題，這麼公審大會似的猛然一來，恐怕是難於抵擋的。

我坐在前排，群衆的反應是甚麼我看不見，但我相信群衆對我的印象，並不因為我成了右派就根本有了改變。有時候，我偷偷轉一下腦袋，看看後排的群衆。大家都愁眉苦臉的，並無敵愾同仇之氣，都替我擔憂，今天他就要被抓走了。我故意看看，表示沒事，我在下面愛聽不聽的。我跟我們單位的人關係好，大概誰都怕我被捕。××司長大約「控訴」了一個多鐘頭，我早就寫了一張字條，遞給主席團。大概意思是：主席團，這位××司長所講的情況完全不是事實。真實的情況我全部記得，但是，如果我在今天這個大會上全部講出來，會涉及黨的機密。如果你們一定要我現在講，我現在就講，使我沒有編造的時間，不過，我的回答至少要一個小時。要麼你們在散會後，立刻找我談，不要給我編造的時間。

主席團的人商量一陣，當衆宣佈了：某某人，他說對這個發言他立刻可以回答。他說需要多少時間，現在就要他講。我大概在台下講了一個小時。鴉雀無聲，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

這是一場標準的公審大會。我記得清清楚楚，一點不怕。我講後原告無一句反駁，是非明白可見。

回家後，我把一九五一年廣東發生的那件事寫成文字。我說，能作證明的人，葉帥，方方，古大存地位那麼高，不便找，李凡夫可以找，楊奇可以找，成幼殊可以找。後兩個人都是在監獄裏去重新整理材料的。還有《廣州日報》的曾艾荻，當時任《南方日報》採訪部主任。以後，我

天天主動問此事。陳原被我問煩了，說，不要問了，有事會找你。

黨內的右派狀元，但對我的處理很輕

右派在一九五八年幾乎都下鄉了，我是留下來了。留在城市的，像我這樣的並不是很多，很多人都到北大荒、到西北勞動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前輩聶紺弩都弄去了，丁玲、艾青都弄去了，為甚麼你這個晚輩的晚輩曾某人跑脱了？原因很簡單，兩個人扶着我去勞動，可以。那個時候，關節炎很嚴重，根本不大走得動路，走幾步都坐三輪車。這個是根本原因。此外，我們單位的幾個右派，能力強的，也都沒有去勞改。後來，把我們這批右派當中被認為是有本事的，放在一間大房子裏，成立一個小組，要我們編詞典。從此，反右派的事，就沒有再提。我們的組長柏宏文，老同志，久經生死考驗，又懂政策，一點也不歧視我們。

雖然還沒有正式開除，但黨籍問題還沒有處理。到一九五八年夏天，人民社已由東總布胡同十號搬到朝陽門內一百六十六號，即現在的地方了，有一天開黨支部大會，叫我參加，正式通過開除黨籍。

天氣很悶熱，大家都知道這個會就一件事，宣佈對我的決定。但並不是幾十個人爭着叫口號，喊開除。開會後，沒有人發言。這種會，事先不佈置發言，是不大可能的。總之，過了很久，很久，沒有人發言。我心裏説，請快一點，快一點，這不過是個手續問題而已。但是，誰都

不發言。最後，又是周靜起來解圍。他有政治經驗，他看這個樣子不像話，上級有人參加，會去反映的。所以越不發言，我越怕，說是對曾某人有溫情主義。周靜站起來，用蘇州軟綿綿的話說，根據現在的情況，右派一律都開除黨籍，曾彥修是一樣的，我建議開除黨籍。就這幾句話，大家都舉手了。一舉完手，我就出去，算解放了。我內心十分佩服周靜。沒有周靜，這兩次支部大會怎麼收場呀？沒有周靜，怎麼向上級彙報呀？要出事的，我也會更麻煩。

按照我的情況，黨內第一個，報上的右派狀元，但實際上對我的處理應該說是偏輕的。我屬於第三類右派。右派有五類，還有個極右，還有個內控的中右，中右在內部還是算右派，實際是七種。右派開會，自報公議，我報三類，順利通過。

「反右」兩年後，一九五九年，中央在國慶那一天要在全國給一批右派摘帽。這個裏邊又有我。說通過改造，接受教訓等等，總之要說兩句好話才有樓梯好下。給甚麼人摘帽呢，每個民主黨派各兩個，工商界兩個，文化界兩個，教育界兩個。共產黨也是兩個，一個是我，一個是木刻家彥涵。彥涵是延安魯藝的學生，他在延安的木刻，在重慶登出後，徐悲鴻寫文章大讚。解放後，在中央美院任教授、系主任等。我始終沒有見過他，但知道他名聲特大，在延安稱讚他的木刻的人就很多。當時摘帽的消息登在全國各報上，叫做「摘掉右派帽子」，於是我便成了「摘帽右派」。

兩年後第一批摘帽，給你摘了帽，登了報紙，應該說很客氣了。原因可能跟我初反右時，首先自報有關吧。

一九八五年，我已經退休了兩三年，新聞出版署人事司一個女同志打了幾次電話，叫我到新聞出版署取回自己的「材料」。那時我住在前門，坐公交車三四站就到燈市口新聞出版署了。催了我一年多兩年，我沒有去拿。最後一次我說，留着吧，將來說不定還會有用處，有甚麼運動再來，就可以寫簡單一點。將來能肯定沒有這種運動嗎？

我敢不去取的最根本一點是，我這些東西裏邊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沒有我今天遞一個情報，明天遞一個情況，更沒有檢舉張三李四王五的一個字。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我被打成大右派後，我是不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狀」，檢舉過別人？沒有，半個字也沒有。我只是罵自己，沒有檢舉過任何一個人。我沒有整過別人，所以，我的一生的一切運動材料，我都不怕。我沒有做虧心事，就讓它留下吧。一個人連這點個性都沒有？

我這一輩子，當然是個「大作家」了。這個作家，就是寫檢查交代。從延安到「文革」結束，恐怕在百萬字以上。我到現在敢說，那裏邊沒有一字是損害到任何人的，這是我敢於相信自己的地方。我收回「材料」做甚麼，哪有功夫去銷毀它？

可能因為我的原因，人民社劃右派的比例很高

我們單位究竟有多少右派？有人說三十來個。有人確實是莫名其妙被劃了右派。今年春節，我們單位的負責人去看望王以鑄，問他，你是怎麼劃成右派的呀？他說，大概是因為曾彥修劃右

派的關係吧，他尊重我們這批人，在「反右」時，要過關就難了。（這件事是單位司機告訴我的。）王以鑄很有學問，懂七八種外語，古今中外，無所不通。

我們社原來的秘書長，老生活書店的，前幾年去世了。一九六三年他到上海來，住在很漂亮的招待所，打電話把我叫去。那時我已經調到上海。他很客氣，問了身體情況後說，老曾，你可得注意，你看看，你特別重視的人，不管老的、年輕的，統統是右派呀。他舉了一個人，劉某某。據我所知，劉現在哈爾濱黑龍江社會科學院。這個人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的，很聰明，很能幹，外文也好，到了世界知識出版社。人們對國民黨不了解，把中央政治大學看成跟中共黨校一樣。這個學校跟其他的學校是有所不同，但不是國民黨的黨校，只是畢業出來的人在政府裏找工作方便些。讀書時不一定是國民黨員。我知道這個學校歷來招收普通高中生。我反舉了另一個人，我說，有一個我比較重視的女同志，「肅反」時說她是三青團外圍組織的，我主張不要調查，這個女同志沒有劃右派呀。他說，這個也是事實。不過，你這個人太愛才，不重視政治。我說，「愛才」兩個字不敢當，我自己就沒有才，談得上甚麼愛才，對有才的人很佩服倒是真的。現已徹底查明，史枚、戴文葆、王以鑄等名人，簡直不知是如何劃為右派的。王以鑄在戴文葆的追思會上說，一天，人事科長找戴、王二人談話，不知談些甚麼，出門時，王問：這是不是說我們是右派呢？回說：有這麼點意思吧。所以，他們完全是因我而擴大劃為右派的，我萬死也償不了我的罪行。

因為我的關係，我們單位劃的右派增加了。我們單位如果劃三個，就是百分之一，劃九個，

就是百分之三，如果劃到二十個、三十個，是百分之八九到十幾了。我們二百多人，知識分子、編輯部的人佔不了三分之一，絕大多數還是行政方面的人。所以，人民出版社後來劃右派的比例很大。

我看見蕭揚寫張聞天的一篇文章，說整個外交部的右派在千分之二以內。恐怕只有張聞天才能擋住。喬冠華這些人，都是他頂住的，要不然，統統是右派。張聞天是甚麼身份？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當然可以擋一下，人家不好查得那麼緊。但是，人民出版社，我變成右派後，必然牽連其他人，不多也難交卷。而且劃右派，劃得沒有底，沒有完。到一九五八年底，又補劃了一個留美回來的楊靜遠。楊靜遠是極著名的經濟學家楊端六的女兒。楊靜遠怎麼劃成右派的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過後，所有人統統下鄉勞動，楊靜遠到了遵化縣。因為一切都歸公，收割莊稼馬馬虎虎，掉得遍地都是。老百姓去拾，公社命令不准，說爛在地裏是社會主義，拾回家是資本主義。那個時候還不叫鬥私批修，是叫批判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農民不知甚麼東西，就簡稱「自發式」。楊靜遠在內部開會提出意見，認為莊稼收成不好，與其爛在地裏浪費，不如讓農民拾回家充飢。就這一點，當時就大大批判她。冬天回到北京後，又開編輯部大會批判，我們幾個右派也去受教育。結果她被補劃成右派。這真是荒誕已極，讓老百姓拾莊稼，有甚麼罪？看到老百姓餓死不管，才算正確？是非顛倒，已經叫人欲哭無淚。

這個時候把楊靜遠補劃成右派，我相信是上級的意見。人民出版社自己不會把一個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就因為這麼一件事劃成右派。楊端六已經劃成大右派了，上面催得緊，楊靜遠是在

劫難逃。

一九六零夏天，我調到上海去了。以後幾年中，人民社五人小組中的人凡是到上海，沒有一個人不來看我。陳原晚上九點找到當時我住的半郊區，我實在不好意思。陳原是我的專案組的組長，我知道他沒有辦法，我們之間的關係很好，相互之間沒有絲毫的意見。他也知道我是怎麼一回事。

人民出版社另外一個副總編輯譚士，也是五人小組的。他到上海，不但要來看我，還要陪着我這裏吃一家，那裏吃一家，他知道我錢少了，全是他付錢。張惠卿，後來人民社的副總編輯，他到上海也要專門來看我。范用，也要來看，站着談了很久，令我感動。總之，當時的領導，或者五人小組的來上海，統統要來看我，所以我很感謝。

「文革」中，人民社也有過兩派，兩派雖然鬥，兩派都到上海的辭海編輯所來找我，説要「外調」。他們打聽我的家，星期天分頭到我家裏來。根本不是向我調查甚麼的，而是向我問好的。他們知道，説來「外調」，辭海的人在旁邊，要拍桌子瞪眼睛的。我想既然他們是兩派，肯定希望我講點對方的壞話，結果根本沒有談對方，只是來看看我。他們還擔心我在上海怎麼樣，這就是人性。所以這個人性，是消滅不了的。一個人真正消滅了人性，就不像話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沒有對人種下仇恨，在我有權整人的時候，我絕不整人，我沒權時的反映就很清楚了。後來我回到北京，回到人民社才知道：好在我在上海，在北京就危險了。本社的不打你，不抓你，但其他單位的造反派來，一傢伙抓去，一鬥，當場把你打死都很可能。

第十九章 大躍進時期和「三年自然災害」

右派沒有資格參加大煉鋼鐵，專代抄大字報

「反右」後，接着是大躍進。北京王府井大街兩邊人行道鋪的磚，比一般的磚好，據説是耐火磚，全部被挖掉了，去砌煉鋼爐。我走了多少次，沒有磚了，全是爛泥。這是眼見，不是聽説。

人民社在甚麼地方煉鋼呢？就在現在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停車的空地上。甚麼都拿去燒，通天亮燒。我們這些右派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那是「革命群衆」的光榮任務。我的天老爺，阿彌陀佛，我們在上面看見炎炎夏天，天天熊熊大火，有甚麼煉的？有大火就行了。真是滑稽得很。

我們幹甚麼呢？沒有資格參加大躍進，就代抄大字報。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每個人要不斷地貼出大字報來歌頌三面紅旗，一邊要大煉鋼鐵，一邊要交大字報。那時，已經沒有白

紙了，天下的白紙已經用完了，用報紙抄。抄報紙前，要反覆看，有沒有毛主席像之類，這個問題很鄭重，塗了毛主席像，便是反革命。開始一張《人民日報》算一張，一人一天抄十張，到後來，一天要抄一百張大字報。王以鑄聰明得很，說這樣抄，抄不完，把《人民日報》對開，一張《人民日報》變成兩張，但還是完不成任務，我們每個人至少抄一百張以上，後來又對開，一張《人民日報》變成了四張。

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突然要打麻雀。一九五八年打麻雀是甚麼原因，現在我也不便談。報上說劉少奇、葉劍英也出來打麻雀了，這也是世界史上沒有過的一種笑話。我打了多久？打了十來天。當時號召是三天，人民社反右派的重點已轉到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一個老同志身上，一打麻雀，就叫我去。我有關節炎，還要爬梯子到房上去打麻雀。但打麻雀比在單位裏挨鬥，或看別人挨鬥舒服得多，暫時離開痛苦，像出家當了和尚一樣，如登仙界。我很感興趣，整天拿着長杆子，捆片破布，在房頂上嘩——嘩——地打。打麻雀規定是三天，三天過後，沒有叫我停，我就打下去。有一天，他們發現我好久不見了，不知我是自殺，還是跑了。後來找到我問，你到哪裏去了？我說，打麻雀，沒有事，沒有事。沒有人叫我下來呀。此事極端荒謬，全國人民都在打，連國家主席也出來打。在地上吼鬧一整天，麻雀無法着地，渴餓掉地而死了。這種虐殺，對一切生命都不應當吧？還總結經驗，在報上宣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誇耀，豈不滑稽？

劃右派不久，我們吃飯就很不方便了。我們的食堂就在樓下，但我們幾個人坐在那裏，人家就不便來坐了。別人一來，怕被說成是不跟右派劃清界限。群衆也希望我們不要去，食堂不大，

如果幾個右派集中在一起吃飯，特別是最引起注意的這幾個人在一起，更不行，說你們又在搞甚麼「集團」了。分開坐，更沒有地方。所以，我們中午吃飯自覺不去食堂，跑到東四十字路東北口的小飯館去吃。我本身走路就很艱難，拄個棍子。當時東四十字路口還是一大片草棚棚，幾十個小飯館，一般是兩毛四分錢炒個白菜肉絲，我們一般兩毛四分錢就夠了。隆福寺胡同裏邊，也是小飯館，貴一些。

大躍進鬧了半年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之交出去吃，已經吃不到甚麼東西了，飯館沒有東西賣了。以前的朝內菜市場很大，無所不有，但到了一九五九年，連個菜皮都沒有。像我們這樣的人，中午逛來逛去的，相互都認識。斜對門是文化部，再斜對門，是科學出版社，這些人都見過，都想到那裏去買點東西，但都是空的，完全徹底沒有了。奇怪的是，一九五九年建國十週年前一個把月，開始佈置了，菜場裏出現上千的瓶瓶罐罐，紅的，綠的，甚麼都有，還有彩帶，琳琅滿目，像兒童世界一樣。原來是拍國慶電影，想說明中國豐盛得不得了。我們知道裏邊全是空的，任何東西都沒有，一個饅頭都沒有，一片菜葉也沒有，完全是零，這件事是我親眼長期看見的，誰要殺我腦袋，還是我看見的。這不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做假，是百分之百做假。當時如果反對這樣做，就有可能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反右派後，大躍進後，政治風氣就是這個樣子，上面說這叫「生動活潑」，「最新最美麗的圖畫」，誰敢說不是呢？

到小飯館去吃午飯，一個好辦法，帶幾首鼓吹大躍進的「詩」去，當場貼上。例如：「舊社會無衣無食，新社會糧食滿倉。」「天大地大沒有毛主席恩情大。」一九五八年夏時還好，幾十家

蘆葦棚、飯館還維持了幾個月，全民寫詩，棚裏貼滿大躍進詩，但菜只有一種：大白菜炒肉絲。

「三年自然災害」

「全國性的自然災害」，這個說法是官書的說法，這全不正確。一是絕不止三年，二是絕不是自然災害。我要強調，希望氣象學界今後有人敢於出來證明，那三年不是自然災害。但當時有些地方就餓死人。為甚麼呢？全部公社化，糧食全部歸公，人民拿不到。中國幅員這麼大，自古以來幾千年，沒有說從東到西，從北到南，一起鬧自然災害的，除非地球毀滅。中國這麼大，有時候自然災害的範圍大一點，有時候小一點，像今年的地震、雪災，範圍就大得可怕，但是那三年，至少一九五八年，全國好。從全國幾個地區來講，我知道的，特別是三個地區，一般是常年沒有水災，沒有旱災。一個是蘇無滬地區，就是蘇州、無錫、杭州、上海，包括嘉興，這是最大的一個地區。這個地區水網發達，水多，就排出去，久不下雨，就有水車供應水。江南的龍骨水車比四川的漂亮得多，簡直就是藝術品。大躍進時統統當柴去煉鋼了，殘餘的我見過，看了讓人流眼淚。這個地區，如果範圍再大一些，寧滬杭，包括南京，都可以算進去，是太湖區域。但是那幾年，這些地方照樣餓死很多人。無錫是天堂，也照樣餓死人，而且很厲害。

一個是成都平原十多個縣，這是都江堰水網區，也是旱時可以灌溉，澇時可以排水出去。過去成都市內有許多河，現在都填了，一大破壞，太可惜了。我一九三二年在成都讀書時，從我住

的地方半邊街走到少城公園後門的半邊橋，就是沿着河走，一邊是河，一邊是人行道，河對面是人家，中間還是橋。現在河都沒有了，欲哭無淚。成都市本身就在水網上。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成都平原照樣餓死人。

再有一個是珠江三角洲，也是旱澇保收，珠江水量大，大小河多得很。這個地方以水災為主。

在這三個地區，那幾年照樣發生人為的災難。時間不是三年，現在說三年，說到一九六一年就止了。我的天老爺，一九六一年還沒有到頂點咧，實際上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五年。一九五九年不是批彭德懷嗎，以後更左。一九六三年，我在上海每天除了幾兩飯吃，甚麼都買不到。甚麼時候開始好轉的呢？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開始好一點。所謂好一點，就是危機狀態有所改變，不會拿着二兩糧票，跑遍上海買不到東西。那個時候，除了想吃東西，不想第二個。我下了班，就拿着提包到處轉。那個時候，全國每個人都有一個包，準備有甚麼東西就買，只要不是草就買。當時我跟保姆一起跑一二十里，跑在上海郊區農民種田的地方，買長到一尺多高的「雞毛菜」，偷偷買，一買要買幾十斤，吃幾天，當飯吃。當時沒有吃的東西，救命的東西，根本不怕雞毛菜爛，總比沒有東西吃好。買吃的東西很貴，買雞毛菜都要二三十塊錢，而買線裝書，四毛錢可以買一大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上海才開始有桃酥，半兩糧票，五毛錢一個。我去買過兩三次，給我的小孩子吃，我自己沒有吃。當時五毛錢，相當於現在一二十元了吧。所以這個時間不是三年。在上海，有兩三年我是下了班就在馬路上跑，總想買到點甚麼東西，結果越餓越

跑，越跑越餓。

人民公社好到甚麼程度呢？我有孩子，腿不太好，准許我有個保姆。保姆是江蘇宜興人，她的兒子叫朱大生，又高又大。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差不多每年，都要到上海來兩三次。他當生產隊隊長，他不是黨員。我問他甚麼道理，他說黨員不願意幹。他告訴我他們那裏是如何大躍進的。

糧食出來，全部交公，一粒不留，根據工分來領糧。當時最強勞動力一天十工分。朱大生又高又大，一天十工分。任何一家人，根據工分分配的糧食都不夠吃，只有向公家借。我說，糧食全是你們種的嘛。他說，都是我們種的，但生產隊年年全交公了。我們家家都欠公家的糧。全部是人家種出來的，全部交給你，結果還欠你多少。這個就是人民公社，先進在甚麼地方呢？

說到大煉鋼鐵，現在有人決不會信。朱大生說，他們水鄉也要煉。宜興南部是水田，既沒有樹，也沒有煤，更沒有鐵礦。他們平時燒飯，就是燒稻草。但要煉，非煉不可，上邊還組織人夜夜檢查，每個村抽幹部參加檢查隊，由上面的縣、區幹部帶着。他們怎麼煉呢？把濕泥巴堆成爐子的樣子，搞個鐵架，把各種各樣的枝條、柴草拿去燒，上面冒火，冒煙。燒甚麼東西呢，燒爛泥巴塊。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燒一陣，煙把爛泥巴熏黑了，然後扒出來堆一大堆，全是「鋼」。晚上有人檢查。我問怎麼檢查，他說，我們有放哨，只要有檢查，我們就燒，平時不燒。來檢查的人看到這些燒黑的爛泥塊，說這個「鋼」不錯，就驗收了。我說，你們真妙，成本不高，還把土燒得漆黑，燒得像鋼。朱大生說，我也要奉命去檢查人家呀。

朱大生到上海來幹甚麼？來賣出口大米。不知出口到哪個國家，總之不是蘇聯。他們的水泥船不在上海，要到離開上海幾十里的一個港口去賣大米。朱大生就住在我們家。他沒有地方住，人老實得很。

所以說那幾年並不是還蘇聯的債的問題，剛好相反，反對赫魯曉夫後，甚麼都不給他們了，一顆米都不給了。他們也很困難，但我們不幫你的忙了。因為你批了斯大林，你修正主義了。上海八十歲的人都知道，是要給蘇聯的不給了。我就在那幾年吃了好些好罐頭。有一種哈爾濱的酸黃瓜，當時偶爾能買到，一罐五毛錢。為甚麼從哈爾濱運到上海來呢？上海、北京這兩個特別的城市沒有東西賣，更不好看。還有橘子醬，一公斤重，一塊錢，我都買了一些，因為我很喜歡吃這些東西。一般市民，沒有買罐頭的習慣。我看見沒有甚麼人買，就去買。

浙江嚴重到甚麼程度呢？一九六四年，余明出差路過上海，打聽到我在辭海編輯所，電話告訴我他住在外灘。我去了兩個晚上，從我們單位到外灘有有軌電車。余明比我大好幾歲，是高中同學，當時在浙江省輕工業廳當副廳長。他是老資格，一九三九年到延安了，因為他被捕過，在延安坐了兩年牢，一直審查他的這段歷史，不相信他，所以從延安到東北，從東北到浙江，當個輕工業廳的副廳長。按他的資格，當個省委書記都可以，是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的黨員。

他談到一些問題，傷心地為公事哭。我說，你們那裏的絲綢好，現在恢復一點了吧。一說，他的眼淚就流下來了。他說，你以為還有啊，桑樹條都砍來大煉鋼鐵了，老百姓都不種了，你以為還有甚麼桑條，還有那麼多蠶。其他地方是桑樹，杭嘉湖是桑條，有指頭粗，四尺來高，一拉

就連根拔得起來。我問，茶呢？他說，茶樹也燒了煉鋼了。

沒有辦法，沒有東西燒，要交卷，總要拿東西來燒，整個國家幾乎都要燒掉了。現在我們的一些專家仍在為大躍進辯護，仍在為人民公社辯護，怎麼好，怎麼偉大。那沒有辦法，隨便你怎麼辯護，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這些事情，笑話到任何笑話集都編不出來。現在敢講的不多，但我必須要講。任何有良心的氣象學家，應該公佈那幾年中國的氣象情況，公佈自然災害的情況。

實際上中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不是三年，而是五年，也不是甚麼自然災害，全是人造災害。局部地區的真自然災害年年有，但沒有哪一年有今年二零零八年這樣重吧，當然國家增加了困難，但並沒有人人餓飯。「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有些人仍竭力為之辯護，至今還要騙人，硬說是「自然災害」，何可至此。

第四編



第二十章 在上海辭海編輯所（一九六零年六月——一九六四年九月）

調七八十個右派，結果只調去了兩三個

我一九六零年六月調到上海去。上海當時設立了辭海編輯所。這個辭海編輯所源起毛主席說要重編《辭海》。抗戰開始時，上海中華書局用二十年編出了一部《辭海》，上下兩卷。抗戰時這個書後方就斷了，毛主席有一套，常查，覺得這個書有用處。一九五七年在全國反右派運動的最高潮中，毛視察到上海，接見老朋友舒新城等文化名人。毛提出要舒修訂辭書，甚為重視此事。舒提出調一百個幹部，一百萬元的計劃。後來這些事情由上海市委全盤負責。

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柯慶施當然執行了。這些條件，在當時來說是特好的。找了一所很好的花園很大花園洋房。關於調人，有個傳說。不知是不是舒新城建議調專家，毛主席開玩笑說，那麼多右派，現在沒有事，你們調去就是了。就是說，那麼多教授，那麼多大學校長，還有報紙的總編輯等，你們要調就調吧。七十到八十個人，有大學校長，大學教授，還有編輯，其中有我。

我沒有去勞改的原因，一是不能行動，二是要留下我編一個東西。一九五八年，我下來後王子野負全責。他找我說，你不能去勞動了，就留在這裏，要編蔣介石全集，是毛主席的意思，你也知道，可能就要動手。他說，材料多是公開的，關鍵是註釋，註釋比較麻煩，你就在這裏做此事。你主要是抓註釋。註釋牽涉近現代的歷史、人物等，政治性很強。上海要調我去辭海，王子野都找各種理由沒讓我走。我也不想去，在北京臭了，何必還要臭到上海去？拖到一九六零年六月，上海辭海一個副總編輯來北京出差，隨便到我們單位來。他一看，我並不是病得那麼厲害，結果還是要我去。要我去的原因是編一個大東西光有學者不行，還要有一批做編輯的人。

我一九六零年六月去上海，到辭海編輯所去報到，一切均很客氣。第二天，上海市文教書記石西民派車來接我，接到上海錦江飯店的樓下。這個飯店很有名，樓下有個小會議室，很多會議都在這裏開。石西民那天在那裏開會，他出來接見我，就幾分鐘，因為他認識我。進北京城前，在新華總社裏就是鄰座，很熟悉的。這個接見，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打招呼」，跟黨內外的人說，這個人，你們不要太整他了。我完全明白他是這個意思。

要調的七八十個人，基本上全部落空，像費孝通，中央民族大學不放，說他現在不當校長，不公開講課，但可以給教授講課。山東大學的校長陸侃如、夫人馮沅君本來也要一塊調的，也沒有調來。山東大學也這樣講，現在不讓他上課，也不做校長了，但可以讓他給教研組講課，結果統統沒有落實。最後調成的只有兩三個，其中一個叫李毓珍（二十年代的黨員，後來失掉了組織關係），筆名叫于振，北大俄文系副主任，翻譯了很多俄文詩；一個是我。上海師大去一個姓徐

的教授，但沒去多久，又回師大了。所以，這個調右派的事全部落空。這件事反過來證明，你打的那些右派，人家單位不放。我們單位也一樣，拖了兩年。我對自己被調到上海去，至今心裏也感到很不安，像聶紺弩、艾青、丁玲這些前輩革命家都去東北勞改了，我怎麼能不有愧於他們呢？

提意見只能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提真正重要的

我這個身份不好安排。把我放在綜合組，就是編務組，無所不管的事務性小組，十來個人，但是編務組的工作，我一點也都沒有做過。我的工作，主要是由辭海編輯所長、上海市調來的原教育局副局長杭葦負責。從頭到尾，完全由他分配。他從老新四軍、老根據地出來，在上海待過很多年，所以知道運動這些情況。按照規矩，我是不能放在重要地方的。但是調你來，又不是專來抄抄寫寫的。杭葦這個人工作十分積極負責，人直爽，對我相當客氣。他要我看稿，提意見。

稿件分四個人看，自然科學一個人、社會科學一個人、文學藝術一個人、歷史地理一個人。我複看史地類稿，看後即提意見，處理後發稿。平日我做一些甚麼呢？我舉一兩個例子。比如人物評價。稿件裏古今中外各種人物評價總體要平衡一下，看有沒有太滑邊的。中國跟外國人比，是不是有評價太高或者太低的。這個活，不是我能做的，但杭葦要我做，只好服從。

另外看長條樣。我是看長條樣的四個人之一。長條樣，就是沒有正式印刷前按照筆劃排的還沒有分頁碼的清樣，沒有拼版前叫長條樣，長條樣還不是正式的清樣。看長條樣就是提提意

見。所有意見，都別在一張紙上，最後交到杭葦、羅竹風那裏去。我提了些甚麼呢？舉一條例子。「自由、平等、博愛」這一條，在六幾年左得要命，被罵得狗血噴頭，我提了意見。杭葦看到後，找我到他的辦公室，把秘書支開。他說，老曾，你怎麼不知道呀？我說，甚麼事？我真不知道。他說，彭老總為這一條在延安不是被批過嗎？我說，我真的不知道這個事。他說，彭老總在一九三九年寫過一篇文章，可能是秀才給他寫的，對自由平等博愛歌頌了一下，延安知道了，批了他，批他資產階級思想，說他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還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此事。他說，你在延安，怎麼不知道？我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遠在天邊，有各種文件，我們在延安，甚麼都不知道。他說，你以後注意一點。這一來，我就知道了，所有的極左的，亂打棍子的，提意見時，只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從根本上提甚麼意見。杭葦在這個問題上怕我出亂子，暗中幫助我，不然，再給你戴一個右派帽子。

我在上海並沒有做甚麼工作，但我對上海有關同志對我的關照愛護非常感激。我發現至少在表面上，沒有一個人對我採取輕視態度。

石西民總結了《辭海》的根本大法

我一到上海，發現工作基本上是停頓的。有一間房，堆滿了稿子，一條一條的，沒有人管。我進去拿了幾條一看，天老爺，這不是中學生寫的嗎？絕對不能用。在我去之前在北京已經處理

過一本大躍進時大學新生編的辭典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開始，世界知識出版社從人民社分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出版社，歸外交部管。大概一九五九年的秋天，上面給我一個任務，讓我到世界知識出版社去看他們編的《世界知識辭典》的全部草稿，幾千條。我每天去，中午給我送飯。我就奇怪，《世界知識辭典》是他們出版社組織的，我是人民出版社的右派，他們那麼多專家，哪一個不比我強，為甚麼叫我去看呢？我當時不多想，現在很明白了。這個辭典草稿不成話，百分之百否定，但他們誰出來幹這個事呢，一否定不是又要當右派嗎？這是大躍進的偉大成果，這是在偉大光輝旗幟下產生的新鮮革命事物。

這個《世界知識辭典》草稿簡直不像話，沒有任何常識。比如英國的工黨，印度的國大黨，法國的社會黨，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這些黨每年都要開一次代表大會之類，要選舉出一個大體上叫主席甚麼的人。但這個主席一年選一個，做當年的事務性的聯絡工作，跟黨的領袖完全是兩回事。典型的是印度的國大黨，領袖是尼赫魯，以後是他的後裔。我們人民社出版的《世界知識年鑒》是陳原主編的，照規矩講，一九五四年的主席是誰，就是誰，沒有講是「領袖」。因為領袖比較難講，有時候是一生的，有時候是一段時間的。要我看的《世界知識辭典》草稿，隨便拿着我們社編的年鑒抄，拿着哪年是哪年，全是笑話。不是哪點不對，而是笑話大集中。一個初中、高中畢業生，去搞全球問題，或者剛剛考入大學就編書，全國都是這樣。大學把原來的教授打倒，就由剛考進中文系的人編《中國文學史》。這就是大躍進鬧的笑話。我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看了三個星期，全部看完。但我這個報告沒辦法寫，寫出來就是全盤否定。正在為難時，一天回

家，在南小街的人行道上碰到陳原。我說，陳原同志，怎麼把我調去看這個東西。我舉了幾個例子，說明他們是根據他主編的《世界知識年鑒》來編的，拿到哪本抄哪本，全成笑話了。我說，我這個報告不好寫，全不能用呀。他說，你不要說了，我懂了。這事我來對付。這個事，了不起，他來對付了。陳原顯然也在保護我。

我到上海又看到這樣的東西。一房子的稿子，全是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大躍進剛考進大學的學生寫的。我找到副總編輯陳落，他比我大十來歲，是清華大學西語系畢業的，三十年代的地下地黨員，曾經失掉關係，他當然甚麼都懂。我說，那稿子我看了一些，我在北京剛好受命處理過世界知識出版社的辭典草稿，跟這一模一樣。我報告陳原，陳原已經否定了。陳落說，我知道，你千萬不要再講了。估計編輯所已經發現了問題，大概領導也知道了，包括石西民。上海這些東西是根據甚麼來編的呢？政治性第一，就是大批判，在政治性下還有甚麼科學性？通俗性就是大躍進。同人人寫詩是同一性質。

石西民也在抓《辭海》指導原則問題。一九六一年春天開了一個兩三百人的大會，石西民作了一個報告，提出編寫《辭海》的方針：知識性、正面性、穩定性。這就很正確了。這個方針任何辭書都適用，而且永遠適用。知識性，辭典首先是告訴人們知識；正面性，講清楚就行了，二加二等於四，不要扯別的。穩定性，這點很重要，辭書，要供人家翻多少年，這個知識必須是穩定的，不要過三天就不可靠了。這個意見是不是石西民提出來的？也不一定，我想也可能是許多專家提出來的。這個提得非常好。任何辭書、教科書，都離不開這個東西。我覺得這是《辭海》

的一個大創造，具有永久價值。而且提出每條的釋文要「四至」分明，不宜有半句出界的話。這也可謂是一條經典原則。這些如果是石西民首提的，那石西民的功勞就大了。

但是以後的幾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直到一九六四春天《辭海》發排，都是「反修」高潮，一切都是以革命性為準，一切都又全否定了，跟這個方針是根本相對的。要執行這個方針，根本做不到了。政治批判，亂戴帽子，誰也沒有辦法，編寫的人明知道自己是胡說八道，也要這樣寫。編輯部的編輯看到，知道不對，也不敢說。餓着肚子天天一起「反修」，不要科學，不要知識，就這樣胡來。雖然石西民提出了這麼正確的原則，但無法貫徹。任何人，只要你一貫徹，就變成反革命修正主義了。所以，《辭海》試行本兩巨冊就是在這個環境下產生的。一九六四年編出來，很厚的兩本，叫試行本，紙張很好，是專門製造的，叫聖經紙，又薄，韌性又強，但內容是「反修」高潮中的產物。此編未發行。當然，作為經驗教訓，此前的工作，還是很重要的。

接着，毛主席的指示又來了，說全國的文聯作協都變成裴多菲俱樂部了。跟着以後全部是運動，一年多就是「文革」大爆發，不能再做甚麼事了。

我在上海這些年，業務上可以說絲毫作用沒有起。我算好，得到了領導關懷，怕我再出亂子，提意見時，招呼我，反左的不能提，這個是善意的警告。在上海十八年，領導、同志們對我很好，處處保護我，我內心感到慚愧，對他們很感謝。

第二十一章

我在「四清」中為三十個工人徹底平了反，至今負責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

車間審查部份工人政治歷史，不得不全部由我負責，全部無事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經濟開始有點恢復了，毛主席又發動要搞「四清」運動。清甚麼呢？農村的資本主義又發生了，要復辟了，所以要清思想、清經濟、清政治、清組織。首先在農村，所有人統統要清查一遍，搞了一兩年。城市也搞，所有的單位機關，每個人都要搞。這個事，中央正式作了決定。劉少奇說，「四清」運動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意思是說，農村的人，城市機關的人，「四清」還沒有搞清楚的，把這四個方面查清楚；這個運動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這個話跟沒有講差不多。毛主席說不是這個問題，「四清」運動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又變成階級鬥爭的大運動，而且發表的決定公開批判說，有人說

「四清」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這說法是錯誤的。實際上，這是毛第一次公開批劉，在一九六四年就出現了。毛跟劉的矛盾這時已經公開化，書面化了。以後的事情還有甚麼可奇怪的呢？這是我們後來知道的。中央上層當時就知道了。他們聽了劉少奇的講話，以及毛對劉的批評。

簡單地說，「四清」是全民的階級鬥爭的大運動。每個人都要查。不是被鬥，就是鬥人，一個也不能跑。在「四清」運動決議中，提出有些「四不清」的人也可參加「四清」運動，作為工作隊的隊員參加，提高其覺悟，把自己「四不清」的問題講清楚。我就是作為「四不清」（右派當時是「四不清」了）的人參加的。從一九六四年十月起，到「文革」，近兩年。

上海市出版局負責各個出版社、各個印刷廠的「四清」運動。其中有個重點的「四清」對象，也是試點工廠，叫群眾印刷廠，由上海市出版局的局長馬飛海親自擔任隊長。馬飛海是老地下黨，跟我年齡差不多，人非常好。上海市出版局從各個出版社、工廠等調了三四十個人作為隊員，其中我也參加這個「四清」工作隊。總之，又把你作為典型，希望你在運動中表現好一點。上海的同志，不管是出版局的局長、副局長，還是下面的，對我都很好，叫我參加「四清」運動，就是馬飛海、丁景唐等同志對我的公開保護。

群眾印刷廠有八百多人，是上海印刷廠大型中的小型，中型中的大型。這個印刷廠又印書，又裝訂，從排印一直到把書印出去。這個廠的裝訂車間有兩百人左右。裝訂車間是技術性比較薄弱的車間，大概由三十家以上的小裝訂作合起來的。裝訂作，就是裝訂小作坊，但當時就叫裝訂

作。過去私營時兩三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裝訂作，印刷廠把需要裝訂的大張印張運出去裝訂。大一點的裝訂作有七八個人。解放後，社會主義改造全部改了，合成大裝訂車間。名義上是一個車間，其實佔了許多大房子。這個車間有這樣的特點：一是由小裝訂作合起來的，二是工人的文化程度相差很大，有的過去是小老闆，有的過去是還不識字的家庭婦女。

由於這樣的情況，這個車間就必然比較複雜。這個複雜，並不是從消極意義上説的，不等於那裏的反動派就多，特務就多，不是政治情況複雜，這是兩回事。這裏邊，小業主，也就是小老闆有一批，有二十多個人，有的是有機器的，可以稱為小資本家。因此，公認這個車間情況非常複雜，「問題」很多，推動工作很難。所謂難，是客觀的。文化相差大，年齡相差大，有二十來歲的新工人，有六十多歲的老工人，那時還沒有退休制度。還有一些小老闆，統統得養着。

「清思想」。在這種工廠裏清甚麼呢？這種工廠是以輕體力勞動為主，又不是科研單位，沒有甚麼腦力勞動者。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反修、反赫魯曉夫，他們不懂，也無興趣，那時生活還難得很呢。

「清經濟」。裝訂車間在印刷廠裏人數是第一，技術算低級，清甚麼經濟，誰能貪污？拿幾張紙出去，或者拿兩本書出去？甚麼地方都要去清思想、清經濟，現在我才敢説，那時不敢説，這都是吃了飯沒有事幹。要人為地製造出一大堆階級鬥爭，實際證明也是這樣。

「清政治」跟「清組織」是一回事。這個地方有甚麼組織呢，一個是工會，有一些人給人家戴了反革命、資本家的帽子，其他的，都是工會會員，清甚麼呢？二個是黨，幾個黨員跟廣大工

人並沒有大關係。共產黨內部要清就清，何必弄得天下攘攘？還有幾個團員，無非是學習學習。

我就被派到這個裝訂車間。我們這個「四清」小組有八個人，副組長是個老工人，文化低，人很好，另外有兩個大學生，還有兩個三十來歲的工人，還有一個是我。正組長掛名而不來上班。清經濟，清甚麼呢，每個月領工資，不多領一文也不少一文錢，鬧來鬧去就是買賣糧票。那個時候，一兩糧票，比現在一百塊錢還貴重。沒有糧票，餓死也沒辦法。有一兩糧票，也不一定能買得到東西。當時江浙天堂地區也有二十斤或三十斤糧票換一個媳婦的現象。

裝訂車間買賣糧票是怎麼回事呢？我現在沒有糧了，支撐不下去了，我向你買兩斤糧票，這就是救命。除了直接買賣，還有轉賣，這個是必然的。我有幾百塊錢，我從你那裏買了糧票後，我用不完，又倒一下。相互間買賣糧票，不是一個人，很多人都參加了。你說，這是貪污？就算吧，整一個，法不責衆，而且沒有憑據，只是大家的印象，某某人，倒賣糧票。這樣的事，反覆發動，反覆講，效果不大。交代清楚就完了。如果反映很多的，找他談談話，讓他認認錯就算了。這怎麼就成了全國性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呢？其他的，啥也沒有。要說投機倒把，他沒有東西投甚麼機倒甚麼把呀。

清經濟，我舉一個笑話。有一個女工經常把勞動棉紗線手套拆了後織棉線衣、線背心。她哪裏來的？大概是偷的。她有問題，有經濟問題，有貪污。大家反映得厲害，我們就去了解情況。原來她的丈夫是另外一個鋼鐵廠的搬運工，手套是一個星期發兩雙。因此，這個女工就有許多，她吃過飯就織。鬧了半天，就是這麼個偉大的階級鬥爭。在所有反映清經濟的事情中，這件事是

最大的。真是鬧劇！

所以，在普通老百姓裏清經濟、清思想，都清不了甚麼。清組織、清政治，他們甚麼組織都沒有，掛名的工會會員，人人都是。結果後來自然就變成了集中清政治歷史。我們「四清」工作隊一去，印刷廠人事科就把這個車間「問題」多的人的檔案交給我們了。別看這個普通裝訂車間，有些人的檔案兩大本。各種各樣的運動交代、各種表、外調材料，多得不得了。大概有三十個人上下，人事科認為問題嚴重。

當時我是摘帽右派，不能參加審查。但後來沒有辦法，我不但審查普通的，連黨員也要我去審查。這三十個人的結論都是我寫的，統統弄得清清楚楚，甚麼事都沒有。工作隊的工人同志，年輕的三十歲，年齡大一點的四十來歲，他們的文化不高，對舊社會的情況不太了解，甚麼叫國民黨、三青團，不懂，連青紅幫，杜月笙、黃金榮都弄不清，政治上基本上是一張白紙。這些人解放後成為積極分子，確實很單純，很賣力，表現好，也入黨了，成為「四清」工作隊的組長或者隊員。

我們共用一張差不多有半個乒乓球桌子那麼大的辦公桌。開始，他們一人分幾個人，沒有分給我，因為我不是黨員，是大右派，形式上必須另眼看待。但他們都相信我，討論時，沒叫我離開。他們也離不開我，討論這個，討論那個，他們毫無辦法。他們本身比審查對象還小一二十歲，要討論別人二三十年前的事情，連邊都摸不着。開始，我看他們苦得很，沒有辦法，不得不參加，發發言。慢慢地，可能他們去彙報了吧，我就正式參加對工人的審查了。黨員的檔案，開

始我還是不能看，非黨員，我都能看。到了最後，審查對象有兩個黨員，包括一個支部書記，他們不知道怎麼辦，還是交給我。這些同志相信我，知道我不會包庇特務。最後，審查歷史這個事，就由我一個人包攬了。我提出一些問題，請他們去調查，最後討論作結論。

由我起草的三十來個人的結論，只有一個人沒有作正式推翻懷疑的結論。但也沒有增加新的懷疑，因為現有的資料無法增加對他的懷疑，也無法根本推翻過去對他的一點懷疑。這個人，本身問題不嚴重。國民黨垮台時，他在浙江溫州不掛牌的據說是非正式特務機關給別人做飯，兼管清潔。這是他自己寫的，這就說明他不懂甚麼。我們還到溫州反覆調查，問當地解放前的情況。又問街道，街道鄰居說，那個沒有牌子的房子是有幾個人進進出出，但究竟是幹甚麼的，弄不清楚。所以，就是根據他本人寫的，他就是做飯和做清潔的，其他的沒有，構不成甚麼特務嫌疑。但對他的懷疑，不能全解除，所以沒有作結論，但把性質沖淡了。

另外三十個左右，我可以舉四五個人。這些人的事，比小說裏寫的還有趣。

被懷疑是特務的小資本家，其實是解放前救過地下黨員的同情分子

李某某，六十來歲的老先生。他原來是有十幾個人的裝訂作的小老闆，夠得上小資本家了。公私合營後，他也就進工廠了。他本人在老弱殘廢組，做點零碎的小事。他的妻子五十多了，在摺頁組。他們說，這個人的問題嚴重。一是說他解放前曾經寄錢給國民黨浦東游擊隊，二是說他

常常去看過去屬他的一丈多長的摺頁機，想復辟，想國民黨打回來，收回他的機器。所以，李某某，除資本家外，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

我說，審查別人的問題，最怕始終不見面，背對背，始終亂猜，根據無數的懷疑作了無任何證據的結論，人家都不知道。我說，這次要一個個問清楚，要審查就這樣做，背對背的審查，我不參加，要我參加，就要直接談話。他們同意了。我找這個老先生談話。我說，聽你說你身體不好，飯也不大吃得下去，沒有甚麼事情的。還不清楚的，講清楚就是了，身體要緊。他甚麼都不敢說，嚇得不得了，儘管我對他非常客氣，絕對不是懷疑他的，而是關心的，問他甚麼地方的人，多少歲，身體甚麼樣等等，但他還是嚇壞了。

正在這時，有人向我反映說，他的妻子這兩三天沒有吃午飯，恐怕要出事。因為中午在廠裏食堂吃一頓飯。中午吃飯帶休息有四十五分鐘。我就去找這位女工談，好好安慰她。我說，聽說你兩天都沒有吃午飯，千萬不要這樣，身體吃不消。總之東拉西扯，只強調要她先吃飯，天垮下來，也沒有甚麼不得了。對方一聽，覺得你不是來整我的。她無意間提到解放前他們家是幫助過地下黨的，她家樓上曾經藏過共產黨，有三個人，住了兩三個星期。我立刻就懂了。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大逮捕，抓住共產黨立刻殺頭，當時整個地下黨到處隱蔽。我問，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姓甚麼？她說不知道，是她的老伴認識的。這下我就很注意了，一邊問，一邊聽，看她說的像不像。她就有點訴苦了，說很難呀，很危險。我問怎麼危險，怎麼難。她說，三個人在樓上，我每天去買菜，都是偷偷地不讓人家看見。我問為甚麼，她說，平時就我們夫婦，突然加三個人，每

天買菜增加很多。她這個話，不像編出來的，因為她是個沒有知識的人，沒有能力編。我很注意，但我不表現出來。我就用各種方法再啓發她講具體的事，看她講的是不是真的。她又提到倒馬桶。上海天天倒馬桶。她說，倒馬桶也難，要沒有人的時候倒。我問為甚麼呢？她說，一下子來了三個人，增加很多，如果被旁邊的人家看見，就會奇怪。我聽她這樣講，覺得這些不大可能編造出來，是她無意中講出來的，真實性非常強。一個人沒有實際的經歷，你就是一個偵探小說家，也製造不出這樣的故事來。我反覆安慰她，一定會調查清楚，勸她先吃飯，不會有甚麼事情的。然後，我又去問她的丈夫，把三個躲藏者的名字弄清了。我回小組，把這些事一談，就請費全法做下一步的事。我們小組的費全法是中華書局的印刷工人，三十歲，能幹，靈活得很。我說，如果地下黨真有三個人在他們樓上避過難，去問市總工會，一定問得出來。這三個人，不會是普通的人，職位不會低，一定是中層幹部了。如果市總工會沒有，就到市委組織部去調查。這種調查的方法，他們不懂。費全法去問市總工會，一問，三個人立刻調查出來了。一個在浦東哪個廠當黨委書記還是副書記，一個在哪個區當工會副主席之類的，還有一個也查到了，都是上海市工會的中層幹部。後來，費全法又到浦東去見了那個黨委書記還是副書記，那個人說有這一回事，他們是在那裏躲過。問為甚麼要到他家去。他說，平時跟這個小資本家就有關係，覺得他思想並不反動，跟他建立來往。一個完全證實，其他兩個，就不去見也行。

因為根本問題弄清楚了，說寄錢幫助過國民黨浦東游擊隊的事，就直接問他了。我知道國民黨沒有浦東游擊隊，我們倒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說，你浦東那邊是不是有甚麼熟人，聽說

你解放前給浦東那邊寄過錢，是不是有這回事？他說，有啊，他恐怕寄了相當於「四清」時的一兩百塊。我問為甚麼要寄錢。他說，那個人說他沒有辦法生存了，要做個小生意，過去認識的，他就寄了。

所以，問題弄清楚了。這個人不但不是反動資本家，相反是在危機時幫助地下黨、隱藏了三個黨員的進步的資本家。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並不難。不要神秘化，這個有問題，那個有問題，又不去調查。

說人家是漢奸反革命，其實是抗戰時我們派出的「兩面村長」

朱某某，快六十歲了，是清潔工人，工作表現非常好，但頭上戴頂「漢奸反革命」的帽子。人事科就是這樣介紹的。但是群眾反映好，工作上找不出毛病，賣命得很。這個帽子是公開戴的，所以更怕。我們又看檔案，又派人去調查。他是江陰縣對河那邊靖江縣江邊的一個農民。那個地方是敵偽統治，建立了偽政權，但是我們也進進出出的。他是兩面村長，是我們叫他去當偽村長的，總要有一個人應付差事嘛。他說，我白天應付偽政府，晚上，走幾里路就到根據地彙報情況，接受任務。我一聽他說「接受任務」，心裏就想，一般人說不出來。我問他有些甚麼指示。他說，敵人要糧食，你說不給，就要殺老百姓的頭。他特別講到獻銅獻鐵。他說，明知道這是敵人拿去作武器的，我就請示，結果是，不交不行，不交就暴露了，所以就收起來，把最差的

交給敵人，好的運到根據地去。我一聽，這不大像一個文化低的人能製造出來的。如果完全是敵人那邊的村長，不會知道我們這邊的情況。他即使要編造，也會漏洞百出。你講的是真的、假的，我一聽就知道了。

我們到他家鄉也調查過，得出結果，這個人是共產黨指派的應付敵人的村長，實際上為解放區工作。因為他的「漢奸反革命」帽子是上海××區公安局戴的，有名單的，他要定期去彙報，我們就向××區公安局報告。××區公安局也派了人來，說是弄錯了，就是你們說的情況。我說，為甚麼不早點解決呢？那個人說，我們的工作也不容易。你們來了這麼大個工作隊，甚麼局長呀一大堆，你們調查出來，比我們容易說話，如果我們說，動不動就說我們右傾、投降。

當時還沒有「平反」一說，共產黨還有搞錯的呀。當時說因為表現好、勞動好等等，說些好話，大家都贊成，摘了帽子。說人家是漢奸反革命，結果呢，不但不是漢奸，而是抗戰時立了功的，是共產黨派他去當兩面村長的。想想看，這樣的情況有多少？

一個真新四軍，長年被懷疑是特務分子

胡某某，是真的新四軍，被懷疑是特務分子，說有嚴重的政治問題，根據是他平日的胡吹。弄清楚這個人的問題，很費力。

胡某某是切邊工，行話叫「大刀架子上做的」，很有勁，工作不錯，但喜歡胡吹（吹牛）。

還買賣糧票，車間裏你賣給我，我賣給你。他還有賭錢惡習。當時那點工資真的用不完，能買的東西就那麼多，錢沒有用處。當然是小賭，打牌、擲骰子，麻將當時還少。他老講他是新四軍，是從南京對面的江北撤退到黃河以北山東渤海區，又打回來的，功勞很大。過去他是黨員，後來沒有黨籍了等等。

他的檔案厚厚一大本。工作組反覆討論，我也參加。非常奇怪，他的檔案裏竟有一張黨證，是有光紙，比巴掌小一點，油印的，某某人是某某團的黨員。我覺得奇怪。共產黨從來沒有黨證制度，這是怎麼回事？問「四清」隊的幾個領導，新四軍在蘇北有沒有黨證制度，他們說沒有聽說過。但是，特務哪有那麼笨的，製造一個假黨證，這麼簡陋，不是鬧笑話嗎？如果是假的，就應該製造得像樣一點，製造成這個樣子，騙人也難呀。我仔細看，裏邊的章，跟寫的字不一樣，寫的是某某團，章卻是另外一個團的。這樣看，我覺得反而更不像假的了。作假的人，公開做出這個矛盾給你看嗎？天下任何特務機關不會這麼傻的。華北似乎沒有蓋章之說，但新四軍地區有指頭大小的章。我們的隊伍番號一天到晚變來變去，今天叫甚麼團，明天又叫甚麼團，後天又變成地方隊伍叫甚麼團。這個團變來變去，但黨的章是老章，永遠不變的。這有可能。所以這個黨證，我不能肯定是真的，但更不能肯定是假的。我們工作隊的副隊長，辭海的副總編輯陳落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比我大七八歲，知道的事情多。我向他建議說，胡某某的經歷有北上，有南下，我們兩個找他談一次話，和和平平的，聽他講，提出問題。他如果是假的，上下幾千里，怎麼來的，怎麼去的，他的文化程度低，要騙我們，不可能。

一天下午約胡某某談，談了差不多兩個小時。他原原本本講了。他就是上海人，是外灘修鞋的。大概在日本快投降前兩年，一九四四年被抓壯丁，變成僞軍。不久打了敗仗，新四軍把他們解放了，他就變成新四軍了。當時我們兵源不夠，訓練訓練，講講話，訴訴苦，就變成新四軍。大體上他說得對。

他說，我打仗表現不錯，發展為黨員。我問怎麼不錯，他說，如果我打得不好，還准我當黨員嗎？他說，又調我去當某個師長的警衛員，師長是解放後才叫的，那時可能叫某個軍分區司令之類。我一聽，解放區團以上幹部有警衛員，不是黨員不能做。

他講一九四六年民國黨大進攻，他們朝北撤退時經過了甚麼地方。我覺得他說得大體對，他的文化程度不高，編不出來。有時，我插一句話說，你說的地名不大對，音是對的，字記錯了。這個是為了解除他的恐慌，讓他知道我不是來找他的碴子的；這也是對他的威懾，你亂說過不了關。當他講到一些地方，我又提出問題，看他講的是不是實話。比如他講到山東渤海區，我問他到過哪些地方，他說到了陽信。我說我也到過陽信，陽信出甚麼？他說，出棗，出梨。全對。他講到南下時說，北撤也難，南下也難，打了多少仗，犧牲了多少人。這也跟實際的情況差不多。

我問起他黨證的事。我說，共產黨沒有黨證制喲，你這是怎麼來的？他說，這是臨時的。我們北撤的時候，我們自己沒有收容隊，為了準備受傷掉隊時讓老百姓收留，發了這個黨證，這張黨證不但說明我是新四軍，還說明我是黨員。我這一聽，完全不像假的。甚麼高明的特務都製造不出這些細節來。陳落聽了也覺得是合理的。

我問，你又怎麼離隊了呢？他說，我一到了江陰要塞，就請假回上海，我就不想回隊了，所以我就沒有回去。我問，還記得師長的名字嗎？他說記得，叫某某某。

這次談話後，我跟陳落已大致肯定，他講的全是真的，編是編不出來的。有個別的地方他記不清楚，是自然的事情。最後就是調查他說的師長了。十好幾年了，怎麼找到這個師長？大家都覺得難。我說，當時的師長，現在中央軍委、國防部都有名字。我們工作隊沒有辦法調查，我們寫一個情況，通過市委組織部，請市委辦公廳轉國防部辦公廳，國防部辦公廳轉有關單位。總之，往國防部辦公廳一交就行了，或請中央組織部轉也一樣。這個信發出後，不到兩個星期，海南島來信了，過去那個師長現在是海南島某艦隊司令。這個司令立刻回信，關心得不得了，介紹這個人怎樣怎樣，本人所說均屬實。說他還派人回上海找過兩次，沒有找到。這個材料一來，情況完全清楚了。

這種很複雜的歷史，叫一般的人事科去調查，怎麼弄得清楚？一般工作隊，也弄不清楚。所以，我們把一切複雜情況都交給人事科，很危險。

被認為是「濫權」病退了女工的女支書，差點被開除黨籍

諸××是黨支部書記，權力比車間主任大。這個女同志能力強，脾氣大，工作方式不好，得罪人，對她的反映很多。一，說她父親是大漢奸；二，說她是洋奴，歷史不清；三，說她在「四

清」開始前一兩年，對女職工進行過搜身。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一次有人丟東西，她把幾個女職工叫到她的辦公室去，沒有搜出結果來。四，最嚴重的一件事情，我們去後才爆炸性地說她在一九六二年越權把女工汪某某病退了。最後一事鬧得天翻地覆。

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全國餓飯的人很多，全國單位要減員，中央緊急政策。諸××把一個姓汪的女工病退了，是××區核防所出的醫生簽字證明了的。當時上面規定，估計這人一年或者兩年之內不可能上班，就要病退。退回地方，由民政局救濟。這是壓縮開支，減少各單位支出。

我們「四清」工作隊一進廠，汪某某就來了。很多人支持她，說諸××讓汪某某病退，沒有根據。這個問題最尖銳，用的時間很長。諸××是車間支部書記，我是大右派，按規定，我是不能做黨員的「四清」工作的。但是，這個問題複雜，還是交給我。我接手前，已經開過兩次批判會。「四清」工作隊的隊長馬飛海來看了，說不要這樣搞，這是鬥爭會，諸××的脾氣那個樣子，萬一出事怎麼辦？

我沒有權力阻止開批判會，但讓我接手調查，我願意。首先她父親的名字我聽說過，印象中是個詩人，在民國初期當過北洋政府總統府秘書之類，汪僞政府前南京有個漢奸「維新政府」，主席叫梁鴻志，她父親又是梁鴻志的秘書。我就請教他人後找到古籍出版社的富壽蓀同志問諸××父親的情況。這位同志說，諸的父親是清朝末年同光詩體的代表。他還幫我找來書，證明諸××之父是詩人、名流。

諸××父親的情況弄清楚了，確實是大官僚，是漢奸。但我們關鍵是查女工汪某某被病退的問題。如果不是核防所的意見，那就是嚴重違紀了。醫生簽字的地方，寫的是醫生的名字，但多人核對，是諸××的筆跡。這下，我們就緊張了。我們讓一個女大學生去查核防所的檔案，還讓她把醫生的簽字帶去給醫生看。醫生看了，說不是他寫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輕易做結論。我知道一點，住院的病人，醫院有另外一套討論病歷。這個大學生跑了幾次，覺得太囉嗦。我們只好商量請另外一個女工，工作隊員張美珍去。我說，據我所知，任何醫院內部還有一個討論病狀的檔案，是內部討論的記錄，一般不給人看，只有特殊情況，如上級衛生部門來調查才給看。我說，對諸的處理意見，只有看了這個檔案才能決定。我對張美珍說，你要詳詳細細地說明，去哀求他們，說明這個特殊檔案與我們處理一個人的關係，請他們給你看，有沒有他們討論的檔案。張美珍跑了兩三次，真的有內部檔案，檔案的診斷結果是汪某某在中央規定的時間內不能工作。醫院只作了這個結論，退不退，中央有文件，因為簽字就要得罪人了。有這些材料，基本上就把諸××的主要矛盾弄清楚了。

領導派我找諸××談話，她不知道我是右派，如果知道，肯定會大罵我。當時規定，工作隊所有人的身份都不公開。我把她找出來在食堂裏談。她的性子急得很，見面就說，你們把我開除好了，你們把我開除好了。我說，諸××同志，慢慢來，你看這個樣子是不是要把你開除的樣子嘛。我只好說，組織上了解你，不然不會找你反覆談。你的父親，調查過了，是甚麼樣甚麼樣的人，你呢，具體的情況你不知道，但你的情況跟你父親完全不同。她一聽，就流淚了，說，我

父親有七個小老婆，我是第七個小老婆生的。我三四歲時，父親就去世，我們被趕出來，就跟乞丐一樣。我父親是甚麼樣子都不知道。我是依靠母親做工帶大的。她這一說，她的出身大漢奸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不是說她是洋奴嗎？這個問題也要問清楚。我就說，聽說你還會跳舞，會唱歌，會吹奏洋樂器。她說，我是被送到天主堂去學的。天主堂經濟也困難，我們就去婚禮和喪禮上演奏，大商店開業，我們也去。原來她是幹這個事，並不是洋奴。我說這個事我知道，大城市都有，解放後一段時間還有，我在廣州看見過。

這些事情問清楚後，就剩最後的醫生簽字了。我又問她，我們調查了，好像醫生的字跡是你的，怎麼回事？她一下子又爆發了，又大哭，說，你們把我開除好了，你們把我開除好了。我說情況我們基本都了解了，你慢慢講，慢慢講。她看我不是整她的，說，是我代醫生簽名的。我說，你怎麼去幹這種事呢？意思是你怎麼幹這樣的傻事。她說有甚麼辦法，病退是得罪人的事，有指標，有任務，醫生不簽字，我也不知道高下，就代醫生簽了。她承認了。我說，一切都清楚了，現在你的任務是好好吃飯，注意健康，大事我們替你保險。上面只叫她做點自我批評了結。她工作積極，好面子，好勝，方式有點簡單。這類同志是解放後第一批積極分子，非常可靠。

「勸退」黨的會上，臨時暗中緊急改變「勸退」決定

失掉共產黨黨籍當時有兩種，一種是開除，一種是勸退。朱××，三十多歲參加過新四軍。

他是怎麼到上海當工人的，沒有多問。他們夫婦都不會理家，當時有高價糧賣，他常買高價糧，錢不夠用，到處借，欠工廠的錢也比較多。大家對他的意見較多。就在「四清」期間，一九六五年夏秋，他突然接到家裏的電報說父親去世。他向廠部借了二百元。其實朱××父親這時並沒有死，他弟弟打電報時，父親病重，以為活不成了。當時我們不知道，朱××也不知道這些真實情況。朱××寄錢回家鄉如皋或東台，本人沒有回去。這件事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但就在他寄錢不久，工作組因事外調，被調的人剛好從如皋回來，說見到了朱××的父親，還到朱××的父親家坐過。我們就覺得奇怪了，朱××說他父親死了，寄了錢回去，但他父親並沒有死，他公然說父親死了來騙兩百塊錢。

小組請費全法到朱××家鄉去調查，真的看見朱父還在。費全法回到上海，彙報了情況，說是弟弟估計父親會死才打的電報。我說，這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證明朱××是否欺騙，還必須證明他寄了安葬費後，是否還給父親寫了信，如寄了信，就證明他知道父親沒有死。廠裏的人都知道，朱××對他父親好，常寄錢，寄信也很多。我對費全法說，恐怕得再去一次，用非公開的辦法，看有沒有朱××再給他父親寫的信，如果有，問題就大了。我對費全法說，你的方法必須轉彎抹角。他拿了一個空信封回來，是一九六五年幾月的。這個信封的日期，說明信是向公家借錢以後寫的。上面研究後，覺得朱××不可挽救了，覺悟低，決定勸他退黨。

為了擴大影響，勸朱××退黨的會，邀請了十多個老工人參加。我跟費全法在旁邊聽。

就在開會的時候，我突然想起那個信封有點舊。我對費全法說，那信封好像舊了一點，能

不能確定郵戳是哪天的？費全法是搞印刷質檢的，說，我借放大鏡來看。我馬上遞了個條子給主席說，請你現在設法拖時間，信封可能有問題，現在不能作組織處理。費全法拿放大鏡來一看，「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三」與「五」兩個字，就看清是「三」而不是「五」，也就是說這是前兩年的郵戳。這下查清楚了，是舊信封。所以，我又立刻給主席遞條子說，這個問題千萬不能談了，是舊信封，就是批評一下。

這件事如果不是小心，就會冤枉一個好人。

「四清」從一九六四年的四月搞到「文革」前，一年多。經過調查，證明這個印刷廠的裝訂車間的三十多個人沒有問題。後來「文革」一來，過了半年多，說「四清」工作隊是鎮壓群衆，要交代。我說，我去吧。我可以當着群衆的面，把一個個人是怎麼審查的，一個個的問題是怎麼解決的，統統說出來。陳落說，算了，你不要去，去了沒有用。「文革」了，是非全翻了，越有理越有罪，現在要全是壞人才行。

作為一個摘帽右派，在這個印刷廠「四清」，我總覺得這是我這一生幹的一件好事。三十多個人的結論，全是我寫的，像部福爾摩斯偵探案。我全像辦案似的，同一般所謂搞政治運動全不同，一個疑點，一個反證都不放過。

我這個人可謂「不學無術」。這個成語一般是罵人最厲害的話。如果我們把「無術」理解成為沒有甚麼大的辦事本領的話，也就沒有甚麼了不起了。但是，我覺得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辦事本領，那就是我願、也敢對「人事」問題負責。很多人怕挨此事之邊，我卻十分喜歡鑽進去把事情

弄個水落石出。我一生毫無所長，凡遇到人的「歷史」難題，涉及到「整人」的，只要允許我過問時，我一定主動過問。孔子在《語論》中說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個「四毋」主義其實就是一個主義：不要主觀主義，也就是胡適強調的四個字「拿證據來」！凡對人的政治懷疑，全沒有證據的，在我的力量能及之處，我一定給予推翻。我現在已經進入九十歲了，還能活幾天？吹牛會被人揭發得更慘。近來，我寫了一首自壽詩《微覺此生未整人》：「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雲。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

第二十二章 半飢半飽，強作風流

我的關節炎竟然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

在北京人民社時，我的關節炎嚴重，走不動，我住的地方與我辦公的地方，只有一站地，但都走不動。走不動怎麼辦呢，便找了一個三輪車工人，用破三輪車拉我上下班。然後他就做清潔、燒開水等雜工。他也很高興，他有正式編制，後來當收發。我當了右派後，當然不能坐三輪車了，我就靠拄棍子。

到了上海後，一九六三年，我到醫院去看一般的感冒之類的病，醫生姓李，四十多歲，他問我還有沒有別的病，我說還有關節炎。我把我的情況講了，說走不動，還把拐杖給他看。這個李醫生好得不得了。他說，治療試試看。我說我治療過，沒有效果。他說，再試試。他去聯繫骨科，骨科一個專家的回答也很科學，說你這個類風濕關節炎，目前全世界都沒有治療的辦法。這個病古時候就有，所以，治可以治，一般不大見效。很客氣。這個話，我在北京就聽專家講過。

可是這個內科李醫生說，試試吧。他給我吃「可的鬆」，激素類藥，當時還沒有「強的鬆」。我照着他給的藥吃。兩三個月後，在商店櫃檯買東西，買完走出來，棍子都忘記了，又回去拿。李醫生太好了，但過不了多久，這個李醫生不見了。我問護士，說調走了。我問調到哪裏，說不知道。李醫生走後，我還找其他的醫生，其他醫生說，既然有效，就可以治下去。我吃「可的鬆」，三個月後是一天一片，然後是一天半片，最後服到七三年七四年。一九七零到幹校勞動時，也帶着照樣服。

「文革」開始時，我的關節炎實際上已經好了百分之七十八十了。從走不了幾步，到後來在幹校勞動樣樣都離不開我，真是沒有想到。現在老了，九十歲走不了路，不是痛得不得了，只是隱隱痛。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麼度過業餘時光的

逛舊書店，買兩種書——

那個時候物質生活很困難，不用說了。政治生活就是「反修」，一年比一年緊。但是還有星期天，還有多數晚上的時間。當時又沒有電視，我在上海的業餘消遣主要有下面一些。

逛舊書店。上海舊書店在福州路。星期天，就坐四十九路公共汽車到福州路口下，在那裏待兩三個鐘頭，中午坐車回家。舊書買甚麼呢？我買兩種書。一種是線裝書，買來做甚麼？做大便

紙。那個時候沒有大便紙賣，上海也沒有，單位每個月發很小張的三十張。買了些甚麼呢？現在講，實在對不起，有《二程全書》、《朱子語類》、《王陽明全集》等，這些書解放後根本就賣不出去，很多，《二程全書》有幾十本，紙還比較好。有中華書局的，也有商務印書館的，你花幾毛錢，一塊錢，提兩大捆回去。同時我不喜歡理學，我對理學厭煩得很。中國搞成這個樣子，理學家要負很大的責任。

另一種是我喜歡的書，因為錢不多，買些零零碎碎的。比如《世説新語》，幾種版本我都買，有中華書局的四庫備要本，有商務的四庫叢刊本。當時一堆一堆地擺在那裏，沒有人要，三四毛錢一本。文字漂亮得不得了。還有董解元的《西廂記》——董解元的《西廂記》比王實甫的好——賈島的《長江集》。《長江集》，很薄，萬有文庫本，有光紙的，五分錢或一毛錢，字一點點大。我看了後，倒數的第三首詩吧，好像是「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記不清了，每一個字我都畫了紅圈。其他有幾首也畫滿了。還有三曹詩集裏的一些詩，我也是圈上加圈。

批鄧拓的時候，因鄧拓引用過賈島的詩，説鄧拓要拿刀殺人。「文化大革命」一來，我就知道不對了，我也畫了圈，不是説我也想刺殺元首麼？要趕快消滅書。那時，甚麼書都有問題。這一類道林紙的，反光的，很重，水又化不了。怎麼辦？一不敢燒，要冒煙，抓到不得了，就是反革命。第二，又不敢拿到廢紙店去賣，怕廢紙店有人監視。當時就是這麼荒唐。因此，我放在水盆裏泡，發脹後，撕碎用手捏成蠶豆大，放進馬桶一邊沖一邊倒，再查，你查不出來。那時，逼

得不得不想這樣的辦法。因為查出來，說不清。儘管是非常薄的唐代詩人的一本舊書，你在上面畫了紅圈圈，就可能是反革命。

在這個問題上，田家英就吃了虧。一九七八年以後，我見過他夫人董邊。這些故事現在為甚麼講？因為沒有人想得到人們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而今天還有人要歌頌這個怎麼偉大，我覺得真是不可理解。

除了逛舊書店外，還逛文具店。文具店有紙筆墨店。福州路過去拐彎有個河南路，河南路有家很大的墨莊，叫曹素功墨店，各種各樣的墨多得很，觀賞觀賞，買點零碎的，兩毛、三毛的，十幾二十塊的買不起，但經常去看，太好看了，想不到墨的形狀竟是數十百種的。

逛舊貨店、古董店——

上海廣東路有一家很大的古董店，延安中路等處也有。上海古董店、舊貨店不少，那時還開着，只是沒有人去買。我沒有甚麼知識，只是看看。當時賣的東西多是幾塊，而不是幾十、幾百、幾千。比方說，紫檀木的筆架，兩三塊，現在一萬塊錢都買不着。各種小玩意，鎮紙的東西，有象牙的，有竹的，有玉的。象牙的，大概不到十塊錢，但買不起呀。字畫一大堆，都三塊五塊。木器店也有。有個圓桌子很漂亮，是花梨木的，現在叫黃花梨，要十五塊錢。價錢不便宜，但買回去，放在那裏。一個右派，不知道自己犯的罪還消遣，不是自己找罪受。我只是去看看，看了後，心情好一些，時間也過得快一點，一個上午就過去了。

跑舊貨店有一個目的，我要賣一點舊貨。當時舊貨店的東西還是很貴。國內甚麼都不能生產，甚麼都不准進口了，偏偏我有一些東西可以賣。我有幾個照相機。一九三六年，我在重慶北碚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當練習生會照相。解放初，我買了幾隻舊照相機，德國的蔡司依康、羅勒福來、乃卡都有。蔡司依康相機有兩種，一種照小的，二寸，一卷照十六張；一種照八張，這兩種我都買了，因為已成廢品了，兩種加起來，不超過五十塊。還有觀劇鏡，外國進口的，鍍金的，很漂亮，我也買過一個，好玩，也便宜，那個時候三五塊錢，也是舊的。還有金筆，解放後，在廣州地攤上，五一筆、派克筆，根本不值錢。五一金筆，一枝舊的可能相當於一九五四年幣改後的兩三塊錢。我大概一樣買了一枝。還有一種瓦特曼金筆，中國人只知道瓦特曼是墨水，也有金筆，我也買了。

這個時候，這些東西派上用場了。我的東西都賣了。上海有錢的很多，會買東西的人更多。覺得錢沒有用，買的人，不一定是投甚麼機，可能是絕望的心情，買點舊貨看看算了。好東西，一兩天就賣出去了。

上海舊貨店的人都是有眼光的，他收這些東西都是高價。因為上海有一批人，手裏有錢，又懂這些東西，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這些東西了，不准進來了，就要買回去，貴也要買。舊貨店幫你賣，非常合理。一般是七折到八折。比如他賣了一百塊，他通知你，他收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佣金，給你七十塊或者八十塊。賣解放初買的東西，也只在上海才賣得出去。

聽音樂——

上海音樂廳當時在延安東路，離外灘一站路，現在整體搬家了。我辦公的地方在陝西北路，有軌電車可到。一九六三年夏天後，飢餓的情況稍有緩解，音樂廳才有演出。每次演出要登廣告。只要有演出，不吃午飯，我就去買票，兩毛到三毛一張。買好票，立刻用糧票買點東西回來上班。回來的時間不夠，要遲到一點。遲到一二十分鐘。我跟一個副總編輯在一個小辦公室，這個副總編輯不管這些事，普通的辦公室不行，遲到是不行的。五點過下班，就不着急了，七點才開幕。

其實我哪裏懂這些東西，就是散散心。但是，到現在還記得哪些人演的甚麼。不是有意記的，甚麼原因，說不出來，但是這一輩子就記住了。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衛仲樂，六十幾歲，白頭髮，彈《十面埋伏》，想不到琵琶彈得那麼精彩。還有一個陸春齡，是個三輪車工人，報上介紹過，吹笛子《江南春早》等，好得不得了。溫可錚，個子不高，男低音。男低音是很難唱的，世界上不多。中國二十世紀以來，我所知道的，他是一個。好不好，我無法評論，我不懂。還有一個，叫杜矢甲，跟蕭軍的作風差不多，在延安對誰都不理不睬的。在延安，我聽杜演唱過兩三次。他不大出台。他唱《伏爾加河船夫曲》。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最出名的男低音只有蘇聯的夏里阿平，高爾基的朋友。我在台下還見過拉二胡的閔惠芬，她拉《二泉映月》、《江河水》。我看她比賽時，年紀很小，坐在椅子上，腳似乎還不着地。

為甚麼六七十年前聽過一兩次的，連他們的名字、他們的作品現在還記得，想也不用想？因

為我自己沒有才，我尊敬有才的人，我佩服有學問、有專長的人，我尊重他們，我覺得他們了不起，所以把他們記住了。另外，我不會悲觀的原因，是我還有這些可笑的閒情野趣。

坐公共汽車逛郊區——

當時在上海一張月票可以到處跑，但是郊區要另外買票。所謂郊區，就是離開上海市區十幾二十里以外的地方。上海郊區甚麼樣子，我也去看看。老看南京路、淮海路，有啥意思？上海周圍附近的市鎮，甚麼七寶、寶山、朱家角、高橋，我都去過。我坐着車，看一看，又坐車回來。七寶、朱家角是比較大的市鎮。現在鼎鼎大名的寶山縣，當時就是一條小街，甚麼都沒有，連我們四川的小鄉鎮都比不上。到高橋看到了杜月笙的杜家祠堂，大門外牆上好像有用金箔貼成的一篇杜氏族譜序，似乎是章太炎寫的，說杜月笙的祖先是杜甫，妙不可言。

去轉郊區是為甚麼目的呢，甚麼都不為。不買東西，也不賣東西，反正花錢的話，就是三毛、一毛五的票錢，不花錢的話，就是月票。我總不能說在上海待了這麼多年，只知道南京路、淮海路、外灘嘛。這也是開闊眼界的辦法。

第二十三章 「文革」早期：牛棚虐事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九六九年九月）

甚麼人進「牛棚」

「文革」開始時，上海辭海編輯所相當龐大了，七八十上百人了。麻雀雖小，肝膽俱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單位裏不斷出現各種各樣的造反派。「搏蒼龍」、「抓劉鄧」、「革到底」、「學林江」，這類戰鬥隊和革命司令部多得很。前半年，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同年的十一月十二月，我是單位的第一個焦點，你是右派，大右派，文章做起來很方便。做就是了。這個時候還沒有開始大打人，就是罵。大字報如山似海。天天有高潮，罵我根本不能到上海前線來，上海是國防前線，怎麼能讓這種反革命分子來呢？說我是周揚派來的定時炸彈，不過癮，又說是劉鄧黑司令部派到上海來的特別情報員。我舉這些，是好笑，怎麼會鬧成這樣？一點不稀奇，當時全國都是這樣的，沒有說你是日本派來的特務，已經夠客氣了。再下去，就可以說你是日本派的

特務了。這樣以我為中心，鬧了半年。到十一二月，我發現有張大字報是幾個黨員寫的。他們本身是「老保」，是靠邊的。他們說，我們單位「文革」的大方向偏了，大方向應該是揪「閻王殿」。這張大字報出來後，情況才有改變。這些黨員都到北京去串聯了。單位裏十幾個真造反派真幹起來了，很厲害，樓梯、房子，裏裏外外貼滿了反對「老保」的大字報，把矛頭一下全對着「老保」，即多數群眾了。

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初就開始設牛棚了。我呢，是第一個進牛棚的。這個牛棚裏只關我一條牛，是舊式花園的花房改的公共食堂，不准我到辦公室，白天勞動。

我們那個單位，與季羨林《牛棚雜憶》寫的相比起來，沒有那麼兇，沒有那麼殘暴，但折磨人的花樣可能比他們多。我這裏盡量不重複，全國講的不少了。

當時上海的牛棚關十種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資本家、走資派、反動權威。又可簡稱「地、富、反、壞、右，叛、特、資、走、資（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其他，扯不上邊的，就給你戴上更多帽子後關起來鬥，當然大單位關的範圍比這個寬多了。

當時甚麼叫「反動權威」？現在的青年人可以說想死都想不到。凡是你有一技之長的，就是反動權威。理髮理得比別人好，工資比別人高，是反動權威；炒菜炒得好的，也是反動權威。更奇怪的是編竹籃子的、編竹筐的師傅，也叫反動權威，都是要挨鬥的。「文革」開始，上海的理髮店掛毛主席像，兩邊還擺上些甚麼，跟供菩薩一模一樣。理髮的人去，首先問，你是甚麼貨色？當時誰都怕，是甚麼就說甚麼，如我是地主，我是右派，我是資本家等等。問完，叫你向毛

主席請罪，在毛主席像前哇哇請半天罪。請了罪，叫了口號，才給你理髮。我去試過一回，這個理髮比坐監獄還難受，寧肯上殺場，我也不去理這個髮了。沒有辦法，我就在小弄堂裏理。當時很多家中無收入，婦女都出來理髮了，也不管會不會理，拿着小推子，一塊布，一個櫈子，也不要鏡子。當時牛鬼蛇神太多，我們單位七八十個人，揪出來二十三個人，這些人怎麼辦呢，工資扣了，去理髮也要先請罪，於是，就在弄堂邊，一毛錢理了，也不洗。有一天，我看到一個三四十歲的理髮員理得很好，還有一個鏡子，就去找他理髮了。我一邊理一邊跟他聊。我說，你不是一毛錢的家庭婦女來理髮的，你的手藝高明得很呀！他說，我是某某大理髮廳的理髮師。我說，怎麼到這裏來了呢？他說，你不知道，理髮店理得好的都要挨鬥的。我問，鬥甚麼呢？他說，鬥反動權威。他讓我向近處上海美琪電影院斜對面的一間舊平房看，那是個編竹器的合作社。他說，那裏才開鬥爭會。我問鬥甚麼。他說，鬥師傅，反動權威。到這個竹器社來編竹器的都是附近的貧民，來求生的，竟然成了反動權威。這個理髮師說，我們的理髮店已經有人挨鬥了，我再不跑出來，就鬥到我的頭上了。我不好意思，給他四毛錢。其他大理髮店是八毛一塊多。他不好意思收，說來說去，收了二毛錢。所以在那個情況下，絕不是只有哪一個人感到恐怖的問題，人人都感到生活在惶惶難以終日的世界裏邊。編個竹筐，技術好一點，都要被鬥。一切只許壞，不能好，不許你作出成績，任何人要作出成績，那你就是牛鬼蛇神。當時小學教師、小學校長，大部份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了，提着破痰盂敲幾下，叫喊我是甚麼甚麼牛鬼蛇神之類。這樣的事就發生在我住的房屋後面，我親眼看見了。有些小孩子，拿着木棍趕老師。當時的氣氛就

是這個樣子。據説，全地球都必然會照這麼辦，先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然後「五洲震盪風雷激」，「環球同此涼熱」了。

一九六六年，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一個號召全國大鬥特鬥、大亂特亂、天天颳十二級以上颱風的總動員令，從此全國就人無寧日，地無寧日，國無寧日，以至有那麼多墳墓也無寧日，延安的「四八」烈士墓也被毀了。而所謂「牛鬼蛇神」又是無任何明確定義的，今天你算權高氣大，但一聲説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堅決的保皇派」等等，你就一切都完了。在很長一個時期，「文革」中的前三四年吧，「人」與「牛鬼蛇神」之間是沒有明確區分的，今天你鬥別人是「牛鬼蛇神」，説不定明天你就是「牛鬼蛇神」了。一九六六年秋冬或一九七七年春，一次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大鬥「牛鬼蛇神」時，我被插着大「標子」（舊時押赴刑場砍頭時插在罪犯後頸高過頭的大標牌），上書「大右派曾彥修」，字少醒目，倒也簡明。始終押着我趕上「鬥牛」場並被鬥的，是一位原國民黨政府浙江南部溫嶺縣的「推事」，據説是縣法院的審判官。（此人最後似也未進牛棚，不知有何法術。）我心裏想：這倒好，蔣介石何必「反攻大陸」呢？這不是已經實現「國民黨大審共產黨」了嗎？上海事實上已經把革命與反革命翻了個天了，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八九月間，表面上以所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的名義，組織多少萬人去消滅江南造船廠的另一個造反派，結果竟把「江南」船廠的地下黨員視為反動組織，公開在文化廣場設辦公處，要江南廠的地下黨員去登記自首（這一登記是不是明白叫「自首登記」我不甚清楚）。解放後，我們並不要每

個國民黨員都來登記，而是只要它的區黨部委員以上的黨官來登記。我當然不是說一切「文革」中的全國亂打亂鬥，都是來自陳伯達的這一號召，但它們同這個號召是絕對分不開的，則是事實。

打掃廁所的學問，我可以寫一本很不錯的小冊子

我一九六七年春進牛棚，到一九六九年，將近三年。幹了甚麼呢，我摘要地講講。打掃廁所還要「摘要」講，學問確實不少。

一清晨趕到單位打掃清潔。開始是我一個，後來就多了。進了「牛棚」的，都來打掃。我們單位是大資本家的花園洋房，有個很大的花園。房屋不讓我們進，我們打掃公共的地方，特別是廁所，樓上樓下好幾個，而我是打掃廁所的真正的專家。平生唯此堪稱傑，打掃廁所可稱王。關於打掃廁所，我可以寫一本書。「文革」後，鄧小平曾經誇獎童第周，說童第周真是個科學家，打掃廁所，也打掃得非常乾淨。我看了後，心裏有點不平。我不是科學家，但我也打掃得很好，坐便器內部，工具弄不到的地方，我都是用手去弄乾淨的。外邊花園裏的小便池，可能幾十年沒有打掃過，我全是用手。還有廁所的地板，多少年沒有去垢，我是坐在地板上，拿着鈍刀，一邊刮，一邊擦，一寸一寸弄的。又要刮乾淨，又不要傷地板，好容易！所以，打掃廁所這門學問，我可以寫一本小冊子。除了童第周外，全國打掃廁所打掃得好的，一定千千萬萬。既然打掃廁所了，就把它打掃乾淨。打掃女廁所，我尤其賣力。沒人時，進去反鎖，打掃半小時出來，讓人進

去。如此反覆，便完成任務了。我故意誇大地兩手拿滿清潔器物，大張旗鼓地進進出出，讓人明眼看見，以免發生誣告。

打掃廁所的工作，對我來講是長期的強項。劃了右派到上海去，就沒有斷過。這個單位對我很好，很客氣，甚至優待，重體力的勞動沒有讓我做。但是掃廁所，我一去，就要打掃。可能是上面規定的，你沒有到東北、西北去勞改，必須在本單位勞改，而且還必定是打掃廁所之類的。其實，打掃衛生本身沒有甚麼下賤，是規定的人頭腦有欠清潔。我對接受打掃廁所的工作特別高興。因為就沒有人認真打掃乾淨過。我認認真真的，每個平方寸都要打掃乾淨，至今足以自傲。

他們七點半上班前，我們就要打掃好，他們上班，我們就滾開，到牛棚去。

我們單位調去的右派，有四個。李毓珍，老前輩了，我們沒有要他多勞動，我跟另外兩個右派，一年要四次到中華書局圖書館去做一次清潔。這時中華書局的資方在大陸已經沒有了，原來的圖書室由辭海編輯所代管，也可以使用，很大的，幾層樓，幾十萬冊書。圖書館平時關起來，每一季要徹底打掃一次，透透氣。一次要三天。我心想，這些書商蓋這麼大的圖書館樓，藏這麼多書做甚麼呢？

天天早晚請罪中之千奇百怪

早晚兩次，在毛主席的大像前請罪。偉大叫了半天之後，叫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還要叫向

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完了後，鞠躬請罪，一鞠躬，兩鞠躬，三鞠躬。一天必須做兩次，一直做到進了幹校後，右派們還是得集中做，最後做到林彪事件後，這個事才自然放鬆了，沒有人抓了。

我們單位有個人更特別，叫鍾吉宇，解放前是中華書局的中級職員。中華書局解放前是私營的，商務是第一號大，它是第二號大。鍾吉宇是個居士，編過佛教的刊物。這個老先生說話很耿直。造反派天天來牛棚批鬥，每個人都要自報身份。我報右派還不行，一定要報「大右派」。他呢，他報不出來。他說，我是中華書局的職員。造反派敲他的腦袋，敲來敲去，老鬥他，說他是騙子，是僞居士，說他信佛教是騙人的，還說他是資本家，非要他承認是資本家不可。哎呀，鍾老先生呢，要辯。說，我怎麼是資本家嘛，中華書局解放以後公私合營，黨組織要開三方代表會談，中華書局資方在上海一個人也沒有，因為規定要三方開會後作出決定執行，組織便指定我當資方代表。我跟資方沒有關係，我是個小職員。他堅決不承認，不斷地辯論。造反派便不斷地敲他的腦袋，恨透了他。最後把他弄出來，單獨請罪。為了他，造反派在單位花園裏幾根仿古希臘柱子的背後，設了一個毛主席像，跟神龕一模一樣，讓他每天老早來，跪在這個像前面請罪，八點後才能到牛棚去。下午六點鐘放我們回去。他呢，五點半後又讓叫去跪着請罪。很長的時間，有一年把。這是個倔強的老人，人格高尚。這些事都是從上海某大學請來支援我單位的幾個學生幹的——整個民族被糟蹋得不像樣子了。

牛鬼蛇神有的不准坐公交車，後來全不准坐

我們單位造反派規定，少數幾個牛鬼蛇神，上下班不准坐公交車。其他的，可以坐，但是，不許坐，有座位也不許坐，只能站着，如果別人要你坐，你要說，我是牛鬼蛇神。世界變成這樣，想得到嗎？阮友秋是老前輩，據說是個很老的黨員，留學日本的，他翻譯的書我也看過。當時阮友秋大概六十好幾了，也沒有退休，平時來辭海上班，坐在資料室一張桌子邊，資料也不管，屬於安置性質，維持生活而已，沒有甚麼任務。解放後一二十年，大一點的單位，都有這種現象，也就是讓一些老人的生活能維持下去。阮友秋老了，身體也不好。他住在虹口那邊，到辭海編輯所來，很遠很遠。他坐的那路公交車上有個女造反派很兇，發現他坐了，叫他站起來。造反派還要鬥他，並規定牛鬼蛇神絕不准坐。阮老說，我站不動了，我老了。不管，照樣鬥，照樣罵。現在有些人，寫「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績怎麼偉大，想把這些事統統抹掉。

不僅平時不能坐，我們到郊外很遠的地方勞動，也不能坐。造反派把單位所有牛鬼蛇神，包括年紀大的，弄到郊外鋼筋水泥構件廠去勞動。這個廠的勞動很重，這種苦地方造反派不派人跟去，我們自己去。帶隊的人，他能勞動，另外還有兩三個身體強的，他們去頂，我算中等。我幹甚麼呢，我推車，推石子，準備拌混凝土。

我們中有老先生四五個怎麼辦呢？我一面推石子，一面還受領隊之命負責招呼他們，擔心他們出死亡事故。我給他們安排一點像是在勞動樣子的勞動，這裏擦擦，那裏摸摸。這個廠

比較好，造反派不管我們，如果這個廠的造反派管我們，我們只有死。我們的老人中有傅東華。

這個工廠在郊區，出廠門走好久才是有軌電車的終點站，回家上車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為甚麼這樣晚呢？水泥廠勞動後一身全是水泥，下班後，必須沖乾淨，吃晚飯才走，所以離開工廠時，已經坐末班車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搖搖擺擺，我們也不能坐，我們不得不設法把傅東華圍起來，讓他坐坐。

不准在食堂吃飯

辭海編輯所的食堂有六七張桌子，食堂的清潔全歸我們管，但是吃飯的時候，所有的牛鬼蛇神不准跟其他人一起吃。群眾並不贊成，但沒有辦法。我們的造反派是跟王洪文的工總司聯繫在一起的，厲害得很，那是皇家造反派，誰也不敢惹。我們二十七八個牛鬼蛇神，吃飯時在食堂外邊等，下雨就淋雨，大太陽就曬太陽，等他們吃完後，我們再進去。我們急急忙忙吃完後再洗碗，收拾食堂。洗碗少不了我，那麼多碗筷，沒有幾個手腳快的不行。我們牛鬼蛇神裏當隊長的，手腳快，我們三個右派，手腳也快。其他人運輸、擺放碗。下午或者開鬥爭會，或者在花園裏勞動。這個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我們負責清潔，但是，就不准進去吃飯。

天天讀：他們幹出來的惡事，不應該是人類想得出來的

天天上午，有時候加下午，天天讀，天天批，天天鬥，天天思想彙報。天天讀，讀毛主席的語錄、文章；天天批，自己彙報，自己批評，彙報思想，除了口頭的，還有書面的；天天鬥，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有時候鬥得很長，一個人鬥兩三個星期。

毛主席的書，讀甚麼呢，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我們這些人就是國民黨的人，敦促我們投降。其中一個牛鬼蛇神姜兆良就是山東根據地十幾歲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打過杜聿明的，結果他變成杜聿明了，要他「投降」。

事情更壞到甚麼程度呢？當時造反派嫌他們的力量不夠，只有十八個人，嫌其他的都是老保，從上海師大引進來了三個學生。這三個學生不知道現在在哪裏，他們幹出來的事，不是人類想得出來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這些文章在三個學生沒有來之前，已是反覆背過的。三個學生來了後，叫我們背〈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怎麼背？叫我背一段，叫另一個人背第二段，後來發展到背到一段中途，停下來，讓下一個人接下句去背。一背不出來，就打你的頭。這種做法，確實是把我們國家的青年毀掉了，從心裏邊毀掉了，從良心上毀掉了，從道德上毀掉了，把國家、民族毀掉了。

當時我們的一位老幹部，據說抗戰前曾當過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的，着急得很。我跟他關係好。我說，你看，我們當了牛鬼蛇神不要緊，青年變成這個樣子怎麼辦，民族的前途怎麼辦？他

話不多，含着淚說，我們死不足惜，本來就沒有想到能活到今天的，可是……他說不下去了。

我們單位還有個傅東華，傅老，他可不是普通人。抗戰前，他在上海是甚麼地位呢，當時鴛鴦蝴蝶派是不被算為作家的，包括張恨水也不大算，當時上海，左翼作家和中間派作家都能通得過的文人，約有三個，一個是傅東華，一個是葉聖陶，一個是夏丏尊。這三個人地位高，名聲好。如果做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這三個人都可以當，可望通過。傅東華是無錫有名的國學專修館畢業的，畢業後卻到北京師大附中高中部教英文。我問過他老人家是怎麼回事，他說他自己一直在學英文，他把他的英文成績一報，就被錄用了。這種人少見，可以說是一個天才吧。這個老先生也在牛棚裏，人老了，話也說不清楚了，我們經常保護他。那時，「樣板戲」已統治幾年了。有一天考我們樣板戲，這可要命，像傅東華這樣的人，他怎麼會管你甚麼樣板戲不樣板戲呢？一天思想彙報，他說，昨天我看了樣板戲。造反派問，哪個樣板戲？他說，八個樣板戲。他聽說過樣板戲有八個。造反派說，你講是哪八個。忙中他一個也講不出來。又鬥得他不死不活的。

天天彙報思想，還有個大笑話。可能在一九六九年或者一九七零年，造反派經常出題考試，有天出的題是毛主席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二三十個人裏，少數人說對了，多數人回答不上來，其中有我，年月日一個都不知道。單位的兩個負責人也是很老的黨員，都沒有答出來。造反派罵，這樣偉大的事你們都不知道，還算不算中國人？罵的時候說，特別是你們三個，都是老黨員……這個話一出來，他覺得失言了，因為我已經被開除了，還說我是老黨員。他馬上改口說，

你曾某人不在內，一下子更正了。造反派又罵，毛主席的生日，你們三個全說不出來，你們吃不吃壽麵？我們說，吃。真的，毛主席的生日，上海家家戶戶吃壽麵，年年都吃，餓死人也要吃，居委會還不斷提醒，不要忘記，要你去買麵條，吃壽麵。

除了搬大餐桌，我還要在廣告牌上貼批判我的大字報，既有生命危險，又污辱人

製鋼板標語，貼標語——

這個工作很重，最不簡單。牆有多大，標語就搞多大，字呢，一個直徑也有三四尺。貼甚麼，無非是「四個偉大」、永遠健康之類。江青還沒有貼標語，只是開大會的時候就要叫「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貼的時候，要一個大車，幾桶糨糊。人家貼的還沒有乾，我們的就貼上去，我們的還沒有乾，人家的又貼上來。真是：標語家家貼，一蓋幾十層。黃昏不到，拾廢品的一下子就揭得乾乾淨淨。第二天再貼。如此反覆了幾年，形成了一種貼標語、揭標語、廢品收購站的奇異三角關係，一種空前的今古奇觀。

還要製鋼板標語。我們單位大量地買鋼板、三角鐵。我們牛鬼蛇神裏邊偏偏有一個大學化工系畢業的，知道一點鋼板怎麼焊接，怎麼鋸三角鐵等。鋸三角鐵是用一種專門的鋸子，一邊鋸，一邊加油，鋸子不行了，要趕快換鋸條，鋸條都買了幾包，一包一百片。鋸好後，還要焊，還要除銹，最後還要打黃漆底，用紅漆書寫。那個標語有三個人高，要豎起來，下面要挖深坑。這些

全套的工作，大概做了兩三個月。製好標語後，我們幾十個牛鬼蛇神不在毛主席像前，而在這個標語前請罪了。

更妙的是要我在南京西路的廣告牌上貼大字報。那時的廣告牌，統統都變成了貼標語貼大字報的地方。不知為甚麼，有一天發現這塊地方沒有貼，造反派趕快搞了一個基本上是關於我的專輯，大右派某某怎麼樣怎麼樣。弄好後，要牛鬼蛇神去貼。貼的時候，才知道是貼我。這個廣告牌很高，運了兩張乒乓桌重疊放，又借了很長的兩個竹梯捆在一起架在上面。這時造反派說，規定這個大字報要曾彥修自己去貼。如果沒有造反派在場，其他同志可能不會讓我去。他們知道我的關節不好，怕出事。但那時沒有辦法，我只有橫下心了。你不貼，當場就會號召群衆把你打死。我先爬上兩層乒乓桌，又爬上兩個接起來的竹梯。平時，看見廣告牌上的字並不大，但是一旦上去，才看到字很大，一個最小的字至少三四寸見方。

要你去貼寫你的大字報，還爬到這麼高的地方，這也是造反派想出來的折磨人的辦法。他能夠給哪個人以最大的痛苦，就選擇哪個人做。一個人的心腸能夠壞到那個程度，真是想不到。我想起這樣的事情，就要哭。不是因為我貼自己的大字報要哭，是想到民族的災難就要哭。為甚麼要把一個民族害成這個樣呀！這些青年平常並不敢這麼做的。所以我到現在會還有些悲觀，甚至很悲觀。如果有人號召幹壞事，還是有人會跟着走的。能夠壞到甚麼程度，就壞到甚麼程度。又升不了官，又發不了財，何必把壞事幹到了這樣的程度呢？

搬橡木大餐桌——

單位裏的鬥爭大會都在二樓開，一個大房間，連着中間空着的一片。鬥我們牛鬼蛇神中的人，有若干次。要鬥一個人的時候，造反派就叫我們做一件很怪的工作。我們單位的花園洋房，原來是何某人的，他兒子是民國黨的一個中將。解放前夕，全家都去香港了。樓下有個西式大餐桌，丈把長，中間可以拉長，可以縮短。這個桌子是進口的，橡木，很厚，非常好，但是重，估計有七八百斤。造反派要我們幹甚麼呢，每次開批鬥會，要把這個桌子搬到二樓上去，會後又搬下樓。二十幾個人，樓梯擠不下，上面一些人，下面一些人，一階一階抬，這個當中，有五六個人，包括傅東華這樣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他們也要幫助抬。我趕快給我們牛鬼組長說，這些事情不能讓他們做，如果在下面，萬一頂不住，壓死了怎麼辦。得令後，我叫他們到上邊去，做個樣子，叫一叫。不管是上下樓梯，還是在樓梯拐彎處，都非常緊張，因為整個樓梯都是鋪了大理石的，很漂亮，我們要小心不要把大理石弄壞了。

把這麼重的桌子搬上二樓做甚麼呢？就放在旁邊，從來不用。這樣的搬動，五六次以上。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先打兩百殺威棒，想盡一切辦法折磨人，怎麼樣能使你感到最大痛苦，就怎麼樣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人心道德被弄成這個樣子……

花園裏的其他勞動——

在花園裏種菜、修枝、剪草。兩隻手用大剪刀剪萬年青，我根本沒有辦法，沒有那個力氣。

其他的，我都能做。種菜需要肥料，辦公室旁都有蓄糞池，我們就舀起來，加水沖淡，作肥料。這套東西，原來就會一些，這時又學會了一些。鋸樹我最感興趣，我爬到樹上去鋸，還要下來反覆看，把樹鋸得很漂亮。有一棵大白玉蘭樹，一根枝長歪了，從觀賞角度來講，從樹的安全看，必須鋸掉。當時七十多歲的老花匠還在，我們問他，現在鋸可以吧，如果造反派問，你就說，是你叫我們鋸的。他說，可以。造反派真來問他了。他說，是他叫我們鋸的，他一個人沒有力氣。

這些勞動，除搬桌子，貼自己的標語，其他的沒有大的危險，就是污辱人。

第二十四章 「文革」中期：三年幹校勞動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九七二年三月）

在奉賢縣海邊的勞動強度是很大的，相當緊張

到幹校前，我們在農村已經住了幾個月。這件事是全國都統一的。一九六九年，林彪有個命令，十月一號前都必須離開城市。我們單位開到奉賢縣農村，佔三分之二多一點的人都去了，上海還留了二十多個，甚麼原因我不知道，有些是身體不行的，有些是管錢的，有些是造反派，造反派的女的似乎未去。

一傢伙到農村去，好幾十個人（工宣隊、軍宣隊就十幾個人），天天要吃飯、喝水。不能吃農民的，就借用農民的廚房。大師傅去了一個，做菜的，其他的任務就在三個人身上了，我和嚴慶龍兩個右派，外加一個鍾吉宇。可能上面有規定，一切重勞動都交給右派。我們三個二十四小時負責整個廚房。

做些甚麼呢，天不亮，四點多鐘起來用大鍋燒水做稀飯，然後是挑水。我們借廚房那家人旁邊就是小河，上海周圍多是這樣的，岸上離水面只有兩三尺。挑多少呢，有半個人高的缸四個，我跟嚴慶龍兩個人一早上要挑五六十挑，還要挑夠洗臉水、洗碗水。鍾吉宇管燒火，他神經不夠正常，不敢放心讓他挑。早上大家起床做運動，然後洗臉，開早飯。飯吃完後，洗碗，洗鍋，全是我們的事。四缸水用得差不多了，又要挑水，把四個缸裝滿，接着打掃廚房。

忙完早飯打掃後，隨着師傅去柘林鎮上買菜。這個師傅並不很壞，但他知道這個時候對我們決不能好。我們去挑菜先回來，他在茶館裏坐一陣，九點過鐘回來。我們理菜、洗菜、切菜，中午淘米做飯，他只管炒菜、分菜。中午飯後，洗鍋，清掃，又挑水，把幾缸子灌滿。這時大概快到三點，大體可以休息半個小時。接着做晚飯。晚飯後，又是收拾，黃昏起，又要挑水，供晚上洗臉等使用。

我們三個人，就睡在廚房旁邊農民的一張床上。我高瘦，嚴慶龍又高又大，鍾吉宇個子較小，這樣怎麼睡覺呢。我們再三央求，鍾吉宇老先生做完事後，可以回到大家住的地方。

當時有規定，在農村裏不能説哪個是右派，怕出事。因為農村也鬧，知道你是右派，把你打死都有可能。因為有這一條，我們沒有被打死。這是軍宣隊的規定，不然也難説。

一九六九年十月到十二月在奉賢縣農村裏三個月的勞動，算是把整個工作頂過來了。解決好幾十個人的洗臉、洗腳、吃飯，沒有別人，實際上主要是我和嚴慶龍兩個。根本上是嚴慶龍。鍾吉宇也少不了。這三個月是負擔最大的，相當緊張，心裏很怕，缸子擺在外邊，如果放毒，不把

我們捉（抓）去槍斃才怪！還好，那個時候這些事還少。

平常看見我是一把骨頭，一勞動，樣樣會幹

一九七零年一月或者二月，我們正式到了奉賢縣的五七幹校。幹校離海邊不遠，在閔行鎮東面十來里的海塘裏面，東面是東海。那一帶都是五七幹校，我們旁邊是電影五七幹校。幹校正在修的時候，我們均不知道，建築材料鐵絲、木料是從上海運去的，花了不少錢，可能搭草棚的草是當地買的。叫我們去，房子、路、水溝已經基本修好了，可見早已定案。因為要劃界，要整地，要有一大堆「基本建設」，這一大段區域不知準備了多久了。

我們叫新聞出版五七幹校，共有十多個單位，每個單位是軍事編制一個連，我們是九連。《解放日報》是一個連，《文匯報》是一個連。七八十個人是一個連，五六十個也是一個連。房子全是新草棚，我們有一個大草棚，男同志住，有一個小一點的，住女同志。還有兩個更小的，一個住工宣隊，一個住軍宣隊。男同志、女同志住的都是舊的雙層木床，全是從上海各校運去的。學校停辦了。

我們去住了一個晚上，漏雨，又補草。這次沒有讓我上去，上房危險。按照規定應該是我上去的。

在這裏勞動的兩三年，對我來講，是一種解放，因為我會勞動。我在根據地十幾年，甚麼沒

有幹過？從小在家裏邊，也看過，也幹過。不像上海當時的知識分子，沒有勞動過，確實不懂。我們那個連裏會勞動的好像只有一兩個，或兩三個。

我們九連工宣隊前前後後的幾個隊長都非常好，都是工廠裏的老模範，他們是被造反派排斥的。我們的軍宣隊長是空四軍一個地勤排長。空四軍後來因為林彪事件搞得很厲害，說要暗殺毛主席。這個排長才是真正的工農兵。他在安徽農村是放牛娃，也打過鐵，然後當兵。他不過是個地勤排長，但他很有水平。名義上全部權掌握在工宣隊手裏，實際是掌握在軍宣隊手上。

平常看見我不行，一勞動，就不一樣了。

生產組拿着新買的鋸子鋸木頭，鋸不動。我說沒有開口呀。他們問甚麼是開口，我解釋了半天，一個齒向這邊，一個齒向那邊。我說我可以開口，需要鉗子。又去上海買鉗子。我們那裏天天有大卡車回上海。我小時候看見過鋸條開口，雖然是第一次做，但道理懂，就沒有問題。他們又去鋸竹子，鋸不動。我說鋸竹子跟鋸木頭的鋸是兩種。鋸竹子的，鋸子比較薄，齒也比較小。又去重買。

這大體上會給他們一個印象：原來解放區來的這些老東西，甚麼苦活都會呀！

我跟鄭炳中（耿庸）做管水員

主要的勞動是種稻。給我們連四塊田，每塊田的中間原來是堆鹽的地方，四塊田共十六畝。稻田事先已經做了很多基本建設工作，都挖好了，鹽沒有了，也沖過一些了，水也淹好了。何時

做的，做來幹甚麼的，不太清楚。

種水稻要一個管水員，一天到晚要看着。插秧以後幹甚麼呢，田乾了，要灌水，下大雨了，不管多大，都要披個雨衣去看。水多了，秧苗會漂起來，要放水。任何時候離不開人，半夜都要管。南方種水稻我知道個大略，我就自報了做管水員。做管水員是辛苦，我知道這一點。我是找個藉口，這樣就等於脱離了我們本部了，甚麼大批判，甚麼唱樣板戲，我就堂而皇之地逃過了。我自願地以勞動懲罰來代替精神懲罰，多好呀！管水員，浪漫點說，我就真成了大地的兒子，

不久，我把鄭炳中也設法弄來做了管水員。我當水利部長，他是「現行」，只能當水利部副部長。

鄭炳中，筆名耿庸，是「胡風派」中的一個作家，剛出獄幾個月，即遇「文革」，又給他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他到幹校後，我覺得他一個人苦得很，把他一個人放在小工具間。工具間就是放糞桶的地方。這些受胡風影響者有些不可理解，一天到晚拿個馬恩全集在那裏看，蒼蠅呀，蚊子呀，嗡嗡嗡的，不管。像他那樣，我覺得比坐監獄還難受。我向工宣隊、軍宣隊建議——這個建議不能像正常的建議，還得裝出個樣子。我說，鄭炳中是現行反革命，不能叫他在那裏舒服，他一個人坐在那裏看書。這麼大四塊田，我一個人也管不了，我建議把他調出來，同我一起管水。他們同意了。

耕地、耙田，全是我和耿庸兩個人做的，公家向老百姓借的牛。犁田開始，我讓他在前面牽牛，我在後邊，結果我根本不行，犁不動。他到後邊去，哎呀，居然就犁動了。犁一陣，我們上

田休息休息，抽勞動牌煙，八分錢一盒。

搞（幹）了一個星期，我就問耿庸，你勞動真厲害，勞動了十年，甚麼都會。他說，我一天都沒有勞動過呀。我很吃驚，說，你不是胡風分子，被關了十年嗎？他說，我真的一天都沒有勞動過。他們坐的是特殊監獄，在上海建國西路，房子很高很大，當時關有幾千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是個秘密的監獄，他們進出都是晚上。到現在為止，我問別人，說老百姓只知道那裏是個軍事秘密單位，其他都不知道。

耿庸說，一間房子那麼小，關幾個人，還能勞動甚麼呢？根本沒有勞動。我說，你們這批人太厲害了，坐在糞桶旁讀馬列，下了田，又馬上能做從來沒有做過的，還能犁田。

犁了田，又要耙田。我說，我也要學一學。耙田，前邊牛拉，後邊有一個專門耙田的農具，人站在農具上，牛往前拉，就把田耙平了。但我站上去就滾下來，站上去就滾下來。他站上去，就沒有問題，把田耙平了。在體力勞動上，他成了天才，我不理解。這個勞動，難度很大，第一次就學會了，除了佩服外，我只說能跟着胡風跑的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奇人。這些人，幹一個事，專一個事，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不過思想確實有點鑽牛角尖。

田耙平了，放水，水只能高出秧苗根一點。插秧的時候，我就成為要人了，這裏叫老曾，那裏叫老曾。我升為「老曾」了。說這裏沒有水，這裏水太深。插了秧後，長到三四寸，稗子出來了，我看到那麼多人去拔，把田搞得一塌糊塗。我跟耿庸說，我們兩個包下來，整天拔，他們會答應的。上面當然答應了。只要天一亮我們就去，晚上才回來。搞（幹）了不久，發現了問

題，稗子弄了一大堆在田坎（埂）上。田坎窄，又只有抱到大路上，運輸量很大，太耽誤時間。不久，一個十二三歲的農村孩子看見後笑我們，他說不要這樣，稗子拔起來，根朝上，用腳跟踏進土裏，它就長不起來了。孔子說他「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我們說，「吾不如小農」、「吾不如小圃」。我和耿庸，把稗子和稻子分得清清楚楚，一看就不會錯。稗子的梗子和葉子更寬一點，顏色更綠，根部更白一些。以後就整天做這個事。上午，下午，至多休息十多分鐘，抽點煙。稗子問題解決了，有希望收一點。這個問題不解決，根本沒收成。

撒化肥，我們說大家來，把稻子弄壞了，還是我們兩個。噴藥，也是我們兩個。沖水，因為是鹽鹼地，上面浮着一層鹽鹼，也是我們兩個。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兩個，一天全部的時間不夠。蟲也出來了，團部生產處裝了光管滅蟲，通根電線，常出毛病，所以，晚上要去看光管。

撈水藻、撈水浮蓮、拉大車、倒石子

到深潭裏去撈水藻，作肥料。黑色的水藻很細，比頭髮粗一點，有點像長頭髮菜。水有大半人深，有些地方比人深。許多人不敢下水，我不怕，會游一點。我不是在家鄉學會的，我是在延安延河裏學會的。

我們連隊會一點水的，我一個，還有一個老黨員被開除黨籍的，還有一軍宣隊員。我們三個，背心一脫下去。他們說，老曾這個人似乎風都吹得倒，現在能下水，公然游來游去。我們把

水藻推到岸邊，岸邊的人用鈎子勾上去，運走。

撈水浮蓮，絞碎餵豬。水浮蓮很重，大多數人不敢下去，撈水浮蓮又少不了我，又是我們下水去推。因此，在幹校的兩三年，他們不怎麼鬥我。

拉大車是個技術活，但其實沒有甚麼了不起。硬去拉，拉不動，掌握好重心，用力就不大。在上海牛棚時，老派我跟另外一個人去拉東西。這個人老實，膽子也小，說他是國民黨的中校，其實他甚麼都不是。空車的時候，他都拉不動。我說，你坐上去。他不敢，怕被人看見。我說，你沒有發現拉空車時要放磚，你坐上去，你的重量剛好落在車輪着地的中軸點上，拉起來就輕。馬路上有許多婦女拉車的。我說，你看，她們都手臂約三十度向上，就像車在推她們。車子啓動以後有個慣性，你就利用它。他不敢坐，我說我來試驗一下。我去坐，他很高興，他拉動了。

所以，在幹校拉大車，拉酒糟，又少不了我。這一來，不少人認為根據地的人真是勞動過的，沒有做過的，一下子也就學會了。

挑石子，挑沙子，挑爛泥巴，這些工作，只要你會挑，就不太重，扁擔在肩上都是一閃一閃的。關鍵是倒出的時候需要技術。倒時，一隻腳跨前半步，兩隻手拉着繩子往兩邊一翻，倒得乾乾淨淨。他們看，看不會，非要把挑的東西放下來，再來倒，多費力呀。最難的是挑爛泥，始終沒有一個學會，我不懂是甚麼道理。很容易的，老百姓誰都會做，腰一彎，一腳跨前半步，兩隻手往外一翻，爛泥就倒出去了。結果，竟始終成了我一個人的表演，無人想學。

幹校要不斷地搞基本建設，要修路，不斷有石頭、細沙子運來。都是船裝的，離開幹校有十

幾里路。一船石子，一船沙，派給哪個連，哪個連就去裝到卡車上。

從船上裝進竹筐，很重，幾個壯丁戴着很厚的手套幹，因為離卡車還有二三十米一段路。裝車時，下面四個人推，我跟耿庸兩個人在卡車上接，然後倒（因為這最重，也易傷）。但倒了第一筐，我就發現不對。前一筐倒下，把後邊的堵住了。我立刻跟耿庸說這樣不行。後來，裝滿一筐石子放在卡車尾下，送石子的人提着的一筐快放到這個筐上時，我們立刻乘勢提起來一下往空中一翻，倒出石子。倒的時候，盡量往最前邊倒。我很快就發明了這個辦法。這個發明很重要，不然會累死我們兩人，我們在車上是不是很累呢？是很累，但用猛力，幾秒鐘的事，但是，非如此不可，不如此，解決不了問題。

我看見其他的連隊，像古籍出版社，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累半天，弄不了。我們建議他們像我們這樣，他們學不會，有一次，我跟耿庸兩個就幫他們倒，我們是鄰居，不然他們就完不成任務。裝完車後，他們跟我們一起回幹校。我這個人，是天生的體力勞動者，我還能想點辦法。體力勞動，只要想辦法，就不大一樣。

挑水，掏豬圈，沖鹽鹼

還有一件事是帶有污辱性的，要右派做。幹校每個連隊都有四個大缸，上面有蓋子，我跟嚴慶龍、程光裕三個右派必須每天挑水。前面已經講過了。

掏豬圈。這個事夠受。豬圈長期沒有掏，墊豬圈的草壓在下面，要把它挖出來，裝車，運到田裏作肥料。重得要命，用全身的力量挖，都挖不起來，只能挖幾根。這個工作，我們單位還有一個女同志參加。是處罰呀，她是人事科長莊獻之。叫一個中年女同志來做這種事情，道德的底線何在？但是造反派的骨幹，一下也沒有下鄉。

沖鹽鹼。田裏當中的一塊原來是堆鹽的，鹽分很重，影響水稻收成。我跟耿庸兩個人去改良。我們用比手掌寬的一點的鐵鎝把土翻起來，用水沖，這樣反覆翻，反覆沖。我們估計要三四年後才能改善一點點。這個工作本來可以不做，沒有人叫我們做，但我們認為在幹校是一輩子，就想，把這個田改善一點，使畝產高一點。我真的是這樣想的，看樣子，一輩子就這樣子了，與其天天唱着「樣板戲」過日子，不如避開「樣板戲」天天老老實實去種田。不但如此，我們還準備在一九七二年提出全面的改革種植計劃，即中間堆鹽部份不種，把力量集中在旁邊，勞動力可能減少一半，收成可能要好一些。因為觀察了兩年，費這麼大的力量，肥料、種子等，用在堆過鹽的田裏，一切投入多白費。大概一九七零年以後，團部作總結，說我們種出來的水稻，按照我們當時已降的工資來算，平均四百多塊一斤。但是一九七二年還沒有春耕，突然北京開個甚麼會，周總理關心《辭海》的事，說《辭海》是毛主席提出的任務，你們放棄了幾年，不對，要我們回上海。其實周總理是用盡苦心，用各種名義把文教單位的人弄回去幹事情。所以我們辭海編輯所的人在一九七二年四五月間就全回上海了，其他單位的還繼續幹。我個人一九七四年又回幹校去幹了四個月。所以加起來，我幹了三年。

表面上對我要大整，重要的問題反而要請教我

三年當中，由於勞動的關係，看我不像個反革命，人雖然瘦，但甚麼都拿得起，甚麼都會，所以軍宣隊的隊長，表面上對我要訓訓，機密的問題反而要找我商量。

我們單位的陳落（陳國棟）在清華大學當過黨支部書記。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清華大學畢業，長期做地下工作。抗戰後的一兩年失掉關係，解放後經過審查，重新入黨。

肯定是陳落自己的自傳寫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他領導的一個學生黨員回山西時在太原被捕叛變了。這個學生供出了一些人，包括陳落。這樣一直懷疑陳落，「文革」鬥，下到幹校也鬥，說他是叛徒。理由是，叛徒講了你的名字，你讀的學校，你為甚麼沒有被捕？你一定是被捕了，當了叛徒。陳落這個人不大說話，他的解釋一直是，我就是一直沒有出事嘛，聽說那人被捕，我就回到鄉下躲起來了。

一天晚上，快九點了，軍宣隊的隊長、工宣隊的隊長突然來找我。工宣隊長參加過抗美援朝，人極好。他們把我找去，說：老曾，陳落這個事鬥了這麼久，你的感覺怎麼樣？我看到他們很誠懇，就跟他們談了可能兩個多鐘頭。我從「九一八」以後的形勢談起，談國民黨跟地方軍閥的關係。我說，國民黨跟各個地方勢力的關係，不是共產黨中央跟黑龍江省委、廣東省委的關係，根本上是兩回事。國民黨下面的地方勢力，特別像閻錫山這些軍閥，他們希望自己控制的地方秩序穩定，不出事情。至於你蔣介石直接統治的地方，則巴不得（希望）你越亂越好，越控制

不住，他們越高興。因為他們可以穩坐釣魚台，你想吃掉我，辦不到。所以，如果國民黨的地方軍閥在自己的地方發現了蔣介石南京有個共產黨，不會立刻用密碼電報通知南京，更不會派專人去通知。他們跟蔣介石的關係，是希望蔣介石垮台。所以這種事，不會報告。我們共產黨不一樣，西藏、黑龍江如果發現了甚麼問題，馬上一個電報到中央、公安部，當天就抓起來了。如果國民黨全國都像我們，我們現在恐怕還沒有取得政權，還在地下呢。所以像陳落這種事，只能是這樣，相反倒是不能解釋了。如果閻錫山立刻高興得不得了，趕快給南京一個電報，告訴南京哪裏有個共產黨，趕快捉（抓）起來，國民黨就團結成一個人一樣，它會垮台嗎？國民黨不是這樣，我們共產黨才是這樣。因此陳落講這種情況，不但不稀奇，而是正常，甚至是必然。最後我說，我講的這些，供你們參考吧。

這就是啓蒙，不怪他們。他們看出來了，你不像個壞人，所以就把這種事來問你。一方面勞動的事，表面上要你做最髒最累的，但不是出自他們的本性，他們是被迫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走資派等等，當時着重是搞右派。其他的學術權威，也無非叫他掃掃地。

用各種勞動去代替各種強迫思想「改造」

「文革」時期的勞動，五七幹校的勞動，不少人的回憶都痛苦、悲觀，包括葉聖陶的兒子寫的回憶錄。我確實沒有談這些方面，我完全沒有談內心的悲觀。其實悲觀得很，悲觀不是對我自

己，而是對整個民族的前途。我當時認為中國是沒有希望的，認為中國完蛋了，特別是林彪事件後，更是如此，看到權力落到江青手後，更不抱任何希望了。

這個時候，我已經不是一個甚麼知識分子了，而是一個國定的五種主要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壞、右」中最後的一個等級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完全絕望了。魯迅似乎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正是魯迅還看不出中國有甚麼希望的時候講的，很沉重，很痛苦。我這時候就是這種心情。

那些大叫其苦的東西，我看到過。原因在於他們那時還沒有麻木，還沒有絕望。而我相反，我實行的是「阿Q主義」：人生大概會遇到這些東西，都是正常的吧！我用這來麻木自己。當然這終究也是自己騙自己的。但是，如果不騙，不是更苦麼。所以我願意勞動，花全部時間勞動。我當了管水員後，許多事都逃掉了。比如天天唱樣板戲，我就不唱；學習姚文元批評吳晗的文章，我就不學。到現在為止，姚的這篇文章我也沒有讀過一字。如果又要學，我找種種藉口，找最難的、最累的、最髒的活兒幹。我說，今天我幹這個，就躲過了。他們再怎麼整我，覺得水稻沒有我不行。

我還躲過了「拉練」。拉練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半夜走，走幾十里，再回來。我們幹校拉練了許多次，我都有藉口，一次都沒有參加過。我說，一來一去，四五天，這裏管水的事一天到晚都離不開人。他們同意了。陳落當時五十幾歲了，頭髮全白了。我看他幾十里路走下來，實在是累得不行，我跟耿庸商量，陳落也苦，這次你跟陳落對調一下行不行，這次把陳落留下，你跑一

趟?耿庸去了,陳落少去跑了一次。四五個鐘頭跑幾十里,要他的命。我因是管水員,免了這樣的事,而且非常自然。

所以,我犁田時,犁田至上,我插秧時,插秧至上。這樣,把人的痛苦減低了不泊。天天學習唱樣板戲,天天讀聖書,天天喊口號,天天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人到了這種程度,變成甚麼了?心裏邊不願意,但又不得不這樣做。我呢,用各種勞動代替各種歌頌「四人幫」的痛苦。比較起來,一天到晚受那種罪,受那種精神的罪,比下地獄還痛苦。你江青是甚麼?你張春橋是甚麼?你姚文元是甚麼?我要把我的人格全放下,捧你們,全天歌頌你們,那個痛苦,不是人受的。所以,體力上受的苦就變成很能接受的了。天不亮就起來到田裏,晚上九點才回來。你去拉練,來回四五天,我一個人在鄉下勞動,沒有人來干涉,得其所哉,心裏不那麼痛苦。

在幹校當然苦,但在那個情況下你不接受這個任務,你不幹,別人更苦。比如裝卡車,我跟耿庸不做,累死也運不回去。撈水草,我會一點水,你不下去,別人不會水的下去,行嗎?當時唯一的感覺是,我不幹,別人幹起來,痛苦多我一百倍。他沒有這個技術,他不會。你強迫我下去,還不如我自己下去。那個時候才不管你死活,你大右派,狗都不如。

別人談到「五七」幹校之類的經歷時,都很痛苦,我為甚麼反而眉飛色舞十分高興的樣子呢?我可以問一句:你是喜歡天天在四十度高溫下生活,還是比較喜歡天天在三十六七度下生活呢?「地、富、反、壞、右」,天天過的甚麼「生活」?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最下,腐刑,極矣!」「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勞動時,我不比年輕力壯的人差,

這時我的人格是獨立的，自由的，沒有時間去自羞自愧與自我污辱了，因此，當時就會「自我感覺良好」，阿Q一番。可是解放後我們卻發明了各種各樣終生污辱人的辦法，然後再及刑事，這可是要千萬引以為戒的啊！人活個臉，樹活個皮，再大的權力也不要以逼人自辱為樂啊，「士可殺，不可侮」，聖人又何必非先辱後殺不可呢？那是失敗，是徹頭徹尾的失敗。漢武帝權大極矣，不時以屠殺大臣為樂，他給了司馬遷「宮刑」，到底是誰犯了罪呢？

在寬寬的田埂上，吸着「勞動」牌香煙，做做打油詩消遣

進入幹校時，各人的處境不一樣，心態自然會不同。對有些人像是判了無期徒刑一樣，悲痛十分是自然的。但是，它對我則是一個大解脱，天天在大自然中，與自然相處、對話，再怎麼苦，怎麼累，自然不會侮辱人，不會讓你做我前邊講的那些侮辱自己的事。你如果不是生成的奴才，當然選擇去做重體力勞動。

我這時學會了猛抽香煙。當時上海煙廠為適應大家的購買力水平，新出了一種八分錢一盒的「勞動」牌香煙。大概與相聲裏那個「宇宙」牌差不多。二十枝，有時會自動熄掉，有時會猛然發出爆炸聲。但不會弄死人，照吸不誤。

我在一九六九，一九七零，一九七一這幾年，一個人在田間坐看藍天白雲時，每每順口吟出一些打油詩，即詠即成，多是五絕、七絕，間有七律，恐怕有幾十首。不過我做的不是「行到水

窮處，坐看雲起時」那樣的閒適詩。我舉幾首。我曾與一老人共同抬沙石水泥等一個時期，我有詩記其事：「勤勤建獵舍，抬沙萬把斤。竹槓兩邊客，自始未通名。」為甚麼不通名呢？為了減少麻煩。後據說，另一抬扛者名金姓堯，是一大文史家。我又與「胡風分子」耿庸是管水員，前邊已經講過我們的事。我也有詩：「夜半起犁田，耿庸剛出監。我爭先上耙，一鞭滾下來。」

此外，偶然也有一些時事性的感言詩。例如，一九七一年好像在五七幹校看過一次鋼琴伴唱《黃河大合唱》。我的印象還好，是藝術家們合作的。於是，我在腦子中又形成了一首《哭冼星海》：「七載巴黎究樂音，一曲黃河海內驚。國人引領聆新曲，卻送神京學聖經。」因為這位勤奮的天才一去就不復返了。

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幹校時，好像又有一次批瞿秋白的高潮，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便順口唸成四句詩《悼瞿秋白》；「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秋深月更白，諸夏永懷霜。」這裏要解釋兩句。「諸夏」句是指一九三六年魯迅為瞿秋白出版《瞿秋白譯文集》兩厚冊特裝豪華本時，把出版者取名為「諸夏懷霜社」，而瞿即名「霜」，「諸夏」則泛指中國。

我們五七幹校所在的地方在上海市，屬奉賢縣柘林鎮，南面靠海一面修建了幾個世紀著名的「海塘」，即一項延長數百里的保護農田，防制海潮的特大水利工程。海塘之外，南面即杭州灣，再往東就直連太平洋了。柘林鎮在五個世紀前曾被倭寇長期佔領，倭寇據此作為搶掠焚燒我東南諸省的重要據點。我幾乎天天都要走上海塘，面對杭州灣，不知不覺就形成了《柘林東望》這首詩：「柘林東望海汪汪，五百年前宰殺場。世事於今唯內創，仰視雲天淚幾行。」

第二十五章 「文革」後期：心如死灰

（一九七二年四月—一九七七年六月）

閒散人員，一當就是六年

從幹校回上海之前，要派幾個人打掃個把月才行。好幾年沒有人住，很漂亮的兩層樓的西式的大樓，還有附屬房子、衛生間及大花園，留守的人只是天天畫個到，不管衛生的。又是派我們三個右派：我，嚴慶龍，陳光裕。我們單位一共四個右派，李毓珍老了，恐怕六十多歲了，頭髮白了。這個工程浩大呀。但是，工宣隊、軍宣隊沒有派一個人監督，所以，他們內心其實是矛盾的，派上海的大學生回去，解決不了問題，他們知道勞動還是你右派最可靠。他們心裏知道，你們不是壞人。我跟嚴慶龍兩個都是老黨員，陳光裕老實得不得了，可能是右派人數不夠，把他湊數的。為甚麼工宣隊、軍宣隊一個人不上來，一方面對我們比較放心，你們不敢鬧甚麼事；另一方面，這幾個星期的勞動夠苦的。吃飯要跑到旁邊買兩個上海煎包。我連吃飯的精神都沒有，請

他們幫我帶幾個回來。

這個工程又是很有趣的，包括鋸樹，樹長得亂七八糟，必須全部修剪。我五十幾歲學上樹。為甚麼我要鋸樹呢？我手腳長，方便得多。陳光裕，小矮子；嚴慶龍，太胖。我手腳確實要比他們靈活一點，人瘦，手長，腳長，鋸起來像個老猴子，鑽來鑽去。

我們搞了兩三個禮拜，單位搬回來了。以後，我就沒有派任何業務工作。我們一批七八個人，右派有幾個，單獨在過去僕人住的最邊上的一間木房子裏，從旁邊的樓梯進去，我們叫西伯利亞。著名人物不少，包括《文匯報》的兩個社長，徐鑄成、陳虞蓀，《新民晚報》的副總編輯張林嵐，還有一些新聞出版的頭頭，都調到辭海來「養着」了，但不是工作。是天天學，還是學語錄之類，要學兩個小時，學完後就悶在那裏，不多說話。我一九七八年八月離開的時候，還沒有一個人分配工作。

「文革」後期沒有事情給我做，還是勞動，這個工廠那個工廠勞動，在花園裏勞動，但是形勢已經跟「文革」前半期有區別了，不是完全以正式的牛鬼蛇神的身份去勞動。閒散人員。一當又是六年。

那個時候就是絕望，是等死——不是等死，是等被捕

在漫長的六年多的時間裏，我只能說，心如死灰。這時，不像過去還能到音樂廳去聽二胡、

聽笛子，沒有了，只有樣板戲。所以，人不存在任何希望了。看樣子，國家也不準備分配工作。說得清楚一點，那個時候就是絕望，是等死——不是等死，是等被捕。

為甚麼說等被捕呢？知道上面最恨的是右派，你除了等被捕還等甚麼？我舉的下面幾件事，就能說明了。

第一件，確立八個樣板戲。

林彪事件是一九七一年在幹校時聽說的，沒有給我們傳達。他們聽傳達的時候，每個人都在發抖。我是陳落同志偷偷告訴我的。林彪事件後，一切就明白了，上面連能牽制江青的人都沒有了。大家都擁護周總理，但大家也知道，周也朝不保夕。江青這夥人，做的不可思議的事越來越多。林彪垮台後，正式確定八個樣板戲，《人民日報》正式發社論，〈普及樣板戲〉。把八個樣板戲變成了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中的最高文化。這下，「大破大立」這四個字全都明白了。「大破」，就是要把中國幾千年的一切知識文化，一切道德標準，全部掃蕩；外國的，也統統不要，全部都反動。要的就是江青的八個樣板戲。這八個樣板戲，能征服中華民族嗎？能夠使一個知識分子崇拜嗎？所以，大破甚麼，大立甚麼，清清楚楚了。到處天天唱樣板戲，上海因此殺了人，出了佈告的。當時農村一些青年組織起來唱，民間演員當然不可能演得跟江青認可的樣板戲一模一樣，這就說你是反動了。

樣板戲怎麼能夠變成中外加起來的最高文化呢，這不是笑話嗎？當然，樣板戲個別的場次，如《沙家浜》中的「智鬥」，我估計還要傳下去。但是這場戲，你要是知道一些外國的文學史，

特別是戲劇史，就知道它的寫作方法、寫作思想是學習外國的東西。中國戲劇再怎麼複雜，自己有一套思想體系，要灌輸「忠孝節義」，比如《趙氏孤兒》，又長又複雜的戲，外國都很重視。《白蛇傳》也是比較長的一個戲。把這兩個戲跟「智鬥」一比，風格完全不一樣，沒有一樣相同的地方。當時不敢講，但是我看出來了，就是這一場，吸收融合了古代希臘的喜劇，以及後來法國、意大利喜劇的東西。因此，這場戲跟整個戲的前前後後大不一樣。「十八個人就是十八棵青松」，第一號主人公，一個人那麼吃力地在那裏歌唱自己一半天，這才是江青要求的。後來才知道，「智鬥」這場戲是汪曾祺編的，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了多少外國書，沒有這個修養編不出來。說句實話，這場喜劇極高明，但它是標準西方式的，是引進。

第二件事，一九七三年公開樹立了一個交白卷的大罵科學知識的英雄張鐵生。張鐵生自己答不出題，還要大罵出的題都是反動落後的。把他樹立成新的英雄，說明甚麼？是不是全國都不識字最好？都不知道二加二等於四最好？事情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一點都沒有辦法了。把這樣的人樹立成民族英雄，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上，古今中外是空前絕後的。任何民族不會出現這樣不可想像的怪事。全國樹立不要科學、不要文化的典範，實際上在樹立地痞流氓。這種做法，把好壞根本顛倒過來了。當然，張鐵生本人也是中了毒，但是他公然在考卷上罵，是投機了。他知道上面就是要他這種東西，就是要他這種「偉大革命精神」，所以，他一下子成了全國的革命英雄。如果這樣搞下去，那還有甚麼神七、神八上天？中國在世界上還有甚麼地位？中華還存在嗎？因此，「文革」後期，明顯地可以看到毀滅文化、打倒科學的運動不但沒有減

速，反而還在向深度發展。人們希望林彪死後情況有所改善，但是更厲害了。所以看到這些，我是非常悲觀的。

第三件事，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滸》，批投降派。

一九七二年基辛格、尼克松到中國來，一九七三年，鄧小平出來。但是一般的人，特別是我，還是懂得要基辛格、尼克松來，是為了對付蘇聯，是聯美對蘇，國內沒有放鬆，越來越緊，不是反對「五一六」嗎，嚇死人。內部就更怪了。我們的最高領導公開講：大學還是要辦的，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根據這句話，中西方的文史全不要了。這個話，誰都知道是錯誤的。這樣的局面，不得不令人悲觀。

一九七三年後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滸》，批投降派，混戰一場哦。批周公，明明就是批周恩來。這種批，比「文革」初期還要複雜得多，把批林跟批孔連在一起。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如果把祖先的文化傳統丟掉，包括孔子在內——孔子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消極、錯誤的東西，但好的東西佔多數——國內的各個民族、海外的華人華僑、全世界的中國人就沒有一個團結的思想中心了，中華共性就不存在了。馬英九幾次公開講，強調一個中華民族，這個東西就厲害。幾千年創造的以儒家孔孟思想為主導的文化，可以改善，但不能推倒、燒掉。中國是不可能把中國人（華人）團結在秦始皇身邊的，絕無可能，團結在孔子身邊倒有可能，包括我們幾十年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有可能。我可以說，孔子有很多偉大的思想，了不起。但是，要叫我團結到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這些人的身邊，團結到太平天國的身邊，不可能，永遠

不可能。黃巢有兩句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從這句詩就看出來，中國的歷史不可能以農民戰爭的領袖為軸心來寫。現在世界有那麼多「孔子學院」，你說不行，要一律改為「秦始皇學院」，你看哪個國家會接受。

我們中國精神上合理的東西，在孔孟，還有如李白、杜甫等身上，而不是在秦始皇身上，黃巢身上，李自成身上。

最後一件事就是一九七六年周總理逝世。他的死，對全國人來說是天崩地裂，知道從此以後沒有任何——至少在表面上能夠牽制江青的勢力了。只要周在一天，他們還不大方便把周怎麼樣，因為他們知道把周一打，人民的內心就變了。周死的時候，全國悲痛。每個人都感到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如何，好像變成了沒有娘的孤兒，被扔在沙漠裏，感到生命連蚊子蒼蠅都不如。是哭周，更主要還是哭自己，全成了沒娘的孤兒了。在中國歷史上，我估計這是第一次。我完全是內心無主，不知道這個國家何時會變焦土。我看不見這個國家有一點點好轉的跡象。

上海的「四人幫」的部下們下令不准戴黑紗，不准設靈堂，更不准開追悼會。但是實際情況是布店把所有的黑綢等全部拿出來賣。當時，軍宣隊撤走了。工宣隊給我們傳達說，葉帥因病請假。我知道江青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把軍權從老帥們手裏奪走。

但是在辭海編輯所，就是那些老工人帶頭設靈堂，戴黑紗。所有地方都是這樣。這證明中國這個國家既不願望亡於外患，也不願意亡於內亂。但那個時候，除了悲觀，沒有別的辦法。這沒有甚麼好吹的，我沒有看見甚麼前途。當時我寫了一首悼總理詩：

大地凝寒舉國悲，鞠躬盡瘁巨星垂。行矣不回周總理，忍睹江山竟付誰。

很清楚，是說國家成了江青的了。詩不能給別人看見，只記在心裏，說明內心沉重，已經完全絕望了。我估計大屠殺快來了。江青這些人上台，把老一點的統統殺掉。這沒有甚麼稀奇的，我等待被捕。現在有些人不談這些，其實跟我一樣。

這幾天不對頭，殺氣騰騰，他們動手了，我準備犧牲了

抓「四人幫」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六號，以後這兩三天，新華社的消息、評論，多得不得了，殺氣騰騰，話還是「文革」那一套，但是更兇了，鎮壓味更濃了。

我住在上海三樓房子，跟我同一層的姜兆良（已經去世）是黨員，他的兩個哥哥死在淮海戰役，他也是參加過淮海戰役支前的，卻把他打成牛鬼蛇神。這個時候，像我們這些人，互相都比較放心了。經過「文化大革命」，甚麼人甚麼心腸還不清楚？我去問他，說，這幾天不大對呀，殺氣騰騰，他們動手了，我現在就準備犧牲了，恐怕就在這幾天了。我主要是說那幾天的消息評論等殺氣騰騰，我不知道那幾天的新聞評論等是針對「四人幫」的，不知道華國鋒是用這種方法對付「四人幫」的餘黨的。這不能怪華國鋒。他要表現出比他們更左，更堅持毛澤東路線，更擁護毛澤東才行。

姜兆良說，老曾，事情還不清楚。告訴你，我也很緊張。但我一個山東一起南下的同鄉在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工作，我去見過他。他告訴我，本來要在上海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現在內部通知，這個會不開了。大家都在議論，不是說延期，而是說不開了。張春橋是全軍政治部主任呀。老曾，事情可能不是那麼壞的。

我鬆了一口氣，希望情況並不是我分析的那樣。張春橋的會不是改期，是不開了。

過兩天，情況就知道了。大概是十月九號早晨，我們照樣上班，馬路兩邊貼滿了大標語：油炸江青，活剝張春橋。跟平常的「打倒」之類不一樣。這些標語說明老百姓恨江青他們，比恨日本人還要恨。日本人侵略要殺中國人，但你中國人也這樣幹，所以特別恨。

聽說是上海交大、上海飛機廠——當時實際沒有造飛機、復旦大學從北京聽到消息後，通宵趕出了標語。

本單位宣佈「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會上，負責人卻專罵右派

上海各單位正式傳達大概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號。我們單位十三號晚上統一傳達，照唸市委的通知。這個通知很簡單，說中央對這幾個人「隔離審查」。當然知道是逮捕了。傳達通知的人是當時辭海編輯所新來的負責人。我們一九七二年回上海後，辭海編輯所的負責人變了幾次。這個負責人傳達完後，大罵牛鬼蛇神，罵了半天，特別是罵右派，罵得非常尖銳，非常厲

害。其實是指着我的鼻子罵。另外兩個是小右派，我是大右派。他用上海話說，你們右「帕」分子，要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當時我就想，甚麼道理，還在糊裏糊塗擁護「四人幫」，「四人幫」被抓起來了，你照本宣科就是了，這樣大罵為甚麼呢？你也是個三八式地下黨員，為了保存自己，竟然這樣胡鬧。經過那麼多年的階級鬥爭，「反右」、「文革」，有些同志，包括有些三八式的黨員，入黨快四十年了，怎麼在這個時候還大罵右派，有甚麼必要？難道一點都看不出來呀，所謂隔離審查就是逮捕，這點應該知道的呀。所以，幾十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使得一些人，包括三八式的，也真正異化了，被毀掉了。為甚麼我談張春橋、姚文元，不生氣，他們本來就是人民的公敵，氣他們幹甚麼。但你這樣的人，在宣佈打倒「四人幫」時，反把我大罵一頓，只能說你已被徹底改造了，不明是非了。任何時候，總之，整死你右派我就沒錯。

為甚麼對此我會義憤，聲音會提高，對他這樣的人生氣？因為你應該首先是個人。我沒有把江青看成人，張春橋他們是毒蛇猛獸，你呢，你四十年的黨員了，你這個三八式，我對你是抱有希望的，而你在這個場合，大部份的時間罵右派。我覺得是政治投機，他說這些話，意思是誰勝誰負還不知道，如果江青這一派翻過來，他不是又表現好了嗎？此外還能做甚麼解釋呢？

一輩子有三件最快樂的事情，我都看見了，幸何如哉

我現在九十歲了，一輩子有三件最快樂的事情，我都看見了。一個人，一生可以看見這三件

事，滿足了，可以死了。

一是日本投降。中國人的高興程度，一般人想像不到，外國人更想像不到。日本投降前的中國，雖然還是你打我，我打你，特別是蒙古族、滿族，從山海關外取得中央政權，但是，他們還是接受了中國的共同文化，而且明清兩個朝代，對中國的貢獻很大。現在公開承認，西藏是元代進入中國領土的。我們今天這個版圖就是清代確定的。有東北，有內蒙古，有新疆，有西藏。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抗日戰爭，只有日本侵略的時候，整個中國才面臨亡國，中國人全變成了被統治的、被殺害的對象，這在歷史上前所未有。

第二是解放南京。現在的青年不怎麼理解，為甚麼解放南京我們會那麼高興。他們不知道，包括現在六七十歲的人不大理解為甚麼現在九十歲的人那麼恨蔣介石。一些教授寫了很多文章，寫了很多書，説蔣介石沒有投降日本，內心是始終要抗日的，這點已經被證實。但是，蔣介石幹的壞事太多，殺的革命青年太多。我們看見他天天殺青年，引起很多知識分子，至少是高中學生對他極深的仇恨。左傾的，到延安去的青年，都恨他得很。

第三件事情是活捉江青。這件事有點意外，當時沒有估計到。正在愁中國可能要完蛋，正在愁自己哪天要被殺的時候，這個全民公敵被捉起來了。如果政權一旦落入江青之手，就是全國流血。中國的黑暗不知要延長多少時候。如果她上台來統治，要殺的人，不會少於幾千萬。她上台來要封官，自然有很多人要跟着她走。為甚麼有那麼多人跟着走？因為會得到高官厚祿。希特勒得到政權後，也不懂軍隊，只把原來的校官將官都利用，只要封官就行了。

這三件事，是旋轉乾坤不可比擬的重大歷史事件。一個人吃飯一輩子，難道就為了天天吃飯？看見這些驚天動地的事的人，也有，但現在不是太多了。所以我精神有個寄託。怎麼樣呢，你日本沒有把我們中國亡掉，你投降了。你蔣介石殺人這麼厲害，你完蛋了。你江青這麼厲害，也完蛋了，而且更慘，公審判死刑，雖然不執行，但是判了就不得了，給以後的歷史看，甚麼樣的東西是中國的敵人，就是江青這些人。她最反動，是真正的人民的公敵。

第五編



第二十六章 調回北京到大百科全書籌備小組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九七九年七月）

交給于光遠關於六十一個人和張聞天的證明材料

打倒「四人幫」後，我沒有給北京寫甚麼信，我甚麼事都沒有做。大概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于光遠到上海來。于當時還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七個領導之一，胡喬木是主要的。研究室有幾十個人。

于光遠到上海跟我打電話，叫我去看他，在一個很講究的內部招待所，可能在三四月，不太冷。我了解到一些情況，「四人幫」是怎麼被抓的等等。他來上海也沒有甚麼重要的事，他們單位曾經準備創辦一個刊物《思想戰線》，上海「四人幫」那些頭頭說是鄧小平復辟的東西，用各種方法破壞。他就來調查這件事情。這件事調查不調查都是那麼一回事。我的情況沒有甚麼好說的，沒有分配工作。我問他的情況，他說紀登奎要他們全部到大慶油田去調查研究。當時紀登奎

是很當權的，華國鋒第一，汪東興第二，他似乎第三。我說，這還騙得了人呀。很簡單，怕你們這些人留在北京哇啦哇啦，不好辦，再繼續像「四人幫」那樣整你們，不行了，但實際上是驅逐你們。我說，你到大慶去，能總結出甚麼經驗來？還不是乾打壘，「兩論」起家，用洗臉盆把石油端出來。當時就是這樣總結的。這個精神是可貴的，但是不要科學，把科學否定掉了。我說你們去，還不是「兩論起家」。整個東北的石油，就是兩論（實踐論、矛盾論）起家。你再調查，也不准你違反這個理論。你就拖吧。

我交給他兩份材料，我早就抄好了。怪得很，老右派，我偏偏要寫兩份材料。一份是康生講六十一個黨員是「叛徒」的事。我對于光遠說，康生講的這件事，你跟我一樣，全部聽過。康生「文革」出來抓叛徒，其實沒有哪個人比他更清楚這六十一個人不是叛徒。他親口對我們講了這六十一個人案件的詳細情況，講了一兩個鐘頭。我寫一兩千字，向中央講清六十一個人的事情。當然不可能保證是原話。批准六十一個人出來，不是你康生批准的，你康生還沒有回國咧，是張聞天代表中央回答當時在北平的劉少奇。因此這個問題，既不是他們六十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劉少奇的問題，是中央在特殊情況下要他們用登報的方式出來的。

我把材料交給于光遠，于光遠拿回北京，感到氣候還不對，沒有上交，不知放在哪裏了。一九七八年夏天，或者是秋天，于光遠偶爾遇見胡耀邦，胡耀邦急於要給六十一個人平反。這個案件牽涉的人太多，幾個中央局書記，很多都是省委書記，至少都是部長。于光遠說，我們寫過材料，忘記交了，我們清清楚楚。胡耀邦要他要趕快回去找，他沒有找到。第二天，他派司機把

我拉到他家去。一九七八年夏，我已經調回北京。他家還有別的幾個人在談工作，他讓我趕快寫。我就在他那裏寫，不過一千多字，很快就寫出來。我說，還要幾個人簽字，他們都還在。于說，不行，胡耀邦等着要。我說，不跟別人看？于光遠說，有兩個人就行了。我自己說不出口，你是老幹部，我是右派。他叫秘書去打印，打了就發，說胡耀邦分秒必爭。這些事，別人不知道。雖然這些是小事，說明胡在這些事上，確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後來，給六十一人平反的正式文件上，附有于、曾的證明信。我見過的。

另外一份材料是關於張聞天的。我說，廬山會議後，特別是「文革」後，說張聞天是反黨、反毛主席的代表人物，據我所知，張聞天不是這樣，張聞天是擁護毛主席的。我說，我這個材料，只有幾個人知道。一九四二年七月一號晚上，張聞天召集我們農村調查團，還有本地的一些幹部在晉西北談話。張從頭到底，全部歌頌毛澤東，完全出乎我們意外。這個報告不是我一個人聽見的，在北京的還有六七個人，我還舉了名字，說這些人都還在。因此說張聞天一貫反毛，不是事實。現在來看，張聞天的這個報告，對毛當然歌頌得過份了。

張聞天那天晚上給我們作報告，完全是他自動的，臨時組織起來的，講了兩三個鐘頭。無非是講毛如何偉大，如何神聖，已經把毛完全神聖化了。想不到他最後一段講，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來，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湧現出了偉大領袖毛澤東。真是奇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打了那麼多仗，死了那麼多人，說唯一的成就是這個，這就是極端的個人崇拜理論。他本人可能不是真的相信這個理論，他古今中外的書都讀過一些。他被逼得這麼幹，表現他是如何全心全意地、

自動地、無條件地擁護毛澤東。他那天的講話，實際上是個人表態。這個表態，我們幾個跟隨他下鄉的團員不會去報告的，但當地的一百多個人，會不會有人傳話到延安去呢？當時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已經出現了，張聞天那天晚上沒有用，但已經把毛神化了。所以，當個人權力集中的時候，就像張聞天這種人格高尚的人，這個時候也要神化他了；像張聞天這樣有眼光，有學問，還有人格的人，也完全俯服了。

說毛是神，不是解放後才開始的，而是延安整風後就開始了。以張聞天之明，那時也把毛神聖化了，這是張聞天的一個缺點。但我寫材料時，不是作為缺點，而是作為為張聞天翻案的一個好事例來寫的。

關於張聞天，我做了一個最錯誤的事。大概在一九八零年為張聞天平反，為他開單獨的追悼會，陳雲致悼辭。這個悼辭初稿是由三個人起草的，其中有何方和我。不用說，這是上面交給我們的任務，因為我們三個人都單獨跟他有過直接關係。我和何方當時都還靠邊。我又起草了一篇文章，講了張聞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一號晚上談話的精神，然後交給七個人去簽名。我們工作團還健在的七個人有馬洪、雍文濤等，七個人都簽了名。其中一段，被當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參加過這個農村調查的當地的段某堅決反對，刪去了，說那是被批評張的走資政策，張還是錯的。其實這是非常正確的一段，張主張市場開放，很接近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各項政策。但是張七一晚上講話神化毛的這一段，由我寫進文章裏去了，現在還在《人民日報》上。根據姓氏筆畫，我不在前邊，但那篇文章是我寫的，一個字都沒有改過。我當時的水平就是這個樣，是

跟風。風是甚麼？誰擁護毛主席，就正確。公開文章還必須如此。

調回北京的經過

于光遠回北京後不久，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說，中央要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要調一些人到北京，可能有我。這件事實際有權主持的還是胡喬木。

我回了信，説回北京我是贊成的，因為「文革」之後兩年還是靠邊，連非正式的工作也沒有。但是我本人不贊成在中國編大百科全書。原因很簡單，一個國家編一個像樣的大百科全書，一定是這個國家經過某種政治、經濟、文化等重大變化以後，反映國家重大的新東西，可是中國沒有。現在中國百廢待舉，這時要編這種書，無非是按傳統解釋一切，把別人的大百科全書移植過來介紹一點知識，這跟中國大國的形象不太相符。

這封信發出不久，從非正式的渠道聽説要調一批人，其中有我。到了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給單位請了一個星期假，到北京來看看。因為當時我沒有事，又換了新的負責人束紉秋，他非常好，後來任《新民晚報》的副社長。他説，你去很好，我們還有一些問題需要你帶去，你如果能見到胡喬木同志，我們有關於黨史方面的問題要問問他。《辭海》還在繼續編寫，「文革」結束了，知道老調子不行了，但不知道怎麼改。

我到北京，住在出版局的空房子裏。出版局幾間空房子住滿了，都是被趕出北京一二十年

的人。我找到當時出版局的局長陳翰伯，陳翰伯說是有這件事情，胡喬木他們在籌備，是要編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要調一批人。一方面要調一批科學專家，一方面也要調一批做文字宣傳工作很久的人，還準備調一批老同志回北京。我又講，我就不贊成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我說，我不贊成，把我調來幹甚麼呢？他說，你不贊成歸不贊成，調你回來你還是要回來。

實際的籌備小組由姜椿芳做。他是老前輩，外文很好，「文革」期間坐了十年監獄。他出監獄後，就抓緊幹這件事，因此把胡喬木說動了，讓他來負責。那個時候，不像現在叫甚麼領導小組，有甚麼長，那時甚麼都沒有，就是籌備小組。當時已經找到四個人參加籌備小組。有姜椿芳、朱語今和我。朱語今跟我一樣，五七年劃了右派，曾經是團中央宣傳部的部長或副部長，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社長。還有一個沒有來，他就在北京，社會科學院的，他不願意幹，他有事情做。

我問陳翰伯，胡喬木同志能不能見我一下，我有任務。一共才三四天。他說他已經給胡喬木說了我來了，胡喬木準備見我。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去見胡喬木，車子把我送到現在社科院。走上樓梯，一下碰到周揚。周揚當時是社科院副院長。我看見他，高興得不知怎麼說，我以為他早就死了，一般人都以為他死了。「文革」初期把他當一號人物整，鬧得那麼兇，活得成呀！不管周揚過去怎麼左，但看見他紅光滿面，後邊還跟着一個秘書，是很驚喜，感到意外，我等於看見一個死靈魂一樣。他也看見了我，他說，你去吧，他們幾個等着你。很短的互問。

我跟周揚沒有直接關係，但他認識我。從反胡風開始，我要到宣傳部去開吹風會，見他很多

次。他是上級、老前輩，我是小青年，就點點頭恭恭敬敬地招呼一下。我變成右派後，他大概知道。「文革」一開始，我們辭海編輯所造反的對象主要是我，就是鬥我。為甚麼呢，周揚大概在一九六三年到上海去過，他通過下面的人問起幾個人，表示關心，講幾句話，無非是官話。他問了傅東華，還有些人，也問了我。當然是前輩勉勵後輩的話，比如好好改造，將來還是有前途的等等，只能講這些，是經過別人傳達的。我當然是左耳進，右耳出，這有啥稀奇呢。但「文革」初期鬥我，主要的大字報就集中在我身上，說我是周揚派到上海的坐探。

我走進一個小會議室，有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我跟他們三個都很熟悉。他們三個招呼了我後繼續談，談他們院裏的事，甚至牽扯人事安排。我繼續聽不好，退出來也不好，進退維谷，硬着頭皮坐在遠處。你是被開除了黨籍的人，不考慮你自己的身份呀。但他們三人還是把你當成老黨員看，毫無忌諱……

他們的事情談完，我一般性地問好後，直接提出問題。我說，辭海編輯所正在加緊修改有關黨史的人物，有一批人，負責人叫我帶來問問喬木同志，有瞿秋白、彭德懷、林伯渠、劉志丹等。彭德懷寫得很壞；林伯渠，不懂這麼重要的一個老前輩，為甚麼寫得那麼一般，肯定是有問題，但上海不知道。

胡喬木說，現在一個個說不清楚，黨史人物全部要改，全部要重來。你回去說，停止寫了，不要改了，改也改不好。胡喬木談林伯渠的事，談了二十分鐘。幾十年不見，他談那麼機密的事，弄得我莫名其妙。關於林伯渠的一些事，後來知道一些。林伯渠的夫人在林伯渠死後，寫過

化名信給中央，後來查出來，她自殺了。但是胡喬木給我談的，不是這件事，是上面對林伯渠本人的誤會，他說，這是完全不對的。

他偶然談起說，把你們這批人調回北京來，主要是為了解決你們的組織問題。這個問題當地解決不了。還是要問北京，這就不如把你們調回北京好。他說的這批人是指哪些人，我不知道。但他的意思我聽懂了。就是說，你們這批人，要準備重新入黨。

重新入黨申請書確實難寫，覺得不能恢復就算了

我回上海幾天，很快收拾後就到北京來了，大概在一九七七年的七月。到秋天，國慶放假前後，天已經不熱了，新華社的李慎之跑到我們大百科籌備小組來。我們十幾個人，有兩間破平房，在東城的邊上，走幾步就是農田。李慎之在東單下公共汽車，走兩三站才到。

李慎之主要來問我一個問題。我過去沒有見過他。他說，估計你也有這個事。我們那裏，上邊先暗示，後來正式講，要我寫入黨申請書。後來又催我幾次，現在已經告訴我，入黨申請書的手續是必要的，會上不會煩難。

寫入黨申請書就是重新入黨的意思。他感到不好寫，來問我。我說，我的情況跟你一樣，我也拖到現在。他問，你為甚麼不寫？我說，難寫。怎麼寫？重新入黨，不寫你是右派？但不寫不行，這就下不了筆。你說我現在才擁護共產黨，我們十幾歲就擁護共產黨了；你說我現在才相信

馬克思主義，我們十幾歲就相信了，幹這個東西幹了幾十年。現在這麼寫，全是說假話。

我告訴他我的情況。我們這裏的負責人姜椿芳同志，先是找我到他的辦公室談了一兩次，暗示我。看我幾個星期沒有動靜，有天下午把我帶到他家吃晚飯。他有車子。在吃晚飯前，他又很客氣地問這個問題。在這個超級慈祥的老人面前，實在感到不好辦。姜椿芳是個好得不得了的人，一個和善的老人，老黨員。但面對他，這個申請書還是難寫。我跟你一樣，要恢復，就恢復，不恢復，這個問題就只好放下。

在姜椿芳家，我很難表態。面對很和善的老前輩，比你大十幾歲，比你入黨早十來年，個人品格又非常好，我只能非常客氣地說話，無非說感謝組織上的關心，我再仔細考慮等等。

我和李慎之兩個商定不過這一關。這一關太難過。

要這些人重新入黨，可能到處有難處，很多人不表態，才調整了。大概過了幾個月，開支部大會，通知一聲，某某人恢復了黨籍，組織問題就算解決了。

在大百科全書待了大半年，感覺能力實在太不夠了

我在大百科全書大概待了大半年，感到科學研究與國外相距太久了，很難接上頭。但國內的一些科學家積極性很高，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社會科學方面的，也有積極性，但表現不一樣，有點怕，不知道怎麼寫，認為老一套不行了，新一套，又不知道上面的尺度。

大事情不會做，某些小事，要讓我抓一下還可以。我給姜老建議，趕快抓緊時間，把大百科的一些條目請現在還健在的科學家寫。我說，他們可以請助手寫，寫完後他要看，要修改，或者委託甚麼人修改。這個稿子存下來，因為離出版還要好幾年，將來書出來，有的老人可能不在世了，條目仍用他的名義，也可以連助手都署名。我舉了一些例子，比方說請郭老寫「甲骨文」的條目，如果這一條是由郭老寫的，大百科的聲望地位就不一樣了。又比如請裴文中或賈蘭坡寫「周口店人」。周口店人的研究，他們是始終參與的，其他人寫，就不一樣。又如請梁思成寫「故宮」，請馮乃超寫「創造社」。當時他們都在，積極性很高。我說，如果這樣寫，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我們可能有三四千條以上，那大百科的影響就更大。我說，我可以來專任此事，別的我不行，只要找一個伙伴。我推薦了戴文葆。我說戴文葆同志是我所知道的人民出版社第一個學問廣泛的編輯。我跟戴文葆兩個，只要在全國有大學、研究所的城市跑上一年，大概能拿出兩三千條。不說從學術上，就是從商業角度上來講，這也是個好辦法。我還請戴文葆來開了兩次會，他願意，他認為我這個設想很對，而且他幹這些事比我能幹得多。他的知識、學識比我好得多。後來沒有做此事，戴文葆回文物出版社了。（之後，我又動員他回人民出版社。）

這個事情後，我覺得我在這個地方無何作用，我沒有這個學問。我急於要離開，我知道我做不出事情來。

第二十七章 回人民出版社：「外國政治學術叢書」禍起蕭牆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沒幹幾天，「反精神污染」等政治運動來了，我立即辭職

當時人民出版社的人告訴我，人民出版社這幾年沒有總編輯，社長有，是延安出來的，我還認識。經過「文革」後，有些人變聰明了，社長可以做，總編輯決不幹。總編輯要管稿件，要簽字付印，可能出問題。社長兼總編輯，就是不兼，不管稿件。這個也奇怪，上級機關怎麼可以這樣辦事，只有行政工作的負責人，沒有編輯工作的總負責人，幾年了，可謂奇之又奇。

他們問我，你願意回來嗎？我說，我願意，大家都熟悉，特別是有資格有學問的老編輯都熟悉，關係也很好。他們先去活動，到人民社任總編輯，後來上面批准了。

我正式回人民出版社上班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底九月初，在大百科，一年多就過去了，甚麼也

沒有做。

我當時願意回去是感覺到可以做一點事情，你現在沒有人抓全部的出版規劃，我正好去。責任，我不怕，我就去負責任。當時人民出版社還是一個單位兩個招牌，可以用三聯的名義出書，人民出版社也另設個三聯編輯室，其他編輯室的也可以用這個名義出書。所以我去，主要是為了三聯這個招牌去的。人民出版社這個招牌，書難出，那時仍主要是出文件。

回人民社後的日常的工作，簡單地說，不難，這麼多年不好好出書，就放手多出一些書吧。但我回人民社工作才一兩年，一場大風暴吹來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風暴吹到我頭上是很厲害的，我是被這場風吹垮的。

我在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年限到一九八三年底，一九八四年一月一號，我就正式離職了。為甚麼恢復工作才兩年（此處專指在人民出版社時間，在大百科一段，我甚麼事也沒有幹），就決然辭職了？我看在文化思想上新的胡鄧體制下，我甚麼也幹不出來。

我之所以急急離開，根本的原因，還是為了我建議翻譯出版的那套「外國政治學術叢書」。中國人不准談政治，「政治」兩個字是我硬要加的。我建議後，很快就幹起來了。我回人民出版社基本上只幹了這一件事，而這一件事，就闖下了滔天大禍。一場暴風雨就來了。但是全面發動，是在我離職一個多月後，還專門把我找到中宣部去開會。

當時「反精神污染」等，鬧得天翻地覆，我感覺時光在回轉。「文革」剛結束，怎麼又要搞相似的運動了？就是在全國鬧得非常響的時候，我因公在上海。我聽說我們社有些搞人事的、搞

行政的人，已在叫女同志的頭髮要剪短一點，褲子長了短了的，又搞成這樣子。我說不像話，是瞎胡鬧。在這種情況下，我感覺我是不可能在全國「反精神污染」的口號下來也跟反對民主、反對改革、反對開放的。後來接着「反自由化」，因為「反精神污染」不好聽，大家不喜歡這個名詞。我看這一來，工作很難了。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堅決辭職了。

我是一九八三年秋天寫的辭職信，批准我工作算到一九八三年底。沒有人逼我，就是因為「反精神污染」，加上丁玲、歐陽山等人的擁護談話，我感覺到有點像「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我不能接受。

為甚麼要發起出版「外國政治學術叢書」

十年「文革」，任何比較正常的圖書出版都停止了，只有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只有張春橋、姚文元寫的小冊子，八個樣板戲，還有江青對老帥們的訓話等。現在人們已經無人知道了，「文革」一開始，江青就對老帥、老將們有一篇訓話，號召老帥們要「為人民立新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此講話即成小冊，人手一冊。一家人，有幾套毛選，不算稀奇，有一堆小紅書，不算稀奇，這是中國文化歷史上的一件怪事。這種現象，「四人幫」垮台後，在思想專制這個問題上，並沒有花多大的力量去揭發、批判。十多年只出了兩本書：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章士釗的《柳文指要》。

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為了大百科，我到過西安等幾個地方，到過鄉下。「文革」已經結束了，但一些人家，毛選一大堆還擺在那裏，毛主席的塑像也擺得好好的，都跟過去一模一樣。所以十幾年，從「文革」算起，到八十年代初，老百姓誰不希望能看到一些新書？而且中國對外國的情況，特別是對二戰後的外國情況，實際上從來就是一無所知。不是所知甚少，我認為是一無所知。自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後，基本上沒有翻譯介紹外國情況的書，要有，都是那幾本俄文書。名義上有《參考消息》，大學生都可以看，但《參考消息》並不是真的各種消息都有，這個《參考消息》是根據一定的要求來選的，參考性很少。

解放後若干年我們宣傳的是甚麼？宣傳全世界所有苦難的人民都等待中國人民去解救他們。「文革」前後，我多次下鄉勞動，農村天天出工都要叫口號：「身在家門口，遠望天安門，心想全世界，為世界革命種田。」鬧完了，再下田去，已經十點過了。在「文革」期間，更是厲害，到處貼「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蟲，全無敵」。給老百姓灌輸的是：全世界等待着我們去解放。

我這裏還有個例子。一七五七年劃右派前不久，我的一個親戚的孩子從師大畢業來看我，談起朝鮮戰爭中的美國俘虜爭取回國，他不理解。對我說，他們生活窮得很，他們回去，不是要殺頭、要在街上要飯嗎？我問，誰告訴你的？他說，從小學到大學都是這樣教的。當時我哭笑不得。在中國人的腦子裏，外國的人不是凍死、餓死，就是被殺光。自我愚昧，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

因此，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回到人民社工作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就是要睜開眼睛，看看全世界。中國對外國，幾十年來到了一無所知的程度。所以，非要有一些講真實情況的書不可。不說點具體情況，是非常糟糕的。這時，我主張趕快把二戰後外國的情況，多翻譯介紹一些進來。政治、經濟，特別是社會情況要介紹。我利用我這個職務，想大規模地搞一些介紹外國的書。但是這個工作有些不太好做。介紹外國與投降資本主義國家本來是兩回事呀，但你介紹外國，就是投降外國。要革命，就還是要說，全世界人民等着我們去解放他們！

發起出版「外國政治學術叢書」的簡單經過

人民出版社有不少同志感覺跟我一樣，覺得當時我們太封閉，而且解放後一直如此。他們也認為，應該組織大批的外國書，翻譯過來，因為要組織編寫新的稿件，基本上很困難。大部份教授驚魂未定，他們先追求安全自保，有飯吃，不挨鬥，工資照發就行了。也有一些歷史學家願意把一輩子研究的東西，在臨死前拿出來，並不是對現實發表意見，而是對歷史怎麼解釋。所謂的中國歷史就是靠李自成、黃巢，靠農民戰爭，歷史學家不信，稍有常識的，不接受這個東西。

這個時候，外語修養不錯的學者還多，如果組織他們翻譯，他們的責任小，正好符合他們的心意。同時，一些政府部門，如外交部、中聯部、國際研究機關，這些單位的興趣更是大得不得了，他們跟出版社的編輯也認識，大家興趣很高，聽說人民社有這個意圖，這些部門很快自己串

聯，熱鬧起來了。

人民出版社五十年代編介紹國外書的人還在，他們本來外文很好，很快地，人民社新成立了國際政治編輯室，調了幾個外語強的人去。我的意思就是公開地打出「政治」招牌，我們應該了解國外的經濟、政治。

然後由我出面，由宣傳部、編譯局、出版署來發起。我們出版社是小單位，不夠資格。這個事情的發起，我在〈申訴書〉裏説得非常清楚（〈申訴書〉指我在一九八四年夏上交×××同志的一件抗辯書，後面將談此事）：

> 惟覺此事由人民出版社出面邀請不夠資格，遂立即於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寫信給于光遠（社科院）、王惠德（中央編譯局）、陳翰伯、王子野、許力以（以上三個國家出版局）等五同志，建議由他們出面邀請有關單位開一次籌備座談會，成立書目選譯小組，然後再開一次有外地三五家出版社組織參加的具體分工的會議。五天後，陳翰伯同志在原信上批：「送曾彥修同志。惠德、光遠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來未能開展此項工作。建議把此件送陳原同志一閱。我希望在七月間開會（指具體分配出版任務的全國部份出版社會議）。」半個月後，即一九八零年四月十六日，由王惠德、于光遠、陳翰伯三人聯名代表中央編譯局、社科院馬列所、國家出版局發出邀請信，人民出版社是被邀請的出版社之一，於一九八零年四月十六日在國家出版局召開第一次座談會。

陳翰伯、王惠德、于光遠以及國家出版局的幾位負責同志都出席了。會議由陳翰伯同志主持，不約而同地都覺得這不過是把荒廢了十五年的工作重新揀起來做罷了（不過，此次選譯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參考），所以那次會議主要是互相回憶了六十年代出版「灰皮書」「黃皮書」的情況，並原則決定先成立一個選題小組，由六十年代初始終參與此事的中宣部工作人員馮修蕙任臨時小組召集人，選目小組由中聯部七局、中聯部蘇聯東歐研究所、外交部蘇歐司、馬恩編譯局、北京圖書館、中國圖書進口公司、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等單位代表組成。並原則決定一俟書目初步弄好後，即由國家出版局召集全國部份出版社會議，分工承擔任務。×××同志批評説，人民出版社唯一的「創新」就是出了這套書。但是，這個功勞主要不能歸我們，我們確是起了一點作用。

這樣一來，非常順利，這套書經過修訂，目錄出來，有九十七本。國家出版局大概在一九八零年春天開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會議是落實中央宣傳部的一個佈置，即加強中級讀物的出版。中級讀物，就是解放初出的像社會發展史一類書。

但譯書目錄一出來，大家的注意都在這上面了，爭得很厲害。我對本單位的人説，人家不要的，我們來。這樣，經過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兩年，由全國若干個出版社出版，絕大多數書都出來了。

當時，出版界多少形成了一些新鮮空氣。中國上十億人口，出版這幾本書，有甚麼了不起

的。我還發現，不少人長期養成了一種惰性，對這些書並沒有甚麼興趣，一是看不懂，二三十年跟外部完全斷絕了，不知道如何選書。二是確實被運動整怕了，只求一個安全，對譯此套書有興趣的並不多，多數出版社對此無興趣。這一點完全出乎我的想像。

很快地，一九八二年開始了「反對精神污染」。甚麼是「精神污染」，沒有一個人搞得清楚。發動「反精神污染」，新華社發消息，一個丁玲，一個歐陽山，發表談話，支持這個運動。我心裏明白，把這兩位老人家請出來講話，大勢已定了。兩個都是老前輩，有名的作家。

在學術上，在文藝上，更緊張。《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副總編輯王若水兩個人被打下來。胡績偉為了甚麼？為了不同意×××、×××說黨性高於人民性。這個話本身非常抽象，講道理講不出來。胡績偉寫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書。胡績偉認為，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其他的利益，人民性是最高的，人民性就是人民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這個說法恐怕沒有錯。黨性高於人民性，那黨的利益高於人民利益，這個確實不那麼易懂。胡績偉也是二十來歲從地下黨撤退到延安的，做報紙一直做到《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感覺到這種空洞的口號非常錯誤，所以要在「文革」後完全轉變過來。但是×××、×××就不同意，堅持這個東西，鬥，鬥了多少年。是不是真的在鬥這兩個名詞呢？照我看，不是這個。實質上是說你胡績偉太自由化了，應從《人民日報》的崗位上下來。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問題，即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沒有矛盾，沒有甚麼馬克思主義高，人道主義低的問題。同時，王若水又是周揚在馬克思逝世

一百週年這篇講話文章的三個作者之一。一九八三年，周揚作了長篇講演，把過去極左的觀點改變了，就強調了一下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通的。周揚當時身體不好，要他寫這麼長的文章，實際上是困難的。王若水是這個報告爭論最大的這段的起草人。另外兩個人是王元化與顧驤。

先是批周揚，周揚一氣得病，從此就沒有命了。胡績偉跟王若水，在《人民日報》大會、小會上被批判，職都撤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倒一點敏感性都沒有，沒有感到他們的後邊會連着其他單位。我們算個甚麼？一顆小綠豆。但是事實上並不像我所想的那麼簡單。我一九八三年夏辭職，是感到工作無法做了，動輒得咎。但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到三月，把人民社的組長以上的同志叫到宣傳部去，批評了兩次。第一次我不在家，要人民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及各處副處級以上的人到宣傳部去聽轉述×××的批評，約兩小時。三月六號，又叫人民社三個負責人去，指令曾彥修必到。其時我已經離職三個月，是退休人員了。×××一人對我們批評了三個鐘頭。我一字未發。

但是這一次我也一點沒有屈服。這次，周揚沒有屈服，胡績偉、王若水沒有屈服，沒有檢討。社會科學院青年研究所的所長張黎群，他也受到批判，他沒有屈服。這一次，我不但沒有屈服，立刻寫了一本厚厚的〈申訴書〉——我不好叫「抗議書」，交給×××，也交給一些政治局委員或書記。我也上交到中紀委，因為根據批評我的那些說法，我的問題應該由中紀委處理——我的問題已經不是思想問題，而是反革命性質的問題了。

從反右派、「文革」這些運動過來，經驗多了，屈服、檢討沒有用，下一個運動你會更慘。與其那樣，不如我現在就頂住，隨便你，我不但不檢討，我要你檢討；我不但不向你道歉，我反覆要你向全體人民出版社及我本人道歉。這不是搗亂，而是教訓使然。

胡耀邦立即批示，贊成「外國政治學術叢書」計劃

選題小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制定出翻譯近現代外國學術重要書籍九十七種，號稱一百種的計劃。人民出版社負責事務上的工作，打印出來，寄出去徵求意見。

哪曉得（知道）過了個把星期，突然收到一本兩厘米多厚的油印的東西，就是我們寄出去的計劃徵求意見稿，是胡耀邦總書記辦公室退回來的，還有胡的親筆批示。這個事，我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負責把計劃草案分發給專家，至多是某個研究所。但是，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編輯室寄了一些給社會上的著名人物，竟寄了胡耀邦一份。這個做法是很不妥當的。按照規定，我們這個計劃修改定了後最後要報中宣部，看中宣部要不要請示書記處。「文革」期間，無政府主義已經普及全民了。我當時是總編輯，是要負全責的。我只好寫一封信，給胡的辦公室說對不起，我們無政府的狀態還多得很，這個東西是最早的草稿，成型後會呈送中宣部，對寄給胡耀邦一事，我只好表示歉意。因為任何一個小單位都把自己的計劃寄給總書記去徵求意見，實在太不應該。

胡的回信是這樣的：

我贊成翻譯一些現代社會主義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資產階級關於社會學的一些名著。現在我們這方面的知識貧乏得驚人。我不知道全國是否有十來個人認真讀了十來本這樣的著作。沒有這一條，談甚麼探索新理論？但這類著作浩如煙海，紙張翻譯都有限，因此要認真選譯。你們這一百本，至少有兩千萬字吧。這恐怕不行。應該指定一二十人有水平的專家再精選一下。

胡耀邦　七月二十一日

這是一九八零年的事。這封信應該還保存着，是他的親筆信。胡耀邦之所以講太多了，還要精選，是對我們一家出版社講的。一家出版社一下要翻譯一百本確實難。胡耀邦的這個回信，我們並沒有對外宣傳過，但籌備、翻譯這批書的二三十個人都知道了。

到了一九八三年，清理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一九八四年，×××專門為了這套書，又叫我們三個去。我在〈申訴書〉裏說了這件事：

今年（按：指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同志找我們（曾彥修、張惠卿、陳茂

儀）談話時，中宣部出版局局長許力以同志當面向×××同志唸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但×××同志聽了後，隨便說了兩句：「耀邦同志是一般說說，不是對你們人民出版社說的。」但是，我以為耀邦同志的批示絕不是隨便說說，這個批示在黨的理論研究上將會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第一，他認為必須熟悉國外的理論情況，「沒有這一條，談甚麼探索新理論？」把問題提得很高，正確而又必要。第二，這個批示是直接回答人民出版社的，批示中還用了「你們」的話，怎麼能解釋成為不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內呢？第三，正因為只是對人民出版社說的，所以，才會覺得一下子搞這麼多書，計劃太大。如果對全國說的，能夠說只翻譯百把本就把這項重要工作停止了麼，顯然不可能作這種理解。

第二十八章 「颱風」的經過與我的三萬言〈申訴書〉

事情是這樣起來的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某部突然召集人民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及行政副處長以上的人去聽傳達——×××對人民社的批評。那時，我剛好不在北京。

我在〈申訴書〉裏寫到這次批評：

×××同志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和三月六日兩次對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作了「批評」。我這裏把批評打上引號，請看了這兩次「批評」的原話摘要就會完全明白了。（見附件一、二）「批評」的總精神是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是對的，但是自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就完全錯了，是被×××同志認為不受黨的領導的理論界牽着鼻子跑了，還公開替托派宣傳，真正陷入了「三信危機」，人民出版社已經「成了自由主義的出版

社」，等等。其他嚴厲指摘尚多，主要內容略見附件一、二。

×××同×××同志都多次説過，個人責任就不追究了。四月初他們二位向××同志彙報思想工作九條時，第一條就談了這個問題，又説不追究個人責任了。……

×××嚴厲的指責還很多。這件事，不僅僅是這樣批我們，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初，×××和×××兩位向××彙報思想工作，實際上就是彙報「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情況，一共九條，第一條就是談人民出版社。在當時，自由主義就是反黨，而且在他們的彙報當中還講，個人責任就不追究了，意思就是組織處理從寬，本來是應該追究的。

怎麼知道這個彙報的呢？要知道「文革」以後情況不同了，打倒「四人幫」後，上面的事通過小道傳下來。我在給×××的〈申訴書〉中也寫上了這件事。

我的〈申訴書〉將近三萬字，章節清楚，但太長了，不可能在這個談話中多講，只把要點介紹一下。介紹之後，我是對，還是錯，只有付之公論。

×××與我的總分歧：堅持馬列與堅持「雙百」方針是不是不能並存

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後，多年來一直沒有出過這個問題。共產黨不是因為提出「雙百」方針，就放棄馬克思主義，這是很簡單的，就是説可以並存的。〈申訴

書〉中說：

我本人則完全承認我歷來就主張要充份了解外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其他社會科學、文藝思想等方面的情況的。……

一九五五年我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作〈論「睜眼看世界」〉，至今不少人還印象很深。……

一切應該迎頭趕上。對當代的外情不了解是最危險的。……我感覺，更迫切的恐怕首先要了解二次大戰後，尤其是眼前的情況。但是，×××同志在原則上認為不應該出這類書的，他在三月六日第二次對我等三人的談話中說：「用甚麼名義，用三聯，用商務，不是個實質性問題，實質性問題是出了這些對我們有害的東西，而沒有消除它的東西，去和它鬥爭。你們沒有以滅害為己任，缺乏這方面的積極性，這才是個問題。」

×××的這段話很厲害，除了馬列和黨的文獻，二戰以後的外國書都是害，你們不但不滅害，還介紹進來。這段話，我認為說得太滑邊。人類的文化，二戰後的，就都是壞的？作為那麼高級的領導人，把出版二戰後的書說成是「沒有以滅害為己任」，這個太滑邊了。人類的文化，難道在十九世紀馬克思出來後就斷了不成？難道除了馬克思外，都是害嗎？這些思想長期在中國流行，不稀奇。

這樣的話出自高級領導，或者一個宣傳家口裏，當時我實在非常吃驚。這種話，老實說，跟他以前的講話不一樣，以前他絕不會講這種話的。為甚麼一個人有了大權後，會講出這種說不通的話呢？為了維護絕對的權威，自己創立了一個學說：二戰後的書都是害。

中國封建文化的頑固學者認為，孔夫子後再也沒有真理，孔子已經把一切人間的道理講完了。×××的說法是另外一種。馬克思、列寧，加上斯大林（其實主要是指自己），已經把人間的真理講完了，再不能去讀外國書了。

這次突如其來的對我們的毀滅性批評，我在〈申訴書〉裏說得很清楚：

×××同志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談話，提出了一個十分新奇的新原則，他說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訂的出書方針（那時我還未到人民出版社），「這個方針講了些漂亮話，不求實際」。「裏邊還有一個矛盾，或者叫界限不清，又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是宣傳馬列主義，怎麼能並駕齊驅？不太明瞭。」這段話確實很難使人明瞭。毛主席提出「雙百」方針時，並沒有說過它同宣傳馬列、堅持馬列不能並存。×××同志這種批評是自「雙百」方針提出後的首次發難。如果×××同志講的是對的，那麼近三十年來恐怕一切宣傳、理論、報刊、出版方針都全錯了。因為不管哪裏都是要堅持馬列，也要堅持「雙百」，從未有人批評過兩者並存是錯誤的。……我覺得×××同志現在發表的是綱領性意見，在中央未發表意見之前，本人很難同意此種說法。

×××講的話，是要急於開展大規模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就發生口不擇言的明顯錯誤。不是我抓他的辮子，而是錯得令人意外。

×××具體集中指責我們四大問題。最尖銳的是指責我們人民社宣傳托派。中國也好，蘇聯也好，幾十年來，把托派看成是人間罪惡的代名詞，其實對人家啥也不知道。

我在〈申訴書〉裏說：

> ×××同志具體指摘我們的一個個的嚴重問題很多。以下就他指摘最多最尖銳的三類問題作點說明，其餘就不談了。這就是：一、宣傳並公開為托派、布哈林翻案的問題；二、「反蘇」問題；三、散佈其他一些共產黨的理論、綱領問題。
>
> ×××同志指摘最多、最嚴厲的是我們出版了第四國際托派理論家曼德爾《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一書（六萬三千字，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他在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第一次談話說：「國家政治出版社出托派的書，出反對蘇聯的書，出不破哲三的書。……托派在中國是反革命組織，只要有活動，我們就法辦。現在公開出托派的書，這是跟我們黨的方針直接違反的。」「我想像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開出版托派的書，走得太遠了！」三月六日第二次談話時又說：「人民出版社居然出國際托派曼德爾的書，還說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國際的觀點，明知他是托派還公開出版他的書！」

我覺得批評我們的人才高八斗，這回卻真是走得太遠了，還認為布哈林等是應該殺的，這不符合他的知識修養。

比利時的曼德爾，跟中國的大權威開了一個大玩笑

這回×××的嚴厲是異乎尋常，說得我們跟現行反革命差不多了，該法辦了。但是，我早深知這本書的出版經過。我們是有意出版這本書的。因為我們知道×××同志曾經特別讚美過這本書，用不同的方式介紹過這本書，說這本書怎麼特別好，因為他不知道作者是個托派傾向者。我們不得不公開出版，加一個說明。

我的〈申訴書〉裏，對這個問題不得不講得特別清楚：

「文革」前幾年比共（馬列）總書記格魯巴訪華時帶來了曼德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部大書，交與中聯部，說明曼德爾是托派理論家，但比共（馬列）批判不了這部書，希望中國同志把它翻譯出來，加以批判。後來譯出來了，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上冊，「文革」開始後下冊未能印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作為一般學術著作出版了此書的下冊。×××同志看了此書後，於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讚美此書說：「我看到一本比利

時的學者曼德爾寫的這樣的書，叫《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是依靠他自己獨立的觀察，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是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裏面很少利用的。……這位作者並不是一個流行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他堅持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也沒有堅持到這種程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話，他一定都要接受」（見附件六。這個附件是原大字原件複印，很重要，盼能看一看）。這些評價當然是很高的，這就是說曼德爾是一個創造性的、沒有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同志特別重視下冊中的十五章至十七章，即研究蘇聯及過渡時期經濟的三章。據我們所知，×××同志還曾要一個黨中央的機關把曼德爾的這三章書印成了大字本，分發中央負責同志及很多同志參考。中央黨校也在同年十月將這三章書印成大字本，封面印有「中共中央黨校翻印」字樣，發與全體學員作為正面學習材料，根本未向學員說明是托派資料。人民出版社的一個副總編輯張惠卿當時正在那裏輪訓，他也得到一本，至今還在手中。正因為這個國際托派理論家，被×××同志如此作為正面人物在黨中央機關內廣為宣傳，我們才覺得必須說明曼德爾是當代國際托派的著名理論家，以免謬種流傳，不可收拾。……我們在這本小書中之所以特別要指明作者的托派身份，不過是想默默地做一點補救工作……不想我們竟因此而遭受如此強烈的譴責！

〈申訴書〉是一九八四年秋交的。我所說的觀點，完全還是老的正統的教條主義的觀點，即

凡托派都是錯誤的、反動的。×××當然有其高明的地方，在他還不知道曼德爾是托派時，看出他著作的合理性，高度地讚美，但是，一旦他知道曼德爾的托派身份後，連我們指明曼德爾的身份，出版曼德爾的小冊子，也都成了犯罪了。如此處理事情，天下是非還有個客觀標準麼？他提倡的、歌頌的、向領導推薦的，向科學工作者、向黨校推薦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怎麼一到我們手裏就成了犯罪呢？「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我這幾句強硬的回答，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因為他講的話，離開事實太遠了，太滑邊了，好像對這個世界上的事情甚麼都不知道似的。

所以，我在〈申訴書〉中說：

說托派是德日意法西斯的間諜，則二次大戰結束已整整四十年了，迄今全世界未發現任何一件公私材料能證明這一點。而要把這個事情整個隱秘至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至今還是不理解×××為甚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還要說一套三十年代從蘇聯進口的話。

現在還能堅持布哈林是個反革命分子嗎？太怪了

我們受到特別尖銳指責的是×××批評我們出版了一本為布哈林平反的書，×××仍然堅持

布哈林是個反革命分子。其實，蘇聯方面已經多次非正式為其徹底平反多年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外國間諜。但×××卻還要堅持斯大林對布哈林的判決，責備我們不應該出早已在全世界通行了的書：《布哈林案件》。我在〈申訴書〉裏說：

《布哈林案件》一書則是幾萬字的一本小冊子，是英國羅素和平基金會組織人撰寫的。本書首先轉錄了維辛斯基公訴的全文，另外引用了蘇聯的報刊材料，是說明與布哈林同案的一些重要人物均已平反（蘇聯沒有一個人公開平反的，都是非正式的方式），用以反證布哈林罪名不能成立。此外，書中還引用了赫魯曉夫《回憶錄》中的一段話：「我們無限期地擱置了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和其他人的平反，我們現在認識到，我們的決定是一個錯誤。」書中還引用了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著名的女革命家斯塔索娃等於一九六二年蘇共二十二大後聯名致蘇共政治局要求為布哈林平反的信件。另外，全世界都知道，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蘇共中央馬恩列研究院院長、《斯大斯傳略》的領銜作者波斯伯洛夫在赫魯曉夫時代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二十一日全蘇歷史學家會議上，在公開回答提問「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是不是外國間諜」時說：「我可以聲明，只要仔細研究蘇共二十二大文件，就足以說明，無論布哈林還是李可夫，當然都不是間諜和恐怖分子。」（這段話是我們怕萬一原書不可靠，一九八四年又找出蘇聯報刊重譯的。我們知道凡蘇聯的屠殺問題，中國定為「三七

開」，比人家更清楚、更權威。叫重查《真理報》也是我之意。）這本《布哈林案件》一書之不屬於捕風捉影的一類東西是很明白的。它的材料並不多，所引資料也都是全世界久已熟知的。上述波斯伯洛夫的談話更從未受過蘇聯官方的任何譴責和否認。時至今日如還認為布哈林是法西斯間諜，以至一九一八年即勾結各帝國主義合謀刺殺列寧等，那麼，全世界恐怕除了阿爾巴尼亞霍查之流，不管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包括蘇聯本身，已經絕沒有人這麼說了。

中國不熟悉這些問題，以至不少同志至今還拿大審判及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作根據。這電影是不能再放了。可是有個甚麼運動一來，就要連續放這個電影。一個十幾億人口的文化古國能如此滑稽？只要一放這個電影，人們就曉得一定要搞甚麼對敵鬥爭的大運動了。

怎麼可以落後到這個程度呢？×××真不了解情況麼？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堅持布哈林是間諜。可以說在中國，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已經在全國、全黨，造成了幾乎是改不過來的錯誤，現在很多人還是電影中的觀點。一九五六「反右」前，文化部開黨組擴大會，討論赫魯曉夫的報告，是學術性的，一些著名的黨外人物都參加了，茅盾、鄭振鐸、歐陽予倩，把我也擴大起進去了，我不是名人，當時屬於文化部管。辦公廳的副主任×××，跟我激烈爭論起來。我還是比較平靜，我說《列寧在一九一八》不能再放了，因為知道說布哈林的罪名是假的。但那位同

志只看過《列寧在一九一八》，只相信電影，不相信其他。實際上，當時我已經知道列寧夫人的《列寧回憶錄》，當時已經翻譯出來，還沒有出版。列寧夫人回憶列寧遇事的那天，布哈林是唯一一個勸告列寧不要去演講的人。當時列寧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比較隨意。那天，布哈林說不安全，列寧表面說不去，還是去了。但這個電影卻相反，說布哈林組織暗殺列寧，是外國間諜。文化部黨組書記錢俊瑞，他水平高，懂的事多，他說，不要這麼激烈，這是討論問題，討論這個報告就是要糾正從前不對的地方。這樣就維護了我的發言權。講這件事是想說明，到今天一些人也說布哈也是反革命，是間諜。他沒有另外的來源嘛，就是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你說可憐不可憐，堂堂一個如此大國，以蘇聯的一個電影定是非，現在沒有了麼？還有。

×××責備我們為布哈林翻案，是犯罪，就難理解了，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事情，他的知識比我們多幾十倍、幾百倍，他的情報來源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卻連半個字的情報來源也沒有。

人民出版社還有個「反蘇」問題（指契爾年科時期）

×××說人民出版社「反蘇」，是指的甚麼呢？我在〈申訴書〉裏說：

×××同志着重提了《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蘇聯出版物材料彙編》一

書，說我們「反蘇」。此書編輯者是美國人，原書一九七四年出版。此書名字很怕人，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廣告手段，我們以改名為妥。但是這本書的內容卻毫無驚人之處，它不過是蘇聯報刊書籍材料的摘錄而已。這位編者不過是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用蘇聯自己的公開材料來證明蘇聯歷次大審判是冤案而已。我們有此一書便可起個備忘錄的作用，以免出現蘇聯都已實際平反了的人物，我們還是幾十年日日夜夜堅持他們是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偵探間諜之類的笑話。

這本書也不叫平反，就敍述一個個人幹了甚麼，有甚麼功勞，也沒有說他被殺的事，實際上就變成了事實平反了。書名我也不以為然，但我去人民社時，書已經出了，那幾年沒有總編輯，各自為政。

把托洛茨基說成帝國主義的偵探間諜，到現在為止，中外根本拿不出任何一件小事來證明。我看見的材料，沒有說世界上有哪個托洛茨基分子是希特勒的間諜、偵探的。中國那幾個信仰托洛茨基的人，待在北平的，上海的，廣州的，住亭子間，飯也吃不飽，一天到晚想要世界革命。這些都是些怪人，有他們的理論，有他們的理想，但找不出一個是日本人的間諜，也找不出一個是國民黨的特務。

在中國，是有兩個托派最早的中央委員投降了國民黨。但那是在一九三一年，中國托派組織剛成立不久。這樣的人，已經跟托洛茨基者沒有關係了，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罵這兩個叛徒，比

我們罵得還厲害。不僅如此，中國的托洛茨基認為抗戰時，國共合作，共產黨投降了國民黨。所以，他們的思想之「左」，思想之奇怪，現在都令人不理解。但都談不上把世界的、中國的托派說成是德、日間諜。而×××這樣一個大人物，在一九八四年還堅持這樣的說法，我覺得確實令人不解。而且這個話，不是對一個中學生講，而是對一批人講，這些人，至少還是三八式吧，信仰馬克思已經幾十年了，加入共產黨也已經幾十年了，他們一點頭腦都沒有？因此，我在〈申訴書〉裏反駁說：

選譯本書，無論在主觀上、客觀上都沒有甚麼錯誤，「反蘇」之說不知從何說起。我覺得，蘇聯歷史上發生過的種種偏向和錯誤問題，如他們突然的強迫的全盤集體化及其教訓；農輕重工長期比例失調；「肅反」的大規模鎮壓行動，戰爭前後的某些失着；思想文教科技工作中的大國主義、閉關自守與拒絕承認一切新鮮事物的做法（一切俄羅斯第一，反對愛因斯坦學說，反對控制論，反對電子計算機的設想和人工智能的設想，反對遺傳基因與遺傳工程的研究，宣傳生物自然發生，等等）都是我們亟應了解和研究的教訓。翻譯這類問題的書，又是由內部出版，這同反蘇有甚麼關係呢？我以為，這類書今後還應該認真出。據知，這套書中的一本有談及蘇聯集體化失敗之處，政府負責人×××曾要求趕快把內容提要弄出來給他看。

是否應該了解外國黨（外國共產黨）

×××在找我們談話的時候，特別指責我們翻譯了三幾個外國共產黨理論主張的書。原因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全力反蘇以來，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被列為「蘇修」的走狗了，中國跟他們完全斷絕了關係。「文革」前後，有一些外國共產黨裏邊又分出了幾個人，成立了共產黨的馬列派，或者毛派。這些共產黨的力量本來就很小，這一分裂，力量就更小。我們介紹了兩個歐洲的小黨，目的是讓中國人知道，那些小組織是成不了事情的。他們各方面水平都很低，他們講的東西，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可能依靠他們去解放全世界。

另一方面，我們介紹一個比較正規的日本共產黨的代表性的文件，但是這件事，受到×××的嚴厲批評。關鍵一點就是，日共把無產階級專政叫無產階級執政，就是這麼一點，其他也沒有提出來甚麼批評。我的天，對這個批評，我就根本無法理解。因此，我在〈申訴書〉中說：

> 日共就在東鄰，我們不能預存永遠不能改善關係、世世代代要敵對下去的決心。……萬一有朝一日可能重新建立關係時，為避免對他們一無所知，就必須把他們的理論、主張介紹過來。而不破哲三是他們的總書記，最主要的理論家，其在黨內的實際地位早已在老邁的宮本顯治等之上。他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正續編，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日共的理論和觀點，既有一般性的理論看法，也有如何處理日本現在及將來的問題

的闡述，這樣的書是很難找到的，不譯過來，我們怎麼能夠了解日共呢？×××同志所說不應該翻譯的理由，一是日共反華，二是他們認為應把無產階級專政譯作無產階級執政。反華，我們也長期地全面反對過日共，不能因為此就不研究他們……其實，專政、執政，他們更強調的是譯名不妥（我們正式叫法不也重新採用人民民主專政麼？）日共究竟是怎麼回事，總要譯出來看看才知道。……不去了解人家，只能使我們自己閉塞。例如，理論界過去一般認為日共的理論基本上是歐洲共產主義的簡單移植，但是不破哲三的書卻批評歐洲共產主義，表明他們同歐洲共產主義又有不同。究竟是否相同也是要研究才能知道。（二零零八年按：過去我們多年說外國共產黨「反華」，其實只是反對「文革」。）

我在〈申訴書〉裏反覆要求×××道歉

一九八三、八四年的氣氛是相當不平常的，很像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思想緊張情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清污、「反自由化」的形勢很猛，有的單位裏有的人大大地活躍起來了，我們社人事科的人又去警告女同志，自己直接就去警告，頭髮要短一點，褲腳要大一點之類，表示他們有權。在清污反自由化的號召下，文化界一些人被打倒了，像電影戲劇界的，又是全國看他們的「內部」電影，像《早春二月》、《紅色娘子軍》等一大批電影，看的目

的就是為了批判，說這些電影已經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了。這種風氣，跟「文革」前兩三年毫釐不差。對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一九八四這兩三年這樣來勢兇猛的批判，大家都知道，來自××、×××兩個人。對他們的態度，有幾種立場可以採取，其中一是不回答，接受批判並檢討，以當時全國形勢之緊張難逃此運；二是不接受，並作一些反批評。我採取的是第二種。

接受批判、檢討，這個歷史上的教訓多了。接受批判檢討後就沒個完，永遠過不了關，終生都揹着這個包袱，終生都放不下，一有事，就要批鬥，就要檢討。所以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我如果再做檢討的話，我早已不在人間了。人的自尊心到哪裏去了呢？人生在世，一生就為了污辱自己，辱罵自己而存在嗎？這樣活下去，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祖先？中國老百姓有句老話，人活個臉，樹活個皮。一生做檢討，一生要人侮辱自己，算個甚麼事呢？中國有個古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到這個時候，我就是不畏死了。幾十年還不夠，我天天縮着，不敢說一句人話？二十多年了，現在剛剛出來做點小事，三年不到，又犯「死罪」了，誰受得了呢？當時我對××的這個反批判，也是甚麼都準備了的。下一步，就到秦城去，秦城監獄那麼多人，我就進去嘛。當時我是下了這個決心的。你把一切不合理的做到家了，我就無所謂了。

同時我也考慮過，我個人的行為，就是我個人的行為，沒有甚麼影響。我不是周揚，周揚的處境難了，那麼高的地位，那麼大的影響，說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等，他只好悶聲，苦在心頭，一下就病倒了。在批判周揚前，《人民日報》的胡績偉、王若水，已經被批判了。我們這個小小的單位，就被選為典型了。當時出乎我的意外，但一遇上後，我反而一點也不吃驚了，我反而甚

麼事情都沒有了。無非是要來的終於來了。無非是要我屈服，如果我不屈服呢？人要活個尊嚴，把人的尊嚴無止境地摧殘下去，「文革」後再這麼幹，不是把人們的一點希望又要撲滅下去麼？

在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和×××，大「反精神污染」等，知識分子都非常反感，非常頭痛，但是像人民出版社這樣具體的事，一般人不知道。實際上批評者只在獨攬人間真理，只要一個頭腦，重複歷史往事。並不是甚麼科學問題，政治問題，無非是權在你手裏，這樣的一種規矩怎麼可能使國家興旺、強大？我非常奇怪，一個人對歷史怎麼不是引為借鑒，而是想去重複？我以為這實在是中國的一件大怪事，為甚麼對那麼明顯的大錯誤，也要去重複呢？我在〈申訴書〉中幾次提到要批判我的人向我們、向我本人道歉。這個確實有點大逆不道，但也確實是到了人不畏死的程度了。我說：

×××同志是我多年十分尊敬的老上級和業務上的老師，但是，「吾愛吾師，吾尤其愛真理」。三中全會過了六七年後的今天，還出現這樣的「批評」，我是不能不辯正的。

我以為，馬克思主義絕不能只掌握在某一個人的手裏，掌握在一個人手裏的東西就成不了「主義」……我以一個學生的身份深盼×××同志能夠注意一下這個問題。

×××同志幾次要我們在整黨中重新明確方向，徹底討論一下。那麼，在整黨中作為一個黨員我有權利也有義務說明我的看法和全部事實真相。最好，×××同志能正式對人民出版社表示道歉。因為×××同志的這些批評，全國都傳開了。

同時，我準備好事情可能複雜化，這個複雜化就又難免會牽扯到「肅反」這類問題中去的。因此我在〈申訴書〉中申明：

因為這件事情已涉及嚴重的黨紀問題，我不得不把這件材料同時呈送中央紀檢會。

這件事，我絕不是小題大做。我覺得這種批判、這種掃蕩如果太順利了，就不行。一刀砍下來，本以為像切豆腐似的，結果偏砍不動，這樣就會想下一步整人時注意一點。

我的〈申訴書〉是在我們單位秘密打印的，因為牽扯到中央××局委員，屬於機密，所以打印一張，銷毀一張，印了三十份。司機去寄送到中央辦公廳，包括送了一批政治局委員，一批書記處的，同時送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送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我考慮過，與其等你整我，不如我先備案。這大概叫惡人先告狀吧。這次，我也就只能主動當一次惡人了。

〈申訴書〉我花的力量很大，將近三萬字。我為甚麼要花這麼大的力量去寫？並不是為了我個人。不過，個人當時不表態也不行。認錯，我不可能，因為事情是你搞錯了。難道我也跟着說，布哈林等都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都應該殺，殺得很對。我能講這種話嗎？不可能。我是被逼上了梁山，除此別無他法。反駁要的是根據、是事實，如果沒有材料，沒有理由，我也無法反駁。中紀委收到，有沒有看的？我估計可能有人看，看了笑笑，你們那些扯皮，我們管，一天不幹事了？

第六編



在我一生中，可以說是純偶然又偶然的原因，我跟張聞天、康生、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這五個人都有過直接的接觸。和他們中的三四位有直接接觸的人，可能有一些，但同時跟這五個人都有直接接觸的，我估計很少。我是個甚麼呢，一個高中一年級學生，水平低得很，確實是由於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在他們幾個領導下工作過。這個領導，不是他在上面作報告，我在下面聽，基本上是有一點個人的面對面的關係。這個歷史確實是由於極其偶然的原因。為甚麼要反覆說呢？不然就會說這是故意抬高自己的身價。要這樣說，我當然也沒有辦法。我只是想借此機會談談我對這幾個大人物的印象，而人們對這幾個人都是很感興趣的，我談的印象是比較平常的，不是在光環下，神壇上，或者地獄裏的，就是在相對平常狀態下獲得的印象。

第二十九章 張聞天：有才有識，大公無私，樸素謙遜，但是比較軟弱

在遵義會議中的作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突然出現一個問題，說張聞天的職務不是「總書記」，是「總負責」，根據是陳雲寫的一個甚麼東西。這個事，若干年來爭論很多，若有其事，大論特論。其實總書記這個說法，是從西歐一些政黨那裏來的。西歐的不僅僅是社會民主黨、工黨，其他政黨也有這種情況。「書記」是我們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秘書之類的。「書記」，在中國古代另有含義，就是秘書，管行政上的文案事。我們譯的西歐那些政黨的總書記，就是相當於執行秘書，而且他們的總書記是事務性的，多半一年換一個。現在西歐各國的黨，不管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還是社會民主黨，還是工黨之類的，有的叫主席，有的叫總秘書、總書記，隨便你怎麼翻譯，總之總書記根本不是最高領導人的意思，大體上是當年的聯絡秘書的意思。列寧要斯大林出任總書記的時候，即辦公室主任、秘

書處主任、聯絡主任這一類的意思，所以，一直到最後，斯大林並不稱自己是「總書記」，而只自稱作「書記」。但後來在中國，總書記變成最高的權力無限的、自然也就威望無限的神化人物了。很多人就不願意講張聞天當過總書記，只說他是「總負責」。其實按照中國人的習慣，總負責才是真正重要得多，總書記本身並無負責一切的意思，而「總負責」則字面上已十分明白了。

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時，張聞天並不是紅軍，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但他是個緩衝人物。博古他們跟毛說不來，張跟毛沒有甚麼矛盾，而且他個人和藹，水平比較高。遵義會上，博古作了總報告。站起來全盤反對博古的，確實是他。而他的長篇發言，這些年來有各種各樣的說法，說毛主席告訴他講些甚麼，他就講些甚麼，專講別人的話。這可能嗎？他的發言現在還在呀！那個發言很長，他不是個戰爭的指揮者，但是，他是學習了一些東西，有自己的體會的。所以，他的反報告，既有毛的關於戰爭的想法，恐怕還要看到他在根據地觀察了兩年多，有他自己的體會。自己沒有體會，別人告訴他，他可以發言，講幾分鐘，十分鐘後，還能講甚麼呢？他那個發言，在軍事匆忙當中，還能你看我看，大家改嗎？他的稿子不能用，還能變成決議嗎？所以根據一般的常識來講，他的發言，不可能是毛一字一句告訴他的。《張聞天與遵義會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第一篇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共十九頁，應為一萬四千字左右。這個決議也就是會議上的報告。決議註：「這文是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所做的報告。」所以，現在來講，報告與決議就是一回事了。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的作用就大了。大到甚麼程度？經過這麼多年專家的研究，他在長征中

的作用在慢慢增長。他名義上是總負責，他能召集大家來開會，他能夠讓毛把各方面軍事正確意見講出來。前不久，中央十頻道王樹增講他的紀實文學《長征》，材料較簡單，有一點很特別，他明確講一方面軍是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領導到達陝北的。過去似乎從沒有人這樣講過，從沒有人把張的地位放得這麼高，說他是「跟着走」。「跟着走」，就是不起作用。我們總是把一方面軍當做長征的總代表，這裏把他的名字正式擺在第二名，這當然是某個研究者的意見。但是允許這樣，並見諸電視，就很不簡單了。抗戰後沒有這樣提過，都說是毛領導，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延安，從來沒有說在長征中張聞天有甚麼作用。我想不同意王樹增這種提法的人肯定很多。他能夠這樣說出來，光是他一個人也不一定有這個膽量。但是我肯定，有人堅決反對。當然，他這個提法對不對，我也有些懷疑。因為把張放在周恩來之前，是不是對，可以考慮。總理在長征中，在關鍵時期，即過草地的前後病得很重，是上天為我們把他保存下來了。

西安事變，最早主張全面和平解決的是張聞天

西安事變後，十三日，中央在陝北開會，當時沒有多少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甚麼事都是由他們四人決定，博古仍然保持政治局常委地位，甚麼重要的事，他還是參加決策。

打倒「四人幫」後，我從上海辭海編輯所回到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個張聞天文章的選輯小組。後來，這個小組成為中央特設的了。我時常跟這個小組聯繫，因為張聞天是我的老師。他

們寫到西安事變這一段，跟傳統的說法不一樣，他們說，是張聞天在會上發言，明確一開始就主張和平解決。而傳統的說法是，一切都是毛主席定的。我問他們，有沒有檔案根據？他們說，我們看了西安事變兩次會議的簡單記錄。我說，檔案館的記錄。你們說你看到了，他問你，在哪裏呢？你就抓瞎（沒有辦法）了。我問他們這檔案有多長，他們說不長，零零落落的。我說，如果要讓你們寫的觀點保存下去，不怕追究，你們必須要把有關的記錄全記下來。他們覺得我的意見對。我說書呆子解決不了問題，這是個政治問題，將來說你們造謠，你我大家一起吃不消。當時開會是張聞天當主席，是靠後發言，張聞天講的最根本的一句話是：我們中國要抗日，局部的統一戰線是不行的，必須由局部擴大到全國才有可能，要承認南京政府正統才行（大意）。就是說，中國要抗日，不是依靠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這三家在西安就能成事，一定要全國，首先要包括南京政府，包括蔣介石，沒有蔣介石參加的統一的全國力量，抗甚麼日？張學良幾萬人，共產黨的力量更少。因此張主張和平解決，團結抗日。

博古作了兩次發言，第一次發言，似乎要武力解決，第二次，在張聞天講了後，他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同意張聞天的看法。博古這個人，過去的錯誤就是年輕。有啥稀奇呢，地位高了，犯錯誤影響大。總理的發言也好，承認南京政府出面領導抗日。

我現在可以明確地講，西安事變，最早和最明確與堅持主張和平解決的是張聞天，明確得很。這個歷史改不了了。張聞天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因為他主持的時間不算長，不怎麼引人注意，但他遇到的都是最大的問題。現在的電影、電視演此事的時候，張聞天在會上若有若無，不

知道他是幹甚麼的。

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首先提出應有繼承的因素在內

一九三八年，張聞天在陝北公學作了〈論青年的修養〉的報告，在抗大作了〈論待人接物問題〉的演說。這兩個東西，當時全文在延安都登出來了。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時候，他講的這兩個問題跟人家的不大一樣。在〈論青年的修養〉裏，強調青年要有修養。他說的青年修養，當然主要是講革命的意志等。〈論待人接物問題〉，這個講話就很怪了，全是講繼承中國文化的。他引用了很多諸子百家的東西，從這個講話可以看出來，他的準備比較急。他是讀過這些舊書的，但系統上、思想上似乎還沒有那麼清楚，主要引用孔子、孟子等，文章不是很順暢，有一點硬，顯得是急時抱佛足。但他以共產黨總負責人的身份，在戰爭高潮的時候講個人道德修養，講繼承中國的文化，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講，實質上，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第一個較系統地提出要接受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人。他提出中國文化不能片面地打倒，要吸收其中的精華，因為我們一直是打倒，把孔子、孟子罵得一塌糊塗。這時共產黨對外公開了，成為全國性的大黨，威望蒸蒸日上。他對這個問題不能不表態。他直接表示，我們要接受中國文化，要接受中國文化中最優良的東西。對這兩個講演，當時我也不大懂，只覺得抗戰這麼緊張，講這些東西幹甚麼？這只能說明我的程度很低。這兩個東西，不僅在青年裏邊，在延安領導層也不受重視。但歷史證

明張聞天的眼光很高明。在此關頭，中國共產黨不能再以反對一切舊文化為己任了。

一九三九年初冬，黨中央決定開一個一百多人的文化大會。開會之前，中央內部就討論過抗戰中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開始提出了三個特點：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後來周總理提出，還要加個「民主的」。這個討論，毛同意四大特徵。我以為，這樣的一種提法到現在還是對的，以馬克思掛帥，也離不開這幾個特徵。但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長篇文章——後來題目改了，叫〈新民主主義論〉——把「民主的」刪掉了。毛主席的文章先發表，張聞天的報告後發表。但張聞天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張聞天仍是按照討論的決議寫的，還是提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有人說，大眾的就代表民主的，這就太牛頭不對馬嘴了。大眾的，就是表現通俗化的，是表現形式問題，它是不能代表民主的。所以，在中國文化民族發展方向上，張聞天應該是有重要貢獻的。他所堅持的東西，到今天還是正確的，而且今後還離不開它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在重慶發生了一個爭論問題，就是通俗的「民間形式」問題。胡風認為通俗的、民間的形式，內容往往是落後的，甚至反動的，它同「民主的」要求並不是一回事。這點上，胡風並沒有錯。

在延安馬列學院院長這段時間，我認為張至少不全是過

在延安辦馬列學院，他當院長，從一九三八年四月起，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取消，三年多一

點。馬列學院跟抗大、陝北公學不大一樣，馬列學院是小型的，正式學習幾門課程。

延安一整風，說馬列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這個問題怎麼講呢？當時，總的說來都是學習蘇聯那一套，一些提法，一些做法，確實是蘇聯那一套，而且是斯大林那一套。但這個事情不是張聞天的事情，他當時沒有那麼大的作用。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六中全會的報告裏邊就講了，說蘇共黨史是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你那樣講了，就照那樣做。因此延安以後學馬列主義就是學《蘇共黨史》，馬列學院自不例外。

我在馬列學院從開始到最後結束都在，那裏的情況，我是比較清楚的。跟我一樣從頭到尾待了那麼久的人，據我所知，只有三個人：鄧力群、李清和我。我跟鄧力群後來離開了。停辦後的馬列學院，李清還留下來，做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參加了改辦中央研究院。李清現在還在，他當過幾年交通部長。

馬列學院的六門課，可以說是有教條主義，是有相當嚴重地照搬蘇聯的東西。但有一點，這些課程使在那裏讀書的人的眼界開闊了一點，同時也培養了一批人。這些人不是簡單地打土豪，分土地，打倒國民黨，不是那麼簡單了，知識大大增多了。

如果馬列學院的院長不由張聞天當，也難，只有推給毛當。毛不願意當，毛不願意兼這些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只適合於張。張在延安比較穩定。王明、博古、周恩來，他們經常要到重慶去。張當院長這段時間，是過大於功，還是功大於過，我認為至少不完全是過。但整風後不提了，延安好像沒有馬列學院這件事。怎麼沒有這回事呢，李先念我們就同過學，我們同一個小

組，一個窰洞住了幾個月。像李先念這樣的老革命，農民出身，領導武裝鬥爭那麼多年，來學習是好事。馬列學院由張聞天負責辦，我只能說，作用是兩方面的，教條主義是一方面，但不是他有權決定搞的，教條主義歷來就有，從王明、博古那時就開始，不是辦了這個學校才有的，而且一切以蘇共黨史為準，也不是張聞天定的，而是毛主席定的。另一方面，馬列學院也培養了一批幹部。六七門課程學下來，希臘羅馬也知道一點，拿破侖也知道一點，沒有壞處。

一九四二年初起的農村調查

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團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號，天還沒有亮從楊家嶺出發的。我是這個團的一個團員。跟着張聞天在陝北、晉西北調查的情況，前邊已經講過。我的調查給他彙報，他很有興趣。他的調查報告解放後中央秘書處尚存，即〈米脂楊家溝調查報告〉，一九五五年，我在人民社把它要來出版了。

至少張在表面上也已捲入了個人崇拜的巨潮中

他一九四二年時在晉西北農村調查團的「七一」講話，看得出來，一方面是被迫的，一方面是自動的，因為沒有人逼着他講。這個講話太過份了，內容純粹是個人崇拜。他知道他的處境艱

難，因為沒有參加整風，延安有人說他是「躲風」，他必須表態。這個對工作團內部的「七一」報告，也是達到個人崇拜的極點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這說明張聞天的軟弱一面。他自動地，等於宣佈我完全放棄我的一切。我當時聽了，有點意外。現在看來，一點也不意外，他不能不利用這個機會對毛表態。

「文革」期間在六十一個人問題上的崇高表現

這件事情是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告訴我的。

「文革」期間張聞天被打倒，但沒有進監獄。這時，各種造反派、審查劉少奇專案組跑到張聞天的家去威脅他，要他講六十一個人辦理登報出獄這件事是劉少奇在北平個人決定的，陝北的中央不知道，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主要是證明毛不知道，強迫他承認陝北不知道這件事，他也沒有代表中央回過電。專案組威脅利誘的話講過很多次，甚至講，你只要澄清了這個問題，將來中央還是有你的位置的，送一個中央委員或者中央候補委員等。但是，幾次張聞天都堅決否定此事，說當時他是黨內的負責人，這些問題按例要以他的名義回電的。他堅持說，當時是他批准的，他回電的。他不便說其他人及中央，一人頂住。這樣重大的問題，任何人不可能個人決定，張又講究民主，當然是共同決定的。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檔案？我估計可能沒有檔案。電報的內容是通知劉少奇他們可以採取行動出獄，因為再不出獄，日本人一來就完了。在「文革」那種情況

下，很難原原本本講出來。張聞天只能忍辱負重，管你多麼嚴重，我一個人頂着，我不把這個責任推給劉少奇。劉少奇他們有這個建議，我是回了電的。他這樣就大大分擔了劉少奇的責任，同時也消除了陝北諸人的責任：我一個人入獄就是了。張聞天對夫人劉英說，恐怕要被捕了，準備入獄。最後充軍，弄到廣東去了。

這件事，張聞天個人的崇高的人格很使人佩服。抓就抓，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我不能在這時去害劉少奇，罪歸我一人就是。張聞天在共產黨裏邊是有崇高人格的，他的高風亮節，永遠是模範。

逝世早了三個多月，給世人留下永遠的悲哀

我提起這事就說不出話來，就淚流不止。張聞天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一號黎明在無錫病逝的，這個事太遺憾了，離開江青被捕還有三個多月，他沒有看見這一天。再晚一點，看見「四人幫」被捕不是好一點嗎？早去了三四個月。那時國事蜩螗，國家的希望在哪裏？他是帶着無限的痛苦離開人世的，令人痛心不已。他的一些學生，佩服他的一些人，都感覺很遺憾。對共產黨來講，把「四人幫」抓起來，是把共產黨的性命挽回了。我覺得他在七月一日去世，真是個悲劇。他的品質、道德，是很使人追念的。他不像別人，在知識分子裏邊，他確實沒有甚麼自私心。他是一個悲劇人物。

第三十章　有才無德的康生

知識廣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陳雲同機從蘇聯飛回延安。康生在蘇聯中共代表團中是近似於王明的一個人，政治局委員，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馬列學院教過我們的課，黨的理論這部份是他講的。他會講，有一句是一句，條理清楚，沒有一個字重複，很有感情。他給我們講課，舉了兩個人。一個外號「機關槍」，稱讚得不得了，說他會做地下工作。此人即後來的新四軍的政委，華東局的書記饒漱石。另一個叫「小開」，上海話叫小老闆，老闆少爺的意思，在上海似乎有三教九流、無不能交的意思，這個人就是潘漢年。陳雲講的黨課，也盛讚了這兩個人。

康生知識廣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幾乎無所不通。特別有研究的是中國的戲曲史。書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畫的畫，也很好，但他從不拿出來發表。他回到中國，用四川話來說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較精通中國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現你

有本事，你也懂得這些高級文藝，怎麼可以？所以一些領導人寫的詩，都不拿到《人民日報》發表。董老、葉帥這些人偶爾寫寫，只在小報報屁股上發表發表。

康生的知識展露出來，會引起很多麻煩。他精通的東西，有時候到了不能想像的程度。京戲他全懂，不但懂，還會打小鼓。小鼓是京戲樂隊指揮。樂隊指揮實際上也兼具表演指揮的某種性能。我親眼看見康生指揮過。一九三八年七月一號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紀念建黨十七週年，黨校要開紀念大會，請馬列學院的所有學員去參加，同時中午晚上會餐。黨校在延安城東十幾二十里，馬列學院在北門外七八里路。我們天不亮就出發，到那裏殺豬宰羊，大吃一頓。下午開會時，還有幾個美共青年參加。康生當主席，張聞天作報告，晚上演京戲《打漁殺家》。江青演女兒蕭桂英，演得很好。那時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歲吧。那個時候就知道，江青不但會演電影，還會演京戲。阿甲在《打漁殺家》中演父親蕭恩。後來江清把阿甲整得死去活來。江青當時跟毛還不是一家人，還是黨校的學生。康當時是黨校的校長，動員江青出來演蕭桂英這個角色，康生指揮樂隊。但這樂隊放在戲台左邊，用紗縵隔開，看不清楚。這不知是否中國舞台劇樂隊不放在正中的開始。一九八零年我有次到廣西開會，遇到那時黨校的人，也是馬列學院的同學韓世富、李成鐵。我問，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們說，確確實實是康生。說大概準備了個把月，他們早就看過了。但是，那晚我本人並未看清楚，因為那晚的樂隊反常地放在舞台右面用布擋起來了，所以我還不是真正親見。

康生一輩子工作緊張，甚麼時間去學這些東西的呢？他在上海地下黨，管「特科」，更緊

張。在蘇聯住了幾年，估計關於中國的書看得多一點，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裏學的？說明他是何等聰明。領導我們土改的時候，他還給我們講京戲。他問我們，你們懂不懂甚麼叫「水袖功夫」？他說，看一個人會不會演戲，戲的水平怎麼樣，看他出門水袖抖幾抖就行了。舊社會，「水袖功夫」這個說法很流行，比如說某某人的水平達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說好得不得了。我們青年中沒有一個懂。他給我們解釋，一個演員出來有沒有本事，看他一出場，水袖甩幾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功夫能看出一個演員的修養，特別是青衣，雖然是甩幾下，但這個人的各種苦楚，各種悲愁都表現出來了。所以康生這個人對中國文化，不是知道一點點，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給我們分析《西廂記》時說，你們只知道王實甫的《西廂記》，其實董解元的《西廂記》比王實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說一點，就哇哇背出一篇，讓我們聽哪個好。他對中國這一套的了解，怎麼來的？當然是自學的。他在蘇聯幾年，在延安那麼多年，他是用功的。這個人聰明得很，記憶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學搞革命，哪有那麼多時間來學這些東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識技藝如此高明，有些還具有相當難度，一般人甚至費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層，在背後，都知道他不佩服齊白石，他還另外刻一閒章「魯赤水」與之相對，並蓋在自己消遣的畫作上。問題是他的這種情趣看似高雅獨行，其實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夢求從公私兩方面奪取高級文物的卑鄙劫掠行為，實在是太令人吃驚和可怕了。大約一九八零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張到故宮內某處秘密參觀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宮東北部一

個較小的很舊的院落。整個下午參觀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個，由一女專家作總介紹。女專家說，今天是看「四人幫」個人盜竊的國家文物。女專家的介紹很詳細，說被盜竊的文物，就是直接從故宮調出的，數量質量均以康生第一，陳伯達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張春橋沒有。這裏面沒有一件張春橋盜竊的東西，這說明張春橋頭腦裏只有整人害人的壞腦筋，徹頭徹尾的「政治掛帥」，他甚麼文化也顧不得要了。江青幹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憤和恥笑，她雖欲學「老佛爺」，但又上不得台盤，誰也想不到她會幹出如此小家子的惡霸事。她從故宮要了些毛筆，但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枝四五元從故宮正式買去的。我記得好像還看見過故宮打給她的收條存根。看到這裏，大家都罵：像個甚麼樣子！

康生這部份，我們也不過看看百分之一罷了。這部份是精品：康生是不會鬧江青這種笑話的。康生名下陳列出來的書籍是知名的中國戲曲專家傅惜華的藏品，應是全國第一了吧。康生他們把國家的、民間的「帝、封、資」文化積累都燒毀個乾淨，他卻用國家權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搶過手來。我現在談到這件事，自己都說不出口，因為丟了國格呀！你康生、江青是個甚麼身份啊！

康生搶的東西中，有一塊精美瓦硯，據女專家介紹——我的記憶可能不準了——大致說中國此種瓦硯，現存數隻，均已外流，在境內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這一隻了。還有半隻虎符，女專家說，是解放後在京郊發掘出來的，是非銅質的。據說，一般是銅質的，非銅質的至今仍只發現這一個。總之，是國內唯一的半個。這些說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識、廣學，懂得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廣闊的。

陳獨秀知道古學，但不精通這些東西。瞿秋白懂一點，似乎也不精通那麼多東西。

他是個害人狂

根本不用說，他是個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是在搞土改，是在以康生任團長的土改工作團。春節之前，我們到了山東境內靠近河北的黃河北面離黃河不遠的陽信縣，再到何家灣村（？），渤海區黨委就住在這裏。春節前後，不好下鄉，我們繼續住在何家灣。年三十晚，區黨委請康生吃飯，組織部長劉格平是回族，不能參加。春節正日，劉設家宴請康生，飯後，不過下午四時許，康生帶領全團人散步。散步中，康對大家介紹了劉格平生平，說他就是「六十一人」出獄時他堅持不出獄的。康生給我們講了薄一波等六十一同志是怎麼出獄的，清楚得很。全部是中央堅決要他們這麼做的。六十一個人出獄大概填了甚麼表，登了甚麼報，辦理了出獄手續。但「文革」時康生說他們全部是「叛徒」。

我們去山東土改之前，康生已經在山東一兩個月了。原來是鄧子恢在那裏管渤海區黨委的整黨（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個步驟是整黨）。鄧老沒有康生那麼厲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換，換指揮，換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康生在山東掃蕩了渤海區黨委。渤海區黨委書記，叫景曉村，當時比較年輕，三十幾歲，在當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曉村鬥下來，也

把渤海區的行署主任鬥下來了。

整景曉村的詳細情況我們絲毫不知道。但是，通過毛岸英，感覺到一些。四個人擠在一個小房子，在一個炕上。我們三個青年，于光遠，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個個子都不小。毛岸英從蘇聯回來不久，講話比較隨便。當時我們叫康生為康老。毛岸英說，康老整當地負責人太粗暴了。「粗暴」兩個字，是我現在用的，因為我們習慣用這兩個字，毛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用不用這兩個字，我記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怎麼能這樣整人呢?!我們三人對小毛（毛岸英）說，在這裏講講就算了，出了這個門，可不要再講了。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說了，他開了一堆名單，黨的中央委員會、民主黨派的人物，他把這些人害得很慘。不說別的，我舉一個例子，他的秘書凌雲。他在延安棗園社會部的時候，凌雲就是他的秘書，這個秘書不是一般的秘書，是很重要的秘書。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東去，凌雲也是整個土改工作團的秘書。他很相信凌雲，但他把凌雲抓起來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見到凌雲。我說，你「文革」期間被關了十多年，你怎麼會被關呢，康生還不知道你？凌雲說，就是康生幹的。我奇怪，問，康生要抓你幹啥?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確實覺得於公於私，康生都沒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雲舉了一個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軼歐——我們叫曹大姐——兩個人在濟南不知道甚麼原因鬧得非常緊張，康生去青島休養，曹在濟南精神不正常。凌雲把曹軼歐照顧得很好。凌雲說，結果我進秦城也是他提出來的。凌雲沒有詳細講。我說，他把你捉起來幹甚麼呢?你又不是老資格，（按：抗日戰爭前後那兩三年入黨的，一直不算

做老黨員。）關你甚麼呢？

為甚麼他要迫害人，目的是甚麼？是從蘇聯學來的，這是一方面。但在中國，不如此就不行麼？所以，他始終採取這個辦法，硬是把自己保護到底了。

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絕不糊塗

這個人的頭腦是很清楚的，絕不是個糊塗人。在個別的情況下，他能夠聽人家反映真實情況，而且能夠容忍。這就是我本人。這件事，凌雲現在還在，他可以側面證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晉西北土改，康生是團長，我是團員。七月間康生在晉西北開臨縣郝家坡會議，我列席。這個會議的情況，前邊講土地改革時我已經講過。我們當時的情況，跟他在晉西北強調的大不一樣，做法也大不一樣。但我彙報會時，他聽得進去。如果他聽不進去，反過來整你，說你右傾，我就完了。這件事說明，他心裏邊並不是個傻瓜，他心裏明白。我講的時候，他沒有反駁，彙報的時間，連他講話至少一個小時。

這次彙報，是他先給我講。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講過。因為講出來人家不相信，說你宣傳康生，但那天的情況就是這樣。是凌雲白天通知我康生要聽我單獨彙報。彙報是在一天晚上十一點鐘後開始進行的，這時他開始吃晚餐，因為下半夜還要工作。彙報時，他把他那裏的工作先向我講了好久，弄得我誠惶誠恐。沒有辦法，人家那麼高的地位，只有聽完了再彙報。

臨走前，晉綏分局組織部長，朔縣組長張邦英教我說，地難分，你帶點沙地去給康老看。張的黨內鬥爭經驗多了，給我先出了這個主意，我哪想得到這些？

我知道我的話難說得很，帶了舊報紙包的三包土和一包糠窩窩頭。第一包是沙，我說這個沙佔全村土地面積百分之九十以上，每人可分十幾二十畝，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質，不全部是沙，這佔全村百分之六七。這一來，就是百分之九十幾了。第三包是半沙質土壤，沙佔一半，土壤佔一半。這個在全村中大約只佔百分之一二。要種田，只有種這樣的田才有收成，而且還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裏的水來種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處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兩個水井，一個甜水井，一個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沒有澀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鹽鹼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這個水，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簡直是天老爺賜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澆灌，一畝地照樣打好幾百斤，上千斤都辦得到。我彙報時說，我們不但分了地，還訪問過得地群衆，但基本上沒有興趣，因為中農本來有相對好一點的一點土地，結果拿出一二分地「調劑，調劑」，返回他五畝沙地，實際上是他吃虧了。我又把糠窩窩頭（當然是當天又重新發脹了的）給康看。康問，是老百姓吃的？我說，老百姓不全是，有很多是。因此，那地方現在對分土地毫無興趣（朔縣是新解放區）。我這兩手很厲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衛工作的，第一條就必須精明。不帶些東西，憑我的身份，敢說甚麼呢？我這個彙報，康生聽得很認真，可能認為你這個年輕人，竟知道這樣來彙報。如果盲目說，也解決不了問題，因此那天晚上他沒有整我。以後對我的看法也可能

由這晚定下來的，可能覺得你這個人不是隨便說話的。說白了，就是印象不錯。其實，沒有老前輩張邦英指點，我還恐怕真會出亂子。

那天我彙報情況說，我們那個村沒有地主，只有兩個「富農」，並且講了詳細情況。他們是富裕，但是不夠富農條件，因為他們根本上是自己勞動。他說，你這個書呆子。僅僅封你個「書呆子」，這就不簡單了，只是叫你回去對這二戶「掃地出門」，滿足貧僱農的要求。我也這樣做了，明知其錯還是做了——現在追不回來了。這件事，說明他的很多議論，跟他的內心並不是一致的。他知道這些客觀情況之後，他還是非要往「左」不可。甚麼原因，現在怎麼說呢？他無非是背後是一套，當衆是一套。當衆這一套是為了自己過關，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

康生並不因為在晉西北的土改，我給他彙報的情況，我們那裏執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就把我看成是反動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島去治關節炎，經過濟南，到山東分局組織部報到。那時，他的夫人曹軼歐大姐是組織部副部長。我去後，康生叫我留幾天。他叫我到他的小辦公室，看他刻的各種各樣的圖章。他還給我看濟南國民黨總司令王耀武的圖章，還蓋個印給我看，說，還大方。我理解，他覺得你這個人還不是一個完全沒有頭腦的人，雖然我比他年輕二十多歲。

他說，我來濟南這麼久，大明湖還沒有去過。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

天，他們夫婦、淩雲（當時是濟南市的公安局長），我，安排了一條船，就在大明湖那裏游來游去。不僅如此，他還帶大家上岸看王耀武出走的那個堤防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堤防攔着。我們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個普通黨員，一個政治局委員。我這次去，他優禮有加。他原來不認識我的，而我在晉西北彙報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為甚麼他當時沒有把我當成敵人打擊？這說明他的內心世界跟外表表現出來的並不一樣，我老早就感覺不一樣。

一九六零年六月間，我去了上海辭海編輯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們單位的負責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單位奉命要編《蔣介石全集》，要我參加註釋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後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說，你走後，我看見康生。康生問，曾彥修怎麼樣？我說，到上海辭海去了。他說，怎麼不告訴我一聲？王子野對我說，他講這個話，我也不懂，告訴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麼必須告訴你呢？王子野說，算你走好了。他問你，看樣子不是要整你。當時他講了一句，叫他做做資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錄馬列講甚麼甚麼，供寫作組寫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樣子是指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參加寫作組，但寫作組需要馬列語錄，你可以在本單位參加提供。那種寫作組又沒有任何機密，空對空作戰，所以叫你去協助，一點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煩了。

我提這些，主要說明一個問題，康生是一個兩面派，不要只看見他兇惡的那部份，他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極「左」的、打擊一切的姿態，才能上升。但在背後，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實反映一些東西的人，並不會把你怎麼樣。他跟張聞天比起來，正好相反。張聞

天是帶點書呆子味道，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的中國文化修養，反高於張聞天，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一輩子不發表一首詩，一幅畫。歷史上歷來如此。一個帝王，認為自己的詩好，書法好，別人再敢表現嗎？隋煬帝不是有個故事嗎？記不清了，好像就是因為一首詩的一句「空樑落燕泥」甚麼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殺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華的大臣。以後當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詩詞歌賦都懂的話，你只能裝傻。皇帝喜歡寫字，你寫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會作詩，你就要顯出你的詩不夠擦屁股的資格。如果你寫出來的比他還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歷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與唐太宗二人開明一點。他們允許臣下表現藝術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開明一些。

康生這個人，多才多藝，幾乎到了難以想像的程度，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政治道德墮落到了極端。另外，他又是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有些實際情況跟他講，他心裏知道。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文學藝術方面知道得這麼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現的剛好相反，知道文學藝術的人，一般都比較文雅，人格比較高尚，也總會有點表現慾，這是無可厚非的。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惡濁，非常暴虐。康生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一九六幾年他曾經是中央理論小組的組長。理論小組，就是意識形態，包括唱戲，決定權在他手裏。這時候，他有點像日丹諾夫了，但他的學識比日丹諾夫高明多了，在權力上還是比不上日。康生就是人格太差，為了保持自己地位，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點人格都沒有，甚麼革命人、共產黨人，一點都談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為戒。我還覺得他有點可惜。

第三十一章 陳伯達：才勝於學，學勝於德，德毀於位

不知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陳伯達這個人，可以說是個很聰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給我的印象是，才勝於學，學勝於德，德毀於位。好好的一個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後來變得這麼壞，甚麼原因？

陳伯達是以文章上了天，做過幾天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公佈的政治局委員順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陳伯達。但他怎麼又一下子跌下來，從九霄雲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變成了反動頭子，全國要批他？這經過，我一點不知道。不知誰能說得出來。陳的垮台，全國人民至今恐怕還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至今如此。因為當時我甚麼傳達都聽不到。

陳伯達說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大書生，但他讀書卻不太用功，懶得很，就是文筆好。佩服而又知道他一點的年輕人，無顧忌地說他「懶」，即不用功，不苦讀，靠聰明。這不是秘密，知道的人很多。他讀的書並不多，靠聰明。陳伯達不是個政客，他並不想當政客，當政客就要活

動，要到處跑，要講話，他不會這些。他正式講話，五分鐘都困難。在延安，我覺得他只想當個政論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來，全黨注意，全國注意，他就十分滿意了，弄兩個稿費買雞吃。問題是，不可能允許你這樣一個專門寫文章的名流存在，不與政治結合起來，你的文章就發不出去。因此，陳伯達在延安必須服從當時的政治需要，離開了這一條，他就一點用處都沒有了。因為他講的福建話，很難懂，跟人家談不起來。一九四零年，南洋僑領陳嘉庚訪問延安，開歡迎大會，陳老先生講話，陳伯達翻譯，從頭到尾不知說甚麼。他們是同鄉，別人翻譯不夠格。我在場，大家惟有鼓掌而已。陳唯一的任務就是奉命撰寫當時最重要的，用現在的話來講叫時尚論著。他的一生，沒有一個字離開這個，而且他一生的文章，沒有離開最高的領導，是受命要寫的。他寫這種時尚著作，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他到《人民日報》，可以當場寫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文章，在我看來不是陳的風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這樣的文章不經過別人看就發表出來，我有點懷疑。他這篇文章應是早有的，或是帶了原稿，或者背下來的。想想看，如果錯了，他陳伯達有幾個腦袋？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無法無天的緊急總動員令，這個口號是顆炸毀全國的原子彈，誰不吃驚？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是要把全國打得稀爛。歷史證明，這個文章一出來，實際上陳伯達的歷史作用也就完了。這個橫掃其實包括了他在內。他的作用發揮到了頂點，因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後，就沒有可以再掃蕩的東西了，打倒完了嘛。就是說，今後就沒有委託你陳伯達再寫加碼的專文去掃蕩甚麼了。以後打倒劉少奇也好，打倒其他人

也好，都是等而下之的新人物寫的，不需要你陳伯達寫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組長不久，江青就代替他當代組長了。用中國話來說，狡兔死，走狗烹。他這篇文章一來，把已經打倒的，正在打倒的，準備打倒的，都掃光了，話已說到了頂，無可加碼了，因此陳伯達的作用也就沒有那麼大了。而要專挑小刺，陳伯達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遠了。

所以，不是一九七一年廬山會議批評他後，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這篇文章以後實際上就不重要了。不僅如此，這篇文章以後，他的活動，反而變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說他是在為林彪服務，破壞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頭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裏指揮，陳伯達也根本不大會做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對陳左一聲老夫子，右一聲老夫子。其實是挖苦他，輕視他，說他除寫幾篇文章外，無用了。你叫他做行政指揮，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揮他的秘書，替他收集資料，他來寫書。陳伯達要是離開了柴沫（行政秘書）、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陳真這五個人，他就甚麼官也不會當，甚麼書也寫不出來了。

一九七一年中央在廬山開會，準備打倒林彪，毛主席下山後到處講，準備打倒林彪。在這個會上，爭論的東西叫滑天下之大稽，今天提到還叫人笑。這個會上，林彪、陳伯達反覆稱毛主席是天才，是偉大，林彪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設主席，毛主席說不要設。這就發生了「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有個象徵性的元首，你中共中央的主席，人家總統來，你怎麼辦，以甚麼身份去接待人家元首？所以這個元首，堂堂一個大國，不管有沒有實權，總是要有的。毛主席

主張不要，而且還寫進憲法裏。別人也跟着叫不要嗎？你不要腦袋呀，誰也不敢。所以陳伯達等非要設不可。

陳伯達照例講偉大，毛一下不知怎麼的，對偉大厭煩了，一下忽然不要了。是不是真的不要呢，一直到他去世，四個偉大沒有取消半個。陳伯達為了堅持「偉大」「天才」等犯了罪，嚇得要死，到處找證據，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也講了「偉大」、「天才」等，印成書。這可證明陳伯達最終還是有些書呆子，他以為找到馬、恩、列、斯他就可以平安了。

陳伯達為了設國家主席這一條，把在北京的史敬棠叫去了。史敬棠坐專機飛到廬山，幹甚麼呢，代陳草擬在憲法中起草設立國家主席這一條，就幾個字，滑不滑稽？

後來反林彪，反陳伯達，出了幾本材料，把史敬棠的手跡也弄上去了。史敬棠比我大幾歲，一九四一年我同他住一間小窰洞。十幾年前我問史，陳伯達為甚麼要叫你去？那幾個字他不會寫？他説，你還不知道嗎，陳伯達就是這樣，懶得很。我説，再懶，就寫幾個字，這麼一條一款都寫不出來麼？他説，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硬是要我代他草擬。我説，不可理解。難道陳伯達老早就知道，寫這一條要犯死罪麼？犯了法，拿你去充罪也不夠份量呀。後來史敬棠在林彪、陳伯達事件中，進沒有進監獄，我沒有問他，但是他被隔離審查了多少年。

從此，陳伯達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團頭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不過大家不大懂，也沒有怎麼批陳伯達，因為一批就要走火，説偉大、天才等等都不對，哪個敢説？

陳伯達的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進城後不久，一下子就成為被一些人諷

刺挖苦的對象了。甚麼原因？我一點也不知道。一九五一年五月初開全國第一次宣傳會議，我的座位在前面，但我跑到最後一排空位去跟宣傳部幾個我認識的人閒扯。這幾個人進進出出的，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一天，陳伯達在上面講話，這幾個人就說開了。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不會講普通話，他講話，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普通話。他有個口頭禪：我是一個「小小小學生」。但用他的普通話講出來就是：我是一個小猢猻。「小猢猻」就是小猴子的意思。後面幾個人，有田家英、于光遠、黎澍、王宗一、王惠德，這幾個人我都特別熟，這幾個人還有個特點，說話都比較隨便。陳伯達在台上講了二三十分鐘，哪曉得首先就是王宗一發難。王宗一講話相當尖銳。他說，呵，呵，你看這傢伙，又來了，又來了。其他幾個人跟着就挖苦。我覺得奇怪，暗想，唉呀，我才離開北京不到兩年，過去陳老夫子的威信那麼高，怎麼一下子把他作為訕笑的對象了，一下子變成「傢伙」了呢？當時我感覺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個別人對他，而是宣傳部那麼多處長們都把他作為笑話。甚麼原因呢？我不敢問，現在也不知道。如果沒有突出的表現，我想這些人不會這樣幹的，特別是田家英，跟他關係非常好，長期做他的寫作的助手。于光遠更是個道德人，決不會隨便笑人的。

我想，陳伯達這個人的虛僞，到了被人家發現的時候，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這些人一下子看不起他，說明他的威信已經完全沒有了。當時我就有一個感覺，為甚麼上面和下面對一個人的看法會完全不同？這個時候，陳伯達的地位是在不斷上升中。但是，跟他接觸多一點的人，卻這樣看不起他，這些人裏邊，據我所知，除了于光遠，過去對他都是非常尊敬的。于光遠為甚麼

不那麼尊敬他呢？陳伯達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過很長的文章，叫《中國地租概説》，我沒有讀過。于光遠看過後發現陳伯達沒有讀過《資本論》一卷。《資本論》很多人都沒有讀過，這不算稀奇，因為一九三八年才算正式翻譯過來。但是于光遠發現，陳伯達連第一卷都沒有讀過，因為第一卷早就有中譯本。于光遠應陳伯達之邀，跑到楊家嶺去找他，陳伯達很客氣，表示感謝。結果，于光遠發現他印書時，一個字不改。

除了于光遠，在延安時，其他人對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一九五一年卻都挖苦他，我不相信會毫無根據。現在于光遠還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與陳伯達的關係

我跟陳伯達的關係不多，有一點點直接的個人關係。延安一九四一年夏天，也就是開始整風前，他好像並沒有甚麼固定的職務，就是以一個重量級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據説他曾經是中央黨校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話，也是掛名，他不大管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甚麼單位負責，都是個甩手掌櫃。那時，他跟一些人長期住在延安馬列學院山下面簡陋的幾間小平房裏，他們既不上課，也不學習，也不開會，就是住招待所。有徐海東、譚余保、陳伯達、丁玲、高士奇。估計他們的生活由馬列學院照顧，大概他們的生活比一般的學員高得多。我們看見他們，恭恭敬敬點點頭，其他沒有甚麼。當時看不出陳伯達在幹甚麼，可能在寫書吧。或者就是

《三民主義概論》。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飛機第一次炸延安，我進城買書，當時延安有幾個窰洞賣書的，我們一個月領兩塊錢，買書的話，薄薄的可以買四五本，陳伯達也跟普通人一樣進城買書。我沒有看見他。人很多，日本飛機第一次狂轟亂炸，我往東跑，跑到城門洞裏堵住了，回頭看，炸彈炸的火燄一兩丈高。陳伯達受了輕傷，馬列學院幾個同學把他抬回去。抬的人當中，有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余宗彥。我講這件事是為了甚麼呢，說明陳伯達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還是一個比較著名的普通文化人。

陳伯達在一九四一年四五月前，主要是寫中國古代諸子百家研究的文章，當時不大具備條件。他發表了好幾篇論文，聽說好像有些文章的原稿是毛主席看過交給張聞天發表的。這些文章在戰爭時期沒有起甚麼作用，延安都沒有甚麼人看。我都看過，但等於不看，因為我的基礎太差了。我記得他有篇小文章叫〈論楊朱哲學〉，楊朱的哲學在先秦留下來的材料不多，孟子曾經罵過楊朱：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一般學馬克思主義的人，簡單認為楊朱哲學是個人自私哲學。但陳伯達和孟子的提法不一樣，孟子認為，為我，而不為他人利益是不對的。陳伯達講，楊朱哲學在當時有他的進步性，他代表的是新興的工商業者的利益。工商業不講利講甚麼呢？發展工商業對社會是好事。所以他講，楊朱哲學中的「為我」，不要簡單地看，要看他的時代，他這種哲學，不是守舊的哲學，而是比較先進的思想。他的這個解釋，給我留下了較深印象。這究竟是他的解釋，還是引用別人的解釋，我不清楚。因此，當時我們十幾歲二十歲的青年對陳伯達的印象很好，認為他對先秦諸子百家也研究過，是一

個比較懂得中國古代的人，跟左翼一般文化人很不相同，認為他既是一個高級文化人，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的文化人。對陳伯達有這樣看法的，不是我一個人，在延安是較普遍的，不能因為以後判了他十幾年徒刑，就不尊重史實。

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零年，延安組織了很多研究會，是上面發起的，甚麼資本論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會，一大堆。我由馬列學院派去參加兩個研究會，一個是由陳伯達管的三民主義研究會，一個是由王明管的馬列主義研究會。我在三民主義研究會聽陳伯達東講西講，我們懂甚麼，就聽他講。他說，我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留學，他們都在研究斯大林、托洛茨基，鬥得個要命，我就研究三民主義。我為甚麼要研究三民主義？我覺得蔣介石是利用三民主義，而我們對三民主義一點也不懂。我們研究一下吧，你不研究如何批評它，簡單的罵不行呀！我們覺得他的思想比別人高得多，就聽他講。他說，三民主義這個東西，根本沒有辦法無條件反對，反對哪一個都不對。我們過去不懂，在上海的時候，對三民主義統統罵，實際上我們自己毫無研究。我們小青年一聽，又覺得他的見解比別人高明。他問我們，現在的三民主義，哪個重要？有人說，民族主義重要，因為抗戰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重要。他說，我們現在應該強調民權主義。為甚麼呢，民族主義，現在戰爭已經打起來了，全民抗戰了，也算在做了。民生主義，現在抗戰大家都苦得很，強調改善民生辦不到。過於強調這個東西，國民黨、蔣介石會說你是在挑起階級鬥爭。我們現在就要強調民權主義，就要民主，把蔣介石的獨裁削弱一些。這樣一聽，覺得很有道理。當然，強調民權主義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是中央的決定，當時中央說我們講三

民主義，但強調民權主義。經過陳伯達這樣一分析，覺得他的思想比較高，對他是相當崇拜，所以，對他不是一般的尊重，而是非常尊重。

延安時期，一九四一年夏起，他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個研究人員，我是在經濟組。中央政治研究室是怎麼來的呢，後來不大講了。一九四一年五月間，毛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強調反對主觀主義，說我們今後的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調查研究上。毛一下成立了一個很大的「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他當局長，任弼時當副局長，下設三個機構：中央黨務研究室，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敵僞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毛兼主任，陳伯達為副主任。毛兼主任是聽陳說的。陳素不管事。這件事沒有開過成立大會，也沒有甚麼文件，具體的內容是陳伯達告訴我們的。政研室的人，現在還在北京的，據我所知至少還有七個人，包括鄧力群等。陳伯達這個副主任，是掛個名，甚麼事都不管，埋頭寫自己的文章。陳伯達對我們的影響就是「個人講學」。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們拿着櫈子到他的窰洞裏聽他漫談。

陳伯達住一個窰洞，裏邊有一個小坑，他躺在坑上。我們二十來歲，他已經四十多歲，是老前輩，胖胖矮矮的，很隨便。窰洞裏邊最多能容十多個人，擠不進去，我們就在外邊聽他閒吹。他甚麼都吹，天上，地下，無所不吹。有時候，他會講一些毛澤東跟他談的事情。在延安，毛澤東窰洞的座上客有誰？公事以外可以隨便談談的大概只有一個，即陳伯達，我不知道還有第二個。周恩來、朱德是談公事，陳伯達不談公事，陳伯達去是聽毛閒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閒聊。陳伯達這個人看書雜，思想也活潑，有時候叫他去。陳伯達對我們講，毛主席說，曾國

藩家書是好東西，應該讀。而過去，共產黨把曾國藩罵得狗血噴頭，還會讀你曾國藩的書？陳伯達也說，曾國藩的家書，文字非常漂亮，內容非常實際，這個書讀了沒有壞處。一般的馬列主義者，不僅是我們這些青年，那些四十來歲的入黨一二十年的，一般對中國的文化是一筆抹殺的，罵曾國藩罵得更厲害。陳伯達有一次講，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說，毛主席這個意見很好，完全強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辦了。對我來講，能接受，到現在也接受，覺得毛講得對，應該堅持。「自然而然革命化」，毛大概在延安沒有多講，所以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因為，共產黨在三十年代，在王明等人領導下，一天到晚反對「尾巴主義」。陳伯達跟我們講，我們聽是聽，但不敢宣傳，因為不是直接聽來的，如果說毛主席沒有講過，怎麼得了！但我對此印象是很深的，因為這跟我們過去學來的、聽來的不一樣。毛在這些問題上，有過非常正確的思想，但他後來不是這樣做。強迫農業高級合作化，強迫建立人民公社，每年跳升，有甚麼自然而然呢。

總的說來，陳伯達在延安時政治地位不是很高，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是威信高於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遠遠高於周揚這些人。當時延安的黨內黨外文化人加起來恐怕有幾百個。

我在政治研究室待了大半年，一九四二年初叫我參加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團。這事是怎麼來的，我全不知道。

陳在延安整風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風應該從一九四一年毛主席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算起。大概在一九四二年前後，陳伯達寫了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在建立毛澤東的絕對崇高威望和地位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因為這是把黨史翻了過個。現在不提它們了，不符史實。實際上，延安時我們是學此二文很多的。一篇叫〈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有一篇叫〈十年內戰時期的革命與反革命〉（此書在解放後出單行本時可能更名為《關於十年內戰》）。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講毛主席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上半期已經認識到中國革命中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強調中國革命就是要發動廣大農民進行武裝鬥爭才能取得勝利。陳伯達講，在當時認識到這一點的，共產黨內，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因此，只有毛澤東歷來都是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的。

〈十年內戰時期的革命與反革命〉，反革命是說蔣介石怎麼統治，革命是說我們這一面。我們這一面，革命的範圍還是很大的，罷工、罷課、貼標語、遊行示威，都在裏邊。陳伯達說，唯一正確的就是毛澤東在農村的農民土地革命。只有用這個辦法，才能把蔣介石推翻。而且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領袖。

兩篇文章，從理論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上從來就是正確的，是唯一正確的領袖。這兩篇文章，對建立這種觀點，起了無比重要的作用。我們這些年輕人，包括那些從監獄裏

出來的老同志全同意陳伯達。有些監獄出來的同志說，我們貼標語、喊口號，被蔣介石捉起來了好幾年，蔣介石怕你「示威」？統統抓起來就解決了，還是毛的辦法對。所以，陳伯達在延安整風，在擁護毛，說毛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正確的、最高的領袖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這兩篇文章當時大家擁護，事實上對我們這些小青年堅決擁護毛起了極大的作用。

蔣介石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當然是別人替他寫的，講將來要統一，要建國，要強國，一切歸國民黨領導，中國的命運，一切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掌握在蔣介石手裏，離開蔣介石，甚麼都不行。陳伯達奉命寫一篇文章，評蔣介石這本書，名〈評中國之命運〉。毛主席也改過很多次。這篇文章很好，延安發表了，佔兩三版。陳達伯給我們講過，寫文章要學習梁啓超。他很喜歡梁啓超的文章。他講，梁啓超說過，寫文章筆尖要常帶感情，這樣的文章才能引起人家的共鳴。他寫文章就很注意這個問題。他的〈評中國之命運〉就是這樣，全文充滿了革命的感情。這篇文章不是簡單地反蔣，擁護共產黨。這篇文章我只看過一遍，現在還記得一點。陳伯達講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介石屠殺共產黨，講到蔣介石屠殺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話，好幾十年了，仍然記得。他說：蔣介石殺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連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讓人無比沉痛。我現在說起來還要流淚，這叫言有盡而悲無窮。陳伯達文章感動人的力量，在共產黨成立以來，恐怕也是難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評中國之命運〉，用在極壞的方面，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筆尖也帶感情，就是：殺，殺，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

鬼蛇神〉像個甚麼東西呢？就是要發動全國亂砍亂殺，極盡暴力煽動之能事。所以他說他的文章帶感情，從正面的例子看，是這樣，從反面的例子看，也確實發揮到了極點。為了這後一篇文章，「上帝」怎麼能赦免他呢！

中共在延安開了七大之後不久，大概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間，陳伯達來到了中央宣傳部，這時我已經調到中央宣傳部兩三年了。陸定一、陳伯達來任中宣部正副部長，這兩個位置好幾年都是空的。宣傳部就是散兵游勇，加上一些家屬住在那裏，跟一個招待所差不多。他們兩個來，帶了個秘書長丁華。這個秘書長也是個老前輩，同他們二人並不熟，同大家關係很好，成了我們的大家長。但是，他們來後宣傳部也沒有變化，仍沒有工作。陳伯達住在頂層的窰洞，只管寫他的書。他最著名的書，一本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延安出的，這個書是借袁世凱的名罵蔣介石，主要是說蔣介石是個竊國大盜。這個書後來的作用不大。第二本書叫《中國四大家族》，第三本叫《人民公敵蔣介石》。後兩本書是奉命寫的。他寫書有四個助手，沒有這四個助手，他恐怕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中國四大家族》可能是在日本投降前後毛叫他寫的，名字也是毛取的，助手是何均、陳真，這兩個人替他收集經濟方面的資料。陳伯達很聰明，歸納能力很強，編排資料、寫説明文字的能力比別人強。所以，他弄一弄，寫出這本書。這本書的內容現在來看完全站不住腳，即所謂「主題先行」。這個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國民黨時期的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簡稱四行兩局等的財產全算成了蔣、孔、宋、陳的私人

財產。除了這四行兩局外，國民黨當時還搞了許多國營企業，都算成了他們的私人財產。所以，「中國四大家族」就來了，説中國的財富就是他們四大家族的。

現在解放六十年了，證明這個論斷無法成立。陳立夫在政治上是最徹底反共，「政治掛帥」得很，並不怎麼弄錢。國民黨退到台灣後，他怕別人在蔣面前要求懲罰他，因為他的極端反共政策失敗了，離開了台灣。他後來到了美國，連吃飯都困難。靠辦雞場生活。前不久，電視裏説陳立夫的孫子捐了一樣三星堆的寶貝給國家。陳立夫的孫子講，陳立夫囑咐，再怎麼窮，也不能賣，要拿回去捐贈。陳立夫是政治動物，是徹頭徹尾搞政治的，是拿官薪吃飯的人，他好像沒有多少錢。蔣介石的財力也清楚，他沒有甚麼錢。蔣介石是軍事政治動物，並不搞私產，宋美齡長期住在美國，大多是孔家援助的。陳伯達這本書，是先有結論，後找一些材料來拼湊，方法就錯誤。所以，費了那麼大的勁寫出來的書，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孔、宋不太清楚，蔣、陳有幾個錢呢？

《人民公敵蔣介石》這本書，幫助收集材料的人有兩個，一個田家英，一個史敬棠，他們多年替陳伯達收集各種材料，偏於收集政治材料。田家英的文筆好，實際上許多東西是弄好了，交給陳，陳編輯編輯弄出來。《人民公敵蔣介石》，説蔣介石獨裁，反動是對的，賣國來講，現在要更實事求是一些了。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他也是要抗日的。

這兩本書，當時是起了大作用，我們反正相信。但是，〈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十年內戰時期的革命與反革命〉這兩篇文章，才是奠定陳在黨內權力的基礎，才是奠定陳在領導人

面前的政治地位的基礎。而我們在整風中也確實認真地學習了這兩本冊子，而個人崇拜的基礎也被這兩本小冊子打實在了。

一個很有才情的人，最後成為一個反革命的頭子，確實是一場大喜劇

陳伯達還喜歡寫毛筆字，他寫毛筆字也是個天才。他不多練字，但寫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瀟灑。他的幾本小冊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寫的。那個時候，我們都很佩服。

在他下面的青年，經常看見他的，都說他懶，陳並不刻苦用功，同其他人不大相同，但他確實有天賦。一九六零年我調到上海辭海編輯所幾年後，晚上有些專家閒扯（聊天），我坐在旁邊聽。他們扯到中國的書法。有人講日本有人評論，中國現當代的書法家有三個半人，第一個是毛澤東，第二個是康生，第三個是陳伯達，還有半個，是多年鼎鼎大名的書法家沈尹默。他們說，毛澤東、康生、陳伯達的字，都有特點，個人創造性都很強。沈尹默雖是書法大家，但個性特點不夠突出，所以只能算半個。這種說法可能是胡扯，可能也不是毫無道理。我是外行，不敢胡說。

陳伯達這個人，留下的教訓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沒有去做學問，他完全為了當時的某種政治的需要服務，只要是這個需要，他個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書籍來響應，改造歷史事實來發揮他的論點，而不是把自己的歷史論點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所以陳伯達的一生，雖

然寫了那麼多東西，今天看來，在學術上有根據，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陳伯達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值得所有弄理論史學的人引以為鑒。陳伯達之所以會這樣，因為人聰明，但沒有很切實的真才實學。如果他要像黨內的其他學者，像范文瀾一樣，一輩子研究學問，他的成就可能會比范文瀾這些前輩高得多（范有大實學，但後來被簡單的「階級鬥爭論」教義化了）。陳伯達的這一生，其實也不過像蘇聯的米丁、尤金、維辛斯基、李森科這一類的所謂學者一樣（不過，我認為陳比他們究竟高明得多，因為那些不過是幾把刀槍而已。），事情一過，東西全部無用，甚至是胡說八道。在學術上沒有真正的建樹。今天不管陳判沒判刑，陳的書的參考價值都還有，但不大。陳是一個喜劇人物，不是悲劇人物。以陳伯達為鑒，可觀得失。

不過，在一切判刑的人當中，最令人嘆息的還是陳伯達，他不是張春橋、姚文元這類東西。他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後加入共產黨的。這一點，他自己是引以為驕傲的，他常給我們講，雖然話說得平淡。可惜，一個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只是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堅持事實，寫多少書都沒有用。在當時就有人看穿你這個東西不行，以後更會成為廢品。我作為晚輩也算觀察了這一類人七十多年，我現在覺得任何東西，凡是不合歷史事實的，隨便你怎麼講，有些當時就被人恥笑，有些最後要破產。我覺得，陳伯達留下的教訓非常深刻。一個文化人，一個作家，光趕時髦沒有用，最後還要考慮到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實，對不對得起中國人民。

第三十二章 陸定一：中年就被自己人捉捕，最悲慘，才、識，沒有得到發揮

幾乎一生都任宣傳部長，但留下的著作並不多

陸定一這個老前輩很特別，幾乎一生都任各種宣傳部長，但留下的著作並不多。他作為宣傳部長，不怎麼寫東西。他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交大讀書，讀的是電機之類，他的自然科學基礎很好，英語很好，看書、講話、翻譯都行，一九二五年就加入共產黨。一個讀純工程科學的人為甚麼要加入共產黨？道理很簡單，就是當時中國的情況，中國民族所處的地位，逼得中國很多最有思想而又願意做自我犧牲的人都覺得要挽救中國，只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的國民黨，在蘇聯及中共各種具體幫助下，剛改組成功了一年多，以後，中國到處都是共產黨員以跨國民黨籍的身份，出面替國民黨組織黨部。陸此時是否也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出來作共產黨的工作，我不清楚，不過一般是如此的。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為甚麼國民黨似乎還在共產黨之後才

在各地成立呢？但事實就絕對如此。一個真正有形的、具體的、有組織的、有黨員的國民黨，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尤其是一九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年「四一二」政變以前在蘇聯及中共幫助下組織起來的，現在的中國青年全不知此事了。我們縣裏的國民黨縣黨部就是共產黨替它組織的。這位老同志姓陳，後去蘇多年，我在延安拜訪過他多次，解放後被派回任宜賓地委書記。我這些話扯遠了一點，因為現在不僅青年不知道，即使研究黨史的人，也得不到那個時期的那種親切感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翻天覆地的全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高潮，是誰掀起的？是誰具體組織領導的？確確實實就是共產黨，全國如此，絕無例外。一個全國性的、有組織的國民黨，是誰幫它建立的？確確實實的歷史是：共產黨幫它建立起來的。我的年齡當然也未參與其事，但正遇到此事失敗後共產黨員在全國無例外地慘遭大屠殺的慘烈時期，所以清楚地知道那時的悲痛故事。下面我再把事情拉回到正題上來。

陸定一在一九二七年就任團中央宣傳部長。特別奇怪的是，一九二七年在漢口開的「八七會議」，一共才有十幾個人參加，陸也參加過，太不簡單了。這個會是共產黨在「四一二」後開的緊急會議，在會上，決定中國共產黨以後革命要走武裝革命的道路，決定中國共產黨以後要在農村發動起義，發動武裝鬥爭。這可是天大的變化，因此參加這個會應該是非常光榮的。但參加這個會的人倒並不都是共產黨的重要領袖，陸定一就是其中一個。他當時恰好到了武漢，以團中央的宣傳部長身份離參加黨中央開的緊急會議，應該說還差得很遠，但是當時不正常。鄧小平也參加了，當時論職務，鄧小平也沒有資格參加，還有個留法、蘇回來的鄭超麟，當時只是湖北省青

年團的宣傳部長，也參加了。我舉這幾個人說明，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黨的重要領導人。陸定一跟黨的一些老前輩一樣，也成了決定中國革命決策的參與人之一。所以，這個會看起來並不是甚麼有計劃的，是臨時的十分緊急的會議。當時共產國際派了蘇聯的一個小青年羅米那茲來參加，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陸定一在蘇聯待過一段時間，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從上海撤退到江西土地革命根據地，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這是個名義，當時並沒有多少實際的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戰後，八路軍開赴前線，他又任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下面政治部的宣傳部長。一九四一年他回到延安不久，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間，他又出任黨中央的宣傳部長，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被捕後坐了十二年牢，他一生，說來說去都是宣傳部長。但他一生並沒有多少著作。他不像王明、博古、張聞天，以及後來的陳伯達，甚麼原因，我說不出來。這跟個性恐怕有點關係，一點不好表現。

教我們的是政治，不大講技術

我對陸定一的印象比較好，因為他架子不大，也沒有那麼多神秘性，有時候還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訴部下一點點。比方，他同陳伯達在一九四五年六七間到中央宣傳部任正副部長，當時全黨還處於整風後期，實際上宣傳業務已經完全停止。陸定一在中宣部組織了一個黨史小組。當時大概是他自己想出來的，說要根據七大精神寫一部黨史。成員有三個人，張仲實、丁華（帥昌

書）和我。他給我們發了一套《兩條路線》，我們才知道一些事情。這套書一看，我們確實感覺到一九二七年以後，王明、博古、張聞天他們在上海的領導是盲動主義，宗派主義，打倒一切，甚麼都反，自己孤立自己。陸定一召集了幾次三人小會，全聽他講。他講「王明路線」，我心裏叫「喲」，沒有聽說過呀！又講一九三一年的四中全會是錯誤的，我們又很吃驚，因為以前說這個會是如何偉大，如何拯救了中國共產黨。他說，這些東西全部是錯誤的。我們的左傾盲動主義從這個時候就定型了，擴大了。他是在這個小組裏講的，我也不敢告訴別人。當時在延安這些東西還是非常機密的，儘管上面討論歷史問題已經兩三年了，我們下面一點也不知道。「王明路線」，當時不敢講，屬於高度機密。「王明路線」這個問題，延安時一般幹部並不知道，只看見王明、博古是不當權了，並不知道甚麼「第三次左傾路線」。

陸定一跟胡喬木在培養幹部方面不大一樣，田家英和我到胡喬木棗園編語文教材兩次住了三個月，那時中央正在忙於開七大，正在忙於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但是我們一點不知道。胡喬木確實做到了滴水不漏。

陸定一和胡喬木兩個人的領導作風很不一樣，胡喬木守口如瓶可以說是達到極點。陸定一要做甚麼事，會把基本情況告訴我們。陸定一似乎還對我們講過，所謂「鬥爭哲學」是國民黨反共派對我們的一種污蔑，馬克思主義哪裏只講鬥爭呢？

我講這件事，說明陸定一對幹部的領導教育跟胡喬木有點不大一樣，胡喬木教我們的是要講究相當完善的技術，陸定一教我們的是政治、思想，他不講技術。

進北京城以前，叫我做過三件小事

陸定一到中宣部不久，日本就投降了，這時他就忙了，中共中央發聲明、發文章特別多了。不久他就參加中共代表團到重慶開政協會議，他是中共八個代表之一。他從重慶回來後，對我們進行了一些傳達。不久他就離開楊家嶺中宣部，搬到棗園毛主席那裏去了。解放戰爭時期，陸留在陝北毛的身邊，一九四八年約六月，我從山東土改工作團回來，又在西柏坡見到陸定一。他仍然是中宣部長，不過忙於中央的事，部務不管，交與秘書長丁華管事。

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間，黨中央毛主席已經住在西柏坡，陸定一也住在那裏，我當時住在二里外的東柏坡。有一天，陸派個人叫我到他那裏，當時沒有多少電話。我去，看到黨中央在集體辦公，一個房子裏有楊尚昆、安子文、鄧穎超、李維漢等人。我去後，陸定一走出來說，進城後全部教會大學都要接管，教會大學是文化侵略最厲害的，培養的都是親帝國主義的人，這個欺騙上層的知識分子學校，絕對不能讓他們辦，一進城就接管。你去調查一下全國教會大學的情況，多大規模，哪些負責人等，特別要調查有中國負責人的學校，給我資料。

我到處問，附近沒有一個教會學校的大學生。我拿介紹信到南莊中央組織部去問有哪些人是教會大學畢業的。中組部一位同志說，我們也不知道。大家都知道黃華是燕京大學的，但他在哪裏，還不太清楚。一句話，不知道教會大學是怎麼一回事，連一個真正教會大學畢業的大學生都沒有找到。

陸定一交給我的這項工作，沒有結果。由於做這件事，我知道對教會學校要立刻接管，沒有商量餘地。現在看來，當時為了跟國民黨鬥爭，跟西方國家的關係老早就定下來了，不是毛主席進城來寫一邊倒的文章才定的。

陸定一這天還要我辦第三件事。他叫我編中央政策文獻小冊子，準備進城後大量印刷。雖然我們在中央機關，但對軍事上的情況並不知道，而且當時連遼瀋戰役還未結束。我聽他這樣說，覺得中央已經在準備這些東西，要進北京的樣子了。他說，你編好後，交給喬木同志審查，這裏邊好多東西都是他寫的，我會告訴他。後來我就這麼照辦的。

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南下廣東後，見過陸一次。我認真對他提了一個建議，調一個名人來當中山大學副校長，具體建議的是馮乃超，後來實現了。一九五四年我調回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工作緊張的時候，中央宣傳部常開會，現在叫「吹風會」、「通氣會」，又常見到陸定一了。這個會上，陸定一給我們講了很多情況。在胡風的事還沒有登報之前，我們已經知道這是個「反革命集團」了，中央已經定下來要打翻他們了，而且認為胡風「反黨集團」的危險性特別大。他和周揚每次都是帶着檢討的口氣說話。他和周揚在不斷挨毛主席的批評。

我弄不清「雙百」方針最早是誰提出的

在通氣會上，陸定一多次談到「百花齊放」，給我的感覺是，這個口號似乎是他在中央的少

數人會議上提出來似的，而這個意見是得到了毛的同意的。關於「雙百」方針的提出，現在所有的書籍文章似乎都講得有點含糊，沒有哪個文章明白説這是毛主席在哪個會上提出來的。

蘇聯開了二十大後，吹風會上，陸定一告訴了我們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他説蘇聯現在糧食的產量，遠遠低於沙皇時期，我們非常吃驚。我們過去得到的信息是蘇聯富得流油，天下第一，怎麼幾十年後是這個樣子？其實一直如此。陸定一在蘇聯住過幾年，他還透漏了一些其他情況。他説，我們二十年代住在蘇聯就知道，不斷有外國共產黨人失踪，但不敢問，現在看來，都是被抓起來了。這段時間，陸定一表現出對教條主義很痛恨。當時參加通氣會的還有人民大學的副校長，實際負責人×××。陸定一對人民大學的教學，學蘇聯那一套，非常不滿意，罵他們是教條主義，罵的話非常難聽，説他們改不過來。所以我感覺到，陸定一在黨的領導人裏邊，比較起來是一個比較直爽的人，也比較正派。似乎也從未聽到他歌頌過蘇聯。

最好不要正式提出「反對自由化」的口號

陸定一從監獄裏出來後，就沒有擔任過任何工作了，分配給他的是掛名政協副主席，他就以醫院為家。

有一件非常值得人注意的事情。這不是我親見，是我聽來的。他多次，甚至於在非常正式的大會上，以非常誠懇嚴肅的態度提出，最好不要正式提出「反對自由化」的口號。他這個意見，

就跟×××他們的意見是針鋒相對的，他這個意見，是針對×××、×××他們兩個人的，可是這個意見沒有被接受。所以在黨的幾個大秀才中，我最佩服的還是他，他比較注意吸收歷史教訓。他這個人太可惜了，中年就被自己人捉捕，最悲慘，就不能再起作用，他的才、識，都沒有得到發揮。

他為我題字，我能做到一點點就好了

最後我要提件小事。大概在一九八幾年，有個我認識的朋友孫邦鐸君跟他家有點往來，這個朋友到廣州東山賓館去看他，請他題字。題完後，這個朋友對陸講，你有個老部下曾彥修，還記得嗎？他說，當然記得。這個朋友說，你不給他題幅字？他說，好。他拿着筆題了那幅字，後來人家裱好了送給我。這個字的內容，是長輩對我的勉勵，我愧不敢當。

我本人看見後很吃驚。我說，陸定一怎麼寫這幾句給我，我怎麼吃得消呢？我哪裏配得上這麼四句話，根本不配嘛。但轉念一想，他題此送給我，總要考慮一下，如果你這個人跟這四句話是完全相反，他絕對不會題此送給你。所以我只能說，他的用意是勉勵我，而且是終生的。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我終生不敢違背老前輩的良苦用心。所以我把它拍了照片，作為傳家之寶。誰得到這個詩，都是會非常高興的。我當然是以慚愧為主，這是爭取方向嘛。

第三十三章 謎一樣的胡喬木

也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大才人

胡喬木在中共的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幾乎是唯一一個這樣的人物。他的特殊，是另外一種特殊的副產品，即個人崇拜的副產品。如果中國沒有長期的個人崇拜的話，當然也就沒有他這樣一個特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集保留了他的詩：「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詩言志，終生不出此圈一步。

胡喬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並不是說他權大，後來加上位高，言足以制天下，我是指還有其他的方面。我覺得，胡是中共歷史上很難找的一個大才人。在中共歷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學的問題，陳獨秀、李大釗，他們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們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後來一批人，如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識分子當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這些人犧牲得早，像惲代英、蕭楚女，他們的才學沒有得到發揮。瞿秋白，當

然是聰明得不得了，但他很早就成為主要領導人之一，一段時期，瞿秋白是政治上的第一人物。再下來，就是張聞天、康生、陳伯達、陸定一這幾個，他們跟胡喬木不同。他們在黨內都佔過重要的領導地位。他們在黨內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才學，而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機緣，他們參加革命早。再下來，就是黨內很著名，但沒有佔重要地位的人，這就很多了，不知道有多少，像陽翰笙、李一氓、成仿吾、周揚、夏衍、鄧拓這麼一批人，作為知識分子，他們在中共歷史上也都起過重要的作用，名聲都很大，但跟胡喬木也不同，在才學的廣度上，大概比不上胡喬木。我感覺到胡喬木的才學，主要是廣度，但有些地方也有深度。

胡喬木很愛才，甚至非常愛才。愛才的基礎是識才，而不是以能否為我所用來畫線。例如，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忽任李慎之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這就要點膽識了。因為他非常清楚，李是有很多叛逆觀點的。所不同的，李既是官，又是民，是上馬草兵書，下馬彈民調，老百姓立場是根本不放的。胡則不同，騎在馬上下不來。作為一個大才人，這是胡非常不幸的地方。一個草兵書的人易，一個民間的彈琴人難。在這點上說，胡是很不幸的。

胡喬木還有個特別的地方，是其他人遠遠趕不上的，他在品評文字的邏輯、語法、修辭等方面，堪稱獨步。而且我認為在道理上他都是對的。儘管這樣，他本人的文字則並不特別吸引人，遠遠不及陳伯達，也沒有形成一個「胡體」。這是甚麼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控制，左顧右盼，下筆如有繩，文章寫得不放手，展不開，寫不好。他本人的文章，我並不佩服。

胡喬木在知識面的廣度上同康生比，恐怕各有所長，彼此彼此。康生在黨內不得了，在戲

曲、音樂、繪畫、甲骨文、金文、版本學等方面，他不僅僅是有點常識，似乎是花了時間去鑽研過的。康生說來這是業餘，業餘能達到這個標準非常難能可貴。胡喬木在知識的廣度方面可能超過康生。但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戲曲等方面，那胡又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得多，一到了延安，就沒有閒的，而且一直到他離開工作。他工作的緊張程度，是超過常人的。作為職業革命家，他確實是全心全意，嘔心瀝血，把全部的時間、全部的生命貢獻給了共產黨，貢獻給了革命。我甚至想，他也有可能是延安第一忙人。在黨內，熟悉胡喬木的人還較多。解放後，打倒「四人幫」後，跟他發生密切關係的，至少幾十個。我是以前知道一些瑣事，全是明日黃花了。

胡的知識來源，跟他的學校很有關係。他的中學是揚州中學，揚州中學在舊中國是非常著名的中學。有人講，當時有三個程度最高的中學，它是其中之一。胡喬木從揚州中學高中畢業後，進的是清華大學，後來又轉到浙江大學，因此他讀的高中、大學，是全國最著名的名校。所以我們的初中、高中、大學辦得好不好，跟一個人的成長關係很大。你不辦好，很難培養人。

但從根本上講，是胡本人聰明，用功，求知慾旺盛，他雜書也讀。他參加革命活動很早，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學，但他還看一些偏僻的書。所以，在這些地方，你只有佩服。另外，我們在延安他的家裏編語文教科書時，他提出來中學第五年級，即高中畢業，也要教點語音學。我們哪裏懂呢，他給我們說了一下，說語音學並不難，歷史上一千兩年，從《詩經》開始，就很合規律，說不清楚，很難。但這個問題，清末以來已經有一批學者整理出個頭緒了，民國後，留學生多

了，中國音韻學的神秘性早已經完全打破了，因此，教高中畢業生一點音韻學常識，完全應該。中國詩，音韻學是自然的，你無意中懂了規律，你就可以作詩。為甚麼有人寫出舊體詩不像樣？就是不懂音韻。他說音韻根本不難，千萬不要把它神秘化。

他當時要我寫科學小品，我提到朱洗科學通俗生物學著作。不要看延安好像閉塞，實際上大後方和上海出的書很快就運來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一套朱洗的生物學叢書，十本，比較厚。當時宣傳部沒有甚麼事做，我看過十本書中的《人類的祖先》、《蛋生人與人生蛋》等。我說，我覺得朱洗的科學通俗作品寫得好，科學性很強，通俗，引人入勝，講真科學，不是光說廢話。哪知道胡喬木也看過。他說對，朱洗是個科學家，又能這樣通俗地寫，當然很好。不過它是多本書，而你們要寫的是一篇短文，內容只說一點，技術要求更高。他這麼說，只能讓我感到吃驚。他拿甚麼時間看這些書？他日理萬機，我不得不佩服。為了求知，跟他當時業務關係不大的書也要讀。這一點，恐怕是一切搞文化工作的人，特別是作家，都要向他學習的。要不，你的知識貧乏，只能講乾巴巴的那一點。

在延安時期的作用

胡喬木最晚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底就長住延安了，之前他在黨辦的安吳堡安吳青訓班當副主任，離延安幾百里，主任是馮文彬，實際主持教務的是胡喬木。這個學校實際上是延安抗大和陝

北公學的預備學校。如果沒有可靠的介紹信，就必須在這個學校學習一陣，審查後再定你是否能去延安。

這個學校辦了一年多吧，就沒有辦了。胡喬木本人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回到延安。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主要那幾個領導人毛、劉、周、朱外，他實際是延安天空衆星當中最亮的了。他地位不高，歲數不大，三十幾歲，但是當時很多事情都是他幹的。一九四一年毛把他叫去當政治秘書後，就起了這個作用。在延安，開始他在中央青委當宣傳部長，李銳、于光遠、許立群，都是他下面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是偶然去的，還是他找去的，不清楚。但怎麼會這麼巧呢，一個個後來都是大名鼎鼎的人，好像人才都集中他那裏去了。

可能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胡因為有甚麼文章被毛發現了，把他叫去當秘書了。一九四二年後，這個秘書的頭銜就多了，一會兒是政治局秘書，一九四二年毛整風，成立中央整風委員會，他又是整風委員會的秘書，所以不必弄清他有多少個重要秘書頭銜，關鍵是毛的秘書。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作第一個整風報告（是不是〈反對黨八股〉？），這個報告前，張聞天就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號凌晨離開了楊家嶺去陝北和晉西北。

張聞天走後，名義上由何凱豐來當宣傳部長。這件事太具諷刺性了。何凱豐是甚麼人呢？是跟王明他們一起留學蘇聯的，是非常有名的教條頑固派，但他在教條主義集團中只是四五位後的人物，遠遠在王明、博古、張聞天之後。但他進入了政治局。在遵義會議上，他是唯一一個死不轉變，反對毛主席的。連博古都轉變了，他還反對毛。他的威信，在黨內是談不到的，我也沒有

見過這個人。一方面反教條主義，整風，另一方面，把一個教條主義中威信最差的人弄出來當宣傳部長，這對整風是一個最大的諷刺。

但何凱豐很快住院休養了。一九四二年夏天，連中宣部的主要科長吳亮平也調到晉西北某個縣下去當區長還是區委書記了。胡喬木以甚麼名義去的中宣部呢，我不清楚，可能是代行職務，當然他還有一些重要的「秘書」名義去領導宣傳部的工作。

胡作為毛的秘書和中宣部的實際管理人——是何名義我不清楚，也沒有問清楚。——住在楊家嶺。同時，中央秘書處也在楊家嶺，他在這裏編甚麼，調甚麼資料，方便得很。如果住在棗園，麻煩，相距十多里，來回送。所以，他相當長的時候在楊家嶺。

他到楊家嶺來的時候，是在毛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之後，在張聞天一九四二年初下鄉之後，他的任務與毛的任務是分不開的。我們當時鬧不清楚毛報告中引用的對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是諷刺誰，當時一般青年看了後五體投地，以為是諷刺我們的。我們十八九歲去，在延安待了幾年，二十二三歲，確實沒有甚麼本事。但我們這些人有甚麼資格受他的諷刺呢？他諷刺的是王明、博古、張聞天。

延安相當一個時期，一般人，還不要說我們這些下層，包括上面的，都把胡看成毛的代言人，胡講甚麼，大家都要考慮考慮，是他講的，還是毛講的。陳伯達風格有所不同，一般把他自己講的同毛講的分開。

另外，假設沒有胡喬木在延安，就較難很快編出《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六大以

來》黨史資料彙編一出來，王明、博古、張聞天他們只好認錯服輸了，誰也不好再堅持半個字了。這幾個人只有王明裝病，不表態，不那麼公開認輸。這個功勞是誰打的基礎呢？沒有胡喬木收集材料編出這些書來，要在歷史上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後地下黨中央在上海的左傾錯誤暴露出來是比較難的。因為這部份領導人強調這些都是共產國際指揮的。現在拿出他們真正的東西，他們自己寫的「打倒一切」的東西，左傾到極點。所以說在這點上，胡喬木的功勞確實大。不提供、整理這些材料，不編好這些材料，這個問題就不好解決。因為毛主席過去不清楚這些東西，毛主席在土地革命區，在根據地，這時一翻，發現錯誤很多，基本上都是錯誤的，而不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打倒，中國革命就永遠不可能成功。

現在來看就很清楚了。實際上，從這時開始，胡喬木已經代表最高權力在宣傳文化上指揮全局了，並且表現出比過去的人都要注重中國實際。他在楊家嶺中宣部，實際上是整個宣傳、教育工作的轉運中樞。在延安，他的上級只有一個，進城來也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人能指揮他，也沒有第二個人想去指揮他。

從一九四三年起，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個叫中央組織委員會，一個叫中央宣傳委員會，當然都是毛主席在領導。中央組織委員會的書記是劉少奇，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書記是毛澤東。很奇怪吧，共產黨一直是重組織輕宣傳的，怎麼這回組織成了劉少奇，宣傳成了毛澤東？原因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都是以整風為主。整風是幹甚麼？是思想教育，廣義上屬於「宣傳」。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作了決定的，毛在中央有最後決定權。最後決定權一來，胡喬

木就是具有最後決定權的毛澤東的一個秘書。

但是，胡喬木當時與前輩們，與周圍人的人事關係卻是比較好的。他當時的為人是比較謙虛的。所以，儘管他的權力那麼大，那麼重要，但是他個人的聲譽沒有受到損失，老前輩誰都喜歡他，覺得他還是個年輕人，三十來歲，人家並不覺得他有甚麼高傲。當時我們也是非常尊敬他的，覺得他比我們大不了多少歲，有那麼大的本事，有點崇拜。總之覺得，在延安他是一個奇人，有人說胡喬木像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其實不大一樣，陳只是替蔣寫應酬文章，寫不得不表態的文章，是空話、廢話，應付場面。胡喬木替毛起草的東西，是決定性根本性的文章，決定大問題的文章。

所以，胡喬木在延安的作用，地位不高，名義不高，毛主席的秘書，但其實非常重要。這個時期，他處理事情很好，上面、下面對他的印象都不錯。像我們，真的佩服，他確實是一個少見的奇才。我的感覺可能不全對。

調我到中宣部去

一九四三年十一、十二月，胡喬木還住在楊家嶺中宣部。一九四三年共產黨跟國民黨的關係緊張得不得了，中央需要一批通俗宣傳材料，寫好後拿到外邊去換個題目出版。共產黨的宣傳資料歷來如此。

這時候，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搶救後大家都無業務，胡喬木把我叫去，交給我一批資料。這批資料主要是說國民黨怎麼反動，怎麼抓人，怎麼黑暗之類。這些材料是地下黨提供的，有些根據，怕也有誇大。這時中宣部的人，下放的下放，其他的人確實全部靠邊，才會叫到外單位的我。

我把編寫好的東西交去後，胡喬木把我叫去了。這是一天下午，十一月或十二月，很冷，他生病躺在床上，就住在張聞天原來住的那間磚窰洞裏。他這個人，要批評人，要表揚人，都很簡單，不拖沓。他的原話記不得了，意思說，還可改好。但是，他很明確地指出我文字中的種種毛病。說我白話夾文言，還用了一些不妥當的名詞、形容詞，用現在的話說，用了一些酸溜溜的詞語。還有就是一些地方文句不通。總的意思，我了解為：材料有，文字不行，文風華而不實。

我確實一下被他說得不好意思了，心想，水平怎麼這麼差呀，他說得完全對呀。好在我這個人在這些地方經受得起批評。只要你說得對，我就五體投地。最後，他要我回去修改。

他這次對我的批評，我終身感念不盡，不管現在我對他有甚麼意見。這樣的批評，內容上這麼尖銳，但語氣上卻很和緩，對我是極大的幫助，我一生感念他。

我回去徹底修改後交了。他可能覺得孺子可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底把我調到中宣部去了。我去的時候正是蘇聯紅軍初打出國境的時候，所以不全忘記。

胡喬木還是讓我編編寫寫。不到個把月，胡喬木就調回棗園毛主席處去了。

同田家英到胡喬木的窰洞裏編語文課本

我繼續留在中宣部。幹甚麼呢？誰也想不到，胡喬木因為個人的興趣，要搞一套初高中結合起來的語文課本。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參加這個課本的編寫。當時看不出日本甚麼時候投降，以為我們還要喪失很多地方，基本力量還要轉移到山溝裏，可能還要在山裏待十年二十年。延安當時沒有正規的學校，辦的學校跟訓練班差不多。胡喬木自己要主編一部五年制的初高中語文課本。

他這個人很奇怪。一方面忙於最高層的政治評估、活動，另一方面個人的興趣，他也要顧及。他就找我跟田家英編。在戰爭那麼忙碌的時候，他忙那麼多事，新華社的稿件呀，《解放日報》的社論呀，中央的文件呀，他還要忙這個課本。這是他個人業餘愛好，個人興趣。胡喬木對中學的語文教科書，有他一套完全獨立的見解。首先他就認為這是初高中最重要的一套課本。他這套見解，老實說，現在恐怕沒有人能完成。他當時要我們編的語文課本分三個部份，一部份是語文，選從古到今的；第二部份是文法；第三部份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風教育以及科學觀點教育等糅進去寫成文章。最後這一大部份，他認為沒有現成的文章可選，全要自己寫。這個設想不錯，但要求太高，確實很難辦。

我跟田家英的分工是，田負責選課文與寫文法講義，註釋，選從《左傳》、《史記》到「五四」時的文章。胡喬木對聞一多、俞平伯、朱自清，總之對「五四」運動後產生的大的文學家，有成就的，他都很佩服。他曾做過朱自清的學生，更佩服朱自清。田選文章不困難。不要看

田只念到初一，到延安後他更看了許多書。田極聰明，看書過目不忘。舊體詩、詞，一般看一遍就能背了。這一點，跟毛主席有相似之處。毛主席問他哪個詩人說了甚麼，要田查，一查大體全對，最多差一兩個字。毛主席的記憶力之好，恐怕是歷史上難找的。不僅是唐人的詩，宋人的詞，甚至清人的，毛主席看一遍也能記下來。他這樣的人，大概真是幾千年出一個吧。田家英也有這個本事，當然基礎沒有毛好。毛有老師，田家英無老師。

但編文法，即中國語法，就把田難倒了。當時只有一本《馬氏文通》。所以實際上要田家英創造出一套語法來，怎麼可能呢。我的天老爺，我們都是中學生呀。胡喬木讓他多看參考書。

我處於次要地位，負責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科學普及知識等糅在一起，寫成一篇篇文章。為甚麼全要自己寫呢，因為抗戰前的通俗文字，在胡的眼裏統統不行。像高士其寫的，文字長得不得了，不可能進教科書。有個開明青年叢書，我也看過，有些還是看不懂，比如《趣味的數學》，既然說趣味，還是難懂。這些東西，胡喬木都知道。他說不能像賈祖璋的《碧血丹心》那樣，內容少，文字也比較粗糙。他拿出一本《烏拉波拉故事集》，抗戰時貴陽出版的，我們還不知道。胡喬木這個人是多讀，他連這本譯書也看過。他說，你們看看，這書寫得很好，但卻不能用作語文課本，因為太長，一篇好幾千字。我拿來仔細看了，確實寫得很好，就是每篇都太長，廢話還是不少。

為了編這個教材，他把田和我兩個人調到棗園他的窰洞裏。他的兩個窰洞都不大，是挨着的，一個他們夫婦，加上兩個孩子住；另外一個辦公，他把辦公窰洞讓我們住，他在自己住的窰

洞的一張小桌上辦公。兩個窰洞都是老的，人工建的，不是挖的，很一般。

我們去過他那裏兩次。一九四四年「九一八」那天，容易記，我跟田揹着行李到他的辦公室。這次住了一個多月。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第二次叫我們去，一直到五月羅斯福死後，形勢大變，我們才要求回到楊家嶺。為甚麼要我們去呢？便於耳提面命。

胡喬木給我出了一些題目：盡善盡美，百折不撓，生物的生殖等等。這就是說，科學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東西，要當成文學性的散文來寫。為寫出這些東西，一文不超二千字，我改了又寫，寫了又改，反反覆覆，在文字方面受胡喬木的「夾磨」（訓練）。兩次住了三個來月。

胡為甚麼要我們反覆寫呢？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先搞出個「樣板」，再參考這個寫。胡要求我寫的那幾篇，我寫了三篇。我記得〈生物的生殖〉這篇，我自己比較滿意。我當時二十四五歲，既未結婚，也未戀愛。寫這類文章，要打破神秘性就難辦了。我寫了一千多字。胡喬木要求一千五百字左右，用散文寫。開頭的部份我現在還能大致記得大意，文字可能還要漂亮些：

> 春天來了，到田間去看白蝴蝶在菜花中飛舞採食，這個時候，就是在進行兩種生物的生殖活動。一個是植物花粉間結合的「無性生殖」，另一個是白蝴蝶間交配的「有性生殖」。

這個開頭比較輕鬆，人人都看到過這樣的現象，它得到了胡的讚美。胡對人的讚美，任何時

候都不會公開直說。他只會這樣說：「我看這樣可以了。」或者說：「這樣寫比較好。」最多是這樣。當然，我上面這個例子，在科學上是否站得住腳，很難說，可能是胡說，當時只是草稿，尚未作科學核實。

我們兩次去，加起來將近三個月。他對田選的課文樣本（古代的），比較滿意。我的任務，肯定完不成，住在那裏，就寫了這麼幾篇東西，就是反覆磨。

我這個人的頭腦有點特別，對重大的國內國際事件比較關心，對這些事一記下來，就是一生。一九四五年，大概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延安《參考消息》登載了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回到美國在華盛頓的談話，說美國今後將只以蔣介石元帥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為合法的唯一交涉對象。過去當然也是如此，現在特別提出來，強調一下，無非說明今後美國要疏遠共產黨了。這時候，美軍的觀察組還在延安。美軍觀察組一九四四年就來了，可以單獨跟共產黨直接交涉。美國從情報需要，十分想知道一點解放區的情況。我們也十分需要他，來看看吧：從山東半島到陝北，是不是敵僞的佔領區。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軍將來可能在華北登陸，吃的糧食、喝的水要靠我們。美國人估計要在華北登陸才能打敗日本。赫爾利談話後，我估計形勢要大變，美國已經決定不與共產黨合作了。五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我就更估計美國對華的政策要變。國內的形勢也要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要緊張起來。國民黨要加緊反共，包括清剿解放區。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變了，政策根本變了。赫爾利的轉變，就是羅斯福的變化。羅斯福死前態度已經變了，不是到杜魯門手裏才變的，美國覺得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必須要嚴加控制了。

五月間，我們並沒有感覺到日本要投降。胡喬木也沒有跟我們談過。羅斯福去世後的一兩天，我們也感覺形勢要變了。當時我們這些小青年長期在延安，政治還是敏感的，總在觀察點甚麼。胡喬木也忙得要命。我們說回去吧，他根本沒有時間管我們了。他說，好好，回去吧，現在情況變化很大。他並沒有多說。大概就是在羅斯福死後的兩三天，我們就揹着行李回中宣部了。回中宣部還是沒有事情做。

這是我一生第二次在文字上受到胡喬木的「夾磨」，第二次在文字上得到了很多教育。胡喬木非常嚴格，也非常仔細。他講的道理確實對，但自己做起文章來，好像又不那麼生動。

寫《胡喬木傳》的程中原同志曾告訴我，他費了很大的勁，找到延安時期中學中文教科書。他給我看了編者說明。我說，這個說明不僅是照胡喬木的意思寫的，也完全是他的文字。這個書，可能是別人接着編，遵照了他的方針，只是他沒有時間管了。他編語文的方針可能是轉到陝甘寧教育廳了。最後有沒有結果，我根本也不知道。那題目中確實有些極妙的，如「當太陽請假的時候」等，這可不是我能寫出的了。

審查我編的十本小冊子

一九四八年五月前後，我從山東奉命調回東柏坡，從延安失守後，中央這時已經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安定下來了，大概除戰爭外，一些工作要恢復了。延安撤退後，中央各個機構大體都

散了，都到其他地方去了，尤其是東北。我知道西柏坡就住幾個人，毛、周、劉、朱、董老，還有陸定一、陳伯達、胡喬木。他們住在那裏，其他人都只能住在附近的村莊。當時宣傳部在東柏坡算是跟西柏坡最近的，但業務工作沒有開展，只有秘書長丁華在那裏維持局面，有幾家人要照顧。這時，王惠德、于光遠先後調到宣傳部來了。于光遠是跟我一起從山東回來的。陸定一、陳伯達，仍然不怎麼管宣傳部的事。這個時候似乎有氣氛，好像要進北京了。因為陸定一已經準備進城用的書了，于光遠、王惠德就在編寫這些，如政治經濟學常識讀本、社會發展史等。陸定一大概知道我不學無術，沒有叫我寫，他叫我編。他是中央宣傳部部長，他拿出百分之幾的時間來管管宣傳部的事。他知道宣傳部還沒有組織起來，知道業務人員只有幾個（進北京後的中宣部實際全是新組織的）。他叫我編進城後廣泛用的宣傳品，也就是黨的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根據甚麼來編？手裏邊空的。好在各個根據地都印各種小冊子，黨中央的文件，各方面的政策，如工商業政策、土改政策、文藝政策等等，都有小冊子，找了幾十本。

編是陸定一叫我編的，他說審查交喬木，他比我熟悉這些文件。胡喬木當時沒有大名義，是新華社的社長。這也是以後才知道的。是社長也好，不是社長也好，反正歸他領導，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以後，就是這個樣子。現在，人名辭典上查他，進城前，說是毛的秘書，新華社社長，並沒有其他名義。

這裏就要提到編關於鐵托的書了。

蘇聯在一九四八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權方面稍為有一點維護的意思，蘇聯立刻就

說鐵托是殺人犯、匪幫、德國的間諜，天下的惡話都罵到頂了。中國從上到下都沒有人相信，因為我們是把南斯拉夫作為模範的。「解放區」、「解放軍」這名詞是從哪裏來的？是學南斯拉夫的。抗戰時，我們自己的地方叫抗日根據地，日本人佔領的地方，我們叫敵佔區，國民黨叫淪陷區，淪陷區的老百姓對共產黨的區域似沒有名字的，就叫「那邊」，叫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叫「自由區」，這種情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月最熱的時候，重慶組織了一個中外記者參觀團來到延安，這對國民黨是個極大的壓力。外國的記者，特別是美國人想了解「共區」。葉劍英在延安以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身份作了一個報告，叫〈中國解放區概況〉，向他們介紹解放區的情況。這個時候，我們才第一次看見這個名字，覺得「解放區」這個名字太好了。但是軍隊，習慣還叫八路軍、新四軍。在民國黨統治時候就這兩個，其他小的叫抗日游擊隊等。南斯拉夫比我們艱苦，犧牲比例比我們大，死了七分之一的人口。當時朱總司令在一個報告中講，南斯拉夫是「鐵托」，厲害得很，我們要成為「鋼托」。「解放區」、「解放軍」，全是從南斯拉夫學過來的名詞。

定一同志告訴我，要編一本關於南斯拉夫的書，說他們（指蘇聯）注意得很。不然，我怎麼會想到呢？這一下，我得到了暗示：斯大林，你要得罪他，他就可以罵你，說你中共和八路軍是日本人的間諜。不過中國太大了，他不一定敢那麼鬧。對南斯拉夫，他可以罵一個民族英雄是外國間諜，胡說八道到了極點。當時還有個複雜情況，八九月間，西柏坡突然唱起一首歌，叫《民主青年進行曲》，曲是賀綠汀寫的，詞是蕭三寫的，歌寫得好，幾天周圍都傳開了。歌中有

這幾句：「毛澤東—斯大林，斯大林—毛澤東，像太陽在天空照！紅旗在空中飄，全世界人民心一條。」這個歌是說全世界革命要取得勝利了，美國等就要全完了。問題是毛、斯並列，第一句把毛放在斯前邊。不幾天，秘書長丁華悄悄通知我們，不要唱了。我們知道這個歌闖禍了。蘇聯老在國際上放出消息說，中國是比鐵托大得多的鐵托。就是說中國不服從他們的領導，不服從他們的命令，遲早要威脅他們。為了避免麻煩，我們不唱了。接着我奉命編這本書，這本書裏盡是蘇聯罵鐵托是匪徒的東西，你不把這個東西編進去，蘇聯就要整你。我編了它，由上級來決定。我到西柏坡去交給胡喬木審查。關於鐵托這本書，我起了三個名字。《南斯拉夫問題文件集》，這個一般得很；第二個，《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件集》；第三個，《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路線而鬥爭》。我的彙報很簡單，第一個太一般，蘇聯不滿意，南斯拉夫也不滿意。南斯拉夫會說，我有甚麼「問題」，我比你們還苦呢。第二個呢，蘇聯可能還是不滿意。第三個比較空，但是客觀上對蘇聯來講，他們可以勉強接受，也沒有正面罵南斯拉夫。

胡一看，指着第三個書名說，這個好，這個好。胡這個人，批評人怎麼樣，語氣也不重，但是稱讚人更穩重。一般說「這樣可以了」、「我看就這樣」，就是很高的讚譽了。因為總的說來，他是保持文雅狀態。

蘇聯不是一天到晚罵鐵托是匪徒嗎？但我們能把這放在書名上嗎？所以想出《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路線而鬥爭》的書名。書裏邊，把蘇聯的一些文獻放進去，把我們的一些文件放進去，這樣，也算批評鐵托了，但沒有在書名上說你是匪徒，是帝國主義的間諜。當年蘇聯反鐵托，中

國的處境不響應不行。所以，這個書名，得到胡的讚許。

審查完這十本書，胡問我，你現在有甚麼事？我說沒有甚麼特別事，全宣傳部現在沒有甚麼特別事，丁華秘書長你認識的，就管日常生活，于光遠、王惠德剛調來，好像在編寫甚麼，我不知道。他說，你呢？我說，我就是在編這些東西，即陸定一安排的進城需要的小冊子。他說，這樣好不好，你到新華社來幫幫忙吧。當時這個單位調到那個單位，不像現在這個手續那個手續，轉檔案甚麼的，當時揹着自己的行李到那個地方去，就是調工作。我說，我沒有意見，反正現在宣傳部也沒有甚麼事，一切上級決定。他說，還是到新華社這裏來幫幫。他說，這樣吧，我同你一起到定一同志那裏跟他說說。

那天下午四五點鐘左右，我跟他走出門不遠，就遇到毛主席跟江青散步，後邊跟着警衛員。毛主席問胡喬木，這是不是于光遠？胡喬木說，不是于光遠，他叫甚麼甚麼。

毛這個人，一些事情無比精明，對另一些事情並不精明。他在認人這點上，跟周總理完全不能比。于光遠毛見過多少次，延安哲學研究會，毛也去參加，于光遠也去參加，討論、吃飯在一起。不僅僅這樣，于光遠在延安還到過他的窰洞，因為要組織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于光遠同一個比較老的同志屈伯傳，到他的窰洞裏去談過。毛幾次見過于光遠，他還認錯人。于同我一起土改一年多，這些瑣碎事是談過的。毛的思想用在全局上，對小青年，見過多次還不認識。但記得名字，就了不起了。

胡喬木跟毛主席說了幾句，分手了。我跟着他繼續走，走了幾丈遠，他突然說，算了吧，我

給定一同志打個電話就行了。然後他說，我也想走一走。我往東柏坡回去，他一邊走，一邊跟我偶然談起另外的事情，跟蘇聯有關係，是關於斯大林獎的，他說蘇聯要把這個獎給中國甚麼人，而他對這著作是看不中的。胡這個人，他真實的一面往往不表現出來。這件事，我後面再談。

「不必回宣傳部了，就跟新華社到北京吧」

我是十一月底去小新華社的，三月底動身到北京，共待了四個多月。過了一兩個多月，大概在一九四八年的一二月，我發現范長江、石西民不見了，誰也不問，估計是調走了。我們在西柏坡的行動是很注意的，毛、劉、周、朱都在，我們自覺不亂走。

可是一天，我竟然在西柏坡看見了范長江、石西民二人。我很吃驚，只一般地問，你們還在這裏？他們說，我們要調出去。這下我才知道，他們要調工作了。

我在小新華社並沒有甚麼工作，看得出來，胡調這些人去新華社，也沒有甚麼工作。而且當時所謂的評論組主要的兩個人已經走了，我在那裏幹甚麼？不大好意思。大約在這一年的二月間，一天下午，我向胡喬木提過一次我的工作調動，三兩分鐘，他很忙。那時，我的關節痛得厲害，走路相當困難。在小新華社搞了幾個月，每天後半夜才睡，當時都是臨時建的木材房子，沒有炕，冷死人。我的關節炎大大加重了，已經到了拄棍子也較難走的程度。我向他提出要求，我說，我這個情況，恐怕很難適合在北方這個天寒的地方工作，我請求隨軍南下。就回四川吧，我

家鄉南部、東部熱死人。

我是試探性提出的，但胡以一種商量口氣說，現在要進北京了，離解放西南、華南還有一段時間，看戰爭情況，你先到北京再說。最後他說，你不必回宣傳部了，跟新華社到北京。

我當然服從。我聽他的口氣，我能不能南下，是戰局決定的。

胡喬木的外表與內心似乎大有矛盾之處

胡喬木的一生表現出來的是政治，而且永遠是毛的政治。他甚麼事都有主見，但是多半藏起來了。

胡喬木大概是一九三二年入黨的，他這個年齡學的馬克思主義，一部份是日本譯過來的馬、恩著作，雖難懂，但還有些近真，跟着就是俄文翻譯成中文的的東西，這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了，是斯大林部下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具體地說，哲學是米丁、尤金，離馬克思主義很遠了。自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把布哈林打倒以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解釋權就全歸斯大林了。

那時我多少懂得一點事情了，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確實沒有多少從德文翻譯的馬克思的書，我家裏有一本右銘、玉樞（後來聽說即侯外廬、王思華）譯的《資本論》一卷，不大能懂。三十年代前後起，這麼一批——包括胡喬木、周揚，恐怕也是讀的一些從日文翻譯來的不太

好懂的東西。最高明的就是日本河上肇改寫的《通俗資本論》。當時我十二三歲也翻這些書，內容當然不大懂，但曉得是在説馬克思。胡喬木比我們長幾歲，早好幾年參加共產黨，但歷史條件決定他們學的也主要是斯大林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像斯大林那麼絕對，一天到晚講專政，馬克思主義講要解放全人類。所以，任何人即使才高八斗，當時也沒有辦法真正地讀多少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説來説去，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上半期，我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從蘇聯來的斯大林的東西，是斯大林培養的學生尤金、米丁這一批人編寫出來的東西。因此，這個馬克思主義就很絕對，就只強調專政。在那個期間，斯大林有一本書，叫《列寧主義問題》，這個小冊子當時也沒有翻譯出來。雖然當時我十二三歲，但我們家裏的幾百本書我都翻過。其實，斯大林講的許多東西都是錯誤的。比方説，他的《列寧主義問題》最重要的一段〈戰略與策略〉提出一個觀點，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而王明他們就把這個接過來，在上海打倒一切。蔣介石固然是敵人，但中間派更是敵人，先打倒。你把天下的人一切都打倒了，你還幹甚麼呢？世界上任何共產黨「打倒一切」的理論，全都來源於斯大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現在還有一些人還在為斯大林辯護，我不理解，單憑這一句話，就是錯誤到家了，而且永遠是錯誤的。斯大林這個書裏還講，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他舉了合作社、工會、婦聯、青年團、蘇維埃，蘇維埃就是政府，我們叫「人大」，他説這些都是黨的工具之一。在到延安前，我在成都祠堂街一家小書店已經半公開買得着《列寧主義問題》了，看了後感覺奇怪，把政府變成了跟工會等一樣，變成了黨手中的小工具之一。馬克思主義亡於誰？亡於斯大林。在斯大林的

手裏，還有甚麼馬克思主義呢！因此，凡是堅持斯大林，發展斯大林那一套的，都不算堅持馬克思主義。今天說堅持斯大林就是堅持馬克思的明確講法沒有了，但既然斯大林「三七開」，而且這個所謂「三」也不過虛晃一槍，一句帶過，好像批評斯大林就是批評了馬克思，就是反動。其實胡喬木的生長與讀書環境，原則上也是斯大林掌握全權時代編出來的「哲學」和「經濟學」。他雖用功讀書，但他長期在毛的手下工作，他的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思想了。中國不用毛澤東主義，而用毛澤東思想，那是一回事。胡喬木自己的詩，「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就把他的心情完全表白出來了：想不到自己如此幸運，一生能為毛服務。胡的自省精神似乎不太多。

所以胡本人多才、博學，但是在公開場合下，他受毛的框框影響太大，在我看恐怕終生都沒有擺脫。他的個人崇拜，終生都跟他緊密聯在一起。我們對毛，崇拜是有的。在中國的條件下，他能夠領導武裝鬥爭，把蔣打敗，取得全國政權，當然非常傑出、非常偉大。但是，在取得政權以後的那套做法，就很難講。難道農業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對嗎？反右派對的？大躍進對嗎？大煉鋼鐵對嗎？「文化大革命」對嗎？打倒一切對嗎？所以，不能夠說在取得政權後，他的這一系列重大的行動都是對的。

胡喬木這樣的歷史人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重新掌權後，不幸以唐·吉訶德的姿態出現，不管在經濟上，在思想文化上，他不是推動改革開放前進，而是一切都以保衛老傳統的旗手自居。他仍然堅持他過去堅持的那些東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東西。毛的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綱，

胡喬木以後口頭沒有講，但是他的行動表現出來，他是保守的，是不贊成改革前進的，事事不忘以階級鬥爭來處理問題。他是舊傳統的堅持者，而不是新道路的開鑿人。

胡喬木內心裏邊究竟是怎麼想的，恐怕不大容易鬧得清楚。我作為他的老下級，他的學生，經歷過一些事情，接觸、感覺到他的內心想的東西，他贊成的東西，跟他口頭講的東西，常常不一樣。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兩年，田家英跟我到他窰洞編語文教材，幾個月，天天見面。這個時候，知道他非常讚美朱自清、聞一多、俞平伯等教授。那時候，俞平伯的《紅樓夢》評論還沒有出版，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俞平伯的讚美。田家英問，徐志摩，戴望舒，他們的詩選不選？他說，要選，「五四」以來代表性的東西，都要選哪。你這個語文，在中學兼文學史的性質，讀到五年級的時候，《詩經》、《楚辭》也要選一點。他說，沈從文也要選一點。當時我們已經知道沈從文跟一些共產黨員的關係複雜。我又不懂這些東西。我問，胡適選不選？他說，當然要選，不選胡適，選誰呀？他內心清清楚楚。最後他說，只有漢奸不選，周作人不選，其他的，只要好就選。所以，從他對這些人的讚美，你會想得到解放後對教師思想的改造時，他會突然放棄他尊敬了幾十年的人物，一下對他們採取幾乎全否定的態度嗎？甚麼都不要了，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就是農民戰爭，他會贊成嗎？可以看出整個抗戰前，胡對本國的文化，不但不是排斥的，而且對很多人是崇敬的。他在田家英和我二人面前，對唐太宗讚美備至，那時的延安誰敢讚美任何皇

帝?!可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黎澍第一個提出，不應以農民戰爭為歷史推動力時，胡又公開以黎為修正主義的急先鋒。

經過兩三年時間，我們把他這一套摸得比較清楚。以他這套東西來處理解放後文藝政策的東西，以他這套思想來執行基本上是他起草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就要被大批判了。他學問多，知識面廣，但在政治上，又不得不表現出必須政治第一，藝術第二，要照毛主席的辦，要照斯大林的辦。他內心是不是贊成這個方針的呢？我覺得他內心恐怕是不大贊成這個方針的。

第二個例子。

他對我們自己「趕任務」的創作，內心是根本不恭維的。一九四八年，他讓我跟他到陸定一那裏說我的調動，走了幾十步，他說不去了。我回東柏坡，他說他也想走走。走了幾分鐘，路上他就隨便談起斯大林獎金的事。他突然說，他們還要給我們斯大林獎咧。我覺得莫名其妙，便問甚麼獎。他說，他們想給丁玲發一個獎。我問，獎甚麼？他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九四八年可能已經印出來了。我說，斯大林獎是發給他們國內，發給我們……胡說，這還不是跟歐陽山南區合作社《高幹大》一類的東西嗎？他漏出這句話，我哪敢多問一字。歐陽山在延安時曾經寫過一本書，叫《高幹大》。當時延安南區辦了一個合作社，大概辦得比較好，作為一個模範。歐陽山下去蹲點，就寫了本書。這書我沒有讀過。胡喬木說丁玲的書，跟歐陽山寫南區合作社的《高幹大》是一類，就是說也是趕任務的書。「趕任務」是延安時期的

一句話，現在不大用了，就是趕政治任務，政治號召的意思。（胡講話的時間我可能記得不那麼準確。）

這件事我沒有跟別人談過。我今天第一次談起，就是感覺到胡的內心世界，他終生恐怕沒有怎麼表白過、公開過，只在這種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漏出一句吧。當時我也不敢講甚麼，我也不懂。這個例子很典型，他是搞毛的「講話」的，但一遇到實際時，卻表現出對趕任務的東西又不怎麼看得起。

所以我覺得胡喬木的內心世界和他表現出來的，恐怕有時相當不一樣，而他的內心世界，是從來不暴露的。他表現出來的，始終是最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

最後一個例子。

一九八三年，他對我們人民出版社批評得那麼厲害，對我的問題已經提出將來在「整黨」中解決，這對我是甚麼意思已經非常明白了。你又犯了「錯誤」，那就在下一次的「整黨」中解決吧。這個「下一次」不是批判批判問題，而是牽涉到你的組織問題，即開除黨籍，退黨等，來勢猛烈。但是，當我一個字也不接受，而且公開在文字上多次要他向我本人、向人民出版社道歉後，又一點事情也沒有了，煙消雲散了。這說明他批判我們的時候，就知道他的批判是不對的，站不住腳的。他看出來了，公開討論起來，究竟會對誰不利。世界都會看到，怎麼到現在還在講斯大林殺布哈林、殺托洛茨基殺得對，這在世界上是很不雅觀呀，對中國人都不大好看呀。所以對不起，我請求你道歉。我這身份的人對此竟敢如此說，當然是任何後果都準備好了的。你這個

批判，完全違反常識，完全依靠權力，堅持舊的已十分不堪那一套，一加頂住，他就很難辦了。所以他批判我的時候，他本身就不覺得他有甚麼道理，而只是在「維權」。

所以，他表現出來的東西，常常跟他的內心是兩回事。他內心也不認為他講的那些東西是對的，但是為了他的權威、地位，整周揚，整得周揚從此得病，整《人民日報》的社長胡績偉、副總編輯王若水，公開在大會上批判，撤了職。又整到我們頭上了。我算甚麼呢，算個小把戲。他沒有想到，這個小把戲這次來了個反抗。他從此再無一句後話，一個字也沒有。你不屈服，他看，還是迅速收場為妙。

例子雖然不多，但是已經相當地表現出胡喬木是在矛盾中生活了。他表現出來的，不一定是他認為對的東西，但是他又不能不這樣表現。他在晚年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跟×××兩個人一起，把「雙百」方針徹底毀了。事實上，他們所堅持的就是思想上的一種專制政策，這個專制政策，還把它叫做馬克思主義。這個時候已經不叫列寧主義了，也不叫毛澤東思想了，叫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叫你說誰發表一點意見就是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嗎？所以到了他的晚期，八十年代以後，一個博學多才的人，就成了一個被公認的保守代表，不但是保守，而且還要倒退，倒退到甚麼地方去了呢？基本上堅持五十年代那些東西，就是思想上的絕對控制，甚麼都只能照他們的指示運轉，全國又成為只要一個腦筋了。他們兩個成了中國不折不扣的保守思想，向後看的代表人物。

在經濟上反對改革開放，過去沒有點名是他

對胡喬木思想意識方面的做法，爭論很多。擁護他的人，完全作另外的解釋。非常可惜的是，胡喬木恐怕出乎大家所料，他不僅在思想意識上堅持保守的甚至後退的路線，而且在經濟上他是反對改革開放的。這個事情過去社會上不清楚，有人講過，他到深圳回來說，只有一面國旗是紅色的。《炎黃春秋》二零零八年十期，發表了張根生的遺稿〈聽華國鋒談幾件大事〉。張根生長期在華南工作，張根生在這個雜誌上曾發表一篇跟華國鋒的談話，是談粉碎「四人幫」問題的。粉碎「四人幫」，二三十來年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一個講是華國鋒發起的。過去，我也聽說過，只是不敢講。這次華國鋒去世，新華社發表了華國鋒的生平事蹟，這樣的文字是經過審了又審的。這個生平事蹟相當長，就把抓「四人幫」這個事，講得清清楚楚，是華國鋒去找的葉帥。因此，華國鋒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功勞很大。這說明張根生上次發表的跟華國鋒的談話，是真實的。這次，又發表了他一篇文章，是遺稿。遺稿中有這樣一段：

問：建立特區是怎麼決定的？

華：當時，先是中央幾位同志商定，派一個由谷牧為團長，七八個部長參加的去歐洲幾個國家考察的「國務院經濟考察團」。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底。考察回來向中央彙報時提出，有的國家建立加工區，把周圍封閉起來，吸引外商投資辦工廠，不收稅，

產品直接出口，可引進技術、設備、資金。大家聽完彙報後，就議論辦加工區的事。趙紫陽、谷牧、登奎等都贊成。就確定由谷牧進一步研究考慮此事。此後徵求廣東、福建省委意見。習仲勛、項南都很積極。由谷牧牽頭醞釀提出建立特區，經政治局討論同意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建立四個特區。

這事以後，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主動提出要求把大連建成特區。日本專家大賴也提出要對外開放、大連搞特區的建議。我叫谷牧去瀋陽與仲夷商量，並到大連看看。都同意了，正準備提交中央討論決定。這時胡喬木從深圳回來說，深圳甚麼都變白色了，只有國旗還是紅色的，因而只好暫時緩辦。

這件事可以說是很驚人的，原來在改革開放問題上，胡是明顯反對的，堅持要拉着中國向後走。國務院、政治局那麼多人，拿一個人沒有辦法，只有聽他的。中國特別得很，意識形態決定一切。一說你是資本主義，哪個不怕？胡喬木在晚年的十來年，「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我們基本上都知道，他是第一面旗幟，堅持到底。但是在經濟上反對改革開放，過去沒有點名是他，現在這個材料證明是他，而且只要他一講，三個五個七個八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都得聞風而退。

胡喬木這一生，辛苦，多才，日夜工作，但是，他不能隨着時代前進，他是保守的，眼睛老向後看，他崇拜蘇聯思想管制那一套。因為那一套是個人權力的來源，但是我前邊也舉了例子，

他內心世界可能又是另外一套，他能信口講出來，丁玲的書跟歐陽山寫南區合作社的《高幹大》一樣，是「趕任務」，那就是說，對「趕任務」的東西，他根本看不上眼。我覺得這個人是在矛盾中生活，在矛盾中工作。這點上，千萬不能學習他。當然，最後我還要聲明幾句，對胡喬木本人來講，他還是我的老師，中國人有個特點，他真正得到過誰的教育，一生都不會忘記。但他晚年的那些保守、倒退，我不贊成，他晚年的保守也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內心思想，因為堅持那一套，絕對是同權力分不開的，放棄了那一套，就意味着放棄了決定一切的權力。

現在爭論最多的是胡喬木，有的人始終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有人對他晚年十來年表示不敢恭維，我是一個。晚年的胡喬木，似乎是應該引以為戒，而不是學習的榜樣了，一個人站到了歷史前進的對立面，就會變成現代的堂·吉訶德。

胡喬木在晚年很多事是不應該做的，是自己的權威放不下來，永遠覺得自己是思想權威。不先經過他批准的事情就不行。批周揚就是如此，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這些話就不是你周揚的身份能說的。胡對舊的五十年代的東西，不敢決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話不便講了，但事實上還是一切要服從階級鬥爭，還是要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看待一切。這樣的一種思想，他並沒有放棄。這是整套毛澤東思想在新形勢下的堅持。胡喬木晚年堅持的東西，我認為是倒退的，跟中國的前進方向是矛盾的，應該是引以為戒的。

尾聲：我對兩個「和諧」問題的一點看法

我一生自到延安至今，已經超過七十二個年頭了。我算個甚麼人？勉強地說，我是一個不夠格的編輯，我如能獲得此資格，就十分滿意了。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的，多麼光榮。人要自己適當定位，定位不適當，跌下來變得粉碎。

最後，我還有點感想，這真是多餘的話了。

一、兩個「和諧」從根本上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及「世界革命」之類的提法

前幾年，以胡錦濤、溫家寶等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提出在國內建設「和諧社會」，在全球建立「和諧世界」的新口號。這樣的提法，跟過去六七十年的傳統灌輸相距太遠了，令相當一部份人難於接受。但是我願意以行將就木之身，出來講我的一點個人體會。

和諧這個思想，我們過去幾十年已真把它批倒批臭了，說之者謂為「反」，聞之者驚，誰還敢沾它點邊？一談和諧，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革命之尤，就是赫魯曉夫代理人。「要武不要文」，在中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沒有甚麼罪比贊成和諧罪更大的罪了，這是世界上空前的怪事！赫魯曉夫一九五六曾經提出「三和」，之後幾十年間，中國就罵之為世界的萬惡之源。中國這邊看見的天地，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世界革命立刻就要成功了，比喝口涼開水還容易。對赫魯曉夫則說，「放屁，請君充我荒腹！」實在太「那個」了。其實長時期的世界形勢，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對中國來說，那麼長一個時期，「三年自然災害」弄得民有飢色，野有餓殍，還拿甚麼力量去「掃除一切害人蟲」——「蘇修」和「美帝」呢？

我們批判了幾十年的赫魯曉夫，其實赫魯曉夫只有兩條「大罪」。一條，他多多少少批判了斯大林的胡亂殺人，從而放出了反個人崇拜這個妖魔。其實他根本不敢全面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出來平反的人物僅僅限於一些最堅定的斯大林系的領導人物，此外被公開審判處死的大量要人，他半個也沒有平反，包括勃留赫爾（加侖將軍）等三大元帥在內。赫魯曉夫另外一條「罪」，是說他提出了「三和」。一是「和平共處」，一是「和平競賽」，一是「和平過渡」。「和平共處」，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特別是美蘇不要打起來。「和平競賽」，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和平競賽，不要用打仗來解決。「和平過渡」，指發展中國家不通過暴力革命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赫魯曉夫這種提法，是不是他的罪呢？這些，在當時和現在，恐怕都根本成不了

甚麼罪的。

其實中國自己哪有力量來反對這個「三和」呢，但我們就是要堅決反對。從此中國鬧了幾十年。以至於「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常規戰爭不如原子戰爭」的說法也出來了。中國內部當時有的中央同志提出對外的援助要適當量力而行，就成「三降一滅」的大罪了。「一滅」就是消滅世界革命。「世界革命」這個東西，不是你掏空腰包就能援助出來的，它本來就是空想，你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一個特大窮國，自己長期陷入全國性的大飢餓，就是全國人民粒米不沾，也造不出一個甚麼「世界革命」來的呀。中國是替有些人買了一些大單的。而這些人幹甚麼呢？關起門來自己人殺自己人。像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太可怕了。今後任何人如要想繼續保持上述那些老條條老做法，就根本不可能再取信於民於萬一了。唯一的辦法，就是：維新，真正的維新。

現在中央把建立「和諧世界」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建立理想世界的一個主要目標，這很了不起。世界人民今後要獲得總的解放，確實是要經過很長時期的摸索的。根據世界各國的現狀來看，要想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讓各地都推翻舊政府，成立新政府，「解放」全世界，根本上就不是那麼回事，全是空想出來的嘛！現在有很多地方二戰後新成立的政府，屠殺、掠奪往往比原來的大得多，誰也勸不住。殺老百姓是「內政」，不得干涉。世界各國、各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可謂千差萬別，形勢已經很清楚了：由某個階級進行世界暴力革命，已經沒有這個可能——本來就沒有這個可能，現在更加沒有這個可能性了。現在，全世界人民希

望能保持溫飽，沒有內外恐怖的威脅。要達到這個目的，從現在起，天老爺，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中國的領導人從鄧小平起，在這方面現在是相當重視實際了，覺得世界現在已經沒有可能通過甚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來「解放全人類」了，而只提出實際上有可能爭得的建立和諧世界的口號。只要世界能夠真正和和平平，有些地區就有可能慢慢得到一點發展，那裏的痛苦、犧牲就可能慢慢減少一點。越搞世界革命，流血越多，痛苦越大，給世界帶來的破壞越深。經過一戰、二戰，到現在八九十年了，對這些問題，如果還不敢表示一點真實態度，還是根據老尺寸，把近一百年的世界歷史事實視若無睹，一天到晚仍然堅信和號召取得世界無產階級武裝革命的勝利，這樣的獨角戲再唱下去，唱的人就第一個不相信，聽的人誰相信呢？

二、兩個「和諧」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我以為，自從馬克思創造馬克思主義以來，最大的繼承和發展，不是列寧，更不是斯大林，當然也不是上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國，因為中國那些時候發生的那些大事，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惡作劇。歷史上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等，其實很難說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也都各是一種新的理論。你說它是比馬克思主義更偉大的理論也可以，因為它們都在實際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它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蘇聯也始終只講「列寧主義」，偶爾這樣寫：「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說，是中國發明的，抗日戰爭前中國絕沒有這個說法。抗

戰初期或者中期，在延安漸漸出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連中間的破折號也取消了。因此它是創自中國，它的故鄉在中國。蘇聯並沒有接受這個東西，他們認為列寧主義比馬克思主義高明得多，所以他們只講列寧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希望建立的社會，絕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絕不是一天到晚你打我，我打你，你告密我，我告密你的社會，絕不是「克格勃」統治一切的社會。現在中國黨中央敢於提出這樣國內與國際和平或和諧的兩個口號，在我看來，這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過去一切只向專政方向發展的東西，均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絕不是專制，更絕不是個人的專制。秦始皇加馬克思，是絕對不可能的。秦始皇不可能加億萬分之一的馬克思，馬克思也不可能加億萬分之一的秦始皇。秦始皇和馬克思的統一是絕對的荒唐。而現在，中國黨中央提出這兩個和平口號，我感覺到確是在向馬克思本來的思想接近了。

這樣的大事，最後產生在中國，我為此感到很高興。我想，這跟我們民族文化中優秀和美的那部份底蘊，恐怕多少有點關係。因為這兩個口號同時是我們悠久文化中最優美、最善良部份的繼承和發展。雖然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教訓也太沉重了，但可能正是由於如此，所以我們在理論上產生了一個帶飛躍性的歷史進步。當然，這個口號提出後，也常有人利用它們來壓制老百姓。老百姓受盡欺淩，起而開開會、請請願，執權者就説，破壞和諧，加以逮捕。甚至連和平上訪也不准，這就是新瓶裝舊酒，反倒更可怕了。

但是我們有些理論家喜歡這樣講：現在固然正確，過去的那些鬥爭也是少不了的，必須要經

過那麼幾十年殘酷酣暢的鬥爭，遍地流血才行。一定要這樣嗎？絕對不是。以柬埔寨為例，殺人成職業，就把自己搞垮了。中國之所以沒有被搞垮，是因為老革命家們終於把江青捉起來了。如果江青這幫人真得勢，不把中國變成一個大柬埔寨才怪咧！他們在處決人時，已經在全國向喪家徵討兩角左右的子彈費了，國不成國了！不僅僅小國，大國也會自我滅亡的，蘇聯不就自我滅亡了麼？

三、「共產主義」是一個科學性不夠明確的、還弄不清楚的概念

再說說甚麼叫做「共產主義」吧。

「共產主義」這個詞，究竟是甚麼意思？可以說，沒有人把它說清楚過。我們叫「共產黨」，其實我們的最低和最高綱領，從來都不是「共產」，與「共產」沾不上邊。不僅如此，我們還一定要時時痛駁「共產」之說。我問過很多精通各種外文的人，「共產主義」是從哪裏來的，真意如何？回答都是原意跟「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大是一回事，中文很難表達原意。因為它的原意很豐富而模糊，並不只是個財產問題，比財產豐富得多，有點類似於中國人講的極樂世界、大同世界之類。總之，我們的最低綱領，最高綱領，都絕不是中文的「共產」。因此，中文的「共產主義」這個詞，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找不出明確的科學含義的。東歐的那麼多共產黨，倒覺得名稱怕人，不少都改為工人黨、統一工人黨、勞動黨等等，連阿爾巴尼亞也改勞動黨

了，就是因為「共產」二字不夠科學，又很怕人。二三十年代開闢土地革命根據地，三四十年代開闢抗日根據地，以及四十年代末與五十年代初，大搞土地改革時，工作隊下鄉就必須大駁「共產」之說。我也駁過，因為人人都怕你來共他的產呀！

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解釋究竟是甚麼？他們的書太多，我不敢妄議。我只感到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過兩個意思。一個意思講，共產黨的全部綱領，歸納為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後來由此又演變為消滅私有財產。然而甚麼叫「私有財產」呢，難道一切生活資料，不算私有財產嗎？在當代乃至今後廢除得了嗎？在當代，很明顯，一個人有房子，有汽車等等，這總是私人財產吧。特別是住房，不屬私人所有的話，必然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極大的浪費。孟子說過，「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一個「遊民社會」，去實現甚麼「共產主義」呢？只有大破壞，「無不為己」。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講的取消一切私有財產，現在的確是很難理解其真意了，因為他們一字也沒有解釋過。我們長期把廢除私有財產變成一種牧歌似的東西來歌頌，蘇聯的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中說：除了牙刷一切都是公有的。他這是瞎嚷嚷，而他自己在蘇聯是一個有大特權的人，中國還沒有他這樣的人，他是斯大林在一定時期特許的。他的外匯，特別是法郎多得很，他幾乎年年要到法國去度假。

《共產黨宣言》中的另外一個大概意思是，實現共產主義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將成為全社會成員共同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具體文字我背不下來。這就說得比較哲學化了，抽象得很，

也很難懂，我也不大懂。在中國來講，那就是比中國的泛愛主義、人道主義、自由平等、世界大同、人間仙境等所有這些美好的事物集中起來的東西還要好的東西吧。但是這是純哲學的，甚至是純藝術性的描寫，大體是只能意會而難於言傳。

我說這些，是想說明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給我們規定過一個共產主義的標準、藍圖、設計書，他們自己也沒有這個東西。你要搞教條主義，也搞不出來。根據馬、恩《共產黨宣言》的精神，限制剝削，人人能過物質比較豐富、精神得到解脫的生活，已經不得了了。至於甚麼是「共產主義」，再過幾十年，恐也說不清楚。它只能靠人類的實踐來創造，而絕不是去找馬克思或者列寧的一句話來定案。要記住：人類絕不是為了馬克思而活着的。以馬克思之明達，他也絕不可能要求人類今後句句照他辦。天下未知的真理，比已知的真理多得多，馬克思不可能替我們解決未來的一切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二人也有很粗疏的地方，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第一版第一句：「自有人類以來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是原則性與常識性的錯誤。因為各種生物進化學說已有兩三百年了，雖然真正科學的即能夠解釋進化動因的，非目的論的生物進化學說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等書是在宣言發表的第二年即一八五九年才發表的，但人類是由非人類的動物進化而來的思想已經不算怪說了。原始的人類有甚麼階級鬥爭呢？「宣言」作者馬克思、恩格斯難道不懂這些麼？不僅僅是粗疏，而且是感情用事才會如此。

四、世界上原則上只能改良與漸進，沒有見過甚麼地方因採用突進辦法而取得重大成就的

二零零七年，理論家、老黨員、人民大學的前副校長謝韜同志寫了篇長文，叫〈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大膽放言，忠心赤膽。「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歐洲各個國家的工黨繼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一種普遍提法。這些工黨或社會民主黨的名字很多，但基本性質是差不多的，有的辦公室仍掛馬恩以至列寧的像。現在的歐洲，事實上已經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政黨在執政，原則上早已在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性質的一些綱領。它們沒有取消私有財產，但是，人民的福利，從出生到死，都是比較安排周到的。謝韜這篇文章就介紹這些。指出過去罵人家是叛徒不對，他們是緩進的，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這篇文章發表後，得到了很多人的稱讚，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所、大學立即起來討伐他。那時我正在住醫院，看到有些人上綱上線的批判，擔心又來一個甚麼運動。但我注意到上面對此沒有做聲。我覺得這真了不起，值得高聲叫擁護。幾天後，罵聲戛然而止。過去一個討飯辦學的武訓，也可以在全國被罵幾十年，似乎是人間第一壞人，用紙不知可以繞地球幾圈。此種奇景，今後不大可能會再來了吧。謝韜是有資格做第二個武訓，第二個胡適，第二個胡風，第二個周揚的，但他終於沒有做成，證明中國歷史終於前進了，真是值得大慶特慶的。如果謝韜被打，國家又得沉默幾十年。

我講這點是說，我們中國今後倒不一定要叫「民主社會主義」。因為這個名字從列寧開始罵起，罵了一百多年了，我們接着罵，也罵了七八十年，罵它比法西斯主義還要壞，現在回過頭用「民主社會主義」這個名字，自然大有難處。我們未來的社會發展，叫「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最大「特色」是甚麼？講了這個詞多少年，解釋似乎未有過，現在似乎稍微明確一些了，就是建立和諧社會。也是一個漸進的社會。

歐洲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者叫工黨可以供我們參考的東西很多，但是中國的情況，跟北歐那些較小的國家太不一樣，處理我們國家的問題，比他們困難千倍。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了：它們不是敵人，而是大有可學之處。中國只有逐步地改良才是唯一的正確前途。中國這麼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是絕對來不得任何動亂的，小動亂也不行，尤其不能天天自上而下馬不停蹄地自己發動大動亂，只能實行逐步的改良。「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類「理論」，恐怕在全國是再無復活的可能了。人們可望不再冒着炮火前進，不再帶着枷鎖跳舞了。

世界也一樣，世界也只有逐步改良，才可能有共同的發展。你罵我是個改良主義者，那我也沒有辦法，馬克思主義就不准改良嗎？「世界革命」不是翻煎餅，這面烤一烤，翻過來再煎一煎就成了，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但有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實際還在講這些東西。主張改良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嗎？反不反馬克思主義，決定的是人民的最後利益。有不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其實最堅持的是斯大林主義，因為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斯大林那裏學來的，同我一樣。不過我改了，有些同志仍堅持那一套（有人說，你這就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那也無所謂。你

不「背叛」斯大林，成得了馬克思主義者？）。說我是斯大林的叛徒，光榮得很；要說我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那就不合事實。因為我的理想原則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理想。

其實，斯大林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一九二四年，他在與托洛茨基鬥爭中，有過一系列的講話，匯為《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其中有一長節，叫〈戰略與策略〉，這節中，他就提過一個極端錯誤、危害無窮的理論叫做「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十年以後的運用，就是說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比希特勒的法西斯黨還壞，幫了希特勒的忙，也貽害天下無窮。斯大林講的這套荒唐到極點的理論，就是他指揮世界革命的經典理論，中國的王明，不過是在傳達斯大林的旨意罷了。但同時斯大林又在此文中，清楚明白地講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唯一正確的工作方法，就是逐步改良。這可講得好啊！可是就這麼講了一次，他一生不再持此意了，而且也決不准他人再引用此意。我在一九八零寫過一篇文章，題作〈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唯一的正確工作方法——逐步改良〉，投予《紅旗》，未登，全文發表在他們的內部刊物《紅旗未刊稿》上，有幾千字。估計全國無一個報刊會登的。因為中國歷來把逐步改良與反革命看成一回事了，這個損失就大了。

五、兩個「和諧」從理論上保證了中國在政治上不會有倒退的前途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着重說明一點。我以為，在中國要建立「和諧社會」，這不僅僅是「文化革命」結束以來最重大的歷史收穫，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自取得政權後到今天作出

的一個空前的重大的決策，八十八年來，誰敢講和諧這兩個字？打倒江青幫反革命以來，又誰敢說和諧這兩個字？現在，中國找到了一條新路，決定在國內建立「和諧社會」，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永遠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永遠不再強調搞階級鬥爭，挖去這條天天內鬥的孽根，這塊危險的癌細胞，從根本上改為強調和諧發展。在打倒了江青幫以後，鄧小平同志以超人的勇敢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流」這個偉大的口號。我以為這就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和根本精神，它同時也為今天的兩個「和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它受到了極大的干擾，不斷提出的反「精神污染」，反人性論，反人道主義，以至反改革開放等等，氣勢洶洶，使得打倒「四人幫」後出現的一派新思想，新氣象，幾乎被打下去了。這個思想理論干擾的時間不短，籠罩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些直至今日。堅持者雖然不會再公開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了，但實際上仍然處處強調階級鬥爭。

我一見到報上「和諧社會」這個提法，就像成仙成佛一樣地大歡喜。因為，每個中國人，至少像我這樣的人，心裏邊還是擔心：會不會有人在哪天又要發動甚麼全國性的「階級鬥爭」呢？因為這個東西實在是太誘人了：只有殘酷無情的鬥爭，才能保持殘酷無情的集中權力；也只有殘酷無情的集中權力，才永遠需要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但是，「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就從理論上講明我們奮鬥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而且是長期的，永久的，而不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和諧社會」就是要弱化、軟化，消除可能的或已有的社會矛盾，而絕不是加劇和擴大社會矛盾，非鬥得個酣暢淋漓，不可收拾不可。

有些讀者很可能討厭我兩次用了「偉大」這個字眼。我估計其中四十歲或三十五歲以下的朋友居多，因為他們不知道「不和平」的日子是個甚麼樣子。「和平」在中國首先是「除弊」的問題，中國要再不保持永遠的內部「和平」，再出現已經經歷過的某些歲月，那麼「江山如此多嬌」就要變成「江山如此多焦」了。難道國內的「和平」發展，不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嗎？

同時，我要特別聲明：「和平」在中國根本上是上對下、官對民、權力者對非權力者的問題。下對上，哪個有敢不「和平」的？鬧事？誰在鬧事？例如，你把人民的哪點土地——命根子事實上無條件或半無條件地拿走了，受害者冒死聚眾請願，這就要武裝解決問題嗎？這同「和平」解決國內矛盾問題的大方針是一致的嗎？人民甚麼都只能無條件地服從，這叫「順民」，有悖於當代任何先進民族的素養，我們決不要這個東西，這樣的國家強不起來。十三億順民，何以在當代及今後的世界上立腳？人民需要的絕不是單方面的、無條件服從的「和平」。如果把「和平」只往這方面解釋，那就變得對人民不講和平了。

黨中央提出建立「和諧社會」，我們要爭取它半實現、基本實現就不錯。要完全實現，跟民主分不開。沒有民主的選舉，沒有直接選舉撤換人民代表的制度，沒有競選，沒有人民對官員嚴格的監督制度，而只有集中所有權力的到處存在的越來越發展的「一長制」，那麼這個選舉只是在報紙上忙幾天，老百姓是不會感覺到甚麼的。我們要求的安定是上下一致，尤其是要使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內心能夠比較安定。標準是：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有房子住，有醫療衛生保

障，然後他就絕不想去做一個甚麼階級鬥爭的工具，不願被人家拉着，一天到晚被人鬥或去鬥別人了。「衣食足，禮義興」，大家都富裕安定了，還鬥甚麼？還打甚麼？我們的歷史也要從根本上改過來，讓學者們講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只講甚麼黃巾史、黃巢史、張獻忠史、洪秀全史。我們如硬要堅持那樣的歷史，我們就團結不成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時，我們自己也就成了動亂拜物教，有甚麼好處呢？「動亂拜物教」，可能是個新詞，我們要研究歷史，不同這個理論告別，就不要想把全球的華人團結起來。

我能夠在生前看見這兩個「和平」或「和諧」的口號，內心裏確實感到非常安慰。對我來講，這是此生所能收到的最好的信息了。光是說經濟怎麼上去，是好，但這不夠，因為隨時都可能動搖這個東西。現在我們黨把這兩個口號莊重地宣示天下，至少在中國，把內部相互殘殺、互相消滅的這種可怕前途，從理論上、根本上把它否定了。須知，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的三十年，和結束後的又十幾年，還是非天天鬥、月月鬥不可的理論在決定一切，言「和平」、「和諧」都是罪呀！我現在死去，就放心得多。如果國家的前途大體上不會大逆轉了，這不就可以落下多年來高懸着的那顆心麼？還有甚麼捨不得的東西呢？

多年來，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的主要內容究竟是甚麼，我問過很多人，同我一樣，都回答不出來，說沒有聽傳達或解釋過。現在，我以為好了，包括國內和世界在內的這兩個「和平」或「和諧」，不就能夠相當扼要地得到回答了麼？

當然，國際和平相處，是我們必須用盡一切力量去爭取的，但它不決定於我們單方面的希

望。因此，只有加強我們足夠的自衛力量，才能希望取得和平的生存環境。當前已經形成了這麼一種國際環境，中國越弱越不利於國際和平。

我明確地、堅定地擁護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央同志提出的以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為目標的偉大決定，我們應當努力從各方面正確地去逐步實現這個決定。

後記

李晉西

在朋友的建議下採訪曾彥修老師，並做一本訪談錄之類的書，無論是朋友還是我，都知道此書是為了保存（搶救）有價值的記憶，出版比較艱難。而希望曾老師接受採訪，也費了一些周折。託了幾位朋友，他同意了。從開始到結束，他總愛說：「你做這些有甚麼用呢。」我知道他的意思。

採訪是從二零零八年七月開始的，十一月結束。幾乎每個週六和週日的下午，我都揹着電腦，帶着錄音筆去北京南邊方莊曾老師的家。客廳有張長方形的膠合板大桌子，他坐長的一邊，我坐寬的一邊，一坐就是三個多小時。

開始我曾擔心曾老師的記憶，因為他年近九十。但我很快發現，他的記憶可以說是超常的。他手邊沒有一本書，所有的書都打包裝箱準備搬家，而他說到一本書的一篇文章，八九不離十。他審核文稿時，如果我稍稍把他的「記憶」挪動一點，他都會「恢復」原樣。用他的話來說，「很多事像刀刻的一樣」，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曾老師的講述極富感染力。在講到「故事」高潮時，他提高聲量，有時還輔之以手勢，完全沉浸在講述中。家中女工來提醒他血壓高，他講到關鍵處，又完全忘記了。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整理，又經他修訂的《微覺此生未整人——曾彥修訪談錄》，就非常具有現場感。我相信，讀完這本充滿不屈和希望的書，讀者能感受到這一點。

為了這樣一本講真話的書，我要感謝曾老師，謝謝他接受採訪。我還要感謝朋友，感謝讀過此稿的內地編輯及相關出版社的領導。儘管此書最後來到香港出版，他們的努力，我要銘記。

最後，感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此書。拿着香港版的《微覺此生未整人——曾彥修訪談錄》，面對九十二歲的曾老師，雖然仍內疚忐忑，但好似稍稍安心一點了。

二零一一年二月

附錄

「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運動是一九五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展的一場政治運動。「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整風反右運動（肅反）

「整風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一九五七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性大型政治運動，是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前者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後者主要結果是給中共黨外、黨內大量人員確定了「右派」身份。對於反右運動，改革開放後，中共承認「反右擴大

化」，給大批「錯劃右派」予以「改正」，未被改正的右派「維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

四清運動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着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百分之二十（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八零年代初發起的抵制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運動。一九八三年，中共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作出決議，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為作鬥爭」，會後，鄧小平、陳雲也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

清除精神污染主要在理論界和文藝界中進行，在該運動中，很多文藝作品遭到批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微觉此生未整人　曾彦修访谈录
作者=曾彦修口述；李晋西记录整理
页数=512
SS号=13811660
DX号=
出版日期=2011.08
出版社=天地图书有限公司